

現代政治

進步學社發行

現代政治

A GUIDE TO
MODERN POLITICS

By G.H.D. & M.I. Cole

東北大學圖書館

王聿修譯

進步學社叢書第一種

出版預告
進步學社叢書第二種



自由與組織
Freedom versus Organization

1814-1914 百年政治變遷史

羅素 (B. Russell) 著

王 聿 修 譯
王 純 修

目錄

頁

譯者例言

一

蕭公權先生對於原著的評論

二

原序

六

卷一 二十世紀的政治

第一章 現代政治的基礎

十一

第二章 向議會制度挑戰

四二

第三章 今日之政治思潮

五四

卷二 政治機構

第一章 議會制度

六九

第二章 獨裁制度

七八

第三章 政黨與政黨制度

八九

第四章 政治領袖

一〇一

第五章 地方政府

一一二

第六章 政府與機能團體……………一二三

卷三 國家的理論與實際

第一章 國家……………一三五

第二章 主權國家與其鄰國……………一六一

第三章 帝國的國家……………一八五

卷四 政治原則

第一章 社會的基礎……………二〇一

第二章 秩序與自由……………二二一

第三章 平等的問題……………二三〇

第四章 工作與閒暇……………二三八

卷五 未來的展望

第一章 政治行爲……………二四五

第二章 民主政治的問題……………二五八

第三章 議會制度與自治……………二六六

參考書目……………二七九

譯者例言

一個健全的現代公民，至少須具有相當的現代政治常識。我國一般人的政治知識確是太貧乏了。這固然有種種原因，但可供研究政治的書籍的缺乏，亦是原因之一。往往在歐美一連出六七版的名著，而在我國却極少有人讀過。這一部分是因為西文書籍價值過昂，一部分是因為能讀西文書籍者究屬少數。譯者是研究政治學的。因鑒及以上原因，決意選擇有價值的政治書籍，介紹與國人。第一冊選定本書。第二冊選定英人羅素的『自由與組織』，並已脫稿，不久亦可與讀者相見。

譯者所以選定本書的原因有二：第一，本書對於現代各種政治制度有精到的分析，值此世界多事政治嬗變的時候，人人都有一讀的必要，藉可明瞭現代政治的趨勢，即使我們不一定完全同意原著的建議。第二，本書係用通俗文字寫成，專門術語極少，不但可作大學參考書，亦可作一般人的很有興趣的必要讀物。

誠如吾師蕭公權先生所說，本書原著中分國敘述一卷實不必要，且著者的供獻不在此卷。此外，譯者並認為此卷含有濃厚的時間性，故畧而未譯。

譯者課務甚忙，費時半載，譯稿始得完成。在文字上竭力避免滯澀難讀之弊，但又務求與原著逐句符合，庶免失掉本來面目。譯文詞句全是幾經斟酌過的，並且經過二次校對。但譯者仍恐譯筆有未達之處，讀者如有指教，譯者竭誠歡迎。

二十五年十月一日

蕭公權先生對於原著的評論

柯爾君原爲同業組合社會主義之重要領袖。自一九二五年全國同業組合協會(National Guilds League)解散後，此派之實際運動已告結束，而柯爾君之思想亦略有轉向。在『馬克思之真諦』(What Marx Really Meant, London; 1934)一書中柯爾表示其完全接受辯證之方法。至於階級鬥爭之理論，作者以爲不特不能應用於歷史上不同文化遭替之過程(例如羅馬衰亡與歐洲中古之際)，亦且不能吻合十九世紀末年以來近代社會變遷之情形。辯證法爲馬克思之精華，其餘皆其糟粕。取精去粕，既所必需，則居今日而談社會主義，殆無人不應取改訂派之途徑也。『現代政治』(註)爲柯爾夫婦合作之書，其觀點與此大致相同，而參以同業組合之理想。作者對於社會之經濟基礎及階級構造均加以詳細之分析。然全書之主要目的(據作者聲明)在以客觀之態度討論現代各種政治制度，藉覘今後之趨勢，以作留心政治者之南鍼。書凡六卷，前三卷敘述十國政治各方面之組織與情形，後三卷則發揮作者之意見。大體言之，作者之貢獻在後者而不在前者。作者所述十國政治，不特包括歐美列強，國難嚴重之中國亦預其列。此未始非一新穎可喜之處。然恐見以爲此三卷中分國敘述之一部分工作似非必要。蓋在此有限之篇幅中殊難對諸國之詳情充分解釋。此書既非教本，則不如假定讀者已具各國政治概況之知識，不勞贅述。既省作者之筆墨，亦節讀者之時間也。前三卷中每有先後重複之處，正足以見第二卷分國敘述之非必需。……雖然，作者有一重要之結論，不可忽視。作者總括現代政制，分爲三型。一曰議會制，以英法美爲代表。二曰汎繫獨裁制，以意德爲代表。三曰蘇

維埃制，以蘇俄爲代表。此三種政制方爭長於世界之中。孰得孰失，決非可以片言裁定。蓋一制之形成，自有其特殊之背景，非任意抄襲或模仿所能辦。國內時賢近曾注意於民治與獨裁之問題。本書對於二種制度之背景組織運用皆有所說明，或可以供討論之參考也。

自第四卷起作者提出其綜合之意見。作者首先說明共產主義之國家觀而加以評駁。作者以爲國家爲壓迫工具之說在帝俄國家中尙可適用，然以之解釋其他採用民治制度之國家則感覺不合。在此諸國家中階級對立之形勢，固已不十分顯明，其政府且逐漸演進，成爲社會服務之工具，並非純以壓迫或剝削爲目的。共產主義在此諸國中一時難於盛行者其故在此。

作者所持國家之觀念大體上仍爲同業組合社會主義之觀念。簡言之，作者以爲任何國家皆含有強迫與同意之成分，天下固無專賴壓迫而可以久存之國家。即號稱專制之政府實亦得有一部分人民之同意。所謂民主政治，不過使同意之成分更加擴大，以普及全民爲最後之理想耳。雖然，民治之真諦不僅在選權之普及而尙有其他之問題。(一)在代議制度之下吾人不僅承認個人之意志須有表現之機會，最要者乃在如何使社會中有組織之團體利益各有發言之權利。蓋代議制度之目的不在代表個人之意志而在代表社會中之官能。作者慎重聲明，此種同業組合社會主義之官能代議原則，與汎繁主義之組合國家(Corporative State)觀念貌同而實異。前者所提倡之代議制不分勞資之界限，而依據平等之原則，使每種工業中之全體人員成爲一自治之集體。後者之法團(Corporations)根據勞資階級之界限，使少數之資本代表與多數之勞工代表有同等之勢力。此其不同者一。前者放棄一元之主權觀念而承認一切官能團

體之自治權。後者以一切官能團體付之於極權國家之操縱管轄。故後者不特非社會主義亦未嘗充分認識官能之原理。此其不同者二。

(二)代議制之另一問題爲如何使議會有充分之能力以應付現代國家服務之需要。欲救目前議會事繁力絀之弊，厥途有二。一爲增加行政部權力以減輕議會負擔之官僚政治，一爲根據官能原則之分權制度。前者雖有風靡一時之可能。然末流之弊必至於使議會制度之本身歸於消滅。吾人應知。在議會制國家中一部分人士表同情於汎繫主義之故，並非真欲排斥民治，實不過爲反抗議會無能之一種表示而已。欲避免一切形式上之獨裁，保全議會制度之生命，惟有採用官能之原則，實行分權之改組。

作者既將國家之性質說明，乃於第五卷中提出政治之原則。作者同意於社會主義，承認一切社會皆有經濟之基礎。然作者以爲人類之生產工作，不僅以滿足物質需要爲目的。大略言之。文化愈進步則生產工作用於滿足物質需要者之比例愈小。同時社會中人因財富分配之不均及分工之必要，而形成不同之階級。階級之最初形式始爲男女間之差別。男子自任游獵爭戰之工作而成爲優越之階級。此後文化漸進。經濟生產之方式漸變，男子不得不替代婦女，自任農工之工作。於是男子之間亦發生階級之差別。所謂社會階級之經濟基礎。其來源如是。雖然，階級之源起與發展處處有經濟之背景而未必處處以經濟爲目的。其實階級發生之原因出於人類貪利之心者殊不如貪權之心之更爲重要。此種事實今日依然存在，富商大賈之所以爲人欣羨者不徒以其多金，而更以其金錢所博得之勢力與聲譽。吾人須明此理，然後可以談經濟史觀而不陷於錯誤也。作者非謂經濟之不平等及階級相對立之弊爲不重要。經濟不

平等既爲一切不平等之基礎，則改造社會之道，除廢除生產私有而實行社會化以外實無他途。所謂社會化者，其主要之點在生產工具之集合管理與資財收入之集合分配。（作者並不主張取消私產，實行共產制度）。經濟之根本不平等一去，則社會之階級差別亦同時消失矣。

將來社會組織之內容如何乎？作者亦有簡要之說明。傳統之議會主義本不盡合民治之原則。蘇維埃之組織適宜於政治能力較低之民族，似非理想上完美之制度。況繫獨裁更不足語於民治。蓋民治與集權根本不能相容。真正之民治社會當容許種種不同團體之存在。且使每一團體皆有自由之行動，每一團體皆能表現一羣公民對其共同服務或共有利益之全體態度。每一公民因其服務及利益之需要可任意同時參加多數之團體。作者對於國家在此『民治』社會中所佔地位如何一點，並無十分具體之說明。作者謂新社會之組織或有略似議會制度之處。然將來議會工作之大部或幾乎全部將轉移人於各自由團體之手。人類之需要隨時變易，故自由團體亦隨之而創造，而消滅，而改換，殊無一定之地位。政府之構造將失去整齊之形式，不復能於憲法教本中加以簡括之說明。作者之理想社會如此。在極權國家。獨裁制度。統制經濟等趨勢風行之今日中聞此讚揚分權之反抗呼聲，令人頗有新奇之感。……

轉錄社會科學第一卷第一期——

註——爲與本書譯名符合起見，此處略去「指南」二字，特此聲明。

原序

生活中叫做政治的一部分，現在正在變得十分的廣大和顯著。人民日常與國家在政治方面的接觸日漸增多；政客或政治家越來越被認為最不相同的各種問題的專家；政治越來越參進和影響成百萬的人民的生活，這些人在過去的時代，從生到死與政治機構不發生關係。實在，許多年間政治的範圍在大不列顛與合衆國所受的限制，遠甚於在歐洲大陸的一些國家；例如，在整個工業和金融範圍內，政治的控制久被限制到極小的限度。雖然，甚至這兩國內的情勢也在穩健的變化着。假如我們暫時撇開大戰的特殊經驗以及社會主義的政黨所提出的一切方案不談，我們發見過去五十年中，在大不列顛，直接政府的範圍以及晚近政府的干涉工商業問題，都有極大的擴張。在大戰以前，『官僚政治』的增長，是個人主義的資本家時常指摘的題目；大戰以後『官僚政治』繼續增長；同時合衆國（大家這樣稱呼牠）好像是在一個從高度放任主義（Laissez-faire）一大步跳到部分的國家統制制度的進程中。

然而，這些轉變和發生於俄羅斯、義大利、及德意志的更大的轉變相形之下便失色了。共產制度與法西斯制度根本有很大的不同，但牠們有一點相同，就是在這兩個制度中，國家不僅是無所不能，而且無所不入。牠積極的參與生活的一切方面。在一種意義上，問一個俄國人或義大利人政治（譬如說）和經濟的分別，是無用的。因為在他們的國家中，一切都是政治的，都受政治國家的代理人指導和控制。我們亦不能鹵莽的說，這種發展限於前面所說的三個國家，因為共產主義明說是一個國際的信條，並且，我們近來所見到的法西斯主義，雖然是反國際的，却有

高度的傳染性。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一個前此穩定的國家，都可以發覺牠的政治制度忽然自己擴張到牠的整個的社會生活上。並且，不論這種事情發生與否，我們可以有把握的說，政治機構絕不會從牠已取得的地位，再倒退回若干年。無政府主義者和那些認爲政府是有害的人們，如何伯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必定死而不安；因爲現在的一切轉變，以及大多數計劃中的改革，都趨向於使政府的權限增加，而不是減少。

不僅政治範圍有幾乎使人不相信的擴張，並且政治制度對於個人的積極的影響和積極的要求，亦有極大的增加。法國在法國革命以後以及在革命戰爭期間，是『民衆』族國主義的第一個大規模的例子。就是說，一個族國主義，牠至少在理論上要求全體民衆直接的和積極的擁護；但到二十世紀始表現出一個國家對於牠的人民的的要求是如何的殘酷，甚至在和平時期。（當然，我們都知道，戰時的『軍隊動員』在現在是指着，並且將繼續指着『人民動員』到怎樣的限度）。在英國，撇開牠從大戰得的經驗，國家的積極要求仍是比較和緩的；但在其他國家，這種程序有更遠的進展。革命的俄國，就是長期奮鬥的一幕，牠在可能範圍內盡量多取得（用武力，假如必需）牠的人民的積極合作；國社黨的德國由於用警棍驅擊，或召集活動，顯明的充分表示着牠的深刻影響個人生活的意向。在現代世界中，純粹超然派將不久就同古代恐龍一樣的消滅了。或者，假如他生存着，他將長成一個駝鳥的樣子，頭埋在沙土中，希望狂暴的風沙或許仁慈的從他身邊過去。近來流行的一個小冊子上恫嚇的說：『你可以不關心政治，但政治却影響到你。』

由於政治的範圍與親切性的增長兩個原因，現在一般人和政治的關係，較從來任何時爲多。但還有第三個原因

——近年發生的政治上的大改革。但是，使歐洲國家相繼受震動的風浪，在英國的反響是無聲無色的；不過我們不能保證我們可以逃避了牠，不能保證大不列顛能對於避免不適於現下生產能力的制度的劇烈改造，有任何優於其他任何國家處。

因為在現在的政治鬥爭與政治大震動中，沒有驚人的事情。雖然或許有許多警告性的事情。同樣警告性的和同等破壞性的爭鬥和變遷，在十六世紀遍生於歐洲。並且是多由於與現在相同的原因，即生產的發展能力強烈的要求修正不合時的社會和經濟的制度。現在常說，在十九世紀，科學和探險大大的增加了人類所支配的生產富源，致使人類前此為控制和分配牠而發展成的社會和政治的制度，證明顯然不夠用。近來供過於求和飢餓的現象，失業羣衆和使麥子腐爛及焚燒咖啡的現象。僅是這種深刻的不够用表面上的朕兆，並且社會和政治的改革，僅是企圖（聰明的和愚笨的）在尚可救藥的時候，修正制度。

無論如何，這個世界必須改造牠的制度。假如牠不要毀滅。但改造唯有根據三項事件的充分瞭解，方才可能或有效。第一，是瞭解所企圖的目標。就是改造制度，以求現在的生產能力，能充分的合理的盡其機能。第二，是瞭解一切力量和習慣，從牠們和經過牠們，或許可以產生出那必要的轉變。當然，這些力量和習慣在各國不同。因為從來沒有一次轉變，無論如何革命性的，曾完全掃除了發生這個轉變的社會內的習慣。並且在現代的世界，各國的文化制度是分立的、有強烈性的。改造者應當清楚的明瞭並且尊重這些不同的文化和制度。這一點較在以前任何時期都重要。只有政治的獸子，才提議羅馬尼亞（Rumania）與合衆國能用絕對相同的方法，解決牠們的政治問

題。

第三件須明瞭的要事，我們可以名之爲政治合作的『技術』。用這種手段和方法，可以誘導人民在爲他們的利益而設計的社會制度中，不僅服從，而且積極的合作。當然，這些手段和方法在事件與事件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有相當的不同；不過，因爲人都是人類，甚至在最極端的情形下，他們的同點亦大於他們的異點，所以有一個廣大的共同基礎。在政治動力的領域內，一個國家可以從另一個國家學到許多。重要的是，應當由學習得到。極多的意見在紙上是優越的，一到實行就完了，因爲牠們的作者永沒顧到，牠們應如何實際的變爲行動。

這個世界今日所絕對需要的，是政治動力的真實的研究。這冊書就是在這種信念中寫成的。牠不是。並且不打算是一個完全的全世界的政治指南，或者甚至一個完全的描述；因爲那至少需要這冊書的篇幅的許多倍。這冊書所企圖的工作，是敘述現代政治和政治問題內裏的真實情形，是描寫最重要的國家的力量和制度，這些力量和制度好像對於將來有最大的力量和重要性，是指示目下的變遷的最明顯主要的方向，是討論一些政治的技術問題，這些問題是任何可以立刻想到的政府，一定要遇到的。

著者常常在其他著作中說明著者是國際社會主義者。這就是說，著者相信，現在的經濟情況正需要一個國際共同計劃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競爭和利於他人的全社會或社會某些部分的被剝削，將永遠停止。在這種信念上，著者與全世界的社會主義的與共產主義的會社中大部分人員相同。但著者不是定命論者；著者相信，只有這種制度可以根本解決這問題，但著者不相信這種制度是預先命定要來的，或者沒有人的堅定合作，牠會

到來。有兩個可能。紛亂或許再來；或者至少也是極多的不必要的痛苦。

著者亦不相信，著者能預先詳細的準確的寫出在英國或任何其他國家中，這些相當的制度將變成什麼。在某些事件上，著者相信新制度將發生，在其他事件上，現存的制度將被改造或變更適應，有時這些是出於不能預知的路途。著者所能盡量努力的，是提出建議，指示轉變的方向，和描述力量、習慣、及有效的方法。著者相信，目標的認識愈明瞭，參加改造我們的政治制度並減少牠與常識或共同人道的矛盾性的人們——我們全是——的知識愈廣，痛苦、失望、和力量的消耗，就會愈少。假如這建議之中，有些因為不完全的瞭解或事先的偏見，在所建議的時間和地點，變為不適用的。我們可以記着，民族國家的預言者麥堪萬利(Machiavelli)在他自己的國家實行他的教訓之前，等候了三百年，並且，尊崇馬克思的國家，是他的信徒們最不期望的國家。

卷一 二十世紀的政治

第一章 現代政治的基礎

不論世界的政治制度在三十年的期間變成了什麼，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就是，牠與我們大多數人所習於生活於其中的那些政治制度極不相同。我們是在社會基本構造的廣大轉變中，也許變好，也許轉壞；建築未來的國家和社會所必須根據的客觀條件的造成，全依賴我們以及和我們很相同的其他男女。關於這一點，我們多多少少全都有所覺悟。我們不能眼看着，假如我們不參加調整明日社會的工作，別人將替我們調整，並且我們將必須服從他們的政治活動的結果。不論我們是否積極的參加，我們的生活和我們子孫們的生活，是正由在政治上積極活動的人們的爭持替我們決定。假如我們願意，無論如何我們能暫時對於這爭鬥袖手旁觀，雖然我們不敢確定，在短時間內牠不會強把我們拉入。但是，甚至假使我們真作壁上觀，我們也沒有逃避牠的結果的可能。因為政治爭戰雖然在不同的地域採用許多不同的方式，牠的進展却遍於全世界，並且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塊地方，一個人可以退避到那裏，並自信無論如何，牠將從他身邊過去，而不影響他的生活。在這件事上我們全有極重要的關係，不論我們覺着或願意覺着牠與我們如何的無關。只要敵對的政黨僅在小問題上意見不同，並且在不改變社會基本構造的願望上意見相同，不論那個政黨當政都與我們沒很大的關係。如果當下的政治問題深涉人類的和社會的關係的根源，並且我們在社會

中共同生活的整個基礎亦牽入糾紛範圍之內，那時的情勢就很不同了。

所以，我們這時代是一個政治時代。這主要不是因為我們大多數要作政治頭腦的人，而是因為我們被那不能避免的影響逼迫到政治問題上。我們必須調整事物，不然就得讓那種我們完全放棄不打算控制的力量，替我們調整。在某些範圍內，這些力量是與人無關的，客觀的，物質的，並且是無法避免的，但在這些力量安排下的情形之內，人類生活的調整却是人的一種工作。如果我們不參加這工作，別人將參加，並且他們所作的，將影響到我們。假如現在我們拒絕參與政治，那我們是憤世嫉俗者，對這個瘋狂的世界絕望，或者是無知無識的人——只不過是有生命的工具，讓他人替我們決定我們的未來，自己一點也不打算把握我們的命運。

大戰前的政治

我們這些年齡足以記得二十世紀初年的人們。大多數仍以爲這個最後的政治爭鬪的新世界是新奇的。並非這樣一個世界的存在是一件新鮮事。因為事實上牠是很舊的了。但我們在實際生活中遇到牠是在最近。以前只是在歷史書中。因為社會是在兩種時期交替着。在一種時期中，人們駕駛着政治的和社會的制度穩健的緩進，大多數人對這些制度很少生疑問。在另一種時期內，人們改換政治制度，並且最常在危險期間改換。十九世紀是幸運的，牠所經過的時期。在文明的世界的大多數地方，合併有空前迅速的技術進步和異常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的組織。在一七八九年和一九一七年之間，雖然文化的物質方面有完全出人意料之變遷，却沒有一個有基本政治重要性的挑戰的新思想，使牠自己得到具體的實際形式。這並非因為沒有新思想發生。例如，社會主義的成爲一種學說，以及形成遍世

界的宣傳運動，都是在十九世紀。但直到一九一七年，除巴黎市的一度短生命的地方冒險以外，社會主義永遠未能以任何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具體的表現出牠自己。一個革命思想在一七八九和以後幾年在法國有了實際的表現，從此，這個思想的勢力散布到全世界。社會主義須等到一九一七年，才得用真實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手段，作成實際的人權宣言。我們今日是生活在那個新宣言的注視之下。

事實上，十九世紀以及二十世紀迄一九一七年，是正在實現出，並漸漸在政治制度中表示出，那會成爲法國大革命的原動力的思想。無疑的，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制度和議會制度與盧梭(Rousseau)，丹敦(Danton)或羅培斯彼爾(Robespierre)心目中的。有驚人的不同；人權宣言的著者沒料想到他們是在供給機械時代的大規模資本主義以法律的基礎。同樣亦沒料想到他們是在起草現代議會制度的許可狀。不過偉大的政治思想是稀少的。並且人類對於使用牠們。顯然是很經濟的。在文化史上，一個新思想必須經過長遠的過程。並且人們使用牠的路途。是最初乞助於牠的人們永沒夢想到的。

所以十九世紀從法國革命取得的實際政治教訓，是那些族國主義的和代議制政府的教訓。他們從自由的思想作成了族國的思想。在對一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上族國是最高主權，並且是由牠自己的人民治理。從平等的思想作成了平等選舉權的思想。這種思想漸漸具體表現爲普選制度。從友愛所作出的成就最少。或許他們僅認爲是一種文詞上的炫耀。藉以湊成一個革命標語。事實上，十九世紀把友愛替出。不使牠作新三位一體（族國主義，代議制政府，和資本主義——譯者）的第三個成分。那革命性的人權宣言曾堅持友愛是自由的不可缺少的保障。實在。這『第四

個劍客』(指資本主義——譯者)變為新三位一體的達特安(D'Artagnan, 為法國大仲馬Alexander Dumas所著三劍客Three Musketeers小說中四個英雄的首領——譯者), 這個俠客, 不僅保衛法國革命的領袖們心目中的小資產階級, 而且保衛現代工業制度的大資本家和金融家, 甚至革命時代所未能處分的大地主。

在十九世紀, 科學和發明的新力量所造成的財富, 巨量的堆積起來, 受財產的神聖權利的保衛, 同時代議制政府的政治制度正在世界的文明地方接連着擴大。在西歐與合衆國, 在不列顛統治地以及甚至在南美各共和國, 社會是正向議會民主政治的制度發展。這好像是政治組織和政治原理中最終的目標, 甚至多數急進思想家亦認為是如此。甚至在印度和歐洲以外的其他屬國, 一種漸漸傾向於西方式的責任議會政府的期望, 是正在被人們堅持着。日本企圖仿照西方大工業國家改造牠的政治和經濟的制度。甚至中國, 經過一九一二年革命以後, 在歐洲的思想和歐洲的物質工具影響之下, 好像命中注定終將發展為一種議會制的國家。並且, 雖然社會主義攻擊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基礎, 但由於牠的政黨的目標是在依憲法取得政治權力, 好像牠大部分是接受, 不是攻擊, 已成立的議會制國家的形式和制度。雖然馬克思本人指摘議會制國家如同指摘資本制度那樣兇猛——他實在認為議會制的國家是推演出的政治表現——多數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在這一點上『修改』了他們主人的主義。他們在議會制的環境中工作, 使他們近於一種觀點, 就是, 以為用代議民主政治作工具, 不僅能實現社會改造, 而且能實現社會主義。除去已廢的封建專制的衛護者危險的堅持着舊學說, 僅極少數反對派攻擊議會制度; 並且這少數政治的信異端者在大多數人民眼光中, 只是偏見者或迷信者, 不值嚴格的駁斥。這個世界像一直走向議會民主政治的完成。甚至懷疑派和反動派都

不能看出有能轉移這個運動的力量。

大戰前的反對議會民主政治者

在大戰前夕，在世界的文明地方，反對議會政府（那時的議會政府）者主要來自三個區域——從封建主義者和某些與他們有聯合勢力的反動的資本主義分子，從某些左翼革命團體，以及從少數多半與羅馬天主教義有關的浪漫主義者。其中封建主義者大部分只是緊握他們的古代權勢，或者遲緩到他們膽敢的時候，對議會勢力的前進讓步；他們無疑的是處於守衛方面，並且他們正在漸漸被挫折回去。俄國和西班牙是他們主要存留着的堡壘，其次是德國和奧匈帝國，在這裏立憲政府的採行，是部分的和無誠意的。其他的憲法，連大不列顛的在內，仍保留着許多以往的封建成分，但這些成分在實際上是附屬於代議制的成分。有許多的爭鬪靜止的留在封建主義中，但大多數封建主義者沒有使這個世界返回到專制制度的希望。

在反對議會政府者的第二組中，有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人（Bolsheviks）和歐洲的各派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Syndicalist）以及美國世界工業工人聯合會。不過，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多半以為俄國在達到社會主義的過渡中，必定經過一個議會制的局面。第三組，也就是那浪漫的一組，包括着那些運動，如被摩瑞（Charles Maurras）所喚起的法蘭西行動派（Action Française），和大不列顛的幾乎是孤獨人物的白拉克（Hilaire Belloc）先生，以及他在一次返回『君主制』之後的熱望，和他的努力譴責『奴隸國家』。

甚至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俄國就幾乎有一種運動，確實威嚇着向主權國家這種佔優勢的觀念作有效的挑戰。因

爲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所必須應付的社會。實際上沒有讓他們作憲法上的鼓動的餘地。他們大多不會受以演進文詞重述馬克思主義的誘惑。這種以演進文詞重述馬克思主義，能同適當的議會制的實際調和。他們繼續認爲他們的使命是打倒和破壞俄皇的國家機構，而不是奪取和改造牠。但雖然這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多數人的態度（布爾什維克就是多數的意思）。少數人（Mensheviks）改信西歐的演進的社會主義，並且預備與俄國的自由主義者合作，建立一個正統派的議會制國家。作爲走向社會主義的第一步。雖然有列寧（Lenin）的『狂信主義』，大多數人相信，俄國的正當路途是追隨較前進的工業國家，並廢除專制政體，成立立憲議會政體。我們現在知道，在俄國，共產主義的胚胎時期是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牠實際並未出生；並且大多數社會主義者，都很少知道牠的存在。

在大戰前那幾年。極多的注意力都放在工團主義（Syndicalism）和各種與牠有關的運動上，從美國的工業工會主義（Industrial Unionism）到大不列顛的同業組合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工團主義運動的本體產生於無政府主義和左翼工會主義的結合，僅盛行於拉丁國家。並且主要是在小規模工業的工人中。法國是牠的出生地，在那裏。牠在二十世紀初年很活動，但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因大規模工業制度的興起。牠已迅速的衰落了。法國的工會從革命性的『直接行動』和想像中的『總罷工』。轉到較適中的集體爭議（Collective bargaining）方法，以不列顛的和德國的工會主義爲模範。不過工團主義在較落後的義大利和更較落後的西班牙保留着牠的重要性。在這兩個國家內，牠是無政府主義的聯盟，保持着很強的勢力。甚至到現在。工團主義者的痛恨議會制國家，甚至比布爾什維克

黨人更兇猛；但他們着手毀壞牠。目的不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替代牠，而是一齊連集權政府絕滅。他們的目的是重新組織一個社會，一個由小而自由的自治市區聯合的不嚴密的聯邦。這些自治市區是根據工人和農人的經濟團體，他們在合作制度之下控制着生產，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政治政府。他們的理想純是無政府主義的——廢除超過經濟生活的共同統制的一切政府——所以他們表示他們完全敵視共產主義，正如同在大戰前敵視議會主義和封建專制。無政府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在俄國和拉丁國家有他們的信徒，直到一九一七年才被掃除；並且到國外的移民把他們的學說帶過大西洋移植到美國。在這裏，他們的思想在很不同的合衆國的經濟空氣中，起了一個重要的變化，重新生爲世界工業工人聯合會的革命性的『工業工會主義』。在美國，革命的工團主義者遇到一個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對於這個資本主義他們的歐洲式的學說不能無實質的改變而適用；工業工會主義保持着工團主義者對國家和政治行動的敵視，主張集中的經濟組織，並根據『一個大工會』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制度。但不列顛的同業組合社會主義者引用工團主義者的意見於另一個路途，他們作成一種學說，企圖使他們同正統派的社會主義的基本主義調和。同業組合社會主義者大部分不否認國家或政治行動。但他們以爲『經濟力量在政治力量之前』，並且以爲只有以工會的行動，使工人在工業中取得控制權，工人才能用手或用腦，把他們自己放在控制國家或組織社會主義制度的地位。

極端遇合了。在英格蘭，同業組合社會主義者發見他們與白拉克先生有相同處。並且和他一同攻擊『奴隸國家』的侵害。以後在義大利，有許多舊日的工團主義者改信法西斯主義，並且參加建立法西斯工會，作爲這新組合國

家 (Corporative State) 中的份子。在法國，極端工團主義的理論家索勒爾 (Georges Sorel) 先生有一時與法蘭西行動派的天主教保皇黨 (Catholic Royalist) 聯合，他同他們的聯合，是由於共同痛恨議會制國家。摩瑞和他的浪漫的同志們並不真心要返回到大革命前的舊政體 (Ancien régime)，而是要在相當時間以前造成一種反民主政治的運動，也就是我們現在叫做法西斯的運動。他們比皇帝還保皇，比教皇 (Pope) 更天主教。(教皇終於棄絕了他們。)(他們捨去議會制度的政治合理化，訴之於本能的和感情的政治，稱讚領袖論，反對民主政治的取決於人數，並且尊崇以殺人為政治爭論的方法，藉以達到國家尚武的神聖信條。遠在墨索里尼和希特拉以前，他們發現了浪漫的利用誇張的族國主義；但遠在那時，以超過文字上的注意給與摩瑞先生和多德 (Leon Daudet) 先生的人民並不多。他們以政治的可怕的孩子 (enfants terribles，指他們的反民主政治的新運動——譯者) 為娛樂。但在一九一四年前的似乎穩定的世界上，他們好像不是危險可怕的。

大戰前的政治情勢

這樣，直至一九一四年。大多數人民（無論如何在西歐是如此）生活在一個世界上，牠的政治組織和經濟組織的主要性質，好像是穩定的並且是自己有把握的。政治所接觸的以及好像多半要接觸的，只是大多數人的生活的極小部分。大多數人所生活的社會環境，只有漸進的和次要的變遷。這些變遷斷不會攪擾了他們的生存的平穩進程。他們幾乎無問題的接受這社會環境，以渡過他們的歲月。政治制度的一般性格好像已決定了；並且好像所餘下的僅是用緩慢步驟，完成這個向純粹『民治的』議會制度的演進。有些人要快快的前進，另有些人要順此路途緩進，當

然仍有許多人完全不要順此路途前進；但甚至反對議會民主政治者，多半亦認爲議會民主政治的繼續前進，是不可避免的，並且把他們的努力集中在企圖使這個轉變的步驟遲緩。很少有關於基礎政治構造的辯論——只有關於漸次改革的次要問題的。

當然，甚至在這種情勢中，亦並不缺乏『運動』。有許多種類和派別的改造者和反動者，他們的目的都者是改革社會制度的某某特點。甚至有革命者夢想最後『有一天』，民衆從睡眠中起來，將資本主義制度消滅。有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甚至有共產主義者，雖然在那時我們不用這個名字稱呼他們。政治頭腦的人可以依自己的選擇加入改造的，反動的，或革命的運動，並且能對於他們的特殊『主張』盡量的熱心。但對於極多數的一般人民，好像沒有強迫他們參加政治的理由，除非他們自己喜歡那樣。並且甚至那些在各種運動中活動的人們大部分在他們的意識背後有一種狡猾的疑慮，就是不論他們說的是什麼，並沒有激動感情的事情真正像要發生。大多數人民讀着日報上的政治消息，很少感覺較賽足球的消息更重要。並且當他們投票之後，他們用這很相似的精神讀報。只不過暫時的關心他們選的候選人或政黨的成功或失敗。他們能夠不關心，是因爲無論那個政黨上台，不會對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同其他人民的關係，或任何他們的各種利益的追求，有很多的影響。政治是『政黨的把戲』。有時，去參加他是可笑的傻事。充其量，至於一個人隔幾年用投票表示一次自己的信念，就算完了。其餘一切，政客們自能照料，或者，更好一點，文官們(Civil Servants)會留心牠。使事情照常進行。雖然政客們有所主張。我們大多數人住在一個多麼無驚擾的邦貝城中(Pompeii，爲義大利島上一個古代城市，西歷七二年忽因火山噴發被

埋沒（譯者）直至一九一四年；並且甚至在一九一四以後，我們之中知道這次爲什麼火山爆發的人，是如何的少！

這種態度差不多在富人和窮人中是一樣的，但或者最多是在小康之家。富者不真正相信社會主義者將收沒他們的財產，窮人也不相信。大多數僱主向前途展望，頗相信終身能作僱主，或作到他們要告退享福的時候。他們可以對於增稅和『社會主義的』立法鳴不平；但他們永遠不會有一刻設想到他們將被毀滅。大多數工人亦期望以工人終身，並且還期望他們能找着給他們工作的僱主。他們可以同情社會主義的思想，但他們不真正相信社會主義的迫切的來臨。這同樣的心情存在於迅速成長的很不同的各中產階級。雜貨商人、旅館主人、旅行商人、營賭業者、出納員、會計師、技術人員、醫生、教員、文官、有小額固定收入者、和老姑娘、都幾乎無問題的接受照舊生活下去的期望，和把極相同的生活方式傳給下一代的期望。甚至社會主義者亦以爲資本主義制度內好像尚有許多生命；馬克思自己說過，沒有一個社會制度，在完成牠的工作之前，在由發展人類的生產能力的方法變爲人類的羈絆之前，曾被拋棄。

大戰前的美國

以前的一切陳述主要是依據歐洲的意見的結論。但這種陳述甚至與合衆國內意見的情況更爲適合。因爲一般的美國公民普通甚至較西歐人民更不關心政治，並且更傾向於輕視政客，雖然美國公民能隨時作特別高大的政治呼聲。這種普遍的不關心並非全由於一個感覺——雖然有這個感覺——以爲所有的基本政治問題，已由美國憲法的制定者一勞永逸的解決了。或者，無論如何，在憲法重被解釋爲南北戰爭（Civil War）的結果後，是一勞永逸的解決了

。因爲在其他許多事情佔據着人們的心思和精力的時候，人們不願受政治的撓擾。企業——特別是在異常迅速的經濟發展中個人的謀利企業——把美國的議會制度推到巨大的美國舞台的塵埃角落裏。在這種情形之下，政治被視爲一種特殊而且不高尙的事務，成爲職業政客的专业。這是不足驚訝的。這些政客認爲政治是他們用機智謀生的方法，不是政府技術的行使。左右政客的技術成爲企業技術中公認而且重要的一部分；在這種意義上，美國人是有高度的政治意識的。在他們要完成某件事的時候，他們充分的準備向政客呼喊，並且在其他方面亦如此；但他們認爲政治是一種需要操縱的外界事務，不把政治當作他們自己的集體的表現的方法。美國的政黨在選舉運動時，無疑的有廣大而能喧鬧的普遍黨徒；但至少我們可以說，那和賽捧球差不多。美國人看不出有把他們的政治當作生活藝術中真正嚴重的一部分的迫切需要。在這一點上美國人甚至更甚於歐洲人。在美國比在他處甚至更難以說出敵對的政黨代表什麼，或爲了什麼問題他們在選舉時猛烈競爭。一次美國總統選舉，完全和到了第若干盤的銀杯決賽一樣。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事件亦未能把美國人從他們的不關心政治中永久震醒。在美國參戰之後，的確有一個廣大的全國『動員』，並且所有的宣傳技術都被用於增高全國的團結意識。但當戰爭過去以後，美國人立刻拋掉他們的政治熱情，仍去『照常經營企業』，甚至較一九一四年前更熱心。一種增長無止境的繁榮好像要開展在他們面前，並且較以前更沒什麼理由可使他們多關心政客們的行爲。一九二九年以及以後的不景氣，毀壞了美國人民對於美國繁榮的無疑問的信心，震醒他們對政治的不關心。但甚至當他們已受到充分的震動時，他們發覺頗難於知道

應當去作什麼。因為他們的忘掉了真正政治組織的技術，甚至更甚於他國人民。他們有兩個大政黨機構，這兩個政黨和沒有差不多；但他們除此以外就沒有什麼了，並且沒有政治見解的背景，使新組織可以依據牠容易的生長起來。○美國的勞工工會 (Labour Unions) 除一二例外，意見完全是從企業範圍中借來的舊的。美國現有的社會主義或為歐洲運來的未經歸化的人口貨，或者形式極不完備。更沒有任何意見，使法西斯運動能依據牠召集起來，因為必須有社會主義才能使法西斯主義降生。美國人倚賴強有力的人物，並且他們所選擇的強有力的人物，自然的表示着行動堅決的顯明傾向，同時又表示着很不能確定應當作什麼。

政治與世界大戰

在歐洲，戰前的安全感覺的毀滅較在合衆國快得多，但甚至在歐洲。雖然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很久就有關於世界大戰的迫切性的呼聲——帝國主義者叫他們自己的國家武裝起來抵抗別的國家。社會主義者指責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為戰爭的孕育地——大多數人頗不能在他們的腦海內想像出一個世界大戰的真意義。他們沒有標準去較量現代戰爭的打擊原有制度的大罪惡。他們模糊的想像着戰爭是可怕的——這也可以說他們完全未想像到。他們更未能想像到世界大戰將有怎樣的結果。

甚至當戰爭到來，人們仍遲遲不能認識牠的意義。這次戰爭確乎把日常生活顛覆到出人意料的範圍，不僅影響到大部分男子日多一日的被拉人為戰鬪員，並且也影響到後防的工人、僱主、婦女、和兒童。僱主須實行國家的命令（大部分是極有利的），婦女們的工作和服務範圍突然有驚人的擴張，學校中的兒童現在被教着用一種新見地看待

海陸軍隊或軍官訓練團(O. F. C.)。事實上每個交戰國的各部分人民的日常生活都遭受到顛覆。各國人民大受震動，各團體各階級起了混合作用，幾百年的鄉村孤立也被破壞了，地球上有空前大規模的來往，非職業的兵士們對於暴力和天亡的觀念，有一種新奇的熟習。

雖然如此，能認識這個世界正在發生什麼變化的人，仍是極少數。大多數人認為這次戰爭只是一段穿插，並且預料戰事終了後，一切事物仍入於和舊日頗相同的軌道。政客們確曾作很大的應許，應許戰後有好時光來臨，但這些好時光主要是繼續過去的。有為英雄住的較好的房屋，有較高的工資，有改進了社會和經濟狀況，但一切只是繼續戰前公共政策的趨勢。生活程度在一切地方都增高了，但他仍是與以前同樣的生活，同樣把人分為團體和階級。戰前的生活程度如以甲代表，戰後的生活程度就是甲的一倍，或多於甲，但決不是完全換為乙。有許多關於恢復『常態』和『恢復戰前狀態』的言論。兵士們永久回到英國(Britain)，他們盼望他仍是他們離開他時那樣的舊英國。

無疑的只有在我們的大多數讀者所屬的國家，大不列顛，不列顛統治地及合眾國，是完全如此。法國人和比國人因這次大戰蹂躪了他們的土地，使他們對他猛然明瞭；並且使他們更實地的去設想戰爭的結果。但法國人和比國人同樣以為戰後的工作主要是重新建築所被破壞的一切，亦即多半是重造原舊的生活方式。在德國和奧匈帝國，情勢就有些不同了，並且在戰爭行將終結的時候有顯著的變化，那時人民最後開始認識戰敗的迫切。德國人的國內政治上尖銳的分野，遠較英法人為甚，德國人開始領悟到戰敗會引起關於德意志帝國基礎的問題；奧匈帝國是由不滿

現狀而且彼此敵視的民族混合成的，這時展在牠面前的形勢，是這個二重帝國的完全解體，並且把牠的土地分配給若干民族國家。這些民族國家的建國基礎都仍不確定，並且一定要引起嚴重的衝突。

同時，在世界大戰仍在進行中，俄國人已完成他們的兩次革命，並且俄國的布爾什維克（Bolshevik）革命影響了西方各國的思想，使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好像較為真確的多——最重要是在德國，在那裏這種影響再加上行將戰敗的意識，動搖了郝亨佐倫帝國（Hohenzollern Empire）的基礎。俄國人民從世界大戰受的痛苦遠甚過任何國人。他們所受的是最大的損失和最大的物質貧乏；並且沒有希望或愛國情緒來解除極多數人民的痛苦意識。俄國的工人和農人都不真正關心誰戰勝，或希望從戰爭得些什麼。他們全都只要戰爭終止。這就是發生兩次俄國革命的最重要的原因，因為帝俄和繼帝俄的臨時政府都不能繼續抗戰或使戰爭停止。在主要交戰國中，俄國是經濟上最弱的國家，所以在戰事的壓力下，牠感覺到並且開始在其他列強之前先破毀了。甚至在第一次革命前，在這個壓力之下，舊政治和經濟的制度早已走向完全瓦解；因此，俄國人較他國人容易認識出民族間的爭鬪，在文化史上是怎樣的表示着一個時代的終了和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即或俄國的農民沒有認識出這一點，僅從他們的痛苦中看出獲取土地的機會，一大部分俄國無產階級的確已認識出這一點，俄國的中產階級亦看出這一點，並且他們很懼怕。

這些中歐及東歐的騷動酵母，在那些社會制度經過大戰的試驗後僅受了打擊而未至破毀的國家中，只有模糊的認識。當戰事已完，英國人、法國人、比國人和美國人——這些國人受的壓力少並且作的事少——着手工作，盡力迅速去恢復他們仍想着說着的『通常狀態』。而且，當時這一切國家中的已成立的權威的權力，足以強使社會組織

返回到舊日的式樣。軍隊復員發生了些困難，有些罷工帶有淺淡的革命彩色，工業因恢復到平時時候的技術和取消國家的統制，亦發生困難。在政治和工業上，必須對勞工階級的要求作小部分的讓步，補救前此標出的大的允諾。但以全體而論，大戰前的構造未經多少困難就恢復原狀了。所餘的工作，只是使牠仍依舊方式實際的轉動起來。戰時的兵士又坐下來致力於和平時期的技能。叫婦女都走出了軍火工廠和臨時醫院。並且叫她們結婚，或為她們自己準備。凡社會主義者的企圖稍為超過改造派的要求，就都完全被打倒了。各國當局者深深的出了一口氣；這個『穿插』過去了，勝利是穩定了，並且資本主義仍然沒受損傷。

大戰後的歐洲

同時歐洲大陸的版圖是改變了。德國被割去亞爾薩斯洛林 (Alsace-Lorraine)，德屬波蘭各省，和薩爾（暫時的）。在一度短時間的革命騷亂之後，德國改為共和政體。大多數人民接受這種政體。僅認為牠是戰敗和國內意見不一致強加於他們的一種妥協。舊帝國主義者容忍這個共和國，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無力維持德意志帝國；但是雖然被逼着容忍牠，他們仍深惡牠為戰敗的象徵。大實業家容忍牠，拿牠當作防禦社會主義的堡壘。社會民主主義者浸染於議會式的習傳，認為牠是完成演進的社會主義必需的工具，是使各極端派站在他們自己的戰線上彼此牽制的方法。此外，無政治成見的人民們對於牠不熱心，並且對牠有此藐視，認為牠是戰勝者打算從被征服者勒索賠款的工具。維瑪共和國 (Weimar Republic) 的建立，是依照十九世紀民主政治的典型。牠從一起頭就是人人不愛的一個國家，並且不久就表現出牠的權力所能引起的忠心很微弱，所以牠易於被攻擊損傷。

在其他各處，各簇新國家的制憲工作不久都入於積極進行中。波蘭、捷克斯拉夫、芬蘭、愛沙尼亞（Estonia）、拉特維亞（Latvia）、和立陶宛（Lithuania）全是新的政治的實在形體。牠們所需要為牠們自己設置的，不僅是新的憲法，而且要有在獨立社會中人民共同生活的一切基本習慣。奧地利和匈牙利必須解脫他們的帝國的聯合，在他們的狹窄的國界內重新以卑微的形式建立牠們自己，並且是處在因經濟和政治的單位的破壞而發生的一切嚴重困難之下。羅馬尼亞和猶哥斯拉夫擴大成為有實力的新國家。在牠們國境內，有了新的少數民族和少數信他種宗教者，因此發生了紛亂的新問題。甚至因大戰而致富的中立國，在這種政治力量和政治思想普遍的改造中，亦轉而去修正牠們的憲法。最後，俄國這時在牠的共產黨領袖之下，開始安定下去，正在忙着按她自己的特別方式制定憲法；俄國的影響雖一度暫時被西歐打擊回去，却向東散佈到亞洲，並且在土耳其以至日本，引起了新思想和新熱望的發酵作用。

除俄國以外，這些歐洲的新憲法全是按照習傳的方式制定的。所有的新國家全是按照習見的議會制度建立的，僅有次要的差別。建國者甚至未曾考慮過另一種組織形式。那些有創造新歐洲的權力的人，心目中亦沒有另一種組織形式的地位。協約國的政治家常常宣言這次大戰是『為民主政治的戰爭』。並且，民主政治好像就是指歐洲分為若干族國的程序의 完全完成。這種民族國家每個都具有十九世紀民主政治的特色機關——一個兩院組織的議會，一個總統或一個權力有限制的嚴格的立憲君主，一個對議會負責的內閣，並且至少須有政黨制度。建立新國家的工作幾乎當然的被認為包括召集一個民選的會議和按照這些方式起草一個憲法，並取得這個會議的贊同。

爲制定這些新憲法，起草者掠奪了較舊的議會制國家的倉庫，從英國憲法採取一種特點，從美國憲法又採取一種特點，但大多數是按照法國政治制度起草的。大多數社會主義者亦正與其他任何人一樣，深信這是處理政事的正確的民治方法，並深信經過這種程序整個製造出來的新國家，能在牠們的綜合憲法之下，迅速的安定於在政黨制度下的議會政府的經常運用。在這樣心境之下，德意志社會民主黨人領導着創造了維瑪共和國，並且在這樣心境之下，除去俄國。每個新的或重改造的國家，都爲自己設立了一個與此頗相同的憲法，不論牠本國的大小，經濟發展的階段。或種族的和文化的一致性。在匈牙利，巴瓦利亞（Bavaria）以及在相當範圍以內在保加利亞，曾有少數短壽命的企圖。想依照蘇維埃制度的新模範建立新國，捨去議會制度的舊形式；但這些改革者不久便被掃除了。好像這一次大戰的目的是完成議會制的族國主義的構造；並且最有權威的人們，從威爾遜總統到路易喬治（Lloyd George），實在是這樣料想。克里孟梭（Clemenceau）亦代表一種諷刺的贊同。國際聯盟的本身。就是打算組織成一個準議會制度的會議，代表那些有盛行的議會制度特點的獨立民族國家。

雖然。在戰爭期間以及戰後。要歐洲大陸上大多數人民不有強烈的政治感覺。是不可能的。因爲他們的政治命運的決定。是很顯明的密切的影響到他們的日常生活。德國人被封鎖。並且處於半飢餓狀況，新的邊界上的人不確知屬於什麼國家。少數民族無論如何須使他們自己適合於在一個新國家中生活，商人遇到的是不穩定而且常變動的阻礙。消費者不能確知他們口袋中金錢的價值。農夫和地主爭土地所有權。所有這一切人和其他許多人的政治意識不斷的攪入積極的生活。歐洲大部分地方未能使事物穩定。亦未能繼續舊式慣例。每件事物都須重新安排。並且

牠的安排的方式和每個人都有關係。幾乎每個人都須是一種政客。在這些年內大部分歐洲經過了一個驚人的政治教育程序；但不幸牠的先生們所教的，大部分全出於已廢了的教科書。問題是新的，但幾乎每個人都仍企圖使舊解答去適合牠。

然而，戰後的歐洲確按照一個方式安定下來了，雖然人們不久就發現制定一個憲法和建立一個國家不是一件事。在較老的國家內，政治制度是長時期演進的產物，並且這些國家大多數在牠們變為議會民主政治之前，早已成爲國家。新憲法不能自動的依照計劃工作。並且最重要的是，臨時成立的政黨，決不能同樣的像經過長期發展程序而成的政黨在已成立的政治慣例中那樣運用憲法。假如這個新國家內部是一致的，並且假如對於特著的問題有大部分相同的意見，那麼這困難就更大了；但事實上他們之中大多數包含着很多的少數民族，這些人民，對於使他們成爲臣民的新國家的制度不忠心。結果，在政黨的成立中，差不多在一切地方，都是民族的和種族的分野切斷階級的和社會意見的分野。宗教的不同和文化水準的差異，更增加了這個問題的複雜性，並且在每個國家所興起的不是右、左、中二三個强有力的政黨，而是若干團體的混合，牠們大多代表特殊的區域見解。議會制的政府須依靠這些團體的聯合；但這樣的聯合必定對局外人軟弱，並且常常自己相爭。歐洲在大戰之後，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擔當橫在牠面前的重大工作。大多數國家得到軟弱的政府，結果是趨向於把難問題棄置不問。

俄國革命

我們已知道，同時俄國人正在以另一種激烈的方法解決他們的政治問題。舊俄國的明顯的崩潰就是一九一七年

革命的前奏曲。俄帝國的打倒並未費力；牠的顛覆便被召請來代替牠的新領袖們驚駭而窘困。他們竭力仿照正統的西歐方式，建立議會制度的假外表。這個制度只有六個月的壽命，並且永沒握着實權。俄國在這六個月中幾乎是無政府。這樣存在的政權不可挽救的分裂為二派，一方面是受驚的無助的臨時政府，另一方面是猶豫不決的工人運動。工人運動組織成時時在騷動中的蘇維埃。這種組織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當俄帝下台時，所有西歐以及甚至大多數俄國的社會主義者，都以為俄國將發展為大家所讚許的模範議會制國家，但俄國却沒有能生長議會制度的土壤。甚至在拉吳夫(Lyov)和克榮斯基(Korensky)政府之下。實權也是在各蘇維埃手裏，這時蘇維埃知道什麼是牠們所需要的。等到蘇維埃受布爾什維克領袖指揮并預備獲取政權的時候，克榮斯基的政府亦如俄皇的政府一樣，不費事的便被打倒了。新革命的建築者列寧取得權威，成為獨裁的無產階級政制的領袖。歐洲的政治家發現他們自己遇到一個完全新的國家，在這個國家中，權威既不屬於依憲法上的選舉權舉出的議會代表，又不屬於一個世襲的專制君主，而是屬於直接依據工廠和軍隊自己組成的組織，並且是由一個有訓練的革命黨領袖給與牠形式和方向。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獨裁的教條實現了，但這實現不是在無產階級多而有高度訓練的先進工業國，而是在落後的俄國，在俄國農夫的人數遠過於工業工人，並且任何形式的民治行政經驗幾乎完全沒有過。

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十月革命，第一次向世界指示出議會制度發展的程序沒有什麼必然性——議會民主政治的經驗不是社會主義成功的不可少的前奏曲，並且此後承繼封建專制的，除議會制政府以外，無疑的另有了——一個可能。但這個世界遲慢而且不情願領受這些教訓，這些教訓太與同時代的思想收獲相反。大多數人在一九一七年以後若干

年，仍預言蘇維埃政府不久就崩潰，並且說代替牠的或是權力減少的立憲君主，或是正統議會制的共和國，或者，另一個可能就是俄國分裂為像東歐和亞洲西南的那些落後的農業國家。甚至許多社會主義者，亦急忙的指示出布爾什維克革命完全不應發生，因為俄國對於社會主義尙未『成熟』，並且要使牠成熟，只有經過一個在資本主義統制下發展的過渡局面。在布爾什維克黨人自己中間，有許多人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仍懷疑獲取政權是否是一件聰明的事，並且堅決認為社會主義只能在先進的工業國設立；那些贊成獲取政權的人們差不多全相信，除非在西歐激動起連續的革命，並且由此迅速轉為全世無產階級革命，這次俄國革命是必定失敗的。在十月革命後，有一時期所有布爾什維克黨人的成功的希望，都集中在西方革命的發生。

世界革命沒有到來；但是。雖然西方列強對於俄國絕交，並且援助反革命的繼位企圖，蘇維埃制度却沒有崩潰。這個新制度已存在住了，漸漸別國的政客們不得不對這個事實妥協。並且牠成為社會主義者統制下的國家的模範。必然的深切影響到歐洲的和東方落後國家的政治思潮。這些東方落後國家的情況極像俄國。與西方工業國不同。這個文明的世界不得不默默注視這種新國家以及在地下面的新社會和經濟的制度，這些新制度與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不同。正如粉筆和乳酪不同。俄國的共產革命這般的把文明的世界帶回到極違反牠的意志的基本原則。

當然。俄國與西方的爭點不僅是政治組織的敵對形式之爭，而是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之爭。較老的議會制國家所恢復的，和歐洲的新國家所設立的，不是直截了當的民主政治，而且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在制憲程序的背後，正有一種爭鬥在進行着，要使大戰後的世界重鞏固於資本主義，或者至少要竭力使牠鞏固得足以對付勞工階級的

強烈壓力。在一九一八年，德國人相信（或者是對的）戰勝的協約國不會讓郝亨佐倫帝國繼續下去；但我們的確敢說，協約國甚至寧願有德皇威廉，不願有蘇維埃共和國。大家匆忙的使大戰後的國家建立議會制的憲法，不僅是因為要消滅君主專制，而且更多是因為懼怕社會主義的革命。

法西斯主義的降臨

戰勝的國家用種種方法得以將牠們的舊經濟和政治制度恢復原狀，而未經任何實質的改變，並且得以將牠們的特殊制度，強加於戰敗的國家和戰事結束後新創立的國家。但在恢復後的議會政體遇到一種新挑戰的時候，這種程序在歐洲多數國家很難完成。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威脅當時已被驅除；並且俄國受了西方的絕交，雖然未被克服。但正當老政治家見於從極困難的情勢得到這樣的好結果，因而緩了一口氣的時候，歐洲議會主義的聯合陣線突然在十分出人意料的地方，被義大利革命打破了。義大利在法西斯領袖打倒牠的軟弱議會政府之後，經過一個短促的過渡時期，便依據一種與議會制度及俄國無產階級獨裁制度敵對的獨裁方式，組織成獨黨制的國家。不過，這種新獨裁制度不是根據工人階級，並且牠的目的決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制度的組織。法西斯主義的活動分子主要是出自社會的中產階級及農民，並且牠接受大資本家的贊助。作社會主義的勁敵。法西斯主義興起來並發展成一個與馬克思社會主義爭鬥的制度，並且牠借剷除議會民主政治以及社會主義的和獨立的一切工會組織，表彰牠的勝利。牠的信條不是社會平等或世界革命，而是一種族國主義。這種族國主義根本否認階級差別，牠訴之於與階級差別對立的全民族共同的自私自利。

從此以後，在議會制的國家內，議會制的政府的繼續不是僅有一個可能的轉換了；有兩個可能的轉換，議會制度不穩定的站在這二者之間，維持反對革命的與反對反動的事物。這些新的法西斯運動的性質，以及牠們在歐洲的發展，從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到德國國社黨的勝利，我們將在後幾章中討論。起初，大多數以爲法西斯主義是義大利的情勢的特殊產物。我們將看到，在大戰後醒悟增加之後，尤其在一九二九年大不景氣之後，法西斯主義如何漸漸堅固的抓住其他歐洲國家。實在，法西斯主義的力量主要來源，顯然不僅在社會主義進攻的威脅。多半是因大不景氣所引起的普遍的無辦法的感覺。法西斯主義是站在富者的立場攻打社會主義的工具；但牠能在窮人中得到許多信徒，沒有他們，富者是不能戰勝的，因爲在經濟不景氣的幾年中，許多窮人在身體和物質兩方面都很可憐，他們見於社會主義的力量前進的遲緩，他們準備抓住任何能允許把他們迅速從困苦中救出來的信條。

實在，在大不列顛、法蘭西、斯干丁那維亞各國、荷蘭、以及比利時，議會制度現在仍保持完整，雖然這些國家中，有幾個國家內少數人的法西斯意見很發達。實在，在北美合眾國，這個危機未採取法西斯主義的形式，而成爲總統權力的極大擴張，並且這種權力充分的同用於爲工人和制裁工人兩方面。但堅固保有議會制度或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國家，全是那些未曾被逼到真正根本問題上的國家。歐洲的那些甚至到今天仍強烈保持着議會制度的國家，除少數例外，都是經過大戰而主要制度未受損傷的國家，並且能在許多方面循舊軌道前進。中立國如荷蘭及斯干丁那維亞各國，實際上，大戰後更較以前富足，所以也不易感受各種在失望後以敵對的兩極端爲根據的運動；雖然不景氣的幾年已震動了牠們的滿足。牠們仍有多量儲藏着的財富和牠們的舊制度背後的力量。在這個議會制國家的

集團中，比利時是一個會暫時受大戰破壞的國家；比國人是戰勝者，他們能磋商一個條件，使他們的戰前的制度重新設立起來。法國也有重大的損傷，人力的損失和極大部分土地被蹂躪。但她取得阿爾沙斯勞林，並暫時取得薩爾，並且有重建被蹂躪區域的賠款。雖然法國在人力上減弱了，但她可以恢復她的經濟力量，並可以暫時避免她的舊制度的危機。大不列顛雖然因國外貿易的脫節，受到嚴重的損失，然而她有儲存的國外投資和國的生產富源，這些大量的儲存，足以使她渡過大戰後的危險年月，而沒有深刻的廣大的痛苦。足以威脅她的保衛堅固的議會制度。我們已說過，合眾國在戰後享受到一個長時期的空前的繁榮，雖然在後幾年這盛行的繁榮印象因農業區域的痛苦而增長而受到阻止。在一九二九年銀行街（Wall Street）破產以前，美國沒有經驗到任何嚴重的不景氣，甚至到以後不景氣深刻化，美國人仍大部分太不慣於關心他們的政治制度，並且太沒有改換任何政制的準備。足以使不安的情狀形成任何實際運動，以備作基本的政治改革。當羅斯福總統在一九三三年被委託去處理這個危機的時候，他曲解美國憲法，但後來亦未發生他走出憲法以外的任何問題，或受實際壓迫的美國政治制度有任何革命性的改變。

遠東

雖然議會民主政治在這些國家中保持着完整，但牠在全世界的聲望已大大的減低了。這可以由遠東對歐洲事務近來的發展的反響，最明白的看出來。我們已看到，在一九一四年前，遠東國家的最重要的事，好像是爭着完成歐洲式的議會制度。但現在日本、中國、與印度全以牠們不同的方式，表徵着議會制度的聲望已降低了。在日本，雖然政黨政府的影子復活了，實際權力愈倒轉入軍事領袖手中，並且反對政客的武力恐怖主義有顯著的增長。日本

的『法西斯主義』與歐洲的法西斯主義不是一件事。因為牠的最大力量是在軍隊中，並且牠敵視大資本家。指責大資本家背叛國家的理想。這種理想深深的浸入牠裏面。但牠亦有與歐洲的法西斯主義相同處。牠讚美國家意識，並且堅持武力是國家的榮譽的實現。

中國在蘇俄成功後緊接的幾年中，共產主義的思想有很大的進步；雖然共產黨遭受到一次挫折。國民黨在蔣介石指揮之下，變為共產黨的勁敵。但共產黨的勢力仍很大。在中國。有鉅大的區域現在（本書原著在一九三四年出版——譯者）是在一種共產主義的政府之下。這個政府是受了蘇俄的榜樣的影響。但牠是被採行在一個農民很擁擠的並且經濟制度極落後的環境內。中國的大部分確實仍屬於（至少在名義上）南京政府。南京政府在與共產黨分裂以後，採行聯絡歐洲資本主義政府的政策。並且信賴國際聯盟。但歐洲在中國的聲譽，因國聯不能阻止日本獲取滿洲而破碎，並且中國政界的意見。近來趨向於表示願與日本修好，接受在亞洲國家集團中的次等地位。這個集團堅強足以抵抗歐洲的干涉。我們不能說，這個政策已取得任何普遍的接受，因為敵視日本和懷疑日本，在中國種的根很深；但中國人中有了親日派，無疑的是一個極重要的發展，並且國聯在滿洲的失敗，成為這個態度轉變的最顯明的理由。同時又找出另一個理由，就是西方制度的聲譽，在遠東普遍的衰落了。

印度亦感受到這個政治學說的新潮流。最近以前，大多數印度國民黨的領袖們，仍以採行一種按照西歐榜樣的立憲自治政府。為解放印度的方法。主張有民選的議會，這種議會是建築在廣大的選舉權之上，並且有寬泛的立法權。主張有負責的閣員和內閣制的政府，以及一切西方民主政治的那些熟習的制度；英國政治家草擬的關於改革印

度的各種報告，全是依照這些方式完成的。實在，印度的傑出的領袖甘地（Mahatma Gandhi）永遠反抗與歐洲思想同化，並且他對於西方成爲一個謎；但事實上甘地好像不能依議會制度去思想，這增加了他在印度的聲望，同時却常常好像使他不够一個建設的政治領袖的資格。他的抗議和鼓動的能力是無匹的，但與他交往的人們詢問什麼是他的積極的和建設的要求，常常得不到回答。現在甘地的政治領袖地位好像正在消滅中，雖然他仍保持着他的廣大的文化方面和社會方面的勢力。不過，他的權威很少轉移到舊日西方化的議會派的領袖手中，而是大多轉移到訥魯（Jawaharlal Nehru）這般少年領袖手中。訥魯的最近言論，表現着他強烈的受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訥魯曾宣布他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並且最近他說，在他的眼光中，現在印度的選擇是法西斯主義或某種蘇維埃制度。——自然是要適合於印度的需要。新印度好像漸漸不以議會制的政府爲目標了，並且漸多着意於一種改換，這種改換大部分根據發生於俄國的事實——以意大利或德意志作爲另一種可能的改換的榜樣。

政治的展望

議會制度的聲望幾乎有遍世界的低落，這必然的使政治變成不是普通人的事務。因爲，議會制度雖然反對君主專制和貴族政治，要求民衆參與政府的工作，但牠已對這種要求要協了，把廣大的民衆實際上排除到一切需要擁護的政治活動之外。牠給與民衆公民選舉權，但向他們大多數所要求的，僅是他們的投票。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正與議會主義及老式的政府相反，要求更高度的積極公民。因爲，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基礎，不是個人的或一個小團體的或一個私黨的獨裁制度，而是一個有廣大信徒的政黨獨裁制度，並且牠們向本黨黨員及那些與黨的利益有

關的人們所要求的，不僅是在牠們設立的新制度之內消極的服從，而且要積極的有力的參加。在俄國，共產黨黨員是要常常的積極參加政治工作，在一切社會生活的範圍中，充當思想上和行動上的領袖。這種積極公民的要求，亦不限於黨員；因為經過『集體組織』這種共產黨機構的無處不有的代理機關。這種同樣的要求重現於各處，變為要求為公衆熱心服務。俄國共產黨員向工人要求這種服務的理由，是說國家現在是屬於工人的。所以工人應當準備用他們所有的力量，把國家建設起來，作為謀公衆幸福的工具。在另一方面，在義大利和德意志，國家顯然不是屬於工人或人民的，如同在俄國那樣。因為在這兩個國家內，生產工具仍是私人財產，階級的不平等仍存在。然而，法西斯主義和國社主義（Nazism）二者，都向牠們的信徒要求積極的公民，這種積極的公民並非完全與共產黨的要求不同。並且牠們大部分的成功，無疑的是因為牠們能給與牠們的信徒一種意識。使他們知道工作的『主張』——這種主張要求他們為民族全體的利益犧牲和盡忠。階級的區分繼續存在，並且社會的經濟生活未能納於有效的社會控制之下。這種訴之於族國主義的情緒，是否能長久支持，尚不可知，但無論牠的命運日後怎樣，在助使法西斯黨人和國社黨人取得權勢上，牠的重要性是無疑問的。這兩個運動都找到一種感情的申訴。能指揮大量的人民，並且又為牠們的信徒找到積極的工作。不僅是選舉權。他們大多數以為選舉權是不鼓勵人的議會主義制度，情願給與他們的一切。在義大利與德意志以及俄國，握政權的政黨的每個黨員，對於建設新國家以及牠的主要機關的日常工作，都負有一部分積極的工作。並且，一個人要想在這個新獨裁制度的特權階級中得到一個地位，只有作一個為這個獨裁制度的利益的積極公民，才能得到這種報酬。假如按積極參加政治工作並協助政治制度進行的人數作為民主政

治的測驗，無疑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是比議會政制更有效的民主政治。實在，這些國家中的當權的政黨，都是全體人民的少數，所以那獨裁制度實際上也是少數人的。但這不能駁倒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積極的公民資格上超過了議會制度的一點。

雖然，現在在世界大部分地方，普通人對政治的注意和活動，不是由於他們在其中生活的政治制度的性質，而是由於他們行將生活於其中的政治制度的流行的不定性，要求他們，喚起他們。等到政治問題涉及社會制度所要採取的形式，這種申訴立刻就從職業政客和有關的少數人，遍達到廣大的民衆——不僅充當投票人。而且在投票之外須要充當有所行動的公民。政治爭鬪漸漸變得不僅影響社會組織的次要的調整，而且影響根本的關係，如財產關係的制度，和階級的構造。共產主義者是社會主義者。他們無所躊躇的去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並且堅持無階級的社會的建立，唯有以階級獨裁的過渡制度，才能達到這種新的民主政治。法西斯主義者是反社會主義者，他們準備不惜以任何手段去阻止社會主義者奪取他們的權勢，並且懷疑議會民主政治下的『自由』。爲要確定打倒社會主義者，他們自己建立了一個與社會主義者敵對的獨裁制度。共產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都認爲在眼前的尖銳化的爭鬪期間，容忍和言論自由這些自由的美德，是沒有地位的；他們都質問，如何能希望人們容忍那妨礙他們理想成功的自由？他們都告訴我們，只有在衆人接受而且建立鞏固的組織的體制中，才能讓自由存在；並且只有在由這種必要性所強制的限度內，自由和容忍才與社會的進步一致。

對着這種情形，議會主義者舉手驚慌了，雖然在他們那時代，議會曾是顯著的執行處罰者，而且仍準備處罰任

何違犯議會法典的事件。對於那些預備玩議會把戲，並且遵守只在議會方式的限度內謀政治改革的人們，這議會法典已漸包含有很大的言論和著作自由。但顯然共產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都不準備接受這些限度。他們全認為議會已不能把這個混亂的世界改正過來，訴之於議會必須改爲訴之於人們的強有力的右臂。他們的申訴實在不是捨去理智，轉向武力，（因爲他們全否認這二者是相反的），而是捨去那種假設僅數人數（不論這些人或許受到什麼詭計的影響）就夠了的制度，轉而訴之於感情和推理。這可以把人引到一種使用武力的心境，假如武力對於完成他們的目的的是必需的。

訴之於武力

武力於是返回到政治領域以內，他確沒人政治處理事件的範圍，因爲關於這些政治事件，人們強烈的感覺着，他們寧可用武力而不願讓步。大多數人不是爲用武力而用武力，雖然他們或許有時預備讚揚武力，在他們已決心訴之於武力的時候，並且雖然在任何社會內永遠有一些人，訴之於武力可以引起的殘酷的喜悅。在議會制的國家中，如要借助武力而成功，必須有一個問題把人民深刻的分裂開，並且激起他們的強烈的感情，足以使他們棄絕了議會制的習傳。他們作這件事的難易，當然大部分在於這種習傳對他們的控制如何。借助武力作政治工具，在大不列顛或甚至在法蘭西，較在德意志或意大利難的多；並且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又較在（譬如說）保加利亞或猶哥斯拉夫難，但除議會制的習傳以外，一大部分在於當時情勢所呈現的妥協的機會。在議會制習傳強固的國家，妥協已變爲一個大家接受的政治習慣，並且只要妥協的道路未閉塞，很難極端的用武力。然而，當妥協的可能範圍縮小，訴之於武

力的可能性就大了，因為各方都不準備對於自己認為重大的事情退讓。

現在這種妥協的範圍縮小，主要是經濟衰落的結果。在過去這一世紀，資本主義工業的迅速擴展供給了財源，使廣大的民衆的生活程度能有幾乎繼續不斷的增高，不僅富者的資產沒有任何減少；而且利息隨着工資一樣快的增高，並且常較工資增加的更快。只要這種情形存在，對於貧者的增長着的要求，永遠有妥協的餘地，如果他們的請求決不威脅到資本主義的根本組織。但現在，雖然支持這個妥協政策的技術條件比在以前任何時代都顯著——因為在以前生產能力永沒有像現在這樣進步的快——但在資本主義之下，妥協的實際可能性却減少了。國家資本主義在最近尖銳化的國際競爭局面之中，已失去牠的技術，不能使工人的生活程度增高，而同時使牠自己在競爭奪取中的成功不受危險；在過去幾年中，世界的不景氣（這不景氣本身就是這種此路不通的結果）使每個先進國家的資本主義的利益遭遇到一種情勢，在這種情勢中牠們感覺到不僅需要停止生活程度的增進，而且需要取消以前的讓步。同時工人地位的降落，特別是失業者的不幸，使大部分勞工階級的運動，採取了更好戰鬥的口吻，並且使許多勞工階級的運動，成爲顯著的左翼社會主義運動。反對資本主義制度。這些戰鬥性的運動的興起，激起各種保護性的反面運動，同牠們並列發展。這些反面運動，是爲資產階級的利益的。牠們的宣傳用度有充足的供給，已能教唆更貧的階級中一部分人附和牠們，不僅允許這些人大量的即時的利益，而且訴之於他們的國家的情緒，使他們反對社會主義信條中的國際主義。假如因資本主義的大規模的復興，可能的妥協範圍重再擴大，這兩種極端主義或者要失去許多牠們現在的申訴力。但除非這種復興出現，這二者都將要取得更多的基礎；因為這二者有不可避免的極大的相關度

所以政治的展望大部分要靠經濟領域內發生什麼。假如資本主義能在議會制度（牠的習傳的政治同盟）未完全破毀之前，重整牠的力量，並且逃避了現下的世界經濟衰落，經濟的復活或許在某些國家中，能給與議會制度一個新生命。在合衆國、大不列顛、法蘭西、和西歐的許多小國，以及不列顛統治地是這種情形，但甚至在這些有利的情形之下，議會制度亦多半不能恢復牠原來的優勢。成爲一切文明民族政治發展的模範。沒有人推測議會制度能在俄國建立起來；並且，假如俄國保持住社會主義，成爲政治組織的另一個模範，議會制度十之八九將不能在亞洲建立，並且牠亦多半不能回到義大利或德意志；因爲在這兩個國家中，各種依憲法作政爭者已完全毀滅，並且一黨制的國家已成立。這樣好像只留下兩條道路可選擇。一條是法西斯的國家，繼續向非議會制的方式發展，另一條是暴烈的革命，走向某種方式的社會主義的獨裁制度。

所以，議會制度的最順利的展望，亦不過多半是牠存留在有限的幾個國家內。並且，甚至在這些國家內，牠的繼續不僅要依賴資本主義的復興，而且更要依賴一個高度不定性的因子——避免大規模的世界戰爭。因爲牠依賴着社會制度根本不同的國家能並存在世界上而不發生破壞性的衝突。我們已看見，俄國人在革命期間相信這是不可能的；雖然他們的態度後來有很大的改變，在東方和西方的迫切的危險壓迫之下，以往十二年的歷史，亦未能表現出，人民受根本不同的政治與經濟理想鼓舞的各國家，容易和平的生活在一起。但假如像上次那樣大規模的世界大戰再發生一次，我們很難相信議會制度能經過這次衝突仍然存在。在這次爭鬥中，現存的公開討論的制度，和有組織

的反對黨，一定要受到遠甚於上次大戰時的壓迫；因為在大多數國家內，一定要有遠過於上次的強有力的反對新戰爭者。不論軍事的結果如何，大約一次新戰爭後留下的世界，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所受的破壞，需要根本重新建造。十九世紀的議會政治很難再成爲這個重建破碎世界的巨大工作的模範。

第二章 向議會制度挑戰

義大利革命

我們已知道，第一個破壞大戰後歐洲新建立的議會構造的，是義大利一九二二年法西斯黨的勝利。在法西斯黨得勢前若干時，義大利的政治制度已入於混亂狀態，有一個名爲以議會的多數爲基礎的政府，但這個政府很軟弱，實際上義大利幾等於無政府。義大利的議會主義者在國外和國內都是軟弱的。在凡爾賽和會中，他們的要求被比他們強的協約國輕蔑的棄置在一旁。這樣，國外的事件傷害了義大利政府的聲譽，並且在義大利引起一種族國情緒，法西斯黨人很快的利用了這種情緒。法西斯黨人說，義大利是戰勝國方面的，但牠應得一分戰利品。被人不法的奪去。假如有較好的領導，牠可以由新的征服致富。議會主義者在外交上背叛了牠；並且現在他們正預備在國內背叛牠。據說，義大利感受到瓦解於本國內國際社會主義者手中的威脅。這些國際社會主義者毫不愛惜他們的國家，並且軟弱無能的議會制的政府不能制止他們。所以要打倒議會，建立一個强有力的無情的權力，足以有效的抵抗社會主義者的威脅。

義大利的議會制度，實在是一個軟弱而無決斷的東西，在人民的情緒中沒有深刻的根基。義大利的社會主義受了共產主義和工團主義兩種未別解的混合思想的影響，牠的權力增長的足以使議會政府癱瘓無力，但尙未十分團結或堅定，足以自己取得政權。義大利的天主教徒在斯條祖(Don Sturzo)的人民黨(Popular Party)內組織起來，敵視

社會主義，但牠們企圖提出一個改造社會的更進步的黨綱，借以壓倒社會主義者；他們的活動減弱了社會主義，同時亦減弱了政府的力量。結果陷於一種有刺激性的停頓狀態，這種狀態引起義大利的一切其他分子，從工業界的僱主以至於貧苦的農人和失業的兵士，都反對議會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工業僱主求助於政府，保護他們的財產，抵抗工團主義的暴力，但他們失望了，貧苦農人和失業工人因自己受痛苦而譴責他人。假如社會主義者聯合起來，或許能在他們背後集合很大的不滿現狀的力量，足以成功一次社會革命，因為政府一定無力抵抗他們。但在一九二〇年，在相當的破壞了義大利的工業並佔據工廠向政府挑戰之後，社會主義者和工會反向後轉，並且拒絕將挑戰行爲改爲積極的革命，因之失去他們的機會。兩年後，墨索里尼在這普遍的醒悟中把握住他的機會，領導着進軍羅馬，並且建立了法西斯國家。不久之後，甘末爾(Mustapha Kemal)因一部分受義大利的，大部分受俄的國鼓舞，在土耳其建立了另一個個人權勢，領導恢復後的土耳其軍隊，在小亞細亞打希臘人，在世界大戰中一掃他的國家的失敗，並且建立另一種國家，與原舊的模範政府對立。西班牙在一九二三年以李維拉(Primo de Rivera)將軍的武力獨裁隨之於後。但西班牙的政變，不能與義大利和土耳其的革命並立，因為牠的設計，只是爲了增強現存的封建專制的力量，不是要組織一種新國家。西班牙的獨裁制度，只是爲了保護皇室的、貴族的、和教會的特權，在一九三一年牠未經西班牙共和黨的聯合攻擊就失敗了——雖然以後這些共和黨人本身之間起了嚴重的不和，並且現在有一時期西班牙幾乎發生了天主教徒與社會主義者之間的內戰。至少西班牙的獨裁制度暫時終止；但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和土耳其的族國主義仍然很活躍。

義大利的法西斯黨人試驗着一種新式的政府，並且不確知他們的目的，和反對他們的力量。他們只是以試驗的步驟前進，達到新國家的最後的成功。這種新國家是建築在一黨獨存和一黨專權之上。甘末爾雖然因軍事勝利而聲譽增高，仍然需要相當的時間去完成他的個人權勢，但義大利和土耳其的革命（特別是義大利的革命更激動起西方的注意。）很明白的指示出，一個明瞭他自己的意志並且準備無情的使用他的武力的堅毅的政黨，在順利的情勢下，不僅能把牠的志願加於多數人民，而且能完全擊潰並且解散各種明顯的反對組織。這不是說，一個堅毅的少數黨，僅以政變的手段，能成功的擊敗敵對的多數並統制了他們。雖然在某種情勢之下，這或許是可能的。這是說，當原來的政體已變得極衰弱，以致廣大的民衆陷於尖銳化的不滿狀態，那時，一個不怕武力的，堅毅而組織完善的少數黨。能容易的擊敗一個不堅毅的缺少訓練的很大的多數，假如牠所選擇作爲牠的立足點的問題，可以取得牠背後的多數人民的消極同意，並且牠能避免多半不爲多數人民所愛戴的問題。在俄國，在土耳其，以及在義大利，多數人民在衝突的過程中，不積極的參加；他們多多少少都情願接受敵對的少數人的爭鬪的結果。實在，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審慎的一直等到多數蘇維埃歸附了他們。並且等到農人的不滿意的增長在鄉間造成一種有利於他們的空氣。不過布爾什維克黨人知道大多數人民給他們的，只不過是消極的贊助，雖然甚至在十月革命之前，他們已清楚的看出，他們自己已形成一個堅固的結團，能拯救國家免於混亂，並且期望民衆默認他們在蘇維埃大會（Soviet Congress）庇護之下，以武力奪取政權。這亦是一個合理的期望。

義大利法西斯黨人很不敢認定他們的背後有一個甚至消極的多數。他們只確知，他們的各種敵人是無決斷的無

能力的。並且事實上反對他們的各種力量，是尖銳的分裂着，不能行動一致。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感覺他們要達到完全獲得政權的路途，須較俄國人特別謹慎，並且須在起初把他們的獨裁制度隱蔽在習傳的憲政形式之下，以『神聖聯合』(Sacred Union)的名義，挾制着皇帝、舊貴族黨派、和大實業家，去抵抗社會主義者。他們以民族的名義進行反對國際社會主義的戰爭；並且在民族的名義之下，他們能從義大利國家的構造內，募得有力的資助。唯有「階段一階段的，新法西斯國家的真實性質才可以明顯的出現，法西斯黨才可以在控制義大利的制度中，取得獨佔的地位。在進軍羅馬後十二年，法西斯主義仍然僅僅在開始建設組合國家(Corporative State)制度上的構造。

各新建國家的政治情形

發生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範圍內的義大利法西斯革命，給與德國和歐洲小國新成立的議會制度一個重大的打擊。這些新國家沒有議會政府的經驗，或者可說，大部分實在完全沒有任何政府形式的經驗，沒有組織完善的政黨，並且有的國家，甚至沒有任何共同的文化根基或國家情緒。牠們努力掙扎，企圖使牠們的製造成的憲法，能像法蘭西的和那不列顛的漸次發展成的憲法那樣的運用。牠們大多數發覺這件工作很困難，並且牠們的根據政黨聯合的政府，有使人昏亂的迅速交替。這些都是意料中事。這些新國家大多數在構造上是整個的，只奧地利不適當的設置了一個聯邦憲法。這個聯邦憲法的設計是為防止維也納握支配權。這些新國家着手完成國家的統一，雖然在牠們國境內，有來源不同的種族和宗教的分子。牠們尖銳的懷疑一切分權的形式或地方自治，因為牠們恐怕任何此種讓步，都可以被人利用為分裂運動的隱蔽物。牠們試着把一切事務都集權於中央，為的是使全國都印上行政統一的標記。

但唯有他們的政府多以國家或種族的多數為根據，少依靠特殊的社會政策，他們才能這樣作。因此，牠們的政府大多是對經濟問題持極不同的觀點的分子混合組成的。這使牠們除關稅一事外，在處理內政上軟弱而缺乏決斷。他們高築關稅壁壘，為得是以國營的方式發展工業。對於若干問題，特別顯著的是分配土地給飢餓農民的問題，不安寧的壓迫常常足以強迫制定很激烈的立法。但甚至在這件事上，關於被奪去土地者的賠償問題，有無窮的糾紛。在大部分其他事件上，缺乏決斷成為顯著的標記，因為少數黨既多，政黨的聯合成為不可少的，這種政黨聯合唯有將很困難的以及使政府的多數分裂的問題，擱置在一旁，始能保持存在。

雖然這些新國家確相當的穩定為能繼續下去的政治社會。但在俄國革命、義大利革命、和土耳其革命的影響之下，大多數新國家內漸有許多人民，開始認為議會制度的好點，是被人過於誇張了。他們力說，議會制的政府在建立鞏固的國家內，或可運用圓滿，這種國家所有的需要，只是保持社會關係的原來的調整。有時只有較小的改革，並且在這種國家內，對於社會的根本構造，有意見一致的普遍基礎。但議會制度，至少在牠的習傳的形式上，開始像是頗不適宜於必須迎面解決真正根深蒂固的爭論的局面。這種心情在波蘭和某些巴爾幹國家最明顯。皮爾蘇士基將軍（Marshal Pilsudski）的這種心理是很明顯的，他不斷的壓迫着要修改波蘭憲法，增加國家中個人權威的成分；並且這件事以後在猶哥斯拉夫、羅馬尼亞、與匈牙利引起了變化，使牠們的議會制度降到僅比滑稽劇好一點。無疑的，在指責議會制度的背後，有實質的原因；因為要在朝黨與在野黨制度以及各種局面的政黨政府的交替制度能運用，必須每個行將登台的政府，不把牠的大部分時間用於廢止前政府的政令，而寬大的接受已行之政，作為

牠的政策的基本，並且每個政府除去同前政府有充分的共同立足點的政策以外，須自己有一個容忍的合理的政策。假如一個行將登台的政府不能接受前政府的工作的基本原則，很快的雙方都變為不能容忍敵黨獲取政權。因為每一次政府交替，就有企圖改變國家根本性質的危險。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議會制度如要存在，必須政府承認牠自己無能力，並且不斷的將重要問題擱置不問，僅以現狀保護者的職務為滿足，無論現狀是好或是壞。在這些無能為的限制以內議會制的政府或許能暫時生存，但牠能這樣生存，必須犧牲了議會以外確在增大中的積極不滿現狀的團體。未解決的社會問題被擱置得愈久，將變得更顯著而困難。人民長久生活在無能力而含糊不明的混合政府的過程之下，開始渴望獨裁制度的強硬手腕和個人或獨佔的政黨控制下的國家權力主義 (authoritarianism)

德意志革命

德國人與各小國相同，充分的經驗過混合政府的害處。他們的政府分子來路很廣，以致對於社會的和經濟的目標完全沒有決斷力。維瑪共和國亦沒有牠能依靠的任何民衆感情的力量。大多數新國家都具有民族勝利的榮譽，然而第二德意志帝國必得負上德國戰敗的整個恥辱。在對其他國家的關係上，牠被凡爾賽條約的鐵腕束縛着，並且在對德國人民的關係上，牠不僅被強迫成為勝利的協約國的收稅人，而且牠本身須包含各不同社會階級中勢不兩立的敵對派。在牠裏面，社會主義者與資本家都覺得力量足以阻止對方得勢，但不足以自己取得政權。實在，不久之後資本家的黨派重得了上手，戰後的德意志被重建為確實的資本主義國家。但甚至如此，資本主義要能以議會制度統治，必須取得社會主義者的同意。社會主義者的同意是勉強給與的，並且以施與和租稅為條件，德意志資本家

覺得這種條件苛刻而且妨碍商業，特別是在這極缺乏資本的時候。加之，國內舊日的軍人和專制分子雖被制服，但決未毀滅，他們悻悻的站在一旁，憎恨這個共和國，盡力做妨礙牠運用的工作，同時他們等候機會，去恢復優良的舊日的武力訓練。他們得以使他們的勢力侵入新的常備軍，即德意志志願軍(Reichswehr)；於是德意志志願軍成爲德意志共和國永久的威脅。但志願軍的設立，原是說爲其合國的利益效勞的。

在這個國上內有豐富的養料足以養成一個有力的法西斯運動。一九二一年的早熟的克普叛亂(Kapp Putsch)被工會以大罷工的手段有效的擊敗，並且一九二三年希特拉的組織不完美的慕尼黑(Munich)舉事，雖然有魯登道夫(Ludendorff)將軍贊助，亦很容易的被擊潰了。大戰的記憶仍很新鮮，並且德皇的專制和尙武主義極爲人民所不滿，因此，維瑪共和國雖弱，尙不致被推倒。以後，在道斯計劃(Dawgs Plan)和馬克穩定後有大批外資流入，造成一種假繁榮，使維瑪共和國再延長壽命。但甚至在這幾年中，希特拉主義亦是在增長着，並且不滿現狀的情緒增加的很快。不過，牠需要一代從來不知道興盛時代的德意志尙武主義的新人民，去造成一個新的德意志革命。在德意志法西斯主義完成牠的最後勝利以前，又需要世界不景氣加重德國的經濟困苦，切斷牠的外資供給，並減弱這個共和國的抵抗力。

希特拉等到他的時機到來。追隨了墨索里尼的策略，即與舊貴族和大實業家聯合。他們憎恨維瑪共和國內的社會主義的分子。希特拉借他們的和興登堡總統的幫助(不久之前，社會主義者助興登堡復位，做維瑪共和國的守衛者)，取得權勢；但他一就總理位置之後，他的作爲比墨索里尼十二年前的作爲更加迅速和激烈。國社黨運動立即

表示着，牠比牠的義大利榜樣更加無限的野蠻、殘忍、和復仇。國社黨的領袖在讚揚戰爭和暴力上，以及在殘忍的迫害一切能反對他們的政治勢力上，遠甚於墨索里尼。他們着手『滌淨』德意志，比法西斯義大利的受『滌淨』更激烈。如同墨索里尼，他們亦着手工作，去除盡一切現存的勞工階級運動的踪跡，並且創造一種新的有訓練的組織替代牠。這種新組織完全受他們指揮。以備編成『勞工陣線』(Labour Front)的軍團。但他們做這件事，亦是十分的強暴，並且速度遠過於義大利法西斯黨人。他們亦沒有像墨索里尼那樣，對現存的政治構造有相當的因循，雖然因德意志帝國有聯邦性，以致橫在他們面前的重新改組的工作極其廣泛。在幾星期內，議會已減低到僅為國社黨臨時宣言的記錄板。各自治邦的權力完全被撤銷。一切政黨，甚至他們的國家主義的聯盟，都被澈底破壞。並且全盤一致化(Gleichschaltung)的政策，在一切德意志生活的部門中，都有充分的勢力，連有力的路德教派和新教派亦不能例外。在一年內，德意志帝國的各邦實際上已不再是行政單位，並且又廢除德意志議會的聯邦議院(Reichsrat)，加強國社黨的德意志的完全統一。

從政治的唯理論者的立場看，德意志的國社主義是一種遠甚於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驚人而且駭人的現象；因為法西斯黨人獲取權勢所依據的基礎，大部分尚能有合理的解釋。他們同國社黨一樣，捨去軟弱而破碎的議會制度，訴之於有力而為人所熟習的族國主義情緒，並且反抗社會主義。訴之於資產階級本身的利益；這種雙重申訴的力量已足保證他們必勝，雖然他們又有許多次等的申訴援助着。這些申訴常常是屬於極衝突的空幻的性質。在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內亦正如同在德意志國社主義內，有一種訴之於好殺的和愛暴力的成分。但義大利的這種成分永沒達到

國社黨的德意志所已採用的那些極端方式。大體上說，義大利法西斯主義是反社會主義的運動，以有資產的農民和中等階級為基礎，受大資本家的輔助，並且有牠的訴之於族國主義情緒援助着。德意志國社主義同樣是反對社會主義，並且亦是喧嘩的族國主義，把諾底克(Nordic)種族的使命幻想的誇大起來，作為訴之於族國主義的襯托。但牠把牠的信徒建築在純粹無意識的政治雜談上，這一點又遠甚於義大利法西斯黨人。這些無意識的政治雜談是如此的陳述着粉飾着，去迎合一切口味，借此在德意志人民的受挫折與滋擾的性情上，激起了驚人的有力的勢力。因為在凡爾賽條約與大不景氣雙重影響之下，德意志是在一種不康健的神經病的和病態的狀況中。迫害猶太人和社會主義者以及誇耀諾底克種族的優越，都是德意志青年的遏制未發的精神異態的一條出路。

維瑪共和國在恥辱中沉沒了，並且德意志社會主義者忍耐着信奉議會制共和國的補綴性的妥協。他們所獲得的報酬是受迫害和政治力量的完全消滅。又一個大國失去了立憲政府。這個新型的法西斯獨裁制的產生，有如此多的殘酷，以致與希特拉及高林(Goering)相比，墨索里尼開始像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了，並且義大利幾乎戴上了自由和容忍的國家的形象。加之，墨索里尼雖然有許多好戰的言論，他永沒有真正像是向任何列強挑戰。但希特拉這樣做了，並且確像又要使全歐洲起驚擾，雖然在真正的事實上，現在德意志人民更專心在他們自己對於國家的評價中，重新建立他們自己，並且鞏固他們國內的勝利，而不實際從事戰爭。他們對於戰爭仍未準備完全。

歐洲的法西斯主義

同時在歐洲其他部分，亦正和在德意志一樣，大戰後新建立的議會制度正在被替換或剷除了。議會制度在奧地

利消失了。在奧地利，地方獨裁者道爾夫斯（Dollfus）宣布他要建立他自己的組合國家，以基督教為基礎，並且有義大利的幫助，但敵視德意志的競爭的企圖。德意志是要使奧地利不受義大利而受德意志的支配。土耳其和猶哥斯拉夫建立了獨黨議會，這種議會的存在，目的只是為記載黨的獨裁者已定的決定。在這兩個國家，一切反對黨都受到壓制，並且言論自由尙不及在明白廢除議會制度的國家。羅馬尼亞（Rumania）採行了一個空虛的選舉法。無論何時，一個有極多數人擁護的政府如果訴之於全國，這個法律就保證牠的政府位置；但皇帝有權任命或撤換政府，實際上這個制度是皇帝獨裁制。保加利亞（Bulgaria）在一九三四年經過一次武力政變。這次政變驅除了議會制的政府，並且在一種法西斯獨裁制之下，建立了一個新內閣。匈牙利（Hungary）亦是在一種有實力的獨裁制之下，雖然議會的外表仍保存着，並仍許可一些和緩的批評。在波蘭（Poland）許多反對黨的領袖被囚於獄中。波蘭實際上受以皮爾蘇斯基（Pilsudski）將軍為首領的獨裁制的治理，並且近來正討論採行新憲法，這憲法幾乎給與總統無限的權力。他會同一小部分軍官和擁護現存政體者即可全權處理政事。拉特維亞（Latvia）和愛沙尼亞（Estonia）近來都劇烈的捨棄了議會制度，走向行政權力的增強；並且在拉特維亞曾以德意志為榜樣，利用集中訓練營和大批拘捕政治反對派。西班牙在兩年民主議會制之後，（這是一九三一年共和黨革命的結果）又入於混亂狀態，政府得不到共和黨人的可靠的同情，僅借右翼各黨擁護政府的地位，並且是處於不斷的革命威脅之下。在歐洲這些新的或改建的國家中，幾乎唯獨捷克斯拉夫像是安定於牠的議會制度之下。雖然有許多以國家或階級分野為基礎的政黨，並且因此任何政府不能不以廣泛的政黨聯合為基礎。但甚至在捷克斯拉夫，亦有例外的法律施行，並且議會

政制亦決不穩定，因為在國內說德文的區域有國社黨暴動的威脅，在斯勞維基亞（Slovakia）盧瑋尼亞（Ruthenia），有有力的不滿現狀的少數民族——活躍的（雖然是不合法的）共產黨運動尚不在內。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建立，本是要成爲議會制國家的一個聯合，並且大家亦以爲是如此。現在的國聯盟約亦未能預示全世界的議會制度是穩固的。因為，義大利的忠心是可疑的。由此看來，國聯已減爲僅僅英法二大國和許多小國的聯合。這許多小國對於依附國聯愈來愈懷疑，對於牠的箴言愈來愈不注意。蘇俄加入國聯，國聯或可得救，不至於完失效；但假如蘇俄加入而德意志不重返，充其極，國聯亦不過是一個鬆散的國際聯合，爲的是團結起來彼此互保安全，借以抵抗德意志。牠甚至沒有能力樹立世界政府的端倪，或消除戰爭的威脅。

這就是議會制度在戰後歐洲的悲慘歷史。當然這幕戲尙未演出，並且，離然歐洲大部分有侵略性的法西斯運動產生，一些適應的方法是可以找得到的，借之可以阻止歐洲的國家制度完全瓦解。受濃烈族國主義思想所鼓舞，並專致力於武備和彼此攻打的國家，或能設法避免實際戰爭。並且議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無論如何或能把牠們的領土疆界，定得足以在歐洲保持一個危險性的平衡，而不發生公開的衝突。我們很容易明白，爲什麼在現狀下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U.S.S.R.）加入國聯，或至少變爲議會制國家的聯盟，去制止法西斯國家的野心。蘇聯切望避免陷入戰爭，以致破壞了社會主義制度。但不論這能否實現，歐洲現在分成一系列武裝兵營，完全像一九一四年那般的互相敵視，而且現在的情形更加複雜，許多國家都有與國際戰爭同樣迫切的內戰威脅。這種情形對於未來的任何種民主制度，都是不祥的預示。因爲好戰的精神是權力（authoritarian）制度的大本營。並且，人在最恐懼的時候，最容

易趨向於獨裁制。現在恐懼成爲有支配力的政治動機，並且遠甚於在一九一四年。恐懼在政治中和在其他一切中一樣，是理智的勁敵。

第三章 今日之政治思潮

近來已養成一種習慣，就是，把許多不同的運動都總起來冠以『法西斯』的名稱。這許多運動的相同點，是與現在的議會制政府的方法以及一切形式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相反。所有這些運動都被人總稱為法西斯，因為第一，牠們多少都採用革命的形式。在一方面，向一切原有的政黨和政治運動挑戰。大戰後這些年的經驗，已使這些政黨和政治運動失去信仰。在另一方面，向工人階級或牠的領袖的要求挑戰。工人們的要求是以一種平等的社會代替資本主義。不過，把許多消極性質相同而積極性質不同的運動，總起來簡單的冠以這一個名稱，能引人入於極大的錯誤。實在，所有這些普通稱為法西斯的運動，確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并且牠們的目的都是限制（假如不能完全廢除）議會的權力。但是，牠們或許全有這些消極方面的特點，在牠們的積極方面的目標上，以及在牠們背後的社會勢力的性質上，尚有深刻的不同。

有時『法西斯』這個字被用於甚至較此更廣泛的意義。在美國，反對羅斯福的政策者很快的就稱國家復興（National Recovery）程序為法西斯。理由是，為實行這種程序，羅斯福總統不能不取得極廣大的權力，這在實際上對美國國會的權威加上很大的限制，並且破壞了前此認為不可侵犯的一些憲政原則。雖然，把羅斯福主義名為一種法西斯主義，是十分錯誤的，雖然牠有與歐洲法西斯運動相同的性質。實在，這些相同的性質是不得不有的，因為廣義的說；羅斯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是十分相同的情勢的反應；並且都是取得人民心中的某些同樣的情緒和思想

來贊助牠們。事實是，現在在世界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內，大部分人民的心情，都在預備接受新的政治感情。或由當時的情狀重新加上大力量的舊感情。法西斯主義是這種新感情形勢的一種反應；但牠決不是唯一可能的反應。許多普通稱爲法西斯的運動的存在，主要是因爲許多不同類的資產團體和社會階級，看出了仿效那些硬義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取得權勢的方法，是他們取得人民贊助的機會。

法西斯主義的起因

假如這種對於現時的政治情勢的診斷不錯，那麼，要緊是在我們開始討論牠時，不要先研究法西斯主義，而要先去估計各種現在標榜『法西斯』的運動的勢力，在人心中所根據的力量。研究這些力量，可以使我們知道這些不同的運動有多少相同處，以及牠們究竟如何代表一種成爲遍世界的活動的政治力量，或者僅是反對不可忍受的政治經濟情況的暫時反應波浪。然後，我們問一問，引起這些運動發生的是怎樣一種心理狀況，以致這些運動立即反對議會制度和反社會主義，並且情願用強暴手段，爲現在不能通行的政治和經濟的路途，覓一條出路。

第一，無疑的差不多在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很大而且日漸增多的一部分人民，都有一種不安的感覺，覺得在政治和經濟組織中，這個世界正沒有辦法。甚至在世界經濟衰落降臨之前，這種感覺實際已存在；並且這次經濟衰落的普遍，使我們相當的忘掉了那些腐蝕（甚至在一九二九年以前）先進工業國家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強大力量。但經濟衰落當然使這種沒辦法的意識大大的深刻化廣大化——或許更要如此，因爲我們決不敢確定，經濟衰落將終止，亦不敢確定代替牠的至少是比較繁榮的一個資本主義時期。假如牠真很迅速的終止了。多半現在的不安狀況將

發生一個大的反作用，在合衆國最厲害，但在一切受經濟衰落嚴重影響的國家亦都要有些。

第二，無疑的在許多人民心中有一種感覺，覺得現在的政府形式以及經濟和社會組織的形式，確與牠們本來規定要實行的工作不合適。並且有這種感覺的人數日漸增多。不論民主議會制度在革新以後怎樣，牠現在顯然是一架很適宜於用來保持事物現狀的機器。不適宜被用於作激烈的改革。牠至少在現在已失去作大事或引起大感情的能力，尤其不能引起在大戰後的世界生長成的青年們的大感情。這並不是說，除少數議會制的國家以外，尚有一種真正可怕的自覺，叛棄議會制度。但這些議會制國家的一切地方，對議會制度的不尊重日漸增加，並且顯然不情願熱烈的團結起來，保衛牠們。

第三，在一切先進工業國家內，有一種正在增長着的意識，以爲大宗潛伏的財富被愚傻的荒廢了。這種意識在受過技術教育的人民中最強烈，他們對於這種貧窮存在於生產力迅速增加中的矛盾現象，比別人更有深刻的認識。這種矛盾現象的意識使人要說，不論政治和經濟的組織是如何對的制度——並且許多人自認不完全明白這制度——有一件事是明顯的，就是，我們現在尚未得到合宜的制度。這使許多人變成憤世嫉俗的，或者在憤世嫉俗主義開始失去興味的時候，變成各種潛伏的革命。

第四，憤世嫉俗主義漸多爲人所厭倦。人們漸厭倦於聳着肩說什麼都不好，或者至少說政治活動不能產生好結果。他們日多一日的要求以新評價替代舊評價。舊評價已腐爛或不能再感動他們的心情。這種對憤世嫉俗主義的厭倦在知識階級中最明顯，正如前此的自覺的憤世嫉俗主義一樣。但在先進國家中，這種厭倦散布到人民的其他階級

，範圍之廣大，至於使許多人不願相信。以牠的本身而論，完全不是一種建設的力量；因為牠是否定的否定，只不過使人民感受上任何偶然流行的政治傳染病。

第五，一種不安全的恐懼廣大的散布到一切前此多少有相當安全的人民中。這一點主要是指大小資產階級全體，他們是先進的經濟社會中很大一個成分；並且又指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們的教育成爲他們的一種財產，能給他們一個超過普通的進款，此外，一部分報酬較高的工人階級也在內。這是一種很大的力量，逼使大小資產階級擁護任何運動，只要這運動允許打擊社會主義，並且保證以生產工具私有爲基礎的社會繼續存在，並保留階級的分野。在好像可實行社會主義並且工人喜歡社會主義政策的地方，技術工人受這種恐懼心理的壓迫頗傾向社會主義；同時站中間的『有知識的無產階級』可以被逼走向左右兩條道路，這全在乎各國的特殊情形。不論出於任何路途，這種不安的恐懼，無疑的成爲總括在『法西斯』名稱之下的各種運動背後的主要經濟推動力。

第六，在懼怕社會主義的公有財產制度以外，尚有對共產主義的強烈懼怕，認爲共產主義是一個外來的信條，強要統治全世界。這種態度在反蘇聯的幾年宣傳中，牢固的諄諄教入人心，並且這種宣傳無疑的得到許多成功。以事實而論。這種宣傳也不是完全沒有真理。共產主義與歐洲的社會主義不同，牠被人覺得不僅是政治的或經濟的，而且至甚是更強烈的文化的挑戰。有從根破壞一切社會評價的威脅。這些社會評價，都是在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同合衆國爲人所熟習的。人們覺着共產主義要把一種根本不同的生活方法強加到他們身上。這種生活方法不是受西方先進的文化而是受半野蠻的東方邊遠文化所感染的。國社黨人不斷的鄭重宣稱，他們的使命是保衛西歐，抵抗

東方野蠻的威嚇。他們這只是誇張一種情緒，這種情緒在心理中有廣大的反應。這心理是由以多年不平等的階級制度為基礎的文化形成的。自然，這種懼怕東方的心理，在東歐不很感覺到，除去在上等階級；在亞洲，對共產主義的反應，却是出於十分不同的形式，有的人怕共產主義，認為牠是西方的學說，要強加在東方文化上，其餘的人認為牠是比前此西方所供獻給他們的主義，更適合於東方的主義。當然，在亞洲亦是不同經濟階級對於共產主義的反應即不同；但共產主義在東方農業國家，比在歐洲的議會制度中更為適合，這種意識對於決定印度和中國的反應，亦有關係。

第七，有一種很普遍的意識，至少在青年人中是如此，認為所有的舊政黨，從左端社會主義的政黨起，到右端各種保守黨，都是無用的。這使得新一代的選舉人不去熱心參加舊政黨的工作和組織，並且特別不利於議會制的社會主義。因為議會制的社會主義者，比其他政黨更加依賴多數自願幫忙的普通人民的擁護。加之，議會制的社會主義者訴之於人民的力量，在若干國家內無疑的是減弱了。因為事實上社會主義的政府在在位期間，未能使這種局面有任何重要的改變。雖然社會主義者當然可以指出，這些社會主義的政府背後實際並沒有明確的多數，並且沒有探行社會主義政策的真正機會。此外，議會制的社會主義已為人所擯棄，因為當牠在義大利和德意志遭受武力的反對時，牠太易被毀了。社會主義政府的顯明的失敗，使許多青年要說『你看，到了緊要關頭，這些社會主義者是多麼懦弱。』社會主義者可以有正當的回答，或者他們能合理的指出，用議會制的方法建設社會主義，是極端困難的。這種事實並不能把他們從這些批評中救出。一般人，特別是青年人，是不給與原諒的，——他們好下推論。他們亦並

非完全錯誤。在許多議會制的國家中，社會主義者的領袖過於軟弱而且沒有能力。

第八，政治和經濟的紊亂的延長，引起一種有力的『爲上帝』的政治運動爆發。漸有許多人，他們不知道他們要作什麼，只是說，『爲了上帝，我們要作些什麼。』這就是說，最動人的申訴是在用思想的機會以外，給與牠的擁護者以行動的機會。遇着一切可能的機會，人們要在街上遊行，穿上特別的襯衫，高呼政治口號。因爲這些活動給與他們一種意識，以爲他們是正在作些事而不是完全坐着不動。共產主義者亦正如同各種法西斯主義者，極力拉攏這種行動的欲望來贊助他們，並且實際上給與他們的黨徒的真正工作，遠多於各種舊政黨。但當一個活動的共產黨員真要比當一個活動的法西斯黨員危險的多。在許多國家內，假如你是一個法西斯黨員，你能做許多詈罵和踢擊，而自己受不到許多踢擊，但當一個活動的共產黨員，普通都得坐短期的反省院。

族國主義的復興

第九，族國情緒很強烈的復活了。我們審慎的把這一項留在最後，因爲牠與我們所分析過的一切其他情緒不同。實質上，牠是從現代世界問題的可怕的複雜性，迅速的轉變爲一種在人類社會習傳中根深蒂固的概念。這不是因爲民族的情緒本身特別年久。實在，在歐洲大部分地方，牠確是現代的，並且在牠被法國革命的使人改變宗旨的熱心所激動之前，僅有很小的力量。在此以前已有族國情緒，例如，沙士比亞的歷史劇中便有很多，但依麗沙伯時代的英格蘭，是十九世紀前族國情緒特別濃厚的時代。族國主義在歐洲成爲有力的政治力量，是開始於法國革命後的時代，並且此後曾有一時期，牠在人心與自由主義運動聯合起來。要以民族做基礎，建立對人民負責的政府。

但是。雖然族國主義是比較新的。現在在人心中的族國主義的意識的基礎，却是極舊的。因為現代的民族是極年久的社會團結一致的後嗣。有時這種社會的團結一致叫做『合羣的本能』，牠從最早的家族團體經過部落社會，發展成現代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人在懼怕的時候，願意有可以集聚於其中的東西。民族國家在現代世界中，變為人類可以集聚的社會單位。這種羣的或部落的團結一致的意識，常常也是對羣外一切事物感覺生疏的意識；現在族國主義亦同樣的產出有內外之別的和不可理解的意識，以為民族以外的一切事物，都有潛伏的危險性。人們說：『我們不瞭解一切國際主義。牠引着我們，使我們與不同類的人同命運，並且我們不知道牠把我們引到什麼地方。在這個不安全的世界上，唯一可靠的是親密的民族團體』。所以人心中的國際主義趨向大大的減弱了。隨國際主義而來的，有國際聯盟的創設，和上次大戰後的恢復和平。在一切地方，族國主義都在加強；並且凡有外國的壓迫（如同在德意志）或有一種自己國家不如人的意識（如同在義大利）的地方。族國主義精神所發生的形式亦最狂放。急進主義是牠的極端表現之一。

國際主義的情緒的確也在增長着，牠致力於抵抗反對外國人的病態心理的復發。許多人漸已看出，假如世界要免於災難，牠必須依國際的方式，甚或在某些方面依全世界的方式，組織起來。但對於現在的情勢能作理性反應的人，主要限於各國的少數人民，並且大部分限於受過政治教育的人民。這種反應或許此時在法國最強烈，雖然法國常被指責為最族國主義的國家。因為法國人所受的政治教育很高，他們很知道，無論用什麼國家孤立的政策，他們也不能逃避了世界的問題。他們要建築國際的保衛和保證，他們對這事所想出的辦法，比其他國家的多數國際主義

者所想的確實的多；但他們却對於成功的可能性懷疑。照現在的世界形勢看，誰能譴責他們的懷疑？

財產權

以上九項是組成一種心理狀態的基本因素。一切地方的各種所謂法西斯運動，都是以此心理狀態為基礎。但對於附從因素的考慮，也是必要的。所謂附從因素，是指沒有獨立重要性的因素，牠們是從一個或多個我們已指出的基本因素推演出來的。這些附從因素中的第一個，是大小資產階級一同強烈的重新擁護私有財產權。這是由我們前面所說的懼怕不安全的心理引起的。牠同時又造成對社會主義痛恨，和對大規模資本主義亦輕微的厭惡。社會主義有一齊掃除私有生產工具的威脅；大規模資本主義限制了小資產者的機會。並且有時他們的財產有被奪取的威脅。但在這兩種反動之間，對社會主義的痛恨，確比較深刻。因為社會主義主張廢除一切主要生產工具私有，因此一切有生產工具的人，都聯合起來反對牠。社會主義者主張把私人的財產，給與大部分實際沒有財產的人民，這種主張不能取得那些怕失去現有財產的人的同情。這些現有的財產，是他們的優越經濟地位的基礎。在另一方面，大規模資本主義僅威脅小工廠或私人企業家。並且藉證券和股票的所有權分散制，供奉給許多有財產的人充分的報酬。所以，假如社會主義和大規模資本主義爭鬥，小資產階級羣衆大多要幫助資本主義方面，不幫助社會主義方面。

實在，大部分中產階級。現在對於銀行家和金融家有很強烈的厭惡。這是反對大資本家的情緒的特殊方式，並且因近年來的驚人的貨幣紊亂和財政上的不名譽事件，這種厭惡大大的加強了。這種小資本家反對銀行家的複雜

心理狀態』，與另一同類而來源極不同的複雜心理狀態遇合了。這第二種複雜心理狀態是在工人階級中。工人漸認爲銀行家和金融家，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特著的代表。而反對銀行家的中產階級，却認爲他們是健全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敵人。這兩種潮流的混合，引起不斷的混沌政策。例如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與工黨（Labour Party）都贊成國有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但理由却彼此極不同。

要求國家干涉

第二，一切人都日多一日的要求國家干涉，幫助社會內任何部分感覺經濟災難的痛苦的人民。這個要求的基礎，大體上與社會主義的學說無關。他只是由『爲上帝』的態度推演出來的。那些求國家幫助解除困難的人們，大部分只是說，『爲了上帝，能不能有人做些什麼』。並且轉求於政客。認爲政客是他們的需要的最顯明的目標。有些人的要求，僅是要別人去做除淨混亂的工作。要求國家干涉的出發點，就是大多數這種人的出發點。在國家不干涉的時候，或國家的干涉僅產生新混亂的時候，這種要求就變爲改革政治制度的主張。要國家干涉的要求就這樣的從我們所討論的第一個基本因素發生出來，又被第二個因素重新加上很大的力量。

第三，是從代議制度迅速的轉到個人領袖制度。在嚴重危機的時候，這是最常發生的事。並且與民族主義復興一樣，牠大部分是古代思想方式的承繼者。人們仍然易於把他們的信仰託付於個人，而不託付於主義。或者至少把他們對於一個主義的信仰，具體的改爲信仰領袖個人。但這種對於個人領袖的需要，是我們前面所分析的基本力量的結果，牠本身倒不是一個獨立的力量。我們應當把牠算作現情勢下的一個附從的而不是基本的因素。

第四，無疑的現在有一種趨向，即，以討論的方式關心政治者漸少，用暴力和壓迫的方式者漸多。這也是一種附從的反動。大體上，牠是由失敗的意識生出來的盲目碰撞。這種舉動，就好像一個人的腿碰着椅子，反而踢那椅子。怨椅子碰了他。但這並不減少牠的危險性。牠實是造成今日政治心情的因素中，最危險的一個。因為牠使人人於一種先用拳頭，後用思想的心境。並且牠直接引得全國的情狀，易於發生戰爭，又引起一種局勢，減弱制止內戰的力量。這制止內戰的力量，是多年平靜的習傳建立下的。

這些力量大部分都有遍世界的影響。因各國間的情況不同。又因在各國和各階級行將出現的領袖的性質不同，所以這些力量可以出於很不同的方式。將由牠們興起的一切運動，簡單的總起來放在法西斯主義一個名稱之下，容易使人誤解。因為法西斯主義只是對於這種情勢的可能的反應之一。例如許多方纔所敘述的力量，現在在合衆國一定也是很強大的，但稱羅斯福總統的政策爲法西斯，就完全錯誤了。羅斯福的政策不是法西斯主義，而是另一類動員和領導人心同樣的情緒的方法。

美國的試驗

據我們所知道的羅斯福主義的要素，就是。牠是一個試驗性質的非常時期的程序。牠與若干種法西斯主義不同。牠不企圖爲小商人的利益而抑制大規模資本主義，雖然牠確是大部分在引導着他自己，反對銀行家和金融家。這些人顯然須負誇張合衆國的困難的責任。牠是反對銀行家的。但牠不反對大企業；反過來，實業復興法案下的法則，大體上是幫助大規模資本主義者多，幫助小資本家者少。國家復興法案（N.R.A.）的效果，是暫時至少取消「舊

日許多禁止大規模企業聯合的法令。並且把歇爾曼（Sherman）反對企業聯合的法律。廢止了一大部分。美國政府是正在企圖為投資階級（包括大小資本家）的利益抑制銀行家和證券市場的經紀人。並且爲了有資產的農民的利益，去管理財政和商業情況。但在這兩方面。他的目的是在藉實行國家管理。恢復美國的商業繁榮。他是依照舊方式，不是建立一個新制度。他是企圖把美國的資本主義再建立起來。滿心打算在這件工作成功之後。立即把許多（雖然不是全體）新『統制』除去。他不打算建立一種新的國家統制的資本主義。而且在美國採用國家統制方式的企圖中，亦沒有任何完全新的事物。這些國家統制方式的設計。是爲保護個人主義。不是爲廢除個人主義。美國經過一九〇七年金融恐慌之後，在一九一三年設立了聯邦準備銀行。同時把他的中央銀行系統收歸國有。很久以前，美國聯邦政府已在憲法的限制以內，積極的干涉大規模的企業。他曾禁止企業聯合（Trust），並且要限制各種各式的企業獨佔（monopoly）；他在這些企圖上大多失敗了，但這不能就說他的努力不嚴格。在這種政策上，羅斯福總統必須較他的一切前任都走得遠，並且他已能走得很遠，因爲美國的經濟危機特別嚴重。但如認爲羅斯福總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要把美國的資本主義廢止。或認爲他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想把美國的政治制度根本改變，都是十分錯誤的。

以這幾點爲根據，我們可以合理的指出羅斯福總統在合眾國的作爲，同歐洲正發生的事情，有明顯的對照。在歐洲，法西斯或其他反對議會制度的運動已取得統治權。歐洲的法西斯主義在義大利和德意志，目的確是要將國家的政治構造和國家對經濟事務的關係永久改變。牠要把資本主義制度重建在一個新基礎上，成爲國家統制的資本主

義。謀中產階級及有固定收入者（包括小商人和小農業生產者）的利益。這種作法，不僅是應付臨時危急的工具，而是永久的基礎。作為反對社會主義的城堡。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主要是放任主義。歐洲的法西斯主義事實上是資本主義的另一種確實的形式。並且牠的領袖們着手建立一種組合國家（Corporative State），作為權威和獨裁力量的具體表現。這種國家顯然將永遠抵抗平等的社會主義的攻擊。他們永遠拋棄經濟的和政治的自由主義，並且不全是為克服經濟的危機；他們的基本目標極大部分是破壞社會主義，很少是重建經濟的繁榮。

半法西斯的運動

前面最後一段內的敘述，是指在德意志和義大利創立的法西斯制度。但不一定適合歐洲各國中普通稱為「法西斯」的許多其他運動。例如，法西斯主義在大不列顛，尚未發展到足以使牠的性質顯明。在現時，牠差不多是各種不滿意分子的無計劃的叛亂。反對無能的議會制度和立憲社會主義的增長。假如大不列顛的經濟情況變得實在更壞，牠或許要採取恫嚇的形式。並且戴上義大利或德意志法西斯主義的特殊性質。如果一個强有力的社會主義政府取得權勢，或可產生這同樣的結果。但直到現在，我們不能說大不列顛的法西斯主義已有一個政策。因為從毛斯利（Mussolini）爵士或其他領袖的正式演說中，不能發現甚至一個建設的政治學說的初步。其次，法國法西斯主義這個名稱，在現在亦大部分是錯誤的。依照德意志或義大利的意義，法國保皇黨和法蘭西行動派的黨徒，不是法西斯主義者；他們只是強暴的反動者。達鐵厄（Taittinger）先生和其他一些法國的右翼政客，或許有「法西斯」的傾向；但現在尚沒有民衆的法國法西斯運動。在巴黎以外，甚至連這種運動的發端都沒有。再其次，奧國的法西斯主義

亦不容易分類。他開始於道爾夫斯(Herr Dollfus)的領導之下，是一種基督教的組合主義(Christian Corporatism)。這是一件很老的東西，遠在一九一八年奧地利共和國創建以前。在十九世紀，奧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黨，提倡一種同業組合的國家。現在道爾夫斯的權力是由於法西斯運動的擁護，但他個人不能算作一個德意志那樣的或義大利那樣的法西斯主義者。在另一方面，內衛團(Heimwehr)大部分以模仿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為基礎，正如同奧國的國家黨人以模仿德意志國社主義為基礎。但內衛團的背景與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黨的背景極不同。內衛團事實上多仍以依從舊日地主階級領導的農民為基礎。很少依據退伍的兵士和中產階級分子。墨索里尼先生却主要以此為依據。在社會的意義上，內衛團是極反動的，不是義大利法西斯主義或德意志國社主義。實際上，他簡直是反動的地主主義，聯合着反動的教會主義，並且穿上法西斯的外衣。不是一個普遍的煽動性的運動。至於現在在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東歐其他國家的『法西斯主義』，也代表極端右派的舊勢力的更甚的暴力手段。不是一種新發生的而且要造成另一種不同的國家的力量。現今各處的極端右派，好像都採用『法西斯』的方法和組織形式，但這並非是在其同反社會主義和議會制國家的各團體間，有了有社會政策或經濟政策的任何真正的團體。

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

在義大利和德意志的真正的法西斯主義與一切形式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有相同點。正如二相反的極端之間所常有的。這相同點可以幫助解釋這二極端的時常彼此轉變。牠們全是從一種見解出發，都以為經濟的和社會的生活需要並列統制。牠們全要在社會中創造一個權威的中央勢力，能掌握人民的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最後統制權。

但牠們的異點當然比這些同點重要的多。牠們的基本不同點是，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為達到經濟和社會平等的目的。要建立這種權威的統制，但法西斯主義者的要建立牠是為丁恰相反的目的，牠是要阻止這種平等。因此，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主張把一切重要工業及業務都收歸公有，為得使整個社會得以支配整個社會的收入，但法西斯主義者主張把工業及業務留為私人所有，國家有管理權，並且國家的設計就是為了保存財產權，同時又保護有私人財產收入的人領有那些收入。法西斯主義是國家統制的資本主義。為資產階級羣衆謀利益。牠對於資產階級的見解，自然是很廣泛的。包括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牠的高等教育是留給少數人的，因為實際上，那就是一種財產。

但又很有關係的是。法西斯主義是族國主義的。牠的族國主義有經濟的和政治的理由。牠必須是族國主義的，因為民族國家是保護財產權並抵抗社會主義的攻擊的唯一可用的工具。這種必要。可以解釋法西斯領袖的急切於運用族國的情緒。但當然不能解釋為什麼有這種他們能利用的情緒，和這種情緒的力量。因為族國主義情緒的本身，主要不在於經濟的原因，雖然經濟的原因給牠增加了新力量。牠是從懼怕的力量和不安全的威脅升到牠現在的强大狀態，驅使人回到原始式的忠心。誇大式的族國主義。是懼怕的病態心理的結果，牠不再以小規模的羣或部落的忠心。而以族國的意識表現牠自己，以族國為集體力量的具體表現。國際社會主義，或任何需要全世界合作的事情，好像容易使那些只能思想或只能感覺國內事情的人心內害怕。這是妨害國際主義宣傳的致命傷。國際友好和世界合作的思想，含有強烈的人道主義的申訴力。當人在平靜的時候，這種力量可從第三者的心中引起現成的反應。但人不能把牠連繫到任何好像能抵抗襲擊的制度。國際聯盟軟弱的建立在各主權國家的政府的合作之上，牠頗不能在人

心中爲他自己謀一個地位，使人認爲他是能指揮集體忠心的國際組織。所以，人在懼怕的時候，他的國際主義就容易失掉，並且他容易回返到族國情緒，這種情緒可以找到表現忠心的實在組織，並且他感覺到他是這個組織的一部分。唯有一個有知識的信仰的強烈力量，或一種不可忍受的壓迫的意識，方足以在危急的時候，克服這個趨勢；社會主義在許多國家變成强有力的，但牠的國際主義的申訴在大部分人民中仍是很浮淺的。這些人慣於在國內事件上給與牠政治的贊助。

卷二 政治機構

第一章 議會制度

國與國之間（特指英、法、美、義、德、俄、土、日、中國、及英屬印度——譯者），顯然在構造上和重要性質上有很大的不同。即使我們將遠東的政治制度拋開不計，我們仍有三大類國家——議會制的、法西斯制的、和蘇維埃制的。俄國顯然是第三類的代表。義大利是第二類的代表；因為國社黨的「第三帝國」，仍太不完備。不許可我們有滿意的分析。但當我們開始找一個議會制國家的代表時，我們立即遇到困難。大不列顛是議會制度的創始者，自然有充作這一類的代表的強大理由；但大不列顛與合眾國的政治制度的不同點是如此廣大。因之無論如何，這兩國的政治制度必須在許多方面分別看待。在大不列顛和法蘭西的政治制度之間，亦有小範圍的很重要的不同；並且，世界大戰終止以後，多數在歐洲新建立的國家的議會制度，好像以法國為模範者多，以英國為模範者少。所以，在討論議會制的國家上，我們無論如何，必須研究這三個國家，牠們是議會制國家的三種主要的變化。然後，我們才能進一步，在議會制度與其他二種敵對的制度之間，制定滿意的比較。

第一，大不列顛在形式上是立憲君主制。而法蘭西及合眾國全是共和國。在憲法的理論上，不列顛的政府仍包含皇帝的內閣大臣。這些內閣大臣是由皇帝委任，並且對皇帝負責，但在法蘭西與合眾國，在理論上政府是民有的

不歸一個與人民分開的統治者所有。不過，在合眾國，內閣僅是總統的一個附屬物，總統的權力遠過於法國總統或英國皇帝。在法國，內閣是實際的政府，並且牠的位置和權威完全在於牠能在議會中取得多數議員的擁護。英國的內閣亦是如此。

第二，在法蘭西和大不列顛，行政權實際是在依賴議會擁護的一組人手中，但合眾國的憲法的根本，是要使立法權與行政權清楚的分開。在合眾國，握重行政權者不是內閣而是總統。總統的選舉是獨立的。是由全體有選舉權的公民特爲此事選出代表。再由代表選出總統。所以，總統的地位至少與國會平等（國會是民選的立法機關）。美國總統委任他自己的內閣，只須上議院批准。並且閣員是總統的屬員，不是同僚。所以與英法的閣員大大不同，英法的閣員是內閣總理的同僚。美國憲法將行政權提得甚高，較英法二國的行政權都高。並且牠又給與一個廣大的範圍。使一個有力的堅毅的個人領袖，可以在此範圍內運用他的權力。美國的制度只一半是議會制度，並且在實際運用上。總統至少與國會同樣重要。雖然他沒有立法權。

第三，合眾國是一個聯邦共和國，而大不列顛與法蘭西都是單一國。合眾國的聯邦政府不是一個總管一切的政府。像英法的政府那樣。牠僅能處理一定的事件。僅能征收一定種類的租稅，並且有一個成文憲法，繼續不斷的遏制牠，並防止牠踰越牠的指定職務。在這個憲法中，對於牠的權力的限制，有明白的陳述。這個憲法很難修改，並且修改權是握於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對於法官認爲「違憲」的立法，有絕對的否決權。在區域的及地方的行政事務上，法國與英國相較。法國是高度中央集權化的。但英法二國的議會，都須處理一切事務，並且有擴大或限制地方政

府及區域政府的職務的絕對權力。另一方面。在合衆國。每個分立的邦的權限。並非從聯邦政府取得的。這些邦在理論上是獨立的，並且是原本的主權權威。牠們在合衆國憲法之下。僅讓與中央當局某些確定而有限的權力。實在。美國人口的增長與經濟活動的進步。使聯邦政府的權力事實上有很大的擴張。遠超過原來制定美國憲法者的意向。並且最高法院從牠的歷史上表示出。解釋原來憲法的文句。可有相當的伸縮性。好使這些文句適合正在發展中的需要。還有，各邦的主權因南北戰爭的結果。受到一成不變的限制。這次戰爭一勞永逸的解決了邦脫離聯邦的權利問題。但是，雖然原來的憲法有這些修改。美國政治制度的聯邦性。仍是一件有極端實際重要性的事情。例如，牠有力的阻止了工業立法的發展。這類的工業立法。其他一切先進工業都有。在美國。工業立法仍大部分在各邦的權限之內。

第四。我們所討論的這三個國家。全有兩院制。並且牠們的下議院彼此有顯明的相似處。同時牠們的上議院的性質却有深刻的不同點。法國與美國的上議院都是依代表制的基礎選舉的。但英國仍有一個世襲的貴族院。唯有新任命的貴族。是從院外新添補的議員。新貴族的任命。是政府的權限。算作皇帝的顧問。這三國的上議院的行爲都是有名的較國會中另一院守舊；並且這三個上議院的指定的職務。實在大部分是爲牽制政府與下議院的活動。但這種保守的趨勢。在這三個上議院中又有不同的方式，並且英國貴族院的保守性。遠較法美二國的上議院顯著。英國的貴族院實際上是一個永久保守性的議院。對於下議院通過的立法牠有有限的否決權。所以實際上。當一個主要爲保守性的政府在位的時候。牠就失去作用了。但在其他任何種政府當權時，牠永遠是站在反對的地位。在法國和美

國的上議院中，沒有一個單獨的政黨或單獨的利益佔有這種機械式的優勢。在法美二上議院之間，美國上議院在意見上比較下議院不很落後。美國上議院的選舉，確同是由那些選舉下議院的選舉人選舉的。二者的不同主要是代表權的輕重不同。上議院議員的年齡限制較高，任期較長，並且是分批退休。在法國，也是上議院議員的年齡限制較高，任期較長，並且也是與美國一樣的分批退休制，但法國的上議院不是一個民選的機關，如下議院那樣的意義。牠是由一個會議直接選舉的。這個會議的人員，主要是地方的統治當局。這種直接選舉法，再加上他種因素，使牠與下議院相較，（特別在經濟事件上），比美國的上議院顯然更富於保守性。

政黨組織

第五。這三個國家的政黨組織極其不同。議會制度的運用，根本須依賴政黨組織。在大不列顛，政治生活的習慣強烈的歡迎一個兩黨交替當權的制度。所以永遠只有一個單獨的反對黨，可供作交替政府的基礎。這種只許有兩黨的理想，在實際上實在未完全實現。在整個十九世紀中，愛爾蘭人就是使人不便利的第三黨派，擾亂了二黨制的圓滑運用；愛爾蘭人的離開英國政治舞台，是因愛爾蘭得到自由邦的自治地位。但在此以前，工黨已興起，成為影響政治情勢的新第三黨。不過，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愛爾蘭黨與工黨只是集團，尚不足稱為完備的政黨。與急進派一樣。（一八三二改革法案以後，急進主義者組成一個半獨立的政黨，經過數十年之久）愛爾蘭的國民黨和大戰前的工黨，亦是擁護或反對那以二大黨之一為基礎的政府。借以施展牠們的勢力，但牠們自己不企圖取得政府位置。僅在大戰之後，真正三黨鼎立的情勢才出現。在過渡期中，自由黨失去牠們原有的基本重要地位，並且牠餘下的

所有，最後亦和工黨交換了地位，不再是一個嚴重的爭政府位置者了。於是，大不列顛實際上又恢復了二大黨的安排；但這已失去牠原來的簡單性，因為中間的自由黨的力量，很容易足以阻止任何一大黨取得統治權，如果沒有牠的幫助。並且牠與十九世紀的愛爾蘭人一樣，不僅對於某一個單獨的問題有利害關係，所以牠不能對於其他政治爭鬪的形勢，取旁觀的態度。

無疑的，一個兩黨制，甚至一個側面有次要黨派擁護的兩大政黨制，都可使議會制度的運用順利，並且可產生有力而比較穩固的政府。雖然，這種情勢是不能隨人的心願創造的，這可由大戰後新議會制國家的經驗明白的看出。這些新國家的政黨地位和法國的密切相似。在法國，沒有像英美那種有高度組織的政黨。只有一派一派的人員，派的數目極多並且有極大的移動性和不穩固性。這種派制度的存在，表示政府（政府背後必須有多數的擁護）只能以許多派的聯合為基礎；事實上，上下兩院中派的聯合不相符，所以局勢就更加複雜了。上議院中的派數，較下議院的少。並且上議院中派的聯合，較下議院的穩固。不過，政府主要是以下議院中的派為基礎，並且這些派間的聯合是移動的，以致法國的內閣軟弱而且不穩固，所以法國政府更換的次數，遠較英國為多。這種政府機關的弱點和政黨構造的弱點，趨向於使個人的重要性增加。並且，個人位置的保持，較在政黨制度堅強的國家須多憑藉個人的人格，並且個人在法國政治中，是一個重要因素，無論在地方政治或中央政治上。因為對於地方官吏的任命權，他有很大的勢力。

在表面上，美國的政黨制度與英國的密切相似。不與法國相似；因為在美國，正如在英國一樣，久已有兩個世

傳的大政黨，並且美國的這兩個政黨表現着，對於反抗產生新政黨，遠甚於英國。在美國的政治上，共和黨與民主黨仍握着競爭場所，所以任何人都極難被選人國會中任何一院。除非受兩黨中之一黨的贊助。雖然，美國政黨制度事實上實在與英國的很不同。在英國，永遠有一黨廣泛的主張一個保守性的政策——就是，竭力保持事務的原狀，同時，有時候對於必需的改革讓步。——另一黨確定的站在保守黨的左邊，並且以進步的立法作手段。求社會情況的漸次改進。實際上，（甚至在英國）兩個大黨永遠都是保守的。這就是說，牠們共同維持原來的社會和經濟制度。但在英國，擁護原來的秩序的人們，明確的分爲左右翼。所以，當工黨興起，代替了衰落中的自由黨，成爲保守黨的反對黨，牠能很容易的承繼上現存的進步習傳。

另一方面，在合衆國，我們決不能標明一個大黨是保守的，另一個是進步的。因爲這兩大黨都含有保守的和進步的兩種成分，並且這兩黨的黨員，多半是地域的或機會的個人聯合。極少是依政治見地審慎選擇的。有許多大家族世傳的加入這二大政黨，並且又有許多整個的區域世傳的是共和黨或是民主黨。因之，發生於美國的任何新政治趨勢，都將在這兩個政黨以內謀發展，並且不容易成爲一黨的政策。因爲另一黨會全體反對。而且，這種新政治趨勢，必須與美國原來政治制度中大家所公認的美國習傳充分一致。現在羅斯福總統的政策，爲多數他自己的民主黨徒所擁護，却也深爲民主黨的少數人所不喜。但牠亦受許多『進步共和黨員』熱烈的擁護。這些『進步共和黨員』主要出自西部各邦。在歐洲的觀察家看來，美國政黨的情形好像完全不真實；但明顯的，美國政黨制度的主要機能不是去組織不同的政治政策，即使是在對社會根本秩序有共同意見的基礎之內。牠的機能是使議會民主制能運用，而

這個制度是要運用於美國那樣大的土地之上，並且美國人是那般的彼此異趣。美國的政黨完全是運用憲法的一件一件的機器，不是敵對的政治趨向的表現。

議會程序

第六，這三國的議會制度的運用，在議會程序上有很大的不同。在大不列顛幾乎一切公共立法都是由政府創制，並且是政府政策的具體表現。然後將這些立法在議會提出，以候贊成，修改，或否決。在法蘭西亦大多如此。另一方面，在合眾國，行政機關——實際就是總統——有廣大範圍的創制立法權，但同時亦有許多獨立的立法，由國會本身創制，然後呈於總統，取他的贊同或否決。在大不列顛和法蘭西，個人議員也有創制立法權；但在合眾國，這種創制權有積極的使用。大部分是因為，事實上這裏的行政機關對於議會是一個獨立的權力，不是一個由議會內的多數直接產生出的執行機關。在這一點上，合眾國（在一方面）與大不列顛及法蘭西（在另一方面）正相反，但在另一點上，大不列顛又與合眾國及法蘭西全相反。因為美國議會和法國議會都主要以常務委員會制度處理公共政策的各特殊部分；這些委員會繼續不斷的處理某些特殊問題，因之漸對於立法的性質有極真實的極重要的影響。在法國，一個政府議案，常常被上議院中關於這種問題的委員會大加修改；並且上下兩院各自的委員會常常因某特殊問題的細目發生爭執，並且將這個問題堅持到使政府不能思議的程度。政府無力實行牠的志願。另一方面，在大不列顛，政府的立法權比較大的多，因為沒有任何相當於法美二國的委員會制度；甚至當議案入於委員會階段，亦是由特任委員會討論，不是由全議院討論。但這些特任委員會在實際上並非獨立機關。僅是全議院按政黨人數分配的

小形的複產物。並且是在內閣大臣的堅固的控制之下。以政府與議會對立而言。在不列顛制度之中。政府的力量一向使委員會工作決對不能有效的發展。

議會與選舉

第七，選舉權的範圍、議員被選的任期和實際開會的期限、以及解散議會的實行。在這三國間有重要的不同。在大不列顛與合眾國。女子有選舉權。但在法國則沒有。在合眾國。下議院的任期只有兩年，並且每年大部分時間是休會，此外，議會實際起始開會。是在選舉完畢很久以後。這種事實大大的減弱了議會對於總統的權力。總統的任期較長。所以能比選舉他的國會經久。但在他的任期的後一部分。這種情形也可使他遇到一個與他敵對的議會多數，因為這時的國會。是在使他得勢的思想潮流改變以後選出的。另一方面。在大不列顛。下議院的任期為五年，並且有時可以直至期滿；但內閣總理有一種習傳的權力。即在任何時期。都可以請求解散議會。並且政府在任何爭點上失敗。以致引起下議院的不信任。普通立刻即須重新大選，除非當時議院能供作另一個政府的基礎，但這種時候是很少的。法國的制度與英美的制度極不同。下議院任期為四年。並且在期滿以前從來很難被解散；因為在英國政黨制度之下，很少有改換政府而不改換下院內容的可能。但在法國，永遠有許多可能開放着。這是因為分立的黨派數目多，並且牠們彼此間的關係是變動性的。在法國，政府更替只不過是政策的方向極輕微的改向左或向右，並且有時甚至尚不及此。例如，最近一個個的急進主義的領袖，都曾經手組織政府，但經過所有這些政府的更替，政策或議會的後盾都沒有真正的變動。

我們本可以選擇其他許多特點，來比較這三種議會制度（這三種制度是被選出代表主要議會制政府的），我們又可以援引其他議會制國家的制度（這些國家有其他不同的政治制度），使我們的比較更加複雜。不過，雖然有這許多深切的不同的點，但所有不同的議會制度，都有許多相同處。牠們全是根據一種假設，認為一國中的立法權，應當大部分（假如不能全部分）在若干代表手中，這些代表是有選舉權的全體公民用一種方法選出的，又認為這種代議制度，無論如何是國家的正確政府的一個主要成分。牠們制定的代議立法機關（與憲法中其他分子對立而言）的權限，以及牠們明白或暗含給與個人的權限，也許有很大的不同，但牠們都是企圖使一種「民主政治」與大規模的現代國家情形調和。在這樣大的現代國家內，全體人民直接參與政事，至少要像在古代希臘的小城市國家內那樣全體人民參與政治，是不可能的。現代議會制度背後的理論好像是說，既然承認人人有參與創制法律的權利，而這些人又不能人人親自參與創制，他們應當有推舉代表的權利，替代親自參與。就是，人民有權推舉少數人，這些人的選舉，就算作代表他們所代表的若干選舉人的同意。當然，議會制度不必定必須是民治的；因為選舉代表權，可以擴張到全體成年人民。或隨意限制大小階級不給牠選舉權。議會制度的基本意義是代表制。不是民主政治，並且在大多數國家內，唯有逐漸一步一步的，代表人民的議會，方漸近於以普選為基礎，甚至以部分的普選為基礎。我們將要看到，人們能依照議會的方式和代表制的民治性質，叫人代表他們，是由於這種思想。這種代表制的民治性質，正受與牠敵對的政治組織的形式的攻擊。我們必須將這些敵對的政治組織的形式與議會制度作一比較。

第二章 獨裁制度

當我們從比較各種議會制度，轉到討論廣義的總稱為獨裁制的政治制度，我們立即發覺我們自己到了另一個世界。對於這另一個世界，沒有一種爲人所熟習的十九世紀的政治理論，可以容易適用。這並非因爲在世界史中獨裁制是一件新鮮事，以前已有過各種形式的獨裁政府。而是因爲，政治理論家近來幾乎完全是依照議會主義陳述他們的理論，並且暗含的或明白的假定唯有議會制政府的形式，是運用一個現代文明國家的合宜的或正統的制度。所以現代政治思想中的一切熟習的典型，都是議會主義的典型；但這些典型決不與若干主要國家正在發生的制度適合。獨裁制將我們引到另一個世界——或者更可以說，到了兩個不同的世界。因爲俄國的無產階級獨裁制與在義、德、奧創造的法西斯獨裁制，根本上很少有相同處——奧國的獨裁制是宗教的和法西斯的，並且或許實際上甚至宗教性多於法西斯性。在法西斯獨裁制與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間，實有組織上的相似點，並且我們應當注意到這兩種敵對的制度憑藉着幾種相似的組織方法。但在我們注意這些相似點的時候，必須不要忘記，這兩種制度在牠們的目的和基本哲學上，完全不同，並且完全是敵對的。所以，牠們的相似點是在表面上，將基本不同的極重要的特點遮蔽住了。

在俄國的無產階級獨裁制與義、德、奧的法西斯獨裁制之間，尙有其他獨裁制度，不能歸在這兩極端中的任何一端。我們知道，土耳其與中國在形式上全是獨黨制的國家。這種國家的運用，是依賴一個組織遍全國並且大部分

以武力爲背景的政黨的力量。此外，在歐洲有許多國家，牠們的政府形式與獨裁制密切接近，但與真正法西斯國家又不同，即牠們的制度不是依賴一個讚揚煽動性政策的政黨的權威，而是依賴一個仍以專制方法爲統治目標的皇帝的權威。猶哥斯拉夫與羅馬尼亞屬於這一類，並且一九三一前在李維拉獨裁之下的西班牙，亦屬於此類。匈牙利的地位稍不同。牠是在一個攝政王的（不是一個皇帝的）權威統治之下；並且波蘭又自不同，牠的獨裁制度，是在皮爾蘇斯基將軍和他的若干軍官手中，他們處理政事，不出一個形式上仍爲議會制的共和國的範圍。

爲達到本章中比較研究的目標，我們最好仍用我們比較各議會制度時所採用的方法，並且最好是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少數特著的國家。我們將以俄國爲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模範代表，以義大利和德意志爲法西斯主義的代表。雖然在這裏，我們很難精確的談論德意志的新的憲政上的發展，因爲德意志現在是在開創的不完備的階段中。我們不要先討論各獨裁制的不同點，要先討論牠們共同與前章中所討論的議會制度的區別。

獨裁制下的議會

第一，不論什麼形式的獨裁制當權，即使議會仍存在，亦變成一個不重要的無效力的機關了。在俄國，沒有必須打倒的強固的議會制習傳。俄國議會（Дума）隨着蘇維埃制的降臨，輕易的就消滅了；但在義大利和德意志，議會仍然存在，雖然現在德國見於帝國中各邦在憲法上的自治權已無，將已無需要的聯邦議院取消。義大利顯然打算保留牠的上議院，廢除下議院，並且用一個組合議院（Chamber of Corporations）相當的代替牠。但現在義大利議會的上下兩院都仍存在，雖然『民衆』議院（即下議院）

譯者）現在實際上是由法西斯大會從法西斯國

家所承認的各種『組合』團體推舉的名單選擇出來的。在義大利及德意志，議會在憲政的制度中，減到極少真正重要的地位。牠的存在，是國家領袖不時宣言的紀錄板，是預備在需要的時候，批准已由有效的統治機關贊同的立法，或記錄為代表國家的志願而設計的投票。雖然法西斯的領袖給議會找出這些繼續的用途，但顯然的，假如議會完全沒有了，如同在奧國那樣的消滅了，對於國家制度的運用，並沒有真正的分別。議會在法西斯國家內，變成一輛車的第五個輪子，並且甚至不及一輛汽車的預備輪。牠在政府制度的運用中，沒有真正的地位。

政黨獨裁制度

第二，在一切新式獨裁制之中，政黨組織——即唯一准許存在的握統治權的政黨組織——變得在憲法上極其重要，比在最發達的議會制度之下，重要的多。實際上，這個政黨變為政府的最終機關，並且是公共政策的直接來源。在義大利，現在法西斯大會（不是議會）是立法機關；在俄國，雖然最後的憲法上的權威，在紙上是屬於蘇維埃代表大會，樹立政策與創制法律的真正工作，主要是在共產黨各種會議中完成，並且經過共產黨的機構。在德意志，就不完全是這樣。德國的政黨機構，雖然對於造成革命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但以整個而論，牠對於政策的影響，比在義、俄小的多。一部分是因為，德意志新國家的組成，是按照自上而下的個人領袖制的原則。這一點牠過於義大利，當然更無限的過於俄國。所以牠的握統治權的政黨黨員，是為執行黨魁的命令，不是為有效的參加政策的制定；但一部分亦因為，國社主義的革命仍是在進程中，並且尙未能安定下來從事於牠要樹立的憲政制度的工作。因國社主義國家的團結，似乎不可避免的將從黨的各級官員中，發出一種日漸增加的壓力，對於公共政策的決定，要求

一份有效的權力。不提領袖間衝突的可能。這些領袖們對於國家的根本，好像各人持見不同。但甚至現在，雖然有了個人領袖的制度，但關於控制各代理機關。須作的事仍甚多。全盤一致化的程序。將這些代理機關置於公開組織的活動範圍之內，以致在施行新政體的程序中，必須大部分信賴次要領袖的提案權。所以甚至在德國，以政黨全體而論，仍很重要，雖然牠棄絕民治原則，甚至在他本身的官級之中。這個黨受專制的領導；但國社主義的獨裁制，如無組織堅固的政黨作牠的工具，牠即不能控制德國。

言論自由與組織自由

第三，在一個獨裁制度之下，公共問題的討論，是循另一種方式進行，與在議會政體之下我們所熟習的方式很不同。在議會制的國家，言論自由與組織自由以及和平的運動，都被認為在一定的限度以內。對於政治的行爲是重要的。實在，在這幾方面，沒有一個議會制國家，許可完全的自由。被控作煽動運動的人下了獄，言論自由的意義並不及牠原來的意義那樣多，因為大多數有效的新聞機關，都受一小部分有力的資產階級支配。然而相當大的許可範圍內的討論，是議會制組織的一個重要特點，這種議會制的組織，是從敵對政黨的對抗自然興起的，每個政黨都要求有權利使牠自己的理論，有取得輿論贊助的機會。在另一方面，一切獨裁制度對言論、組織、和宣傳自由問題，都採取一種十分不同的態度。牠們皆堅持唯有在新政體本身所根據的假設之限度內，這些自由方可允許。無論如何，在過渡階段須如此，因為這種過渡階級，是為鞏固新政體的。批評家如接受握統治勢力的政體的基本哲學與政策，可以有很大範圍的發表思想的自由，但他們這種工作必須是在政黨組織的輪廓以內，並且是預備不再有疑問的

接受政黨共同得到的任何結論，即使牠是與他們自己的見解完全相反。在獨裁制之下，關於認為仍未決定的事務，可以有很大的言論自由。但當握統治權的政黨對於任何事務已設立下正統的見解，在這方面的批評權，立刻就算終止了。批評家如果不承認他的錯誤，不同意接受政黨得到的結論，並且不使他將來的行動和言論都以此為根據，他就有被驅逐或傷害的危險。這就是說，在一切獨裁制下，都有一種正統的見解，只要牠一成立，所有的好公民，都有與牠一致的義務；並且如不能與這種正統見解一致，那麼不從正統見解者的參與國家政事的一切權利，或企圖說服別人接受他的見解的權利，就全被剝奪了。這顯然是自以為在防衛陣線上的人們所特有的立足點。他們的天職是擁護他們所信仰的主要制度，抵抗一切方式的攻擊。武斷的精神與自信的正直，常常出現於世界史中，但在過去，通常是與宗教原則聯合着，不是同純粹的政治原則聯合着。牠重現於今日成爲一個純粹塵世的柯爾文主義（Calvinism），牠與在克林威爾下的『聖人』統治，有許多相同處，並且與柯爾文（Calvin）和畢茲（Beza）統治下的日内瓦政府，相同處更多。

這些對於言論、組織、與運動的限制，並非說自由已完全沒了；因爲在某些獨裁制度之下，特別是在俄國和土耳其，關於形形色色的問題，很有些討論和積極的爭辯。言論自由未完全毀壞；牠可以說是歸納成潮流，並且被逼流向一定方式的思想與主義。並且，至少在俄國，牠有了一個流動的河道，因之流的更快。這種附屬的次等自由，在各種法西斯獨裁制之下極少；但在國社主義德國的熱烈的活動中，也有牠的徵兆。這些活動是國社主義的作者與藝術家，表示要將他們所有的思想，都傾注於國社主義學說的新典型內。

第四，獨裁制衡量輿論的輕重，與議會制的國家不同。在議會制度之下，輿論的衡量一部分是由於選舉人的選舉權的性質，與立法及行政機構中選舉的和非選舉的份子的相對的權力。但大部分，牠須自己經過政府直接統治以外的經濟制度產生出來。這就是說，事實上，牠的衡量極利於有大量財產的人，因為他們能極有效的利用言論自由和組織自由的制度，遠非沒有多少經濟富源可資運用的人所能及。議會制度與私有生產工具的制度並立存在，因之牠的衡量輿論，是偏向財閥階級的。甚至在選舉權確實普遍並且民選的下議院有很大權力的國家。在另一方面，獨裁制著手審慎的衡量輿論，牠不用操縱選舉制度的方法，而是直接操縱重要機關，經過這些機關，輿論方得表現。算數的意見，只是忠實黨員的意見，並且除黨內受迷惑的範圍以外，一切人的意見都被算作反對的勢力。對於這些勢力必須加以注意，藉以決定黨的既定政策可以推進的限度。反對的意見必須加以注意；但因為不願反對的意見成爲任何形式以及由此組織形式得到力量，於是獨裁者着手轄制牠，阻止牠取得勢力。這種勢力的產生，全是由於公開發表及組織。這就是獨裁制度常常需要大隊偵探的原因。等到把反對的意見熄滅了，並且阻止了牠公開發表，獨裁者們必須弄明白牠是怎樣一會事，因為恐怕在執行他們的政策時意外的碰撞上牠。

全盤一致化與代表制度

第五，在一切獨裁制之下，德國人所謂全盤一致化的程序，有廣泛的施行。這種程序的主要目的，在盡量把能影響國民的意見和態度的一切社會組織，置於一個領袖之下，這個領袖須對握統治權的政黨完全同情。因之，這些社會組織變成積極推進這個政黨政策的代理機關。這就是『極權』國家的概念內的根本思想。但顯然的，俄國亦以

不同的方式，運用這同樣的原則。共產黨政策的一部分，亦正同於法西斯黨的與國社黨的政策的一部分，是要確使社會上的重要位置，握在絕對能用這些地位促進國內當權者的目標的人們手中。

第六，在一切獨裁制之下，代表制問題的意義與在議會制政府下的意義不同。議會制度的基礎主要是個人。牠把牠的代表制度建築在個人投票者的基礎上，認為他選舉某某人，在國家的統治機關中代表他個人的意見。另一方面，獨裁制度絕不是這種意義的個人主義的；因為牠的目的是永不給公民個人權力，不使他對於公共政策的決定有影響。在大多數情形上，他們把人民看作一組一組的，這一組一組的人民需要聲色俱厲的恐嚇，或花言巧語的欺騙，或召募來為國家服務，並且他們把這些組看得較組內所包含的個人重要。共產主義認為這些組根本是各種經濟階級，所以牠推出社會橫分裂的觀念。牠的目的是代表無產階級，不是代表個人，並且要使無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直到將一切其他階級與牠自己併合為一個無階級分別的友愛的社會，牠不再是無產階級。另一方面，法西斯主義認為人的根本分野是機能。不是經濟階級，所以牠把人民分成縱的組。每一組都有對於國家的關係，這關係可以用國家付與牠的服務解說，這是組合國家的思想的根本概念。組合國家企圖將社會中一切各種機能團體組織起來，作為政治國家的附屬機關，並給牠調節和控制的過度的職務。所以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都不打算代表個人。或把個人代表連繫上任何重要性，以別於團體代表。這些團體由於牠們在社會上的特殊地位，可以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這分別基本的，但我們不需要在此處多討論牠，因為這冊書後面有幾章將再討論牠。

形式相反的獨裁制

關於大戰後新獨裁制的共同特點，已說了不少，雖然牠們有許多形式不同的表現。這些同點是極顯著的，但我們從一開始就看出，牠們是次要性的，因為牠們是屬於組織和機構的範圍，不屬於最後性質和最後目標的範圍。同一工具能有極不同的用法。一把外科醫生用的刀子，可以用於治療人，亦可殺人；馬前霜鹼是一種補品，亦是一種毒藥；同一汽汽車，可以送你到遊樂之所或危險地帶。現在我們討論敵對形式的獨裁制度的根本不同點。

第一，在世界上，有以獨裁制為保存在階級區分的工具及毀滅階級區分的工具的不同。並且這不單是一個最後目的問題。因為牠對於一個獨裁制度的當前的工作，有重大影響。假如目的是消滅階級區分，並且藉設立無階級的社會，建立民主政治，牠顯然須立刻開始建樹民治的制度。這些民治制度對於運用以每個公民的平等為基礎的社會，是必要的。因之這獨裁制的基礎必須盡量推廣。並且為一致起見，牠的各等級只需要對於牠的民治目標沒有太危險的妨害的份子。因此，俄國的共產黨必須大，而且須穩健的擴大牠的基礎，其方法是從社會化的農業工人中再往黨內招致更多的份子。並且須在牠的內部工作上盡量民治化，目的在訓練牠的黨員，能負起落在他們肩頭上的責任，即國家的日常行政。和建設心目中的較廣大的民主政治。另一方面，法西斯獨裁制因為是要保存階級的分別，不是要消滅階級的分別，所以必須防衛着，不讓牠的團體中的民治和無產階級份子，在制定黨的政策時，得了上手。牠或許需要使牠的黨加大，藉以得到擁護牠的充分基礎，使獨裁制加強；但牠亦需要依權威的方式，不依民治的方式，組織牠的黨的內部，為得是保證某些份子在黨內的優越地位。然後依賴這些份子，保持『極權』國家的階級特

性。這個黨必須反映着牠所把握的社會制度：假如這個社會制度是要保留階級的區分，那麼黨亦須如此。

這個不同點引導着法西斯獨裁制，使牠把與組合統制對立的個人領袖看得最重；因為，雖然目的或許是建立組合國家，但組合國家必須有一個個人領袖，如義大利的首相（Duce）或德意志的總理（Führer），為權威的根源和黨的靈魂。在另一方面，即使無產階級的獨裁在危險中把大權給與一個人，但牠自然的敵視個人領袖，無論如何，牠敵視任何一個活人為領袖。牠可以在列寧死後，把他奉為聖人，又如中國在俄國的影響之下，把故去的孫逸仙博士奉為聖人。但牠不會把斯丹林或蔣介石奉為聖人，不論牠給與這兩個活着的領袖的權力，是如何的多。

在直接控制社會生活的範圍和方式上，法西斯獨裁制與共產主義獨裁制之間，又有重大分別。共產主義獨裁制因為目的在廢除階級和樹立經濟上的平等。所以牠必然的被引導着，將生產和分配財富的主要機關放在牠的直接統治和管理之下。牠必須直接管理這些事情。因為唯有牠對這些事直接負責，牠才能有效的控制收入的分配。在另一方面。法西斯國家的目的是不平等，所以牠對於按照資本主義經濟學的『邊際生產力』定律，分配不平等報酬的經濟制度，甚為滿足。牠所實際需要的，是將國內的經濟機關置於一種監督之下。全盤一致化必須相當的用於這些經濟機關，目的在將工人保持在適當的訓練和服從之下，並且保證僱主順從法西斯國家的總政策。但這些目標，無需公家握住工業的積極行動，就可達到。所以法西斯獨裁制把工業大部分留為私人所有。並且目的只在保證牠的行動與國家的需要調協。這個國家是維持階級區分和經濟上的不平等的。這就是說，在共產主義下，獨裁的範圍遠大於在法西斯主義下；因為事實上，只要大資本家仍佔有主要生產工具，他們必然的成為社會中的一種力量——一種經濟

獨裁——沒有一個純粹的政治獨裁。能希望使這種力量完全服從牠的志願。沒有一個法西斯獨裁制能純粹是政治的；牠必須亦變成一個經濟的獨裁，不然就須與資本主義的經濟獨裁聯合統治。

因為這個分別，所以法西斯獨裁制與無產階級獨裁制對於牠們自己的社會內一般的生活性質的影響，根本不同。法西斯主義未擾亂社會中不同階級間的收入差別，除去偶然因工人地位轉壞，允許人民在他們的政治活動範圍以外，繼續獨裁制降臨之前他們原來的生活。在另一方面，共產主義要根除階級區分並向收入平等迅速邁進，牠強迫人民完全重新調整他們對社會的關係和價值的觀念，並且使得許多人，必須突然改變他們的整個生活標準和生活方式。所以牠對於人格的性質和特徵以及私人間的交往所產生的有力的作用，遠甚於法西斯主義。這些不同點對政治活動的真正內容起了作用，因為牠們將人民的極大部分生活帶到政治範圍以內，並且將他們的行動和思想統一在一個包圍性的社會計畫的概念之下。對於這個計劃，這些人有共同的責任。無產階級獨裁制包含着極新的社會評價，這種評價的意義較法西斯主義的評價根本得多，因為無產階級獨裁制是依賴一個極根本的經濟革命。法西斯主義的目的主要是保持那受威脅的舊制度，但共產主義是設法樹立新評價。

總之，雖然現在正在爭霸的獨裁制度之間，有密切的共同特點，但如認為在任何意義上，牠們皆堅持共同的思想，那就大錯了。牠們皆反對議會制度，但反對的理由却截然相反。共產主義的反對議會制度，是因為牠認為議會制度不能適用於建立和指揮一個以經濟平等為基礎的無階級分別的社會。另一方面，法西斯主義的反對議會制度，是因為牠認為現代民治式的議會制度，已不再是保持階級分別及族國主義思想的有效工具。因為共產主義雖然現在

有了民族國家的具體表現，但牠根本是世界大同的，牠不僅否認階級的特權，而且否認國家的排外性，法西斯主義在一切地方皆堅持這種排外質。把根據極相反的基本思想的獨裁制混爲一談，純粹是蒙昧的論調。牠們的某些工具是共同的；但他們着手使用這些工具，是爲完全相反的目的，並且使用的方法亦根本不同。

第三章 政黨與政黨制度

政治制度的機能，是在供給一個法律的和憲法的結構，在這結構中，生活的藝術能得到發展的餘地。因之，政治制度必須與生活基本狀況的需要符合。政治制度所保持的人與人的關係，必須能供給合理的機會，使人藉此發展他們的力量，為他們自己創造良好生活的工具。社會的政治制度必須與時代的技術需要諧和。這些制度必須與可供利用的生產力的充分使用一致，使生活程度升到實際的最高點。牠必須充分的顧到文化的需要，這種需要是由技術與教育的進步印入人心中的。

有人可以爭辯說，這些事情是經濟制度的職務，不是政治制度的職務。但事實上，要把這二者分開是不可能的。因為政治制度所保持的人與人的關係，是政治的關係，也是經濟的關係。不論何時何地的國家，都是以一個特殊的財產權制度為基礎，并由國家法庭保護這種制度。政治的憲法暗含的（假如不是明顯的）具有關於私有財產權的規定，和憲法關係的神聖不可侵犯性的規定。憲法是施行公家的與私人的權利和要求的工具，這些權利和要求是在一個經濟制度之下所特有的。假如這個經濟制度能滿足上述的條件，亦即可以使人有機會發展生活的藝術，以及充分利用可供利用的生產富源去擴大他們的滿足，那就好極了。假如不能，政治制度將強有力的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所需要的經濟改革，並且等不到這些改革在新經濟制度中發生效力，牠就要被掃除了。因為政治制度是以經濟制度為基礎，以經濟制度為保衛牠的工具。

但是，有人要說，政治制度不是剛性的，而是有高度適應性的。我們可以修正牠，而不致毀壞牠；並且可以用牠作工具，去製造經濟制度中必要的修正。實在，在過去一世紀中，政治制度有穩健的修正，並且被用於改正各種的經濟不調和。選舉權的推廣，將議會制的國家從寡頭政治的組織，變為部分的民主制度。並且改變後的國家，曾一再的用各種社會改革方案，修正了經濟制度。例如，租稅從純粹承當政府開支，變為重新分配收入的媒介。國家管理工業狀況，實施民衆教育，並增進公共衛生。在一方面說，國家從純粹的政府機構，漸次發展為促進民衆幸福的機關。

這種說法當然有許多真理。國家不是剛性的，可以由內裏發出的作用於牠的力量，壓迫牠改變。牠所支持的經濟制度，也可以修正，藉以應付幸福的要求。事實上，政治和經濟兩種制度，都有很大範圍的修正。不過，這問題是，牠們的修正，是否沒把議會制度和議會制度所根據的經濟制度，修改到超過牠們的可能伸縮限度。國家到了普選的地步，能否再繼續變得更民治，而且保留着牠的議會制的形式？牠能否繼續布施幸福的藥劑，而仍保衛着資本主義制度的財產關係？

有一時期，人們以為普選是民主政治的最後階段。但事實上，現代國家，甚至實際有普選的現代國家，都遠未能將一切權力交與全體選民。現代國家以種種方式，從『權力最高的人民』所取回的，遠多於所給與他們的。有的國家仍有與下議院並行的上議院，為特殊的少數人所把持，而且權力很大，並且有一個皇帝或總統，他有屬於他自己的或屬於他的顧問的很大的特權。在這樣的國家內，上面所說的情形更顯著。有的國家有成文憲法，並且牠的修

改程序很繁雜。牠裏邊具有基本原則，人民立法機關的一切議案，都必須與此基本原則一致。在這樣的國家，前面的說法同樣是對的。合衆國的最高法院以成文憲法爲武器，阻礙政治和經濟的改革，這種阻礙甚至等於一個曠俾最強的皇帝及貴族性的上議院所能作的有力的阻礙。沒有一個大國會經試行過任何完全意義的議會民主政治；或者以後也永遠不會有。

雖然，這些決不是議會制國家的民治性質的唯一限制。我們姑且認爲，假如大多數選民強烈的決心要使現下的制度有某種特殊的改革。那麼這個議會制國家內的貴族成分出來阻止他們是不可能的，或者，成文憲法與他們的願望相反，也是無用的，不論這個憲法的修正程序是如何困難。但實際上很少有這樣的事。大多數選與人，永遠不會強烈的決心妄求任何能以議會議案或修改憲法表現出來的事物，雖然多數選舉人或許有時候極果斷的拒絕政客們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事物，爲的是借他們的完全拒絕，硬一個適當制定的法律的運用無效。美國的禁酒法案是一個顯明而適切的例子，法國人拒絕交納他們認爲過重的租稅的力量。是另一個例子。在積極方面，多數選民或者有時實在要求某些事物，例如和平與麵包；但這種能喚起全體人民的積極要求，不是憲法上的或法律上的，而是嚴格的事實上的。如果問題變爲通過法律，多數人永遠是——並且將要永遠是——對於任何特殊法律，甚至對於禁止法令的制定，不關心或不熱心。爭鬪只是少數人之間的，這類少數人的數目也許大也許小。但永不會變成全體人民的多數。多數人可以投票贊成一方，反對另一方；但任何這類的多數人，皆包含一大部分不熱心的投票人。

在這些情形之下，選舉權的平等並不就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因爲有些人所處的地位，最能使不關心的選舉人去

投票，所以平等的選舉權給與這種人以超出比例的力量。在比較落後的國家，這就等於握政黨的政黨準能選舉勝利。例如，在羅馬尼亞，每次大選都是擁護政府者得到壓倒的多數，並且將各反對黨減為極少數。但假如皇帝更換政府，並召最近一次選舉中的反對黨主政，這時牠一定也能得到同樣極大的多數，如同以前對方所得到的。這一部分是由於羅馬尼亞的特殊選舉制度；但絕非完全因此，因為在原始式的國家中，政府有影響投票人的極大的權力。牠可以威嚇；牠可以表明偏愛牠的友好的希望；並且牠可以甚至用最後的手段，把票計算錯誤。

在某些進步的國家中，在議會制度有效的時候，這些方法是不公開的，雖然如我們所知道的。牠在國社主義的德意志有充分的使用。但在『民治』國家，假如政府的權力極少，有錢階級的權力就極多。不關心的選舉人會受一種報紙上訴之於民衆的影響，而這種報紙是富人所有的或受富人統制的；並且大量的金錢可以用於直接或間接的選舉宣傳。有錢階級的權力對於影響經濟事件的實際進程，亦同樣的重要。他們撤回他們對政府的『信任』，就可造成經濟衰落，使人民厭惡政府。他們可以將市場安排得不借給政府款，或延遲租稅的交納，藉此阻礙政府的活動。他們可以強逼政府站在他們所選擇的立足點上爭鬪，或強逼牠在爭鬪中失敗，喪失牠自己的擁護者的信心。他們能夠不斷的把有利於促進他們自己的利益的思想，宣傳到人民心中，並且散布謠言。他們的反對者的宣傳工具遠不及他們，所以不容易改正這些謠言。

事實上，真正的民主政治不——並且永不能——與任何高度的經濟不平等一致，假如人是完全理智的和政治頭腦的動物，那麼就可以不受狡猾宣傳的感染了。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也就沒有這種問題發生了。因為一個理智的

和政治頭腦的社會，一定不能容許任何重大的經濟不平等。以現實情形而論，普選制度並不就是民主政治，甚至普選制的限度，至於具有普選條文的憲法在形式上是民治的，也不一定就是民主政治。

因為『民主政治』必須經過代表方能起作用，這些代表必須經過政黨，並且須在議會制度規定的情況之下，方能起作用。這是普通公認的；並且大家都承認，極大多數的情形，都是選舉人投一個政黨的票，並不是投他們選區中某個人的票，而這個人碰巧是政黨的候選人。但當候選人已選出，他們大多數不久就發覺，實際上他們差不多是輪班投票機器的一班，以備為政黨保衛牠的政策，並沒叫他們為他們自己運用思想。這裏有一個政府黨和一個反對黨的黨會議（或者有好幾個這種黨會議）；非黨員選舉人的職務，特別假如他贊成政府黨，只是擁護黨的領袖，而不弄出麻煩。

因此，政黨領袖制的性質，以及牠對整個政黨的關係，都與民主政治有很大的關係。假如各政黨是合理的民治性質的，領袖在實際上代表一個大數目的黨員共同制定的意見，並且是一般黨員領導黨的活動，那麼這個政黨制度確具有民治的成分，即使牠是工作於一個非民治性質的社會構造中。一個民治性的政黨，可以在一個非民治性質的社會內存在。但假如政黨本身不是民治性的，那麼普選也不過只是在敵對的政黨間，選擇一黨的工具。

在這一點上，各政黨間當然有很大的不同。在大多數國家中（假如不是在一切國家中），政黨制度的習傳是完全非民治的。歷史上的各大政黨，都不是自下而上以一般的黨員為基礎建立的，並且牠們的政策不是來自黨員所表現的願望。牠們是自上而下由政客團體和贊助他們的富人或强有力的階級創設的；當牠們以後得到了民衆黨員，牠們

普通是把牠們的黨員只當作選舉爭鬪中的輔助物，並且不承認他們對於黨的政策有任何權力。領袖們——當然也必須用一隻眼注意他們的擁護者——宣布政策：選舉區的組織，只是取得必要的擁護的工具。在英國，保守黨和自由黨都沒有任何廣大而真實的一般黨員控制黨的基礎；並且這兩黨的會議，亦沒有為大家所公認的指揮牠們的領袖的權力。

工人階級的政黨

英國的工黨，以及別處的社會主義的政黨，較前面所述的民治的多。但在英國，甚至工黨亦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由社會主義的首領和工會領袖的一個會議建立的。僅在一九一八年以後，牠開始在各選舉區內組織牠自己的民衆黨員；甚至到現在，牠的代表大會（牠有制定黨政策的形式上的權力），不是受全體黨員的控制，而是受大工會的『集團選票』的控制。這減弱了地方的社會主義者對於黨的機構的意見，並且幫助工黨與英國的政治習傳同化。所謂英國的政治習傳，就是政黨機構由中央控制，自上而下領導政治意見。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九年的兩次英國工黨主政，可以說明這種同化的結果，即工會本身對政黨機構的控制減弱，雖然工黨根本依賴牠們的選舉力。

與英國工黨相反的，是大多數歐洲大陸上的社會主義的政黨，牠們是目下而上建立的，以單個的黨員為基礎。但議會制度的危急，使這種政黨繼續不斷的急切想逃避了牠們黨員的民治性的控制與束縛。並且在牠們的歷史中，牠們的黨員大會與黨員中的被選入議會的人員之間，常發生爭鬪。因為，社會主義玩議會的把戲，牠自己最容易被引誘與舊日政黨的不民治手段同化。

共產黨，尤其是俄國的共產黨，有不同的習傳。牠們因受逼迫，大部分的行動須是非法的和秘密的，所以牠們不得不有一種極堅強的訓練；因為一個秘密的政黨必須黨員依令行事，並須有高度的忠心，不然一定要滅亡。因此，共產黨必須主要自中央建立；但因為共產黨與其他政黨不同，牠們需要牠們的全體黨員作很重的積極工作，所以牠們永遠未至於以半輕蔑的態度對待黨員。這種態度是其他領袖們所特有的。俄國共產黨仍保留着從牠的秘密時代推演而來的權威領袖制的廣大成分；但牠這個團體現在已改變，牠的全體黨員在建立社會主義的政策中，可以藉着黨，由下而上有效的發表他們的意見。

雖然，俄國共產黨根本與議會制度下的政黨不同，即共產黨本身具有政府的權力，並且不容有其他政黨存在。牠不是幾個競爭政府位置的政黨之一，而是政府工具所依賴的基礎。牠不再是傳統意義的政黨，而是一個獨裁制的委任機關。在這一點上，牠同於義大利的法西斯黨、德意志的國社黨、和土耳其甘末爾的政黨，雖然牠未曾正式給牠自己任何憲法上的特權。與法西斯黨和國社黨不同。牠不需要這種特權，因為牠已在代表制的政治組織蘇維埃制度中，建立下一個牠可隨時運用的適當工具。俄國的共產黨可以藉蘇埃和各式各樣的『集體組織』統治。現在蘇聯的事務，就是由這些『集體組織』管理。因為，這些組織與共產黨本身一樣，是一個階級的權威的具體表現。在另一方面，法西斯黨與國社黨不能利用議會去達到這個目的，雖然牠們一向在形式上保持着議會制度的外形。議會不能應付牠們的需要。因為如要議會制度有生命和意義，必須牠們許可敵人和敵對的政黨上台競爭權勢，這樣對於當權的政黨的統治，永遠有一個依憲法交替政權的可能。假如一個議會失去了這個特性，成爲一個政黨的事情，牠立

刻完全變為當權政黨的既定政策的記錄機，並且失去牠自己的一切生命與意義。牠或許仍存在，如同牠一向在義大利和德意志——雖然至少在義大利，牠的撤換好像現在是很迫切的——但沒有人注意牠，或認為牠多過一個從舊制度遺留下的儀式。在義大利和德意志，政府的真正工具是政黨，不是議會。

政黨與獨裁

但是，這樣奪取國家權力的政黨，牠本身內的民治程度怎樣？關於土耳其的統治黨，據我們所知道的，尙不足下定論；但關於其他握統治權的政黨，我們可以說一說。否認議會制度的新法西斯黨，皆極端注重領袖的需要。國社黨公開否認民治的觀念。替代這種觀念的是依古典意義領導人民，而不是被人民領導的『煽動家』的觀念。這就是牠的基本政治原則。把人民拉攏到自己的陣線上，是必需的，但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是領導他們和感動他們，不是讓他們統治。這好像就是國社黨的信條。墨索里尼尚不至於被人公認為這種意義的煽動家；但他亦明白的相信由上而下的領袖原則。將這種原則同樣的應用於黨和國家。法西斯黨的和國社黨的領袖，不是從黨取得政策；他們利用一切訓練和宣傳的技術，在上面計畫並補充他們認為適宜的政策。

或許斯丹林對於領袖的技術，持有與此相同的觀點。他沒有握着國家的任何重要位置，而以他的共產黨秘書的優越地位，操縱全俄國的事務。無論如何，他好像在蘇聯的中央，造成他自己的個人獨裁制。共產黨團體獨裁的成分極少。在他當權以前蘇聯不是這樣——甚至在列寧領導下的時候。俄國和布爾什維克黨都有權威的習傳，在這種習傳之上，斯丹林始能對於近年俄國政策的演進，實行他個人的控制。他把曾經膽敢和他反對的托洛茨基（Trots-

（五）和黨內其他一些領袖。驅逐到國外。並且在黨內使主義的一致性。較以前更加強硬。但是，雖然他的權威這樣大，他運用權威仍必須在蘇維埃制度所制定的條件之內，並且必須領導着地方蘇維埃的領袖。這些人又必須轉而領導地方蘇維埃，擁護他的政策。另一方面，在義大利和德意志，實際上在黨以外沒有有組織的輿論，使黨必須接受，並且政黨本身極少是建築在一個政策之上，而是以訴之於民衆感情爲基礎。所以，凡能藉滿足政黨的的感情需要而控制了政黨的人，就能控制國家。只要能抓住這種感情，就可一直繼續統治下去，不需要在黨外取得有組織的擁護他的基礎。這種情形使個人領袖制的原則，在義德二國的推行，遠甚於在俄國。在俄國，蘇維埃制度給黨治下的專制立下了一個界線。但是，訴之於感情不能永遠把握得住；並且義大利好像已到了一個階段，即把握領袖地位，必須同樣的用建設的行動，正如利用尖銳化的心理。

我們已知道，在這一點的背後。有一個極深刻的區別。德國和義國在法西斯主義之下，仍保留着一切舊日的經濟不平等和階級區分，但俄國已迅速向經濟平等的方向進行。俄國正在建設民主政治，但這種民主政治與議會制度根本不同，並且是極真實的民主政治。因爲牠的基礎是平等的觀念。加之，在『集體組織』中已有真正民治性的自我表現的機關。這種機關在俄國的制度比牠在中央所表現的，權威性少的多。

在另一方面，法西斯黨人和國社黨人正在爲『國家觀念』而建設。不是爲平等或民主政治而建設。他們的理論是把國家當作集體的權威，高置於牠的各個人民之上，並且使個人在替國家服務之中，找到他自己的滿足。人民的職務是服務，不是統制；並且人民沒有權利反抗國家——甚至沒有權利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因此，在這些國家中

，理論上不承認民治這回事，並且沒有贊成平等的假定。一切假定全是與此相反的；因為牠們注重的是人民對國家的不同的關係。這種不同的關係是由於人民的不同的機能，不是依照他們的共同人類需要。實際上，這就是說，使財富的廣大不平等繼續下去，握統治權的政黨容許並且承認這種不平等。但是，政黨站在財富保護者的地位，永遠需要有財富者的擁護。所以牠實際控制着無限的財源，尚不算牠藉控制國家而可以取用的公家財源；牠可以用這些金錢，作強烈的宣傳，或大宗的作牠的黨員或擁護者的報酬。有這些方法在手中，對於應付民衆，牠能立刻充分的利用煽動的技術，並且希望使牠自己的全體黨員腐化。爲的是阻止黨內有任何有效的民治精神發生。唯有遇到經濟衰落，這些財源就不靈了；並且甚至如此，牠仍能一直保有一大羣受補助金的擁護者。

議會制下的政黨

在議會制下的政黨，不能希望有像實行一黨制的國家所增加的財源。但甚至議會制下的政黨，亦常常很依賴們分給黨員報酬的力量。特別在不很進步的國家，一次政府的更換，常常也就是大批官職的總更換，甚至最低下的官職；這種『分職制度』也曾盛行於美國。現在美國羅斯福總統正在作一些努力，要限制牠的運用。法國政黨的弱點，常常是由於事實上任命權大部分落在下議院議員個人手中，而不在當權的各政黨或各政治集團手中。英國比較不受『分職制度』的限制，因爲強有力的習慣將牠拒絕在文官制度之外；德國也是如此，直到最近才改變。但『分職制度』各國皆有，只是範圍大小不同；甚至在英國，握政權的政黨即便不能分配許多官職，無論如何，牠可以大量的頒給無限增加的榮譽和勳章。

這樣，政治賄賂的技術，在大多數國家的議會制度的運用中，佔一個重要的地位。即使不計算所謂藉允許社會改革『賄賂』選舉人。這種所謂『賄賂』，在議會制度的政治演進中，無疑的有最大的影響。在受限制的選舉權的情況下，如同一八三二年前英國的情形，賄賂的形式是將文官的養老金和薪水的人名單擴大，將領乾薪的位職給有勢力的人和他們所喜歡的依賴他們的人，以及允許有特權的少數人盡量染指公家的錢財。在選舉權比較擴大情形下，即中產階級有選舉而工人仍除外，這些早期的『弊端』就受到限制，並且，直接賄賂爲人所不喜；因爲，至少在英國，中產階級都在採行適合於他們的需要的商業政策上尋求他們的報酬，不直接從國家竊取。到再進一步選舉權擴大到工人階級，那些仍保有中產階級性質的舊政黨。發覺牠們必須彼此爭作讓步，藉以取得這個新選舉階級的擁護。在英國，在一八六七年改造法案（Reform Act）後十年內，社會立法有驚人的爆發。改造法案第一次給職工舉權。一九〇〇年工黨興起，引起對窮人要求讓步的新收穫；在世界大戰後立刻又有第三次的收穫，目的在希望藉此誘致這又擴大的選舉人。在議會制度之下，擴大選舉權意義，就等於說沒有一個政黨能有長久握政權的希望，除非牠預備將公家的錢財，用於某些種類的社會事業。

只要資本主義仍健在，作這種工作是沒有困難的；因爲利用生產富源的擴大，可以施惠於貧者，而不致使富者變窮。但當資本主義的繁榮停止，這種情形必定也停止；於是議會制度的災難就開始了。普通是，敵對的政黨爲避免彼此爭作讓步的必要，牠們組織政黨聯合『救國家』，並且聯合牠們的宣傳機構，使選民深信『節儉』的需要。這種方法雖然可一時有效，但有一個嚴重的害處，即使競爭政府地位者不遵守『政黨把戲』的規則。這驅使留在政

黨聯合以外的反對黨派使用非議會制的手段，並且使議會的聲譽在選民間降低。此外，政黨把戲的舊方式一經廢除，就不容易恢復了；因為一個政黨聯合常是牠的弱小夥伴的致命傷，而且牠所造成的新反對黨，也許不像舊的那樣有禮貌。然而，假如資本主義本身復元，議會制度在牠仍存在的國家內，大半也可以恢復和牠舊日差不多的式樣；因為人們的習慣是，只要這個政治制度能應用，就不會把牠拋棄。唯獨如果拉力太緊張太延長，以致議會制度在資本主義復活之前已崩潰，那些慣行議會制度的國家，就要預備使用革命手段，設立一個新制度替代牠了。

第四章 政治領袖

當普通男女想到政治的時候，什麼樣的想象最容易在他們心中立刻幻成？他們大多是先想到政客。因為大多數人覺着，依據具體人物思想，較依據理論思想容易。有一時期，大多數英國人一聽到政治二字，或許就本能的聯想到格蘭斯東（Gladstone）和狄思瑞里（Disraeli）兩個名字。現在英國沒有人有這種使政治人格化的資格；但我們敢說，美國大多數公民多半把羅斯福總統與政治聯想到一起。這些聯想反應，以及其他許多同類而程度不同的反應，明白的表示出，在普通的政事行爲中，個人領袖有了能制服人的重要性。

其次，議會制國家的大多數人民就多半要想到政黨。這種情形在一黨獨佔政權的國家也是一樣。但甚至在政黨獨裁的國家，對於個人的反應，亦常是在先。一個義大利人傾向於在想起法西斯黨之前，先想到墨索里尼，並且一想到墨索里尼，他就感受到一種鼓勵。一個德意志人也是在想起國社黨之前，先想到希特拉。甚至在俄國，雖然共產黨或許是來在斯丹林之先，但列寧確在許多人心目中甚至是來在共產黨之先。或許有政治頭腦的少數人不如此，他們的思想慣於依據他們積極參與或反對的政治組織。但前面所說，確是普通一般人的態度。普通人的政治頭腦，是產生於必要或特殊情形的例外，他們的本質不是政治的。

所以，作政治爭鬪而沒有一個可呈現於人前的個人領袖，能在他的信徒心中盪起有力的感情，那就等於把一隻手捆在背後去打架。甚至一個最佔優勢的政治爭鬪，亦需要一個個人領袖，藉此使這個政治爭鬪有充分的擁護者

接受牠；因爲這許多擁護者需要把牠人格化，爲的是使牠在他們心中變得真實一些。在特殊危機的時期，或許有民衆運動興起。這種運動拋棄了牠們自己的領袖，並且好像牠們不願這些領袖的性質而前進。在這種時候，領袖或許改換的很快，並且好像無關緊要。此外，當人平靜的生活在一個安定的政府制度之下時，個人領袖或許也暫時不重要，並且這個政體甚至握在無能爲的人手中，亦可平安無事。但是，當有重大事件必須作，尤其是當整個社會制度的未來發生了問題，並且解決這問題需要民衆的擁護，這時，要得勝利的『主張』，必須找得一個領袖。這個領袖即使不能實際領導，至少須能擺個樣子。

一個人愈多有政治頭腦，愈慣於政治活動，普通說，這種人就愈少需要政治領袖的意識——只要政治上的主要工作是維持舊制度圓滑的有效率的進行。因爲在人學習作政治性的思想時，那取得他們的擁護的主張，無需有個人媒介，就能使他們盡忠心。但是，不論我們在政治中如何活動，甚至我們之中頭腦最理智的人，亦不容易完全放棄使我們的靈感人格化的理想。人類的宗教，永遠是一個精細選擇的信條：大多數人仍需要一個具人形的上帝。

在政治中，個人領袖有時可以由一個集體領袖制替代，而令人滿意。但『黨派』(Factions)二字大部分成爲一個壞名詞，尤其是在危機時期執行政務的黨派。大體上說，在比較小的國家，他們的進行比較容易。例如，在古希臘的城邦和中古時代的德意志與義大利，都有這種黨派。並且他們最容易存在於小的民族國家，這種國家小到一切人民都能美滿的彼此接觸，不像在土地廣大而分散的國家。此外，黨派的成功永遠需要貴族作基礎，貴族是集體擁護他們的一個有相當團結的特權階級。甚至如此，黨派的權力亦大多只是執行比較穩定情形下的舊制度，不是使他

們自己和必需的劇烈改革適應。在危機之中，團體的聯合領袖制，容易對個人統治讓步，如同柯爾文的統治日內瓦，或伯里克利斯（Pericles）的統治雅典，或皮特（Pitt）的統治英格蘭以及拿破崙在革命戰爭期間的統治法國。

這些統治無疑的是屬於極不同的種類，柯爾文的『聖人』統治，在柯爾文死後仍存在，但克林威爾（Cromwell）的統治却不如此。因為克林威爾與柯爾文不同，他不得不把他的領袖制建立在一個高度的個人權勢上，伯里克利斯統治雅典與皮特統治英格蘭，都沒有要求任何很特別的憲法上的權力，所以，等到他們死後，他們領導的團體組織仍然存在，仍是政府的工具。皮特的英格蘭繼續下去，但伯里克利斯留下的雅典帝國，只有極短時間的繼續存留。在另一方面，拿破崙顛覆了共和憲法，並且掌握大權，充作民衆的族國情緒的個人代表，這種情緒因戰爭而大加高漲；他的失敗壞毀了他的制度，雖然他使勝利者在歐洲大部分地方不能將舊制度恢復。皮特和柯爾文是有堅強根基的『制度』的個人領袖，這種制度除去在危機時期，沒有他們作領袖，亦能共同治理國家。伯里克利斯亦有一點這樣的意義。克林威爾也是一個團體運動的領袖，但這個團體如無領袖，即太軟弱不能統治，所以他必須用他自己的、人格的力量，來補救他的弱點。拿破崙興起握統治權，並不是根據一個沒有他亦能統治的有組織的制度，而是根據一種根本沒有組織和團體性的民族情緒的衝動。他甚至較克林威爾更需要使他的權力成爲個人的；唯有勝利，並且須在勝利之後，在他的個人領袖制之下，有一個安定的和建設的時期，才能幫助他的制度存在。

大戰後的領袖

在近年中，有六個人各以不同的方式變成大國的領袖——在大戰後期路易喬治在英國，在一九一七年列寧在俄

國，墨索里尼在義大利，甘末爾在土耳其，希特拉在德意志，以及羅斯福在美國。法國永沒有過這樣義意的領袖，因為克里孟梭（Clemenceau）和普恩加雷（Poincaré）不能克服法蘭西共和的政府的根本團體性，雖然他們前後上台都頗近於變為這種領袖。法國是一個個人主義的國家；但這種性質除不能使個人在法國政治制度下得到個人的權勢以外，又使他的政客們彼此間斷然平等，因之他們永不會容許（假如他們能有所作為）一個同僚得到權勢。克里孟梭和普恩加雷方完成他們被舉台上所負的目前使命，就被政客們推倒了。在俾士麥下台之後，德國永沒有一個個人領袖，直到希特拉出現。威廉二世不足以作領袖，並且只要他在位，亦沒有別人能作領袖——要不是這樣，或者德國尚在大戰中得勝。維瑪共和國是建立在衝突勢力的妥協上，不能產生領袖，除非先毀滅了他自己。路易喬治確曾短時期領導英國，他領導英國的程度過於克里孟梭之領導法國或威爾遜之領導美國。但當大戰終止，他的權勢立刻瓦解，這是因為他對於他所要作的事，沒有明確的觀念，並且更基本的原因是，大戰結束後，英國議會生活的團體性立刻重振作起來。在英國和在法國一樣，政客的個人主義是反對個人權勢的。大戰後的英國如同大戰後的法國，並不是在尋找一個個人領袖，而是要恢復舊生活方式，過安靜生活。

此外還有五個人——列寧、墨索里尼、甘末爾、希特拉、和羅斯福。在這五人之中，唯獨羅斯福須應付根深蒂固的團體控制的習慣。美國總統的權力實在遠大於法國或英國制度下的任何總統。不過，如果沒有極重大的經濟危機降臨到美國人民身上，任何事情都不能把羅斯福送到權力和個人榮譽的最高點。這些是他已享受到的。並且除非這種危機能繼續下去，任何事情都絕對不能使他保守住他的權威。美國的傳統習慣正在等候着重新振作起來，並且

預備拋棄羅斯福。甚至如同拋棄威爾遜，在他作完他的工作的時候。雖然，他的地位與克里孟梭，普恩加雷，或路易喬治的地位不同。這不僅因為他的總統地位有較大的權力，而且亦因為預備推翻他的力量，主要是在政治之外，不是在政治以內——在企業界，不是在國會內。在這種僅有的形勢中，他或許能延長他的權勢，並且藉創立新政治機構，永久的改變了美國制度的構造。這種新政治機構是根據全體民衆意見的擁護。這些意見以前是無組織的，並且在政治中沒有勢力。有了這種擁護，他或者可以是堅強足以抵抗『大企業』，甚至在危機過去以後。但事實多半不能如此。因為這牽涉到：總統須自己建立一個根本的新政黨，並且須打碎兩個傳統大政黨的原舊機構。因為這兩個政黨中充滿企業的勢力，不足成為新政體中的擁護者。美國多半要返回到舊日的方式，並且在羅斯福作完他的工作時拋掉他。他不會使『新政』成為一個永久存在的個人領袖制的基礎。

列寧、墨索里尼、甘末爾、與希特拉的地位就不同了。在他們國內，沒有團體政府（受一組政治領袖的支配）的充分強烈的傳統習慣，來阻止他們。但列寧的地位與其他三人不同。墨索里尼、甘末爾、與希特拉，都是自己創立政黨，擁護自己的個人領袖制，但列寧升為一個黨的公認的領袖時，這個黨早已成立，並且有一個強烈的團體意識和一個確定的政策。列寧不需創立新黨或新政策，只須使這個原有的政黨和原有的政策，適合於當時的形勢和機會。布爾什維克黨確有很強烈的團體領袖制的習傳，不是有個人領袖制的習傳。但危機使一個握支配權的個人領袖的出現，成為不可少的。並且列寧的資格明白的表示出，他適合這種優越地位。在他故去之後，曾有一時期，共產黨企圖恢復『老布爾什維克黨員』的團體領袖制；但危機仍極迫切，又見於領袖本身間的意見深刻不同，以致未能

認可這個解決方案。俄國共產黨必須找出一個新的個人領袖；在能控制當時情勢的二人中，斯丹林成功了。此後托洛茨基的被放逐，幾乎是一件當然的事。因為一個在生死關頭的國家，不能容許同時有兩個競爭個人領袖地位的人，向相反的方面領導。格蘭斯東和狄思瑞里的互相交替，是在平靜時代，那時，政策上唯一實際的不同點，是次要的，並且關於這些不同點後面的基本問題，又有深切的同意。

領袖與政黨

墨索里尼、甘末爾、與希特拉都是自己親手創立政黨，在未曾有過組織而有感情和熱望的團體中，造成有力的廣大民眾組織。在這三項事件中，他們的號召力的基礎成分都是族國主義，雖然他們又給他加上許多他種成分，並且在實際上給與他各種不同的解釋，藉以誘致各不同階級。甘末爾所集合的，主要是土耳其的農民和兵士。他藉着這些人的幫助，掃除了握統治權的『土耳其青年』團體。這個團體曾使土耳其受戰敗的痛苦。『土耳其青年』是『主張西化者』；但甘末爾在使他們失敗之後，他的西化更遠過於他們。那時他戰勝了希臘，並且恢復了國家的榮譽。他的權力穩固的建立在這種軍事勝利之上。甘末爾的建立新土耳其，明確的指示出，一個以強烈族國情緒為基礎的領袖，常常可以作顯然與原有國家習傳相違反的事情。『土耳其青年』是在甘末爾之前的改革者；他們的西化趨向使他們受人厭惡，而甘末爾的榮譽，使他能實行極野心的方案。這些方案是『土耳其青年』甚至從來不敢這樣計劃的。希特拉也須應付一種受戰敗痛苦的人民，但他的工作與甘末爾的不同。即，他所遇到的，一方面是一個强有力的但是深刻分裂的勞工階級運動，另一方面是一個壘堡更堅固的反動的貴族，這些貴族與一部分重要大資

本家合作。在這兩種相反的勢力之間，成了停頓的局面。但立刻都把牠們毀壞是不可能的。希特拉把他的運動建立與此二者都相反的基礎上。他訴之於族國的情緒。反對國際社會主義。他允許勞工階級在國社黨勝利後有很大的經濟利益，藉此取得他們的同情。但在他的運動已成立後，他爲了取得政權，與反動派聯合。反對社會主義。反動派加入了他的運動，原希望使希特拉的勢力附屬於他們自己的勢力之下；但他們沒有有效的個人領袖，可以與希特拉對抗。興登堡總統太老了，巴本在總理任中的失敗，表示他顯然不能號召民衆。希特拉的人格成爲國社黨人玩戲法的巧妙手段，並且國家主義黨人亦曾希望把希特拉作爲他們自己的。在危機時期，領袖的人格重於反動勢力背後的一切傳統訓練。這些傳統勢力，因受杜恩（Doornik）地方所存在的舊失敗的影響，仍找不到一個領袖。

墨索里尼替希特拉設下路徑，他教給希特拉以個人領袖備爲基礎組織政黨的技術。實在，墨索里尼的工作較希特拉的困難。因爲他運用族國情緒的限度，不能如希特拉那樣利用戰敗的痛苦激怒這種情緒。在名義上義大利是戰勝者；但實際牠的人民覺着，即便他們未戰敗，無論如何他們那一份戰利品，是被剝奪了。經濟的災難激起一種熱情，藉譴責政客的弱點，爲發洩的出路。社會主義的勢力增強，足以阻止這些軟弱的政客統治國家，但牠感覺牠本身的力量或內部的團結，都尙不足以攫奪政權。牠在義大利南部僅有很少的信徒，並且在其他地方，天主教徒自己組織了一個廣大的政黨，站立在社會主義者和各反動黨的中間。減弱社會主義者的行動。一九二一年的義大利，完全和十年後的德意志一樣，是處於停頓狀態。這種局面造成產生個人領袖的機會。達農齊歐（Di Annunzio）太不能堅決不變的把握住他的需要，並且他這個外交家太小，不足以變爲一個國家的領袖。他顯示給墨索里尼一條路徑

。即宣波那正在找中路的熱情的力量。墨索里尼抓住他的機會，就變為『義大利首相』了。

雖然，墨索里尼是一個有思想的人，遠過於希特拉，並且比甘末爾和列寧也差不了多少。他不僅自己有作領袖的野心和能誘致人追隨他的特長；而且他能在他心中，造出一個他所要建設的新國家的模型。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大體上具有明確的政策。並且這種政策的實施，主要是墨索里尼個人的成就。無疑的，這個組合國家（Corporate State）的機構在許多方面仍僅是紙面上的，並沒有實現；但我們必須承認，墨索里尼已表現出他是一個建設的領袖，並非完全是一個感情的或能演說的領袖。組合國家的計畫雖然一部分來自黑格兒學說，一部分來自基督教社會主義。甚至一部分來自同業組合主義和工團主義，但主要是墨索里尼自己的。德意志的國社主義，雖然也宣布組合國家的信條，但他是建立在一堆極紊亂的主義上。等他達到以後的階段，或許變明確一些。但現在尚沒有人能說，國社主義德意志的構造將來是怎樣的。並且國社黨的勝利產生出來的建設性的思想，亦好像與國社黨領袖的政策沒多大關係。現在希特拉在德國享受到極大的榮譽和愛戴；但無疑的墨索里尼是領導義大利，而希特拉却好像是一時被一個顧問指導。對於他要用他的權力的建設目標，沒有任何明確的見解。不過希特拉已明白的表現出，他是一個極聰明的術略家。他藉國家主義黨人的幫助，取得政權，並且在他們實際有害於他的個人權勢之前，就拒絕了他們。這都表現他有術略。他是一個演說家，對於在失敗中變成神經衰弱的民族熱情，有極大的號召力。他領導着德意志，但他向何處領導？無疑的是走向國社黨政府的高度集權；但這種盛大的權力用於什麼目的？假如希特拉自己對於未來，除去使德國再在國際間成爲一偉大國家之外，便沒有清楚的見解，他將要不得不在他的親信副官的互相衝

突的計畫之中，擇定國內政策。他這些親信的副官之間，已顯然有很不相同的見解存在。

在那些現在高據國社黨顧問地位的人中，有些人，例如高林（Goering），有貪得無厭的權力慾，甚過一切武力主義的族國主義者。這種人有時是（但非永遠是）君主主義者。但是，不論他們是否要恢復君主制，他們却堅定的崇信一個有訓練的國家，這個國家須有從上而下的嚴密的統制，並且以保持階級區分的傳統方式為基礎。假如希特拉最後和他的黨徒中的這般人聯合。他自己的個人領袖地位能保持多久？或者，即使他仍保持為新德意志的名義上的領袖，他能否不作舊統治階級的俘虜？這種俘虜的意義尤甚於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的充作英國保守黨的俘虜。假如他變為政府的名義領袖，而實際上舊德意志的財閥和貴族支配着政府，他的人望尚能保持多久？國社黨內有有力的無產階級和小資財階級的成分，希特拉對他們都曾作很大的允許。希特拉的最後憑藉，好像很與他自己的黨中的左翼相同。不與右翼相同。因為他實在不是一個貴族，而是一個小資產階級。並且他對於農人和小企業家的同情遠過於對大地主、大工業家、或大財政家。他選擇高貝爾（Goebbels）、達里（Darré）、費德（Föder）和福瑞克（Frick）的戰線，比與高林站在同一戰線上適宜。他在握權一年之後，對於走那條路仍猶疑不定。這表示出他很有政客的狡猾，但亦表示他沒有領袖的偉大性格。大戰後的德意志的神經病態使希特拉成為全國的領袖，並且給他一個極好的機會，去把德國的地位重樹立在國際之間。但是，在這件事作完之後，他第二件事再作什麼？他能解決德國的內部問題嗎？以長久期間而論，這些問題終於是極根本的問題。德國人需要一個領袖，並且他們發見沒有再比希特拉合適的。但一個領袖如不能繼續領導，他對人民的需要尚能繼續滿足多久？假如仍然有危機須

應付，就不會長久。這種危機在德國終於要出現。希特拉或可仍然領導德國，倘若沒有其他任何領袖。但他憑藉了他自己黨中的左翼，好像決心放棄一切履行經濟上的允諾的企圖。這些允諾都是他在握政權之前，大量應允的。此外，在希特拉背後，尚隱有德國志願軍，他是希特拉的暗地裏的主人。

爲使已往十二年的歐洲歷史明瞭，研究這些特著的個人領袖的地位，好像是必需的。因爲這段歷史實在難解釋。除非我們注意到，人在極端危急之中，願意有一個領袖。在這個領袖之下，他們重整旗鼓。假如一個國家的情勢，至於如果政治制度不大改革，人民便不能再忍下去。在這種情勢中人民將本能的盼望一個個人領袖來拯救他們，不會屬望於任何團體的或聯合的領袖制。在一般人民心中，聯合領袖制不能與個人或一個主張相等，團體或聯合的團體用於執行繼續不變的事務，是很好的。但創始劇烈的改革，却需要一個有勇氣的人。無論如何，一般人的見解是如此。

在那些沒有遭遇極端危機。不至於被逼行革命性的改革的國家，人民對於需要領袖的感覺，就少的多了。在英國和法國，團體領袖制的議會傳統習慣，一向堅強足以自持。這不僅是因爲議會意識在英法二國人心中，比較在以前敘述的幾個國家中強烈，而且也因爲英法二國都尚未遭遇着牽涉到整個政治制度的基本危機。不過，甚至在這兩個國家內，較小的危機獎勵個人領袖制的趨勢，已充分表現出來。法國在通貨極度膨脹之後，普恩加雷被召來穩定法郎並平衡預算，這時他有廣大的權力，一時頗近於個人領袖的身分；在英國，爲應付一九三一年的純粹金融的危機，「國民政府的」力量不得不把麥克唐納盡量裝扮着像一個領袖。雖然，這些僅是在原舊局面和議會制度的限制

以內，半領袖制的例子。這種例子僅表明，假如在英國或法國有真正的危機發生，團體領袖制甚至在這樣的國家，亦好像要向個人統治讓步。

第五章 地方政府

在本卷的前幾章中，主要是從整個國家方面討論政治問題，即政治對整個國家的中央政府之影響。但除最小的國家外，每個國家都各依不同的方式為分為較小的區域，目的在辦理瑣細行政。為辦理這種政務，中央政府當然可以完全派他自己的官吏，去照管各區行政。這樣，地方所遵行的一切政策，都是由中央制定，地方居民完全不能過問，除非地方居民能影響中央政府和中央官吏。屬地的行政大多是由這種從上而下的純粹專制政府管理，尤其是如果統治者認為當地人民不『開化』；但完全居住本國人民的地方，牠的地方政府就很少是這種制度的。並且，甚至在那些行政形式完全專制化的地方，受命用這種方式治理屬地人民的長官，亦常常發覺在他面前有一種本地的制度和文化的，是他絕不能忽略的。在他管轄之下的村莊，對於執行裁判、管理婚姻和社會行為、規定土地的耕種、以及統制其他經濟活動，都有強固的習慣。這種地方也許有酋長、頭目、或長老會，這些都是當地居民敬重的人物；普通最容易走的道路，是承認這些制度（除去當地人民的意見與統治者的利益嚴重衝突），並且在相當範圍以內藉重這些人執行事務。或者給酋長或頭目以特權，使他與政府的利益一致，或者甚至國家給他們薪水。許多歐洲強國都發展有這種利用兼『馴服』地方組織的制度，作為牠們的某些殖民地與區國的政府制度。

到了第二個階段，有顧問委員會設立，藉以調劑中央政府的和牠委派的官吏的專制。地方長官或委員向這個顧問會諮詢意見，但對於接受他們的意見，却沒有任何拘束。這種制度亦廣大的應用到殖民地的行政；但顧問會的性

質可以很不同，這在於牠大部分所代表的是屬地的被治的人民，或少數本國去的居民，並且亦在於牠的會員的選擇，是指定的或選舉的，以及選舉所根據的選舉權是廣大的或是屬於少數人的。

在歷史上，完全或一部分以代表制為基礎的顧問委員會，常常在經過一個相當時期以後，發展為立法機關。牠有權替當地政府通過法律，但當地長官代表中央政府保留有否決權。常常這種顧問會的權力限於某種問題，即主要是地方關係的問題。其他問題『留』與長官處理，顧問會對這些問題的關係，至多也不過是只有純粹建議權。

雖然，只要允許顧問會有立法權，就很難永遠限制牠的範圍。英帝國的自治領已發展成實際完全獨立。這些自治領現在所享受的獨立，大多經過前兩段中概述的連續階段。不過這種區域所住的人民，主要是與帝國同世系（南非洲除外），或者至少亦須站在同一廣泛的文化階段上。有的地方顧問會完全或主要代表一小部分居民，或者代表被認為文化低落的民族，那麼這種地方的情勢就不同了。在這些情形之下，有許多人反對給與顧問會任何廣大立法權。在不列顛帝國內，澳大利亞和坎拿大享有充分的『自治領自治權』：印度沒有這種權力，雖然有若干權力讓與主要為印度代表的中央議會和省議會。

國家愈依賴武力，牠的地方制度中大半中央的權威愈多，代表制的成分愈少。所以，假如一個少數民族被一個佔優勢的外國政府違反着牠的意志治理牠，在這種地方，中央政府常是設法破壞一切的地方代表組織，並且完全以中央委派的官吏統治這個反抗的地方。例如，尤哥斯拉夫的某些部分，近年來就是這種局面。在這些地方各少數民族拒絕握統治權的塞爾維亞人（Serb）的併吞與同化。大戰前俄國的屬地大多亦是如此。

只要一個國是由不同的民族成分組成的，並且每個民族大部分集中在這個國內的某一特殊部分，地方自治政府的要求就與各少數民族的文化和政治的要求發生了關聯，甚至他們要求完全獨立，或脫離本國與隣國合併。這類地域主義的要求現在就有，不僅在尤哥斯拉夫有，而且在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波蘭、丹麥、比利時，以及其他幾個國家都有。西班牙也有與此相似的局面，在西班牙，坎塔蘭人（Catalans）與巴斯克人（Basques）以及其他『民族』集團，藉西班牙共和國的成立，取得很大的地方自治權。愛爾蘭在英王國中，久已引起與此相似的問題；土耳其帝國的分裂，就是一部族國主義運動的歷史，先要求自治權，然後要求完全獨立。奧匈帝國的分裂便是這種同類程序的極點。

在有少數民族或少數信奉特殊宗教者的地方，如果他們不是集聚在一個區域。而是分散在其他人民中間，那麼地方自治的要求，就成了另一個不同的方式。這種方式是：要求單獨有民族的或文化的選舉區，如同回教徒之在印度，要求文化的自治權，另外設立學校和教堂，並且要國家承認他們在法庭上有用少數民族言語的權利。但這種少數民族的要求的表現，僅能在此處述及，因為牠會使我們遠離了本章的主題。

聯邦制度

我們此前所討論的政府形式，主要是那些設有立法和行政機關的政府。這些立法和行政機關，實際上是附屬於或甚至平行於中央的這種機關。這些政府發生於帝國中，或發生於由不同的民族成分組成的不同的國家中。但是，在完全與殖民地自治或分立的民族區域自治無關係的國家，當然亦可以有次級立法機關的問題發生。這個問題在一

切聯邦國家內都有，如同合衆國、瑞士、坎拿大、或澳大利亞——至於使合衆國在形式上成爲聯邦，使坎拿大在形式上成爲『地方分權』的技術上的分別，我們在此不必討論。依照這種廣義的說法，大戰前的德國和維瑪共和國，都是聯邦，但國社黨治下的德國却不是；因爲國社黨已破壞了巴發瑞亞（Bavaria）、薩克森（Saxony）和其他德國『邦』的自治制度。在一切聯邦法中，對於聯邦政府和各邦間的權力和職務的分配，都有規定；並且這種分配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但在一切現代的聯邦國家中，都有一種權力集中於中央的強烈趨勢，特別是在經濟方面進步的國家；因爲不僅在關稅政策和貿易管理上漸多利於有共同基礎，並且在工業狀況和勞工狀況上，以及在教育和公共衛生等事務上，亦是如此，無論如何在這些事務的廣義方面是如此。我們已知道合衆國聯邦憲法如何的阻礙這種合人意的共同標準的生長。我們又知道，在危機的壓迫之下，一部分原有的憲法上的阻礙，如何的被羅斯福用强有力的手腕破除了。

雖然，合衆國太大了，不能變爲一個單一制的國家。即使中央的權力再大大的增加，牠仍將保留着聯邦制度。在那些在地理上有不同民族成分的國家中，可以有與中央集權相反的運動，即使經濟的因素是使中央集權增加。在這些情形之下，最好的解決辦法（如果能施行）是使中央政府有權規定許多事務的最低的共同標準，同時允許『邦』或地方政府在規定的最低限度內，有很大的定權，可以改進或變更這些事務，藉以適應地方的或『民族的』需要。現在蘇聯好像就是正在穩健的應用這個辦法。

省市

有些國家既不如合衆國幅員廣大，又不是由很多不同的民族成分組成的，在這種國家內，地方政府的問題仍然可以發生。這樣的國家必定有習傳上的行政區域；在這些行政區域中，有些區域至少一定有地方的統治當局，握有次級的權威。至少在西歐的城市中，這些次級的統治當局常常是極強的，並且他們背後有極長久的習傳。許多這樣的城市在中世紀封建制度盛行的時候，在特許狀之下得到自治權。在若干國家，例如德意志和義大利，這種自治城市取得了完全獨立邦的地位；並且，雖然牠們現在已被十九世紀興起的民族國家吸收了去，牠們仍保留着很大的權力。直到法西斯主義興起之後，這種權力才受到嚴重的損傷。實在，義大利是『統一』於一八六〇年；但在德意志，漢堡(Hamburg)和其他『自由城』在德帝國內的地位，與巴發瑞亞和其他德意志邦相等。這種情形直到國社黨執政才改變，在其他大多數國家中，城市永沒達到這樣程度的獨立權威。在英國，皇帝永遠保有對於城市的完全權威，並且城市的權力與封建貴族的權力相似，同是因玫瑰戰爭後英格蘭國家集權的成功而減弱了。在法國，曾有一時期城市有很大的權力；但大革命前的舊政體已對於牠們有最後的統制權，雖然給與牠們很大的特權。目的是在革命之前，使法國實現中央集權，並且以民主政治的名義廢除了一切有特權的法團。這些法團要求與中央政府對抗的權力。法國革命可以說明法國地方政府受中央行政統制的高深程度。牠又可以說明，爲什麼在法國地域主義者（他們要求恢復歷史上的舊省區。作爲省政府的單位）普通多爲痛恨共和政體的君主主義者，爲什麼在法國人心中，地域主義與反動派的國家政治觀點相聯繫。因爲，現代法國的省(Département)是由中央委派省長(Préfet)治理，故

意創設了牠代替舊日的省——區域改小並且改變——目的在破壞傳統的行政單位。共和黨人認爲這種傳統的行政單位是危險的。因爲牠們在歷史上是與君主政體相聯繫的。

城鄉

城市政府可以是強有力的自治的。如同德意志舊日的城邦和瑞士現在的城邦。在中央政府爲牠們制定的規則之下。牠們可以有很大的自治行政權。如同在英國。或者。牠們是事事受中央統領的行政機關。如同在法國。但差不多城市的行政永遠是根據一種代表機關。這種機關或是直接傳自市法團或中世紀興起市『同業組合』，或是仿照牠們創設的。幾乎一切地方的城市，都有一個長久而強有力的組合自治的習傳。這種習傳有時是寡頭政治性質的，並且在十九世紀。在同業組合制度已衰敗而政治的民主政體尚未興起的期間。尤其是如此。但牠差不多永遠是組合政府的習傳；並且。在十九世紀的思想的影響之下。牠容易改變爲以廣大選舉權爲基礎的組合自治的習傳。

鄉村間也是如此。實在。在亞洲。村莊的自治習傳甚至比自治城的更長；並且在東歐許多地方，也有程度差不多的這種情形。在中國。村莊的地方自治的長久習傳。是在內戰和政治混亂期間保持社會秩序的主要力量。亞洲的城自治，普通遠不及西歐的城；甚至在有民選的或代表制的議會或市區官吏的地方，首要長官普通是由中央政府委任或由省長委任，而省長是中央政府推舉的。村莊也可以有——在東歐和近東普通也有——一個官吏，對他頭上的政府負責；但因爲他的職務普通是管理許多村莊。那純粹地方的和傳統的集體控制的制度，常常能自己保持有效。在非洲和他處的殖民地上。村莊普通是在駐當地長官或統治國委任的官吏管轄之下，這種官吏大多是統治國的人。

但這些官吏的職務是行政兼司法，多半一人管理許多村莊；凡在殖民制度之下又有部落組織的地方，他們多半藉酋長或頭目執行行政事，許多本地的行政方式，有時藉此得以存在。不過，村莊的最大效能和自治力，可在中國看出來；因為在印度，雖然村莊的習傳亦同樣強有力，但牠的自治權大部分受英國的集中行政的限制或廢止。

在西歐，村莊的組織已失去牠的許多力量。這一部分是封建制度的結果。有些國家，封建制度使村莊差不多完全服從貴族和他的官吏。例如在英格蘭，村莊處於地方貴族統制之下。他們把村莊當作他們的采邑管理，有佃戶的代表會和在他們統治下的采邑法庭，幫助他們管理。封建制度的衰落附帶着使這種地方行政也衰落，漸漸國家的法庭干預村莊事務，並且日久之後，村莊行政的統治轉入皇帝推舉的人手中。所以，在英格蘭，州(COUNTY)保安官變為自治城四外整個區域的地方統治當局；在英國內戰和一六八八年革命之後，皇帝的權力大部分轉入議會，這時鄉村的統制權入於鄰村紳士手中。這些人是中央委任的，但議會對他們一定是慫恿的，因為議會中的人和他們相同。差不多到十九世紀末，代議制政府才又侵入英格蘭的鄉村，一八八八年設立州議會，一八九四年設立教區議會，雖然以前在窮人救濟律(Poor Law)和公共衛生法案(Public Health Acts)之下創設的保衛部和鄉村衛生區，已相當的預先設下這種路徑。這樣仿照城市代表制重建立的州和村自治，普通仍是軟弱的；並且中央政府對於牠們的干預，更甚於干預自治城。

中央的控制

受中央管理而由地方執行的這種事務的增加，是增強中央控制地方甚至控制城市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現代的

國家發覺牠們不能不發展教育，作爲一種社會事業，不能不設立一個精密的組織，保護公共衛生，救濟貧苦或殘廢的痛苦，以及準備公用事業。所以，要地方機關從地方稅收內供給這些事業的費用，已變爲不可能的事。國家必須以『補助金』幫助牠們。這些補助金是出自國家的稅收，並且是日漸增加。因爲地方機關很不容易開闢獨立的稅源。這個問題甚至在只有兩級政府機關需要供給的英法二國，亦是很嚴重的。在幅員廣大的聯邦國家，這個問題更困難。這種國家必須爲三級政府機關開闢財源，即聯邦政府、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分裂單一國家爲許多部分的自治省區之計畫中，這問題是一個很棘手的阻礙。

所以現在在西班牙，中央政府與坎塔龍尼亞(Catalonia)間的分配稅收問題仍然未解決；在歐洲，到處都有許多與此類似的問題。在合衆國，聯邦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是關稅和所得稅，邦和地方當局的財政收入主要是資產稅。在英國，地方的財源是來自征收地方資產稅；但地方稅有大家公認的不公平處，於是引起中央政府允許有大折扣及豁免。因此地方收入短少，須仰仗中央的補助金。維瑪共和國改造德國財政，主要是以中央的補助金爲各邦的財源。

常言道，花錢的人點戲唱。因爲地方當局愈來愈依賴中央金庫的補助，所以中央政府對於牠們的控制自然也增加。此外，本來地方當局所管轄的距離比現在的大得多，現在的地方當局的區域大多在某一時期劃定的界限，在那時候在較小的區域內可以圓滿的執行地方的社會事業。這些社會事業，如電燈、熱力、和動力的供給、道路運輸的組織、以及最重要的住宅設計、城鎮和省區設計，現在都需要大規模的調和及統制了，這種所需要的區域遠大於大

多數現在地方當局的區域。結果，有些社會事業——例如，運輸統制和發電問題——整個的或部分的從地方當局手中取出，由直接對中央政府負責的官吏管理。在其他事業上，中央政府抑制了事業的發展或使牠的發展不正當：例如，中央政府的創設新城市，就十分妨礙住宅和工業發展的合理的重新設計。並且中央政府所鼓勵的不是原來城市四郊的無定形的發展。

在這些情勢之下，有些人爭辯說，除去在最大的國家，以現代的技術發展而論，就沒有地方政府的餘地。並且又說，地方的社會事業更注定將一個個從地方機關手中轉入中央統制之下。但我們有强有力的理由反對這種論斷。我們很懷疑，如果不以地方自治為基礎，是不是可以有有效的建築起全國的民主政治制度。地方自治是訓練國家責任的一個極可貴的基礎。並且是防止中央政務極度擁擠的必需的工具。中央政務擁擠，必定弄成不負責任的官僚控制。在一切幅員廣大的國家內，都有一種强有力的企圖，要克服那些阻礙創設省區行政機關的嚴重困難。所謂省區行政機關，是在中央政府和各城市區域及鄉村區域的純粹地方行政之間的。在有民族色彩的地方自治要求的地方，這種地域主義的辦法壓力就更大了；因為離了這種地域情緒，這種省區行政機關易於軟弱或不能存在。一個人可以強烈的感覺到他是曼徹斯特(Manchester)或布瑞福德(Bradford)或布里斯托(Bristol)的一個公民；他感覺不到對於英格蘭西北部或西南部為單位的忠心情緒。在另一方面，有傳統區域分別的地方，人民就有忠心的感覺。一個人可以是佛基尼亞(Virginia)，或馬薩諸塞斯(Massachusetts)，或加里佛尼亞的一個忠實公民，正如同他可以是雷却孟德(Richmond)，或波士頓(Boston)，或山佛蘭西斯科(San Francisco)的一個忠實公民。他可以是威爾士

(Wales) 的忠實公民，正如同他可以是坎堤夫 (Cardiff) 的忠實公民。他可以是蘇格蘭的忠實公民，正如同他可以是哥蘭斯高 (Glasgow) 的忠實公民。他可以是坎塔龍尼亞的忠實公民。正如同他可以是巴塞羅納 (Barcelona) 的忠實公民。他可以是基隆德 (Gironde) 的忠實公民。正如同他可以是波爾多 (Bordeaux) 的忠實公民。這些中間的忠心的刺激，是反抗官僚政治的有價值的防衛：我們亦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在相當的區域內不能發生新的忠心。除非這些區域設有統一行政行動所必需的機關。

雖然，在現今的世界上，中央和地方間的權力與職務，不能劃分得清清楚楚。規定某些事完全是中央的，某些事完全是省的，其他是純粹地方當局的。常常必然的成爲。中央當局制定原則並且強迫實行一個共同的最低標準。然後將事務的實際執行。依照各區域的特殊需要，交與地方機關。地方當局的工作必須主要是執行按全國計畫的事務。這樣便可以超過國家的法律所規定的最低要求。並且藉此可以按照地方的需要及欲望的不同。使會社事業的供給也有分別。假如以這個原則作爲一個一般的指南。就完全沒理由說現代技術的發展必定要損壞地方自治。雖然技術的發展或許要在他的方法上和區域上有許多改變。藉以適應現代的經濟情況。

愛地方的心理是這個世界所不能缺少的東西，尤其是假如這種心理是反對過度的族國主義的。因爲。雖然有時候愛地方的心理被認爲是世界大同的精神的敵人。但他也能變爲這種精神的有力的聯盟。一同去反抗那併吞一切的民族國家的使一切都成爲他的絕對奴隸企圖。德國國社黨着手剷除愛地方的心理。以及義大利法西斯黨破壞城市自治。並將城市置於一個完全受中央控制的市長 (Podestà) 之下。都不是偶然的事。俄國人在蘇聯的廣泛結構之內

，盡量刺激蘇聯國境以內的許多民族。使牠們在文化和教育事業上自治。這亦不是偶然的事。因為承認國內的較小的團體（即使牠們是民族團體），是改正過度的『極權』族國主義（totalitarian Nationalism）的最好的方法。這種『極權』族國主義被法西斯主義高舉為理想。在各大國內，愛地方的心理愈發達，侵略性的族國主義的撕碎世界的危險就愈小。

第六章 政府與機能團體

每個現代社會都是各種團體組成的一個網子。除去人民以公民地位組成的政黨組織以外，他們以無數的其他方式，按照他們的特殊利益、活動、和觀點組織起來。他們所組成的團體在範圍、性質、重要、對國家的關係、以及牠們彼此間的關係上，有各式各樣的分別。在一極端。牠們是如此的鬆散和容易消滅，至於僅和十分無組織的臨時的個人團體差不多。在另一極端。牠們是如此的結合嚴密和耐久。至於能使牠們的人員有強烈而根深蒂固的忠心，並且能深入人的意識中，藉以大大的影響人的活動和生活觀念。

人們論及這些特殊的團體組織時，常常以爲他們好像在一種意義上，是存在於「國家以內」，並且甚至好像牠們的存在，是由於國家願意承認牠們。不錯。牠們需要國家的贊助，假如他們要自由的盡其機能。並且各處的國家都要求以法律爲最後手段。壓制對國家不便利的團體組織。國家對於團體組織的態度常常大部分依團體對於財產的佔有、個人在團體中的權利、集會及出版自由等事的主張規定。例如。在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關於承認合股公司、工會、和獨佔性的企業聯合的地位。都曾有長時期的爭執。在工業中，合股公司的發展曾遭受很大的阻礙，直等到後來國家才藉立法及法庭給與牠們完全的承認。各處的工會主義者。都被強迫不得不努力奮鬥，在法律上爭取聯合及聯合行動的權利。關於托辣斯 (Trust) 及企業聯合。亦有很長時間的衝突；並且各國對牠們的態度亦頗不同。在整個經濟生活範圍之內，資本主義的興起。使團體組織的方式及經濟的團體組織對國家的關係，起了很大的

變化。

雖然，除去經濟的團體組織以外，尚有許多種團體組織。例如，在現代世界上，教堂主要是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的組織。這種團體性質，因宗教失去了甚至形式上的統一，而愈加顯明。「非國教的」教堂必須爭取承認，像工會那樣；並且爲宗教的要求所流的血，遠多於爲其他任何政治問題。

經濟的和宗教的團體組織以及政黨，是團體組織的特著種類。牠們有廣大的人員和廣大的社會勢力。但除此以外，尚有無數的其他團體。以單個而論，這些無數的團體是比較不重要的，但以全體而論，牠們對於當時的社會活動有很大的供獻。例如無數的宣傳組織。每個這種組織的成立，都是爲促進一個特殊的主張或改革——女權、節制生育、節慾、土地稅、教育改革、素食主義、解放奴隸或禁止賭博、或任何其他成千的特殊願望。因此有無數的團體成立。從替醫院或各種慈善事業捐錢的會社，以至「老人會」。蘇格蘭人或康瓦爾人或不信基督教的地方的各種會社。與某個特殊教堂或某個特殊機關有關係的會社，以及其他許多團體，都是爲促進某特殊組織的利益，或向他表示忠心。有些職業團體只一半是經濟的，另一半是技術的或科學的，或者完全是社交的。有無數的關於運動和娛樂的會社，牠們有些是由愛好玩或看某種特別運動遊戲的人自由組織的。有些——變作經濟的——以商業爲基礎，把運動組織成一種娛樂。

此外尚有極多的團體與這一切有固定人員的團體並立。這些團體沒有這種正式的組織，但在有刺激牠們的團體利益的事情發生時，牠們有共同行動的力量。所以，在經濟領域內，一個工廠中的全體工人，不論他們是否屬於一

個工會，他們亦有相當程度的團體意識和團體行動的力量。這都是由於他們對他們的工作地點的共同關係。依此類推，某一特殊區域的居民，特別是假如這個區域的居民的社会地位很相同，或者甚至一個城鎮或一個村莊的全體居民，都有這種團體意識和力量。學校的小學生、學院或大學中的肄業生、常到某個教堂或小教堂的祈禱者、一個有明確界限的職業中的人員（不論有無組織）、某條鐵路的習慣旅客、有規則的常到海伯瑞（Highbury）或斯丹福（Stanford）橋或維多利亞堂或皇后堂的衆人、或常聽無線電的某種特殊節目的衆人、或常到某個城鎮趕集的衆人——在相當範圍內，甚至一種報紙或雜誌的經常讀者——所有這些羣體以及與他們相同的其他許多羣體，都可以對於一個特殊組織有相當程度的關係意識。並且由此生出他們彼此間的關係意識。普通這種意識對於他們的行動沒有社會意義的重要影響；但牠可以在任何時間影響牠們。牠藉引起忠心，可影響牠們的行爲。並且或許使牠們同其他的團體或組織以至同國家本身發生衝突。

少數民族

在某些社會中。另一種團體有很大的關係。如果一個國家是由許多不同的民族成分組成的。尤其是假如這些不同的民族說不同的言語或有很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標準。那麼民族的意識就要把社會分裂爲許多團體。這些團體很容易變得彼此敵視。如果整個國家內有一個佔優勢的民族。牠大部份或完全統制着政治機構。或者一個國家內的少數民族。在地理上集中於一定的區域。他們感覺這塊地方是他們的「民族之家」。那麼這種彼此敵視的情形最容易發生。但甚至在沒有地理上的集中的地方，亦容易有民族情緒。牠或是反抗牠頭上的外來民族的統治階級或資財階級

。如同在波羅地海各國家。或是反抗一個少數民族，認爲牠沾污了統治民族的種族清白，如同國社黨德國的反對猶太人的感覺。或美國南部各邦反對黑人的感覺。在大戰後許多歐洲的新國家中。以及在幾個舊國家中，都很有困難的緊張的『少數民族問題』。在大戰之前。這種困難在奧匈帝國和俄國最尖銳化。現在在尤哥斯拉夫、羅馬尼亞、波蘭與德意志最厲害；但在比利時亦很嚴重。在這裏操法蘭達語的人（Flemings）和操法蘭西語的人（Walloons）之間。有一種強烈的分別感覺。

一個國家內的民族感覺。常常變爲有組織的。引起創設獨立的政黨。以民族爲基礎。有時國內每一個少數民族兼有從右到左的一切階級團體。以及創設特殊的組織，藉以培養民族文化。在民族的分別和宗教的分別符合的地方。教堂亦被牽入這種爭鬪。並且變爲刺激民族感覺的機關。但這種感覺可以離開牠藉以有所表現的任何特殊組織而存。在這種情形之下。正如同在其他許多情形之下。團體組織之外有羣體存在。牠給與團體的擁護。遠多過團體的人員對團體的擁護。

國際團體

我們已知道。羣體和團體問題常常被人寫得好像牠們是存在於『國家以內』。但事實上許多羣體以及若干機關和團體組織都是超越國界的；並且更有許多。即使牠們是按國家的界線組織的。亦有國際的忠心和聯絡。天主教就是一個真正國際組織的顯著的例子。牠所樹起的忠心的要求。是超越民族或國家的界線的。但天主教的實際並未達到牠的理論上的要求。在民族國家興起之後。天主教不得不把自己組織起來——事實上在中世紀的基督教國內牠已

有很大範圍的組織——以各個國家中的民族單位為基礎；並且，當各處天主教企圖強使他們的教義產生政治要求時，天主教主義的政策實際上已與各國的政治狀況調和。在西班牙共和政體成立之前，天主教主義的統制國家一直保持着完整；但在他處牠已被迫讓步。法國革命的經驗再證以宗教改革的教訓，使牠知道不能隨便同塵世的權力肉搏；並且牠的政策須隨時趨勢。教皇與墨索里尼妥協，並且一向拒絕與希特拉作最後的爭吵。牠不能使信奉天主教的巴發瑞亞邦不與第三德帝國聯合，又不能救德意志天主教中心黨免於破滅；並且牠清楚的吩咐牠的德國信徒讓步，不必與國社黨起爭執。天主教比政客更懂得外交。牠知道什麼時候必須在退讓中求安全。什麼時候牠的能力足以冒險前進。此外，牠能和各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妥協；因為，牠宣言反對社會主義，擁護私有財產。同時牠知道如何按照需要伸縮牠的主義的解釋。英國工黨中有許多天主教徒；並且在英國，一個天主教徒可以說明自己是社會主義者，而不致受宗教上的譴責。

次於天主教的最大的『國際』組織，就是勞工的國際。我們不把牠放在第一位，是因為牠的國際主義遠不及天主教的確定，並且牠的政策不如天主教的政策統一。第三國際，或共產國際，與一八六四年馬克思的第一國際相同，實在是一個真正的全世界的運動。牠所要求的工人階級的忠心，完全是超越國界的。但共產國際受俄國人支配，並且在別的國家內，僅有少數工人忠順於牠。在大多數國家內，大部分工人階級的勢力都組織在一個國家的工黨或社會主義黨內以及一個國家的總工會內；並且，雖然大多數這種政黨屬於勞工與社會主義者國際 (Labour a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大多數這種總工會是屬於國際工會聯合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但

這兩個團體却都是鬆散的聯合組織，並且加入這兩個聯合會的各國的組織，決不會把政策的最後統制權，交到牠們手中。社會主義政黨的努力，是在各國的國家憲法結構以內。並且是在議會制的運用的限制和政治情勢的限制之下；各國的工會同樣的受各個國家內的工業狀況和集體爭議的可能性的限制。使勞工與社會主義者國際（I.S.I.）和國際工會聯合會（I.W.O.）成爲真正强有力的國際權威的企圖，已失敗了。並且只要各國的這些會員團體的目的是依議制度取得勝利和集體爭議成功。那麼這種企圖一定是要失敗的。一個革命運動以秘密工作爲滿足，並且否認以憲政方式能成功社會主義，這樣，牠才可以採取國際的態度。僅僅獨立團體的聯合。而且這些團體是在國家的範圍以內工作，是不能採行國際態度的；因爲國際的秩序任何時候都可以與國家情勢的需要衝突。除共產黨以外，世界的社會主義者雖然接受團結國際工人階級的思想。但同時繼續主要爲本國作打算。並且勞工和社會主義者的國際或國際工會聯合會沒有方法得到聲譽，使牠自能指導各國內的運動。如同教皇指導各處天主教的那種意義。工人的國際主義是聯合性質的；而聯合制度是軟弱的。

然而，有這種國際主義的思想，即使牠不能以一個國際制度作有效的表現，牠確能使工人運動不至於完全封閉在各個民族國家的限制之內。其他許多運動亦有小範圍的這種作用。特別是組織鬆散的保持國際和平的世界運動。和平運動普通是以國爲單位組織的；但這種運動得免於完全「國家化」，也是受了國際社會感覺的拯救。許多職業團體也有一些國際團結的初步情緒。這種情緒的力量不足以抵抗國際事件中的任何危機。但在較平靜的時期，足以刺激各國發生一些世界大同的情緒。

雖然，總起來說。只有天主教徒和共產黨能為世界大同的情緒要求任何高度的制度上的基礎。但這二者之間有一個不同點。天主教主義是一個宗教運動，僅偶然成為政治運動。牠能主張牠的國際主義，而不致否認民族國家對政治忠心的要求，牠能允許牠的信徒作他們各本國的『好公民』和愛國者。共產主義是一個政治的信條，牠的希望集中在世界革命，所以牠絕不能這樣做。牠必須領導牠的信徒，反抗民族國家，並一齊否認愛國的要求。牠的世界大同的意義，遠較天主教的深刻廣大。現在天主教在大多數國家內，公認牠的目的僅是在我們這些罪人之上保持牠自己的勢力，不是在政治上改造這個世界。除非天主教對於『塵世的權力』的要求仍然存在。天主教主義才能與共產主義相比，算作一個世界大同的主義。

雖然，天主教主義曾企圖與族國主義妥協，把牠當作一個自保的工具；因為天主教主義承認人的思想和感覺最容易依據着國家的問題和國家的忠心。共產主義企圖使人的思想和感覺都站在世界公民羣衆的地位。這種企圖現在對於多數人是不可能的。俄國人雖然發覺否認對於帝俄的一切忠心，是很容易的事。但俄國人現在的女思想和感覺仍是站在俄國人的地位，並非完全站在世界大同主義者的地位。雖然他們把俄國當作世界革命的守衛，使俄國人成為大同主義者。社會民主政治(Social Democracy)是以大同主義的信條為根據，牠分解成一組盛行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這並非是偶然的：牠是因當時的需要而興起的。民衆運動必須與民衆的感情適合。方能造成；而民衆的感情有壓倒的國家性。我們可以勸服民衆，把一些國際團結的意識置於這種國家的感情之上，但不能使牠們放棄國家的感情或者把牠貶到第二位。國家的問題對於一般人極其接近；並且人的想像不容易飛到一個渺茫的世界。

常常有人以爲資本主義的前途是正在迅速變爲更多國際性的。而工人階級的工作和思想仍然主要是依照國家方式。這完全是一種錯誤。有國際資本家。他們主要是在銀行界和金融界；但他們的影響一定比往常小。有國際的工業聯合；但這種聯合至多也不過是各國資本家集團間的條約上的組織。牠們只能在民族國家間造成條約。不能製造國際主義。事實上。列強的資本主義對於侵入及控制落後國家。已日甚一日。但這是帝國主義。不是國際主義。這在國與國之間可以製造戰爭和仇視。不能製造聯合。此外。帝國主義的反響是經濟的族國主義；現在資本主義的組織正在變成以國家爲單位，與民族國家作密切的聯絡。這種情形甚於以前任何時代。並且在大小國家中都是如此。

團體與國家的關係

所以。大部分羣體和團體的工作。假如不是『在國家以內』。無論如何是在國境以內。於是立刻引起一個問題。即國家對與在他政治控制的區域內活動的羣體和團體。應當有怎樣的關係。對於無組織的羣體。國家需要知道牠們是必定對國家政策有影響的勢力。國家必須測度這些羣體。估計牠們的潛伏的反對力量或擁護力量。決定什麼時候壓制牠們以及什麼時候對牠們讓步或妥協。藉此制定一個政策。使國家團結起來。國家是否要允許少數民族在學校和法庭內用他們自己的言語。並且允許他們可以作官吏？他是否要允許完全的信仰自由。並且允許宗教團體控制教育的範圍（假如有的話）如何？他是否打算實行禁酒或防止賭博？他對節制生育或婦女參政權取什麼態度？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全在於羣體情緒的力量和態度。這種情緒遠超過實際有組織的團體和機關。

如果一個國家遇到正式有組織的羣體。那麼又有一個問題發生。即是否對於任何特殊種類的組織，都禁止、容

許、給與完全的行動自由、積極的鼓勵和扶助？或是實際把牠們『機關化』。使牠們實際成爲國家機構的助手？當然，這些問題的答案依照不同類的組而極不同。在英國，仍然有一個舊日的教堂。在國家之下享有很大的特權，但反過來教堂接受國家的首領爲教堂的首領。並且接受國家委任主教及其他主要高位置的要求。這種情勢是使教堂變爲國家機關的政策所留下的。但在國家完全容許其他宗教派別之後，機關化的趨勢已改變；並且在舊教堂中有一部分人要求自己選擇主教的權利。他們甚至預備企圖廢止國教藉以完成完全的宗教自治。在另一方面，國社黨正從事一種爭鬥，要完全統一德國的基督新教堂，使他們制度化。藉此使牠們在宗教的領域內完全成爲國社黨政策的機關。並且宣揚一種適合於國社黨的種族學說的奇怪『諾底克』宗教。

此外，從托辣斯和企業聯合的地位。亦可說明各種可能的態度的不同。美國政府曾一再立法禁止這種團體。雖然現在在羅斯福總統之下，好像改爲對牠們作謹慎的承認。在國社黨很久之前。德國政府已積極的鼓勵生產加特爾（Cartel）式的企業聯合。所謂生產加特爾即若干工廠密切的聯合起來。以同樣的程序管理售賣、出產、和價格；現在國社黨好像注意於使加特爾機關化，成爲國家機構的助手。隨着這種承認，很久之前國家管理加特爾的政策已有相當的消失；並且國社黨也要使這種承認擴大。英國所走的是第三條路徑。既不禁也又不承認企業聯合，而是讓他們自由的盡其機能。只要牠們不要求以法律強制實行牠們的決定。這是真正放任主義的態度。與十九世紀英國的其他經濟政策是一貫的。在一八七一年以後這種態度亦應用於工會。除去國家曾要求管理工會的政治活動。並且曾在一九二七年通過一條特別的法律。限制罷工權和公務人員的聯合權。工會曾分擔了很多的給與企業聯合的壓迫。並

且牽涉到與法律作繼續不斷的爭鬥；但在這一點上，羅斯福總統又好像改行一種鼓勵企業聯合的謹慎政策。

法西斯主義下的團體

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和德意志的國社主義確企圖施行自由團體組織機關化的政策。『組合國家』所承認或允許的團體。是那些能合併於國家機構以內的團體。或國家藉政府黨的幫助可以支配的團體。組合國家心目中所要建設的國家。是國家自己保有最後的權力。而把社會職務的執行委託與職業組合團體。這些團體對國家負責。並且從國家接受牠們所遵行的一般的政策。反過來，這些職業組合團體得在國家的機關中有代表。例如在義大利，有一種擬議，要廢除下議院。以工業及社會事業的各種職業組合團體組成的議會代替牠。但這不是說職業組合團體有統治權或制定政策權；因為有許多職務是保留與法西斯黨。法西斯黨藉着牠的總理和法西斯大會。把握着國家的真正統制權。這個職業組合議會很像仍在專制政府之下的議會。不像英國或法國的議會。

無疑的，這種機關化的程序是和現代世界上的某些有力的趨勢一同作用着。因為自由團體已變得很強有力，關於立法以及執行已實行的法律。漸漸政客們必須多與牠們商量。在許多情形之下。把這種商量的辦法組織起來。反到便利，即，使自由團體在調查委員會與顧問委員會或政府各部分事務附屬的執行委員會中有代表。或者甚至把某些事務的執行。完全或部分的交與自由團體。這些委員會的功用。是使自由團體與國家連繫起來。並且常常解除了牠們的反對者的勢力。在一切議會制國家中。無數的自由機關在各種方式之下。被拉來幫助政府的行政。

這當然與法西斯主義所實行的機關化的辦法極不同。在議會制國家內，自由團體仍是獨立的，甚至當牠們與政

府合作的時候，牠們亦仍是獨立的。牠們選擇牠們的領袖，決定牠們的政策，都與國家極不相干。組合主義者將不能容忍這種獨立。在他們眼光中，國家必須是『極權的』(Totalitarian)。包括一切的。牠必須把公民的一切重要活動都附屬在牠以下。使公民全遵守整個的國家的共同政策。這種觀念在本書他處有更詳細的討論；此處無需更作進一步的探討。

雖然，我們必須問一問，『共產主義對這種事採取什麼態度？』我們的回答是，俄國的共產主義（在俄國共產主義獨掌政權）在實際上是極權的，正如同法西斯黨人在理論上的極權，並且或者在實行上更甚於任何法西斯國家——因為尚沒有一個法西斯國家能樹立起牠的權力來。指揮大規模資本主義的政策。共產黨統治着俄國。並且牠的權威是用於使各種牠允許存在的團體組織，都變成由中央決定的共產黨政策的執行機關。這就是無政府主義者有猛烈的批評者，而共產主義者沒有的原因。無政府主義者最恨把最後的權威完全集中在國家手中。共產主義審慎的把真正的權威從政治的統制機關委與經濟的統制機關。在這一點上牠遠甚於法西斯主義，但只是在有訓練的共產黨的機構所包括的統治領域以內。

在這個問題上，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間的根本不同點，不是現在的實行不同，而是目的不同。法西斯主義認為政黨控制下的組合國家，是社會組織的最後的圓滿方式。在另一方面，共產主義認為中央集權的無產階級國家，只是完成社會革命的過渡工具。並且牠命裏注定了在革命完成的時候就要凋謝。共產黨人主張，到了那個階級，集權的政府就要被分權的機能行政制度替代了。在這種分權制度中，由社會的經濟機關直接行使權力，無需有一個強

制的政府。強把一種共同的訓練加在這些機關上。共產主義的理想就是無政府主義者的理想；但共產主義者在不安定的革命過渡期間所實行的，是工人階級的一黨獨裁制。牠的民治性遠甚於法西斯主義，因為牠的權力的基礎比法西斯主義的廣大得多；但在現階段，牠的權威性並不少於法西斯主義。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與某些其他思想派別相同——最顯著的是與同業組合社會主義——都堅持需要機能團體有行政權的代表。在這一點上，牠們全與議會制的意見相反。議會制的意見是一個無所不勝任的政治權威，執行一切必須置於社會直接管理之下的事務，並且牠們有最後控制權。法西斯主義與同業組合社會主義相同，堅持給與這些機能團體一個形式上的聯合基礎，即是，堅持把行政職務讓與機能團體。這種團體的組設就是爲『代表』牠們所要控制的事務。然而，在實行上法西斯主義與同業組合社會主義又完全不同；因爲同業組合社會主義者是從團體之內，建立一個民治的機能領袖制，而法西斯主義者是藉他們的握統治權的政黨的權威，把一個領袖制強加在團體之上。在另一方面，共產主義在現階段中完全不堅持這種聯合基礎。牠創設機能機關，但牠在現階段中創設機能機關，是把牠們作爲行政的代理人，不是負責使事務進行的團體的代表組織。因此，牠的行爲像資本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的創設機能團體（如英國的中央電務部），是以國家推舉的人員組成的，並且不從事務的本身建立任何代表權威。但共產主義者用這種方式創立團體，顯然是爲使牠們結果發展成一種代表性質的。這種發展或者是由於由下而來的壓力，或者是由於國家政策的審慎改變。自然，假如共產主義的國家真『謝謝了』，牠的機能機關便沒有了可能的基礎，除非以根據事務本身成立的團體組織爲基礎。

卷三 國家的理論與實際

第一章 國家

現代社會的特著的政治組織是『國家』。『國家』並不是一個新東西；因為在歷史中，凡社會組織超過部落階段的民族，都設立了『國家』。在完全原始生活狀況下過小羣體生活的人，可以無需藉任何足以配稱爲『國家』的制度來治理事務；但當人類社會一經越過這個階段，『國家』就發生了。牠顯然成爲把人類和社會維繫到一塊的必要工具。在古希臘和中世紀的義大利和德意志有所謂『城市國家』；古代的埃及帝國、波斯帝國、和巴比倫帝國都是以『國家』爲基礎。完全如同現在的英帝國。除去最初步的以外，每個文化階段都有『國家』。但什麼是『國家』？一個『國家』的根本特性在那裏？

已有許多人給『國家』下過定義，並且這些定義所根據的原則很不同。在一極端，有人認爲『國家』是牠的全體人民的一個社會(Community)，是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單位。在另一極端，有人認爲『國家』僅是一個社會中的政府機構的一部分。完全與社會是兩件事。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有許多居中的定義；但仍有其他定義，是根據很不同的原則。因爲前面所述的兩個極端以及在牠們中間的一切看法，都是假定有一個人類社會存在，這個社會或者被認爲與『國家』爲一體，或者被認爲與『國家』是兩件事。但仍有一派思想，否認這個社會的存在，並且堅持說社會

是人世間尙待實現一種志願，因為現在人民分爲不同的經濟階級，彼此敵視，以致在階級之間不能有真正的社會存在。這一點表示『國家』既不是社會，又不能代表社會：牠只能代表一個特殊經濟階級的統治其他人民。共產主義者說，在資本主義之下，工人沒有國家。他們所服從的『國家』不是他們的『國家』，乃是剝削他們的人的『國家』。因此，給國家下定義不應當根據牠與社會的關係，而應當認爲牠完全是階級統治的一個機關。

以這個定義爲基礎，『國家』必然被認爲是一個武力的東西。共產主義者認爲國家是一個強制的工具，是由剝削階級設計的，並且是由他們統治着，目的在制服其他階級。法庭、警察、和軍隊都被認爲『國家』權威的模範表現，並且甚至立法亦被看作是一種制裁。不是行政性質或服務性質的。共產主義者不以爲『國家』是向人民作公共服務的團體，更不以爲『國家』是使人民聯合起來爲他們自己作公共服務的團體，他們根本認爲國家這個東西，是將握統治權的經濟階級的利益所需要的紀律，強加在牠境域內的人民身上。所以共產主義者認爲資本主義的『國家』，是維持資本主義制度所必需的強制制度的具體表現。在俄國革命後建設他們自己的國家的時候，他們審慎的把牠創造成無產階級獨裁的工具。這就是說，使牠成爲蘇俄新統治階級的強制性的權威。實在，在共產主義者的眼光中，這個獨裁制度只是爲應付國內的反革命勢力的危險和國外資本主義的壓迫的危險。牠的預定的生命和這種需要一樣長久。並且只要這些危險一消除，而且俄國內的舊階級制度完全毀滅。這個獨裁也就趨向於消滅；因為那時沒有一個人需要牠指揮了。依照共產主義者的見解。到這時國家自己就要『凋謝』並且消滅了。並且管理事務的行政就要代替了管理人的政府。因為在一個沒有階級和階級壓迫的社會中，不需要強制性的政府工具。公共行政的機關仍

然是需要的；但牠們是辦理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機關。共產主義者堅決認為。稱這些機關為『國家』是不合理的。

當然，甚至那些接受這種『國家』性質觀的人們，亦不否認現代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牠們的根本強制性以外，尚有很多的服務活動。很明顯的，在過去百年中，尤其是在過去五十年中，工業國家（不論牠們的政府的政治局面如何）在牠們的強制機能以外，又担任起許多職務。而這些職務根本是屬於社會服務性質的。現代的國家供給並管理教育；牠們對於保護公共衛生有相當的努力；牠們通過了工廠法、鑛廠法、以及其他無數的工業立法範圍內的保護法律；牠們創設了維持失業工人生活的計劃，以及供給患病者醫藥幫助和津貼的計劃，並且牠們用這兩種方式以及其他許多方式，努力於以租稅為手段，重分配收入，為的是減輕牠們的人民的極端的貧窮和艱苦。這些服務的成分在各『國家』中的程度很不同，或者帝俄時代的俄國最少——這或者對於俄國人的容易接受純粹強制的『國家』根本性質觀有關係。這些社會服務在大多數議會制的國家都有，但也有例外。合眾國一方面由於憲法上的困難，但更多由於牠國內的經濟情況繼續不斷的供給個人大量的機會，以致牠在社會服務的發展上落了後；並且在另一方面，大戰前的德意志是在一個頗為專制的政體之下，但差不多在一切社會公共事務上牠都是開創者。雖然，廣義的說，一個國家在議會制度統治之下，而這個議會制度是以廣大的選舉權為基礎，並且行政權的施行是在內閣手中，而內閣對民衆選舉的議院負責，普通這種國家的公共社會事務最進步——尤其是關於以租稅為手段重分配收入。

國家與民主政治

然而，共產主義者堅持說，不論這些服務活動的範圍在若干資本主義『國家』內變得如何廣大，牠們也不能改

變了『國家』的制度上的基本特性。因為共產主義者認為。公共事務與假手租稅重分配收入二者的發展，在這些資本主義國中。穩固的被限制於合乎保持資本制度的限度以內，又認為任何利用國家機構對資本主義作正面攻擊的企圖。或實行任何與資本主義的繁榮相矛盾的改革企圖。都是命裏注定着必然失敗。為擁護這種看法，他們爭辯說，許多現代議會制國家的顯明的民治性質，實際上很大部分是虛妄的。因為另有一個國家機關與民選議院以及與對民選議院負責的政府並立着。假如有任何利用下議院作違反資本主義的存在的企圖。這個機關就要出而干涉。例如。英國除下議院外。尚有貴族院。牠仍有傳統的大權力，可以延遲下院通過的立法，並且在貴族院之上，仍有皇帝否決立法的無限制的權力——這種權力雖然事實上久已不用，但衛護舊制度的人仍然以為可以依憲法申訴於這種權力，去反抗任何改變社會制度主要基礎的企圖。實在，新南威爾斯的省長曾請英皇用這種決否權，否決工黨政府提出的立法，並且著者在寫這書的時候，這個省長的提案的效力問題。正在實際討論中。

在其他國家。英國上議院和皇帝在憲法上所佔的地位。大多為一個成文憲法所替代。這個成文憲法的修改須經過極複雜而且困難的程序。在合眾國。最高法院根據他對憲法上的判決，可以宣布國會正常通過而且總統簽准的法律為無效和違憲，並且合眾國的最高法院以及各邦的最高法院。事實上曾一再否決聯邦政府的法律和各邦的法律。如果一個國家有成文憲法。並且牠的修改需要特別的程序。牠的效果是實際限制民選議院的權力和任何在位的政府的權力。這個政府就如同是牠委任的統治者。如果一個國家的行政權和立法權是分立的。如同在合眾國。牠也能限制民選的總統的權力。在世界上。沒有一個議會制國家可以單由一個民選的代表團體的投票就把牠的社會制度改變

，而不另外需要任何權威。按這種意義，沒有一個議會制的國家是民治的。此外，通過法律和實行法律決不是一件事；並且在實行上，現代國家的行政機構內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構造內，都具有很大的力量阻礙基本改革的施行，即使能有效的克服了通過這些改革案為法律的困難。

雖然，使共產主義的批評議會制度者懷疑議會制國家的真正民治性，尚不止這一個理由。因為他們認為，只要行使選舉權的公民在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上有很大的差別。普選本身就不是一個真正民治性的工具。如果一個社會內有很大的財產不平等，如果大部分人民是站在受傭僱的地位，依賴僱主階級為生，社會中有錢的人必然握有很大的影響政治意見的權力。在幅員廣大的社會中，普選制度包含廣大的選舉區，各區中選舉人的團體又極多，這樣，富者影響政治意見的權力更大。因為選舉區域的面積廣大與人口稠密，必然使有效的宣傳成為一件很費財力的事，於是那些背後有充分金錢的作競選運動的候選人，一定佔很大的便宜。此外甚至在最『民治的』社會中，宣傳的工作其主要亦是在資產階級控制之下。報紙主要為很有錢的人所有，或者有時為特殊資本階級所有。廣播電台或是受政府的控制，為原有制度的利益工作。或是受僱於能出錢的人。所以廣播電台成為一面的政治宣傳工具。戲院、電影院、教堂，事實上所有各種需要大量資本經營或依賴大量捐助的機關，大部分（雖然不是完全的）趨向於受原舊社會制度的擁護者的支配。學校教育亦趨向於對適合於原舊社會制度的意見作反應。事實上，在一個承認很大的社會不平等的社會制度中，不平等的空氣必定差不多充滿所有各種社會機關。

工人階級的組織

實在，在這種社會之中，有貧窮階級自己創立的若干機關和團體，與資產階級所控制的機關對抗。在最進步的國家，工人組織之主要者為工會運動。其次是貧苦消費者創設的合作運動。目的在藉彼此交易，抵制高價格。又有所謂友誼社，也是從社會中的窮人興起的，雖然實際上有許多友誼社很少有民治的情緒。並且在內部組織上大多缺少民治的方法。甚至合作社亦趨向於大部分由他的職員經營，因為日常彼此交易的事務，不能引起多數來合作店交易的人的興趣，使他們積極參加。工會站在從事於集體爭議和工業爭鬪的機關的地位。在他的會員心中確能引起很高度的積極的忠心。工會的統轄方法亦是很有效的民治方法，並且在工業國中工會是勞工階級的忠心的最重要的集中點。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勞工階級的政治運動大多是以工會主義為基礎；並且差不多一切地方的工黨和社會主義的政黨，都與工會密切的合作。

工人們為達到他們自己的目標而創造的這些民治性質的組織。對於沾染上原舊社會制度所特有的思想和態度的社會機關。有相當的平衡作用。但工人階級的機關本身並非絕對未沾染上他們所依附的制度的影響。合作社的交易脫不了因資本主義商業的存在而有的限制。工會須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去爭議工業狀況的維持和改進。並且為他們的會員追求眼前的經濟利益。牠們被逼使他們自己對那個制度的危機通融。在這種工作上。他們不能不習染上些資本主義的態度。因為以爭議成功的立足點而論，在資本主義繁榮的時候比在衰落的時候牠們極易爭得讓步。在資本主義衰落的時候。資本家可以借不景氣為理由，減低工資或增加工作時間。因此。工會常常因為怕引起更多人失業，不敢攻擊資本主義。特別是在『不景氣的時候』。並且甚至不得不為資本主義的復活工作。拿資本主義當作保持

工業標準的工具，雖然他們的信仰是社會主義的信仰。在這種工作上，牠們的領袖不能不犧牲一些牠們的社會主義的熱情；因為當你剛剛與一個資本家交沙之後，而你又極願和他妥協。你極不容易再去到街頭。以社會主義者的十分不負責的熱情責罵資本主義。普通一個社會主義者沒有你這種責任。而你須顧到一個廣大工人團體的目前的經濟利益。

議會中反對資本主義的議員亦遇到這種同樣的困難。因為他們發覺他們必須維持資本主義制度的進行，直到他們能介紹一個新制度替代牠。假如他們所處的地位是迅速以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那就好極了；他們對於損傷資本主義的信心和作破壞資本主義繁榮的事。就無需猶豫了。但是。我們已知道。在任何國家內。僅在議會的民選議員中得到勝利。甚至是得到明確的多數議席。亦不足以使一個政黨能一下把社會制度改變；因為在國家中仍有一切其他分子。需要應付。所以，當社會主義者的政府執政的時候。牠很容易發見。他們向社會主義邁進的願望和必須用力維持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是矛盾的。牠只能引起廣大範圍的失業。並不比工會的領袖高明。除非他所處的地位能迅速採取有效的步驟。重新吸收失業工人。

國家能民治化嗎？

根據這些理由，共產主義者爭辯說。以議會方式改變社會基礎的整個計劃。是完全建立在幻想之上。他們說。『國家』是資產階級的堡壘強固的保護者。並且是資產階級的最後的具體表現。所以用牠把資本主義改變為另一個不同的制度。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此。工黨和社會民主黨的目標是獲得現存的國家機構。並且利用牠依憲政軌道

建設社會主義；但共產黨爭論說，奪獲現在的國家是不必需的，但必需將他毀滅，並且設立一個以無產階級獨裁制爲基礎的新國家代替他。俄國革命就是依此進行的；並且共產黨人說，這必定是一切國家中的真正革命的技術。

雖然，我們必須記住，我們已知道俄國在帝俄時代的國家，是現代一切大國中最不成熟的武力的具體表現，並且對社會服務最少。帝俄時代的俄國甚至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他是一個封建的或專制的國家。僅有初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帝俄時代的俄國的資本主義在技術的變化上實在有高度的進步。他的工廠是很大的，並且是高度機械化的。工廠內的工人因之亦聚集爲很大的羣衆，受大規模的僱主支配。此外，俄國的無產階級雖然總數很少，却是世界上最受剝削的無產階級之一。在較進步的國家，無產階級的收入和社會地位漸漸變爲小資產階級。但在俄國，沒有很大的中間階級來緩和階級差別的殘酷。所以俄國的無產階級有深刻的階級意識；因此他得到步伐整齊的大力量。但俄國的一般民衆却很少有團結力和意識，除去對於他們自己村莊的目前生活有影響的事情。農民們耕種土地，過一種極端低下的生活，並且是仍處於專制政體的統治之下。這樣的 等階級是軟弱的，並且大部分包含着下級的官吏 即專制國家的僕人。無產階級雖然少，却是一個積極的團結力量。能在帝俄政體因戰爭的巨大壓迫而崩潰的時候，握取政權。無產階級獨裁的學說恰恰適合一九一七年革命的俄國的需要；但這並不能斷定，他對於經濟階級的層次很不同的國家的需要，亦能同樣的適合。

因爲在這些國家，社會的對比絕不是如此的極端，並且階級間亦沒有如此深刻的差別。此外，如果一個議會制度向普選和責任政府邁進，國家除去是壓制的工具以外，實際上已變爲服務社會的工具，並且人民對國家的意識與

帝俄的人民的意識極不同。在俄國，大多數人確以為國家根本是壓迫的和強制的，此外就沒什麼其他性質了；但在議會制的國家，即使人民確以為國家是壓迫的和強制的，他們必須把牠也當做一個服務的制度，從這個制度他們得到某些利益，並且他們對這個制度繼續不斷的使用壓力，藉以得到新的讓步。所以議會制的國家很不容易接受共產主義的學說。因為在表面上，牠好像和人們對於國家的實際經驗不適合。這不一定是說共產主義的看法不對，牠或許是完全對的，因為也許這些國家深刻的浸染上資本主義的成見。不能再被用為打倒資本主義的工具。但即使是如此，議會制國家的人民亦不會立刻相信牠，或者要等到他們已試驗過用國家機構去達到他們的目標，大部分人始相信牠。因為在表面上，議會制的國家從很久以前已漸漸變得民治性加多，並且人們自然的想到這個程序可以繼續前進直到變為完全民治化的國家。所以在議會制的國家，多半共產黨人對於國家的看法不能盛行。除非以下兩件事中有一件發生——除非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實際試用國家作建立社會主義的工具，而不得不承認牠的失敗，或者，除非議會制國家為應付社會主義的邁進，被法西斯主義的革命打倒，或是改走反民治的方向，以致明確的表現出根本的社會改革不能再用牠作工具。

關於國家的一些理論

這種共產主義的國家理論的討論，使我們遠離了我們原來給國家下定義的企圖。但現在我們必須返回到這個企圖。在歷史上，國家好像是存在於超過部落的社會內，為團結人民的工具。牠使人民之間有一個管理的總機關，並且使他們在集體對外交涉上，有一個代表他們的總機關。在歷史上，國家是團結一個人類社會的總組織，使這個社

會的人民在內部的關係和對外的關係上，成爲一個組合的團體。霍布斯(Thomas Hobbes)稱呼國家爲『利維坦』(Leviathan 爲舊約中一怪獸名。霍布斯用他比喻國家 譯者)。這個名稱最能表現國家的這種性質。不過。這種描寫只告訴我們國家作什麼。而未告訴我們國家是什麼。他顯然與個人有分別。他以各種方式表現出人民的聯合。這樣，我們是否認爲他是爲團結個人而設立的政府？這樣一個定義使我們不得不給另一個名詞下定義，因『政府』這個名詞和『國家』一樣，可以有許多意義不同的用法。當我們說政府二字，有時我們是指一個社會中握中央行政權的機關——例如美國的和大多數議會制國家的內閣。但我們也可以用『政府』二字代表一個社會內的整個機構。他不僅是爲整個社會執行行政議案，而且也是爲通過新法律和執行舊法律。依這個意義。『政府』二字的意義是立法加行政加司法。很明顯的。如果政府就是指國家。政府二字必須很廣泛的解釋成包含這三樣。

關於國家的來源。以往的政治理論中曾有許多討論。許多世紀以來最受人稱許的政治理論。就是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的說法。按這個理論。認爲國家的存在是由於一種包含他的一切人員的契約或合同。社會契約論是否關於國家實際如何成立的一個歷史論斷。或者只是對於已成立的國家的根本性質之哲學上的解釋。永遠不很清楚。普通這個理論是被鑄成一個歷史解釋的形式。但無論如何，有些代表這種理論的人。坦白的承認他裏面的歷史成分是虛構的。列如盧梭(Rousseau)明白的說。在歷史上國家是否是藉契約而發生的問題。他完全不注意。並且他又明白的說，在他看來，歷史基礎的缺少不能對這個學說的正確性發生任何影響。在本質上。社會契約論不是一個解釋源流的理論，他是企圖解說已成的國家的性質。並且制定人民對於他的義務的性質。

社會契約論在不同的著者手中。形式就不同。並且有許多不同的解釋。牠的一種形式。是被認為存在於人民和政府之間。有人說。人民同意使他們自己服從政府。為的是取得秩序和安全。但他們這樣作是有條件的。即政府的統治必須是為他們的利益。不是為政府自己的利益。人民和政府彼此都有權利和義務。如果不能實踐這些義務，就算違背契約。這個學說暗示着。人民有權廢除一個政府。如果牠不能為人民的利益而統治。所以在一部分重要人民發覺他們與某個政府有所爭時，這種形式的契約論就變為有利於革命的理論。不過。自然有原舊制度的衛護者以為社會契約論的這種解釋是不可忍受的。他們之中有些人完全否認社會契約論。並且給『君權神聖說』找了個替身。即堅持政府（或者較確一點說。是指君主政體的政府）的權力是上帝直接授與的。他們只認這種政府是合乎正統的；所以反對政府便是極大的罪惡。不論政府的統治是如何的壞。雖然。這個學說有牠的弱點；因為如何決定那些政府是合於正統的。並且牠們的權威是得自上帝？那些政府是篡位的？相信『君權神聖說』的人們解決這個難題的方法是追溯皇帝的血統。他們要把皇帝的權利溯源於亞當（Adam。聖經中之人類始祖。譯者）；但我們能指出一點來反駁他們。即皇帝為亞當的後代的意義。不能超過其他任何人。在實行上。『君權神聖說』變為一切當了皇帝的個人的權利護符。他們的理由是，如果上帝不願他們作皇帝，他們決作不了皇帝；所以牠成了任何已成立的政府的護身符。只是這個政府必須有一個君主的形式——因為好像沒有人以為能夠再有貴族權神聖或民治權神聖。

鑒於『君權神聖說』有許多困難。主張強力國家的人不得不去找另種辯護的理由。霍布斯在社會契約論的另一方面內。找得這種理由。在霍布斯的學說內。社會契約不是人民和政府雙方成立的。而是所有將要變為一個國

家的人民的個人間的契約。按他這個學說。一切個人都同意團結在一個國家內。並且爲了這樣作，把一切權威交給他們所同意建立的政府。不論這個政府怎樣；因爲在霍布斯的眼光中，如果沒有一個掌握最高和普遍權威的政府。就沒有國家。人民有權設立或不設立政府。但當他們一經設立政府並且使他們自己服從牠之後。他們就失去一切權利。整個權力便從他們手中轉到他們所同意委任的政府手中。霍布斯與持君權神聖說者不同，他不以爲政府必須是君主制的；人民可以隨意把牠造成任何式樣——君主制、貴族制、民主政治、或任何其他方式。但政府一經成立，牠的權力就是最高的無限的。因爲霍布斯認爲，最高統治權的精義在於無限制和不可分裂。

這個學說被人指出來。使專制主義與公認的民衆同意的必要相調和。藉以使政府合於正統。但這個學說把民衆的同意移到久遠的歷史以前。以致永不能再乞助於這種同意權。爲現在的權利和要求辯護。雖然。這個學說太荒謬了，不能使人接受。並且專制主義的衛護者幾乎普遍的否認霍布斯的理論。雖然這個理論是偏向他們那面。因爲他們知道牠是有雙重作用的。霍布斯式的社會契約論。事實上替那些和他持正相反的国家觀的人們的目標效了勞。因爲他的承繼者們抓住了這一點：即承認國家只能建立在服從牠的人民的同意之上。這些人把這個觀念建立爲繼續的民衆主權說。這種主權與社會的生命同樣長久。他們說。如霍布斯所承認的，人民握有組織國家的最後權威。但他們決不放棄這個權威。他們必須永遠保留着這種權威。他們不僅在最初得有設立國家的權利。而且在任何時候。他們可以有權毀壞牠或修改牠的制度。這正是洛克(John Locke)的著作中的社會契約論的方式。並且在盧梭的『社會契約』一書中意義更完全。這冊書認爲人民的主權是國家的唯一合於正統的基礎；事實上。牠使公民的志願成爲

爲政治義務的基礎。

但當盧梭和他的承繼者們堅持只有這種民衆主權的基礎能使國家合於正統時，顯然他們不能並且也沒有堅持說。所有現實的國家都是人民的志願的表現。民衆主權顯然是一種願望，並不是現實國家的憲法中已有的充分具體實現。所以。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變爲一個革命的信條。對於構成法國的革命思想的方向有深刻的影響。並且在人權宣言中得到表現，而人權宣言是法蘭西共和國的憲章。

盧梭的學說愈變爲革命的動力。牠愈不能用於解釋現在的國家的性質，更不能解釋國家的起源。承認全體人民有選擇國家種類的最後權力的著者。開始拒絕社會契約說。認爲牠對於確定這個原則。完全是不必需的。例如。邊沁 (Bentham) 否認社會契約的理論，認爲牠在歷史上是錯誤的。在邏輯上是引人入於歧途的。他在他的功利主義 (Utilitarianism) 的學說中，寧願給與社會制度一個純理性的基礎。他這種學說認爲國家是促進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但邊沁當然是最後一個人用這個觀念作爲現存國家的性質的解釋。

國家的基礎

實際上。國家的存在以及在特殊區域內行使政府的權力。是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有許多國家。現在要追溯牠們的起源已不可能；因爲他們已漸漸發展的改變了形式，有時是依憲政的軌道改革牠們的構造，有時是出於違憲的手段。這就是說。有時出於自身的調整。有時出於革命。征服對於使土地受某個特殊國家的統治，以及對於征服階級的決定強加在原來人民之上的整個國家構造，也有很大的關係。一切的國家。不論牠們的起源和後來的變遷怎

樣，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具有壓迫和同意的混合成分。因為從來尚沒有一個國家在他的整個領域以內純粹以壓迫為基礎。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存在，除非有些地方同意牠存在，至少須有一部分人民同意牠存在，並且須有一些積極的志願，扶助牠抵禦外侮。但國家背後的積極志願的成分，可以很強，也可以很弱，並且可以集中在很小的一部分人民，或者是廣闊的分散在多數人之間。所謂國家的民治化，包括一個雙重程序——一部分是承認多數人參與國家的實際統制權，藉此可以便願意維持國家的心願散布的廣一些，另一部分是更廣大的散布投票權。但這種投票權並不一定就附帶着有控制國家的活動的真正權力。因為一個投票權的控制力顯然是隨着兩個因子變動。即隨着由此投票所選出的代表的權力和投票人對於選擇他們的代表的實際自由。

現代民主主義者心目中的理想，是使國家這個組織不僅具有牠的全體公民的消極的同意，而且要具有他們的積極的意志——就是，使國家成為人民的意志的實際具體表現。但什麼是人民的意志，或者甚至什麼是人民，却完全不清楚。數人數是傳統的決定民衆意志的方法，但實用這種數人數的方法，必須是在能行使投票權的制度的結構之內。而且在這個制度的結構內，必須投票的結果能在國家的積極行為中表現出來。選舉一個英國的議會代表的一票，和選舉一個俄國的蘇維埃代表的一票，或一個義大利的法西斯代表的一票，不是一件事，而且影響也不同。此外，甚至在議會制的情況之下，投票的情形和數票的情形，都有很大的關係。選舉制度有許多種——有每區一人的大選舉區制，如在英法二國，有比例代表制，如在歐洲的多數新國家，以及許多從這兩種制度脫變的制度。關於規定選舉區的界綫，尚有用若干不同方法的餘地。『亂分區域』這個名詞表明選舉區界綫的劃定，可以對於投票的結果

有很大的影響。並且，廣大的選舉區使選舉運動多少總成爲一件費錢的事。這實際增加了有錢階級影響投票的權力。還有選舉競爭太多的問題，罷免當選代表權的存廢問題。候選人的資格問題，和公開投票或秘密投票問題。

看到這些問題以及其他許多與此類似的問題。僅有廣大的選舉權，不一定就是個人選舉者有充分自由選擇代表，硬代表發表他們的願望。何況事實上，選舉區內的許多選舉人或者完全不明白他們所要發表的政治願望，並且更不知道使這些願望生效力的方法。此外，我們已知道，實際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完全依數人數行事；每個國家對於民治的選舉的結果，都有一種遏制，或是出於一個上議院或一個世襲君主的方式，或是出於一個成文憲法。或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或者同時有一個以上的方式。

並且以數人數爲決定政治爭論的最後方法。而且以爲藉此即可建立民主政治的觀念，主要都是根據個人主義的假定。站在以『國家』爲中央統治權威的立足點。這種觀念假定只有單個公民的意志值得主意。單個公民的願望借他們各人所投的贊成代表的票的記錄，就可以表現出來。但在事實上，社會不僅包含孤立的個人。而且有團體，這些團體以許多不同的方式把個人聯合起來；並且個人站在團體和社團的地位。亦同樣有願望。這種願望並不次於他們站在孤立的個人地位的願望。有人可以說，他們站在個人地位所投的票，亦能表現他們所屬的各種團體的一切願望。這實在是個人民主政治的主要理論。不過，這不是一個不言而喻的觀念。並且從來不僅反對民主政治者嚴厲的反駁牠。而且那些堅持組合民主政治的人，亦嚴厲的反駁牠。這些人主張。除非民主政治像採用純粹個人方式那樣，採取了組合方式，牠決不能有效。

什麼是民主政治？

事實上，擁護人民主權的人們對於什麼是「人民」，總是有不同的理論。按照個人主義的民主政治理論，所謂人民僅包括許多個人，除去他們的共同人性以外，他們的不同的資質、關係、職能、或其他，都無關係。但當約翰·米爾頓(John Milton)，或其他不列顛共和國(Commonwealth)的理論家，談到「人民」的時候，他自然不是指這個意義。對於米爾頓，「人民」不僅是一個量的概念。而且主要是一種質的概念。有主權權利的「人民」，並非包含國家以內的一切個人，而是只包含那些憑本身資質够得上分得一份權力的人。米爾頓心目中的「人民」包含「上帝選擇的人」、「聖人」、那些對於宗教性質和道德性質的看法與他相合的人、那些藉着和上帝有正當關係因而適合於統治國家的人。除去在這些說法上以外，他與民衆主權說無關。但他尚且認爲他的主權觀念根本是民衆的，因爲他說：「人人都可以有這種和上帝的正當關係，所以。這不是一種貴族的特權，乃是一個純粹民治的條件。但顯然的，這個學說與在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或國社主義的德意志、或共產主義的蘇俄現在所盛行的見解，有許多相同處。並非這些國家中的握統治權的政黨，實際只許屬於他們自己的特殊品類的『聖人』有投票權。在克林威爾統治之下實際亦未曾這樣做；乃是他們認爲接受統治黨的信條的人們的政治權。比其他人民的政治權大而有效，並且統治黨確越權用牠的民衆擁護作工具。排斥那些和他們的建國基礎原則的見解相衝突的人。這就是全盤一致化(Gleichschaltung)的態度。現在國社主義的德國正在宣佈這種態度：牠背後的假定是，唯有在相當的限制條件以內，民衆主權才可以爲政治制度的基礎。這種條件中的最重要者，是說關於國家的性質和一個社會中社會制度的整個複雜情形的

性質，必須有一個共同意見作基礎。許多人民譴責這種理論，說牠是非民治的，並且牠顯然與個人主義民主政治的假定衝突。但是，牠只在一種意義上是『非民治的』。自然不能把牠列為通常與民主政治相反的任何種類；牠不是君主制的、或寡頭制的、或貴族制的；因為雖然有些人或許認為牠是貴族制的變形，但實際上牠與普通意義的貴族制完全不同，因為牠承認給一切人公民權利的條件，只要這個人預備堅信牠所支持的根本構造。如果我們願意，我們可以譴責這個理論為『非民治的』；但在我們譴責了牠之後，我們仍沒有前進了多少。因為我們必須發明一個新種類，把牠置於這個新種類之下。

代表制的性質

除去以全盤一致化為基礎的理論以外，尚有其他學說，藉着民治的標準否認個人主義的民治的假定。這些學說擁護團體的要求，反對議會民治學說的原子論的個人主義。他們主張，團體與組織正和個人相同，亦是社會中很自然的份子；並且，唯有在社會內有結社的廣大自由，並且把社會行政的職務分與許多合作而且內部自治的團體，社會才可以有健全的基礎。按照議會民治的學說，許多人享有投票權，為的是他們可以選擇一個人，來代表他們的見解。但批評議會制度的民治主義的批評家們，否認一個人能實際代表許多人的關於整個社會事務的意見。這就是說，他對於許多不同事務的意見，只能偶然僥倖與聯合選舉他的人們的意見符合。他們又爭辯說，這個制度必定引起錯誤代表制。人們不得不選擇某人作代表而不選別人。因為他們在某特殊問題上和他意見相同，並且這個問題在當時碰巧正佔最高位，或者因為在人民眼前，他好像是一個政黨的標準代表，而且他們又同意這個政黨對於某些事項

的見解。但這樣選舉的代表必定不能代表他的選區對於極廣泛的事項的意見，這些意見在選舉運動中並不佔最高位置。在幅員廣大的社會中，代表制度無疑是唯一可能的民治方法；但有人堅持說，代表制對於發表被代表的人的意志，可以變得很真實和有效，如果叫人民所選舉的不是一個代表一切事項的單個代表，而是以不同的代表，代表不同的事務。所以不是一個代表機關對於整個社會事務『無所不勝任』，而是有許多機能團體，每個團體管理整個社會事務中的一部分特殊事務。例如，這些人主張，工業應當以職業自治為基礎組織起來。在這些組織內實際工作的工人，可以依民治的方法選舉他們自己的領袖和代表。不用再接受從外面委任的領袖和代表。

這種代表制的真實性質的看法，主要與同業組合社會主義的學說有關聯。同業組合社會主義所最注重的，是工人在工業中有統制權和自治權。反對工業在社會化之後，仍由一個根據上級官委任的官俸制度管理。在大戰期間和大戰以後的幾年中，同業組合社會主義受到廣大的歡迎，但後來就衰落了，並且實際上以一種獨立運動的地位而消滅了。這大部分是因為工會因工業衰落而軟弱無力，但亦因為政治情勢的改變使獲奪政權成為最重要的問題。因之把得權後採用什麼組織行使權力的問題推到腦後。不過，同業組合社會主義雖然成為一個獨立的運動而消滅。但在工人的思想中仍保有相當的勢力；並且假如社會主義藉革命方式或議會方式成了功，跟着工人一定要要求在已變為社會公有的工業中，有一份實際的統治權。同業組合社會主義者或許尚未找到行使這種統制權的正確方式。因為實在的。社會組織的方式很難在需要牠出生的情勢之前預先制定。但不論是怎樣的一個方式，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顯然必須滿足工業中的自治的要求，假如這個社會是要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

這種同業組合社會主義者的機能代表制和機能自治的觀點，常常在人心與組合國家的法西斯見解相混。在義大利，法西斯黨人亦宣揚一種機能組織的學說。並且正在企圖在國家之內建立一個各種工業和事務的代表組合機關，並且甚至有意以組合議院替代下議院。這個組合議院的選出，不是代表軍備選民，而是代表機能團體。道爾夫斯(Herr Dollfuss)實行基督教的關於團體組織的社會習傳，他計畫了一種與組合議院類的似制度，來重建奧國的議會，這個計畫或許與德國的計畫中的計畫很相似。但這些法西斯的機能組織的意義，與同業組合社會主義者的意義根本不同。這種不同我們可以從兩方面討論。第一，最明顯的，他們不是以各種職務人員的民治性的平等為基礎，而是以僱主與工人間的階級分別為基礎。義大利的法西斯職團建立的方法，是把僱主和工人的雙方代表放在一塊，並且使僱主的和工人的團體在他們共同組織的職團中，有同等的代表。所以在一個職團中，少數僱主和極多數工人有同等的力量。在另一方面，同業組合社會主義計畫着把僱主和工人間的階級分別完全除去，並且認為工業中的全體服務人員，是一個組合團體，具有集體的自治權。第二，法西斯主義者的計畫是不以職團為獨立的機關，而是認為牠們根本屬於國家權力範圍以內。對於國家，這個擬議中的新機能組合議院的趨向好像只是一個顧問機關。基本權力仍是保留在其他機關手中，例如不以機能團體為基礎的法西斯大會。事實上，法西斯主義不是社會主義的變形，而是一個承認並由國家認可階級差別的制度；牠不是充分意義的機能制度，因為牠與同業組合社會主義者不同，牠沒有拋棄了主權國家的觀念，而是企圖把一切機能團體包括在牠所要建立的「極權」國家(Totalitarian State)以內。牠承認機能組織的需要，但牠和黑格爾(Hegel)一樣，想要把機能制度附屬在極權觀念之下。

同業組合社會主義者永是爭辯說，如果在一種社會活動中實行民主政治，而在其他社會活動中完全否認民主政治，是無意義的。這是他們的基本理論。他們指出，工作環境對於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和人們消磨空閒時間的環境對他們的影響完全一樣；並且，大小工廠中的專制或官僚式的統制。在人們參與政治事務的時候，不會對於這些人的積極公民權沒有影響。他們堅持說，工廠是訓練積極自治的必要的場所；除非民主政治能成功的設立在工業範圍之內，牠在政治中的運用，永不會成爲真正民治的，不論選舉權是如何的擴大。因爲人們的工作環境對於他們的心情和態度，發生一種很大的影響；並且他們不容易學會怎樣控制政治中發生的較大的問題，除非給他們機會，讓他們控制那影響他們日常生活的比較切近的事務。當然，這個學說不僅涉及工業中的自治，並且涉及一個伸展到一切集體活動範圍內的機能民治的廣大制度。我們要注意。雖然俄國人拋棄了工廠中工人直接委任管理他們的經理人的民治管理法觀念。但實際上他們藉着集體組織已建立下大量的工廠內的民主政治。

組合民主政治

在歷史上有許多時期組合民主政治(Corporative Democracy)的觀念與國家的要求普遍的權威，發生尖銳的衝突。例如，在整個中世紀都是如此。中世紀充滿了組織的精神。至少在城鎮中是如此。在中世紀時，城鎮政府開始成爲由市民團體生出來的自治政府。市民要求有權管理自己的事務，並且要求在內部的事務上不受皇帝或封建君主的干涉。漸漸的大多數國家的城鎮從皇帝或皇帝以下的君主取得特許狀；並且不久在城鎮中又有較小的組合團體，開始要求同樣的自治特權。有同業組合公會興起，代表各獨立手工業的小主人，並且漸漸這些團體得到承認，並從國

家或當時的城鎮當局取得特許狀。有時獨立的同業組合公會本身的力量變得強大足以控制城鎮行政。後來城鎮行政實際上變爲手工業組合公會的一個聯合機關。有時手工業組合公會仍附屬於城鎮總機關；但甚至如此，牠們亦得到重要的特權和管轄牠們自己的司法權。中世紀的世界在文化的進步方面，變成一個組合團體的世界；但這些團體，由於當時的情況，多半主要是地方性的，並且因爲是地方性的，所以不能（除去少數地方）集合起力量來，克服封建君主的專制。因此牠們常常與皇帝聯合，使國家的力量足以抑制封建君主就範；這樣牠們大大的幫助了主權國家的建立，而主權國家在進程中反而打擊並毀壞了牠們，因爲這時經濟情形的改變使地方主義成爲經濟發展的阻礙。實在，這些在中世紀興起的特權團體，在牠們的生命後期應當受許多譴責，這些譴責是來自十八世紀的著者，如英國的亞當斯密士（Adam Smith）和邊沁（Jeremy Bentham）。牠們不能適合迅速擴展的工業和經濟制度的需要，這個制度這時最需要一個全國的自由市場，所以牠們變爲一個阻礙。並且牠們的內部收縮爲反動的寡頭政治，受較富會員的支配。牠們最重要的目標在拒絕外人進入牠們自己獨佔的活動範圍。牠們在革命的法國適當的被掃除了；並且在資本主義的英國被掃除得更容易；我們不要被牠們衰落時的過失埋沒了牠們在初期的教化影響。或在組合的組織方式和當時的經濟目標調和時，用組合的組織方式爲表現民治精神的工具的好處。這個世界藉掃除舊式的企業獨佔而得到好處，但當牠把自己完全託付與個人主義的社會學說，並宣佈以人民之敵看待一切組合團體的時候，牠又受到許多損失。漸漸的，在十九世紀組合團體又恢復了。牠們的方式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相適合。在一方面牠們恢復爲托辣斯和企業聯合，在另一方面成爲工會。此外尚有許多小方式的自由社會組織。現時代的問題是求

得一種方法。使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的集體統制，與用機能自治爲民治表現的要求相調和。

個人民主政治

在這裏，我們需要注意，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期個人主義的民主政治理論形成之後，政治活動的範圍和目的整個觀念都經過了一個根本的改變。十九世紀的理論家提倡個人主義的民主政治學說，使地籍議會制度而存在的。他們能這樣有力的提倡，因爲他們認爲國家的職務主要只限於很少的幾件事。他們以爲，國家的職務是保護個人的自由和財產的基本權利——也就是保持原舊的社會構造——並且竭力少干涉其他事務。例如，使工業依照自由市場的原則，自己經營自己，因爲在一個根據個人財產權的制度之下，一定會有這些原則。差不多沒有一項社會事務被認爲是在國家的權限以內。這些事務盡量（假如不是完全）讓慈善機關供給；甚至在窮人救濟律（Poor Law）下救濟赤貧的責任，都被認爲是不合意的。他們的理由是，公家的慈善機關常能使受惠者墜落，但私人慈善機關則不如此。英格蘭式的窮人救濟律之不能施行於蘇格蘭，就是因此理由，並且在蘇格蘭，救濟窮人的事業直到一八三四以後，才由教堂的職務改爲國家的職務。

對於邊沁以及他們的信徒們心目中的這種「少做事」的國家，一個個人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不是不適宜的。假如國家只有很少的職務，那麼許多人聯合起來選舉一個人，在這些職務上作他們的代表，是可以的。但是國家的活動範圍爲適應不可避免的經濟和社會的需要而累進的擴大了。所以議會制度運用的條件根本改變。並且一個選舉區中當選的代表對舉他的選舉人的關係也根本改變了。在民主主義者的心目中，擴大選舉權仍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以

致他們不能注意到選舉的目的正在有很大的改變。當然這兩件事決不是沒關係的；因為選舉權的擴大，很引起擴大國家活動範圍的必要。這是由於選舉區中新有選舉權的人對於議會有了壓力，使議會補救各種不同的冤情和困苦。但當民治主義的理論家們充分感覺到這種事實時，大多數仍然久久不能看出牠的將來的結果。他們經過若干時間之後，才承認並討論因議會中事務擁擠而發生的嚴重問題，並且承認現代議會的立法職務太複雜廣泛，以致不能以民治的方法進行。由這種事務擁擠發生了新的『民治問題』。有些理論家譴責『新專制』的降臨，因為政府各部的閣員正在篡奪應當屬於議會的權力。但是，假如議會找不出時間處理那些閣員和各部拿去的事務，譴責這種『專制』又有什麼用？常常議會控制的方式是藉這樣一個條款保留着：即以議會議案的方式公布的命令和規則，在施行之前必須『送交議會審查』。但在大多數情形之下，這不過是一幕滑稽劇，因為議會既沒時間又不願意考慮那些數不清的命令和規則。這種命令和規則都是要藉此方法誘致議會批准。議會的事務擁擠愈來愈甚，因為需要以立法處理的問題，變得不但數目多而且更複雜，以致議會的議案愈來愈長。直至於必須計畫着使議案本身僅包含一般的原則，把所謂細節留待行政命令或法令補充。但這種節省議會時間的方法，只不過重新增加了議會以外的行政機關的權威，並且使命令規則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增加的快。更沒有一個人能真正的說出什麼事議會必須宣佈原則。什麼事可以有把握的交與一個閣員或其他附屬的機關。

顧問機關

因為有這種困難，關於制定法律與以法律方式公布的命令和規則，以及關於各種社會事務的行政，愈來愈多借

助於議會以外的機關。顧問委員會愈來愈時新了，並且常常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以代表與問題中的某某部或某某法律有關係的人為基礎。除去正式的顧問委員會以外，實際上成爲不斷的以無數其他方式，諮詢議會以外的團體；所以人民自由的組織對於政府的實際工作，重新又有了重要作用。並且閣員們對於外界團體對他們的議案的批評，必須比對於議會中的辯論更要注意。議會制度的理論仍然保留着，但實際上是累進的修改了。並且這種修改的程序是不能避免的，即使議會願意日夜坐在那裏討論那提出來以備採行的議案。說立法太多，以及說最好不要以立法干涉事情，都無濟於事；因爲，除去日常要進行的極多的新法律以外，永遠有其他無數的法律起草（有些是特別緊急的）因議會無時間而擁擠在那裏。真正的問題不是議會是否應當繼續爲唯一的統治權威，而是議會自己顯然不能施行的那些權力應當交給誰。大概的說，有兩個可能：（一）官僚政治或機能制度。應付這種情勢的一個方法，是讓閣員的權力增加，並坦白的接受這個「新專制」，並且知道閣員必須不斷的諮詢有關的各團體，事實上這種新專制會受到調節。這就是議會制國家實際上主要採用的方法。另一個可能是承認「勝任一切的」議會不能運用，採用一種機能分權制。把從議會手中掉出來的權威，不交與閣員或官僚，而交與一個爲此組織的機能自治機關。這實際就是同業組合社會主義者的計劃；並且假如社會主義到來，我們將要發覺這是不可避免的解決辦法。無論如何在那些習於議會民治制度的國家是如此。那些已往的統治比較專制的國家，或許在這個辦法到來之前尚需若干時日。因爲這種國家到那時沒有這同樣的自下而上的壓力，能要求以代議民治的更有效的方式替代議會制度。在俄國，『集體組織』將先發展爲批評的機關，而不是行政的機關；但牠們已表示着是從批評的活動向行政式的活動發展。

一向爲議會制國家所喜歡的官僚政治的辦法，終久將被承認完全不是一個解決辦法；因爲官僚將不能使民衆對於他們的作爲充分同意，以致他們不能繼續他們的作爲。一個議會制度退化爲官僚政治，而且日多一日的把真正權力交與行政階級手中。這樣牠已是在凋謝的程序中。並且終久一定會引起一種革命，不僅是反對官僚政治。而且反對那民主政治的無效的方式，因爲官僚們企圖藉牠維持他們的權力。在議會制的國家中，法西斯運動背後所集合的情緒，有許多在本質上是反對官僚政治的情緒。這種情緒的起而反抗議會制度，雖然常被反民主政治的勢力獲去，却不是真的反對民主政治，而是反對民主政治的滑稽劇。這種滑稽現象的發生，是由於議會要作的事太多，超出牠的能力以外。因爲在這些情形之下，執行行政事的政府，名義上仍對議會負責，並且經過議會對選民負責，但實際上牠從事於推行極多的活動，而對於這些活動，牠可以沒有議會中一般議員的或選舉人的真正委任統治權。在牠背後沒有真正的代表權威；因爲如果議會既不能從選民得到有效的委任統治權，又不能把這種委任統治權轉令握實際行政權的閣員，這時藉一個能指揮議會中多數議員的政黨來選舉領袖的方法，已不是找得真正領袖的適當方法。在這些情形之下，發生一種要更有效的領袖的呼聲；但在現在的議會制度之下，這是得不到的。唯有如果兩個補救辦法有一個能實行，就可以得到牠。一個補救辦法是民治的辦法，即將議會的權威分給許多機能團體。每個機能團體都能在地自己的範圍內得到民治性的委任統治權。另一個補救的辦法是將議會減爲純粹的註冊機器，記錄在統治黨權威之下發布的法令。這個統治黨不是代表無分別的個人選民的意志，而是代表一個團結的有組織的社會或經濟階級的意志，這是政黨獨裁制的方法。當議會制度實際遇到一個生死的危機須解決，這種制度最易被採用。但是，那些

傳統的徘徊於官僚政治與議會制度之間的領袖們，會發覺他們自己頗不能解決一個真正的危機。

事實上，國家是一個組織，必須他的職務能保持狹窄而且簡單，他才可以行統一的民治統制。但一個國家如果不是變得漸多參與極廣泛而且極複雜的一些活動，他即不能應付他在現代世界上所遇到的問題。或變為民治的國家。廣大的選舉人的壓力以及國內和國際間日漸複雜的情勢的壓力，將使國家不得不擔任起那些日漸增廣和日漸複雜的職務。假如他要保持着他的最高主權的要求。但在接收了這些職務之後，將不可抵抗的驅使着他。第一步先走向官僚政治，這種政治將要引起廣大的反感並且使他的聲譽有嚴重的損失，然後走向一種獨裁制的建立，以獨裁制為行使必然落在牠手中的廣大權威的唯一可能的有效工具。唯一可以替代各種獨裁制的制度，是機能組織。除非能誘致那些負責指導國家的人接受任何一方式的機能解決方案，他們必定將要接受種種方式的政黨獨裁或個人專權的獨裁，認為唯有改為這種獨裁制度，才可以使現代國家中有相當的行政效率。

第二章 主權國家與其隣國

現在的國家都要求完全『主權的』獨立。除去有些國家把牠們的一部分主權交給較大的聯邦單位，如同合衆國的與瑞士的各邦。在有這種聯邦組織的國家，『國』(statenloos)普通所有的屬性，常常是屬於聯邦機關，而不是屬於聯邦所包含的『邦』。一個嚴密結合的聯邦如合衆國，和一個組織鬆散的獨立國家的團體如國際聯盟，其間並沒有真正的相同處。在合衆國，一切對外關係以及大多數重要的國內事務，都是由聯邦政府管理。所以說到國家二字，我們是指那些要求完全主權的單一政治制度，和那些在對外關係上要求同樣完全主權的聯邦國家。

這種國家對於主權的要求，實際上就是要求在他自己的土地以內有完全的絕對的統制權——除去有的國家因有聯邦憲法，以致情形較為複雜——以及在對其他國家的外交上完全獨立。一切公認的文明國家，都被認為有這種完全主權的權利，並且損失任何一部分亦必須有國家的同意方可。是否國家能損失任何一部分主權，而不致失去立國的根本特性，甚至成爲一個爭論。因爲政治法學家的主權不能轉移或分裂的論說，一向受人歡迎。

實在，所謂國際法確是有的。牠的用途是限制國家的絕對自由，使國家不能完全依自己的所好行事，而不顧任何束縛行爲的原則。國際法分爲兩部——國際私法制定管理各國人民之間的關係應該用的原則，牽涉到各該國的法律制度，並且也制定任何一個國家與他國人民的關係。例如護照規則這樣的事情；但國際公法則是關於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的。不過，國際私法須由各國的國家法庭解釋，雖然在一八九六年、一九〇二年、和一九〇五年的海牙會

議 (Hague Conventions) 以後，國際私法中若干部分是由許多國家組成的國際會議決定。這幾次會議英美二國都未簽字，因為這兩個國家的法律制度的基本概念與歐洲大陸的不同。歐洲大陸的法律制度大部分是從羅馬法推演而來的。

國際法

國際公法是以若干國際行爲的原則爲基礎。這些原則未曾制成法典或明白的寫出，而是主要表現於若干前後相繼的大法學家的論文中，以格繞沙士 (Grotius) 爲始祖。格繞沙士的有名的十七世紀的論文，第一次明白的制定了引導的原則。國際法的原則好像是一部分來自理性的『法則』。一部分來自文明國家的公認的實際行爲。國際法的起源一部分是風俗習慣，一部分是各國間實際的條約和協定的內容。雖然沒有明顯的寫出國際法規定的是什麼，一切文明國家前後都已表明同意接受牠的原則的拘束，並且牠的拘束性質會一再被條約的內容和國際宣言的內容確認。在國際法的範圍以外。尚有文明行爲的原則。這些文明行爲的原則是國際『禮讓』的一部分。這就是說。是國際禮節中一部分公認的法典——尙未被認爲有充分意義的拘束力。但所謂『法則』和僅僅的『禮讓』不能每次都明白的寫出。

有些理論家完全反對『國際法』這個名稱。因為他們說。除非有法庭有權力執行。便不能算作法律。現在確有兩個可以宣布國際法的法庭——一八九九年設立的海牙仲裁法庭。和大戰後在國際聯盟盟約之下成立的國際常設法庭。但在性質上。這兩個機關不能有國家法庭的那種執行判決的權力。一個國家不能被拘捕或監禁。雖然牠可以被

判決賠償和罰金；並且，沒有一種國際的武力。相當於民族國家的警察力。但有一點不清楚。即法律觀念本身是否含着必須有一個能強制犯法者的權威存在。雖然在任何軍個國家中。永遠有這樣一個權威在國法的背後。好像要使『國際法』合於正統。須事實上確有一套行爲的原則。對於這些原則。國家承認有應盡的義務——雖然甚至這些國家仍可以不遵守這個法律而不致一定受處罰。國際法一向是根據輿論。不是根據正式的制裁。但牠仍不失爲一種法律。

『文明』國家對『未開化』國家的關係

文明國家彼此交往時所普通公認應遵守的原則。對於交往牠們認爲『未開化的』國家或民族，牠們不一定認爲有拘束牠們的力量。先進的國家自然永不會承認部落社會的『主權』。牠們對待落後國家的方式。亦和對待牠們認爲和牠們自己站在同一文化階段上的國家不同。帝國主義的擴張，已踐踏了『未開化』人民的權利，甚至那些被承認爲國家但未充分被承認可以受國際禮讓的國家，亦不得不接受加於牠的內政上的干涉，而且干涉的方式確與牠們的主權衝突。列強的瓜分非洲，便是根據不承認原始的部落社會有『主權』，並且中國在被侵入以後，先進國家的人民便强行享有『治外法權』。因爲這些先進國家堅持牠們應當把牠們自己的『法律』帶到中國，並且牠們的國民應當不受中國法庭的管轄。土耳其曾有一個長時期不得不服於與此相同的治外法權的要求；取消一國內的外人的這些特權，普通認爲是完全承認一個國家爲國際禮讓中的一員的必經步驟之一。

國家的主權

雖然國際法強使國家在互相交往中負起若干義務。實際上牠甚至是確定牠們各個國家的主權和獨立，不是拘束牠們到一個世界制度以內的工具。實在，國際法學家所承認的原則，主要是以防止國家主權受侵害為基礎。每個國家必須尊敬一切公認的國家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並且不論一個國家的面積和權力如何，都被認為與一切其他公認的國家平等。正如同在一個國家內個人在法律前一律平等。根據這些原則又推出若干理論——即沒有一個國家有任何權力干涉另一國家的內政。或在和平的時候侵略牠的土地。每個國家都有權管轄牠的領海和領空。並且有權自由利用領海以外的公海。國家必須遵守牠們加入的條約。但未經牠們同意的條約不能發生強制力。每個國家有權力隨牠自己的選擇統治牠自己，並且有權利在牠的領土以內隨牠自己的意思制定法律。只不許和牠同他國訂立的條約以及那些規定不確切的國際文明行爲的原則衝突。有些人要再加上一個原則。這個原則在一九〇七年海牙會議中有廣義的制定——當國際間為一個問題發生了糾紛。而這個問題牽涉到解釋一個已有的條約或國際法中的一個原則，各該國必須借助於仲裁。如果牠們不能用直接交涉解決牠們的爭點。不過，這一條永不會被接受為一個無條件的義務。雖然依附國際聯盟或國際常設法庭的國家——所有國聯會員國和其他若干國家——在『可辯明的』糾紛上（廣義的說，就是關於解釋已有的條約或法律原則的糾紛）接受仲裁的義務。在國際聯盟成立之後已大為推廣。

國際聯盟和國際常設法庭的成立，當然大大的影響了國際法的發展。在國聯盟約之下，會員國有了廣大的雖然是規定不適宜的國際義務。這種義務以後又因有極多補充條約而更加充實。在『選擇條文』和『總條例』之下，許多國家使牠們自己借助於仲裁（大多有廣泛的和含糊的保留），不僅關於可辯明的糾紛，而且那些不能以純粹法律

根據解決的糾紛亦包含在內。除去國聯盟約和在他之下制定的條約以外，尚有無數的國際『公約』和條約。牠們的目的是爲減少戰爭的危機和擴大國際仲裁的範圍。在一九二八年的開洛克公約（Kellogg Pact）之下，多數國家正式反對一切戰爭。除非是抵抗侵略者的自衛戰爭；並且在個別的国家與國家之間，尚有很多的不侵略公約。並且有許多國家允許尊重其他國家的領土完整。蘇俄同牠的歐洲的鄰國結締了許多這類的公約。並且有真正重要的一點，即這些俄國的公約包含着『侵略者』的定義。許多公約，包括開洛克公約，因無此定義以致在實行上大部分沒有價值。德國在一九三四年亦與波蘭締結了一個不侵略公約，有效期間爲十年。

國際聯盟

雖然。我們必須知道。所有這些公約和條約以及國聯盟約本身。都是以承認每個獨立國家的最後主權爲基礎。在國際聯盟拘束之內的會員國。決沒有爲國聯放棄了牠們各本國的主權。牠們只是進而多負起一些互相的義務；而這些義務與國聯成立前牠們早已習於加在牠們自己身上的條約義務相同。現在的國際聯盟甚至不足以稱爲國際最高權威的萌芽，只是主權國家間的一個鬆散的聯合。

這在國聯的構造中有明顯的表現。國聯大會（League Assembly）是一個若干國政府的代表的集合；管理牠的活動的一般規則，重要政策的決定必須全體一致通過。並且每個國聯會員國的地位平等。事實上。要完全保持這兩個原則的任何一個。而且又要使國聯完全能運用。實在是辦不到的事。但脫離這兩個原則的一切辦法。僅有最猶豫不定的方式。並且是受極多的保留的限制。我們先討論國與國之間的平等問題。國聯大會的構造即表現出承認這

個原則。而國聯大會是大家假定的最後統治機關。但這個原則決不能實行於國聯行政院（League Council）的構造中。實際上，行政院對於決定國聯政策的影響遠過於大會。在行政院中只有少數大國為當然代表，小國須爭奪其餘的位置或成立一個協定。以規則的循環制分配這些餘下的位置。這已成為現在實際運用的方法。

為使國聯的機構能運用。全體一致通過的規則亦必須修改。純粹程序問題不應用這個規則。這種問題可以由普通投票解決。但這個規則亦脫離了在大會和行政院中進行的比較重要的問題。例如，必須規定在若干事件上可以不顧一國的反對票而作決定。如果這個國家直接牽涉到國聯正在調查的問題，譬如當行政院正在討論是否一個會員國破壞了在國聯盟約下牠應當遵守的義務。在大會中對於若干問題可以依多數票決定，但必須得到一切大國（除在前面保留條件之下）的同意。但所有這些脫離全體一致通過的改變，都是極勉強作成的，並且國聯盟約中仍然沒有條文能使任何國家受任何事件的拘束。如果在這種事件上一個國家未曾明白的同意接受牠所加入的盟約的拘束力。所以在國際法學家眼光中，國家有最高主權的原則仍保持完整。實在。在國聯盟約之下，可以把『制裁』明白的實施於一個被判決實際破壞盟約下的義務的國家，並且甚至有一個規定不適當的義務加在會員國身上，使牠們在某些極端情形之下遵國聯的命令，用牠們的武力對待一個犯罪的國家。但這一切的條文有極多的限制，並且字句的意義不確定，以致很難解釋；並且尚未曾有過對犯罪國實施『制裁』的企圖，雖然對若干小國曾有實施『制裁』的恐嚇。實際對一個強國施行『制裁』的極端困難，在國聯企圖處理由日本侵佔滿洲造成的情勢的時候，明顯的表現出來。

國聯的完全沒有超國家的意義，由每個會員國的保有退出的權利（通知後兩年發生效力），就可以最明白的看

出。盟約上實在說着，國家在退出的時候必須盡牠在盟約下的一切義務，直到牠的退出生效之日；但如何強制牠盡這些義務，却不明瞭。日本和德國近來都通知退出國聯；但這是不是說，日本將被迫接受國聯調查滿洲報告的判決，或德國承認有尊重國聯盟約的義務。直至牠的通知發生效力之日？

事實顯然是這樣：任何有效的超國家的政府和統制機關的發展，與國家保留意義充分的主權是衝突的。主權國家可以使牠們自己受條約的束縛，並且在許多世紀以前已是如此。但直到現在，尙未能借國聯或任何其他方式，想出方法強迫國家尊重牠們所參加的義務，或強迫牠們的行爲與國際的禮讓一致。除非牠們自己願意作這些事。國家的主權的稱義，就是國家不承認有比牠自己高的權威，雖然牠含糊的承認若干國際行爲的廣泛原則。對於這種原則，牠保留着牠隨意解釋的權利。

國家的輿論與國際的輿論

近來日本和德國退出國聯，以及經濟會議和軍縮會議的失敗，顯示出國家仍然認爲牠們自己國家的利益是處理國事的最高法律，雖然有牠們參加的國聯盟約和其他一切公約。無疑的，在少數國家內有很大一部分有國際眼光的輿論興起，這種輿論承認這個文明的世界是直向一個新戰爭走去，甚至這次戰爭的不可挽救的破壞性遠超過上次大戰，除非這個世界能有法克服了國家的自私和貪好大主權國家的榮譽與權力。但以整個世界而論，事實上無疑是族國主義情緒的生長比國際主義的意識快，並且經濟衰落的急迫更增加了國家的利己主義，因爲牠使國家的利己主義以眼前的經濟利益爲基礎。主權國家是自私自利的，並且是不顧世界的需要的。這不僅因爲常常帝國主義的冒險者

或黷武主義者緊握着光榮的慾望，或者甚至種族主義的狂熱者緊握着一個燃燒着的使命，而且也因爲一般人民易於依據國家的利益和觀念去運用思想和感覺，不容易依據全世界的利益和觀念。在一個充滿主權國家的世界上，而主權國家又受彼此衝突的國家的利己主義支配着。那冒險以國際態度行事的國家，必定有很大的危險，因爲不幸的是，協定須有兩方面，而引起爭執只一造就就可以了。正如同一國強加關稅和商業限制，以致其他國家不得不採行反動的政策，政治的利己主義亦同樣的在他處引起自衛的利己主義。軍備引起軍備。一個國家輕視國際主義，可以使他的一切鄰國對於保持和平的國際事業的價值懷疑。也許事實上在大多數國家中，多數人的意見是和平的。是不需要戰爭的；但在一種意義上。多數人一定不是和平主義者，即他們不會不願意他們自己的國家。在戰爭的準備上和其他國家一樣好。

所以，假如一個國家對族國主義發生了狂熱，一切其他國家的和平的人民就處於一種不利的地位。因爲，甚至九個國家同意削減牠們的軍備。假如第十個國家堅持全付武裝。或者甚至讚揚戰爭爲國家的美德的最高訓練基礎。這九個國家能否削減軍備？牠們不能削減軍備。除非牠們之中多數能互相信賴。團結起來。並且預備把牠們的削減後的武力作爲互相保衛之用。但在一個充滿主權國家的世界上。要得到這樣的保證。是極難的事。因爲在成立聯盟之後，決不敢說一定沒有改變。今天的友人可以變成明天的敵人。因爲國家的利己主義可以改變友敵的關係。甚至即使國家以互衛公約把牠們自己拘束到一塊。也很難相信這種公約在一切可以興起的情勢之下仍然有效。不幸。最容易得到的結論是，唯一的安全在使軍備至少與其他國家相等。

國家不能採行（牠們現在已實際採行）純粹利己的態度，除非多數人民的態度在這一點上擁護牠們。無疑的，有很少數國家（假如有的話），牠們的大部分人民實際要戰爭，但有幾個國家，牠們的大部分輿論認為，為破壞原來的國家境界的繼續維持，願意將來有戰爭。匈牙利和保加利亞就是如此，牠們甚至甚於德國。因為，根據一切可能的判斷，德國人是打算借許多國家的法西斯革命為工具，將德國的勢力伸入其他國家。他們很少想要擴張德國的實際領土。至少現在德國人不要併吞奧國；他們只要奧國入於國社主義的統治之下。他們確要得回沙爾（Sudeten），但他們完全希望不以戰爭得回。他們確要恢復波蘭走廊（Polish Corridor）；但甚至如此，他們亦是預備與波蘭人訂立一個公約，這個公約好像規定着十年內不准以武力恢復這塊地方。因為德國人心中的重併吞失地的願望，被其他原因壓倒。德國人希望看到與國社主義類似的政府，設立在歐洲的若干國家。並且因此德國的勢力擴展到歐洲的大部分。假如這種全盤一致化能夠完成，在他們心目中，領土的併吞至少在現在不是國家的一個壓倒的需要。

除去這些國家決意要以各種方式取消凡爾賽和約的裁判，在一切地方，不論主要的輿論是如何的厭惡戰爭，但都對國際的保障與義務深切懷疑，並且興起一種情緒，以為在軍備上和經濟政策上，每個國家必須注意牠自己的安全。國際聯盟的希望差不多衰落到極點；在這種情勢之下，甚至有些有名的國際主義者亦因失望而變為族國主義者。所以，假如民衆的感情是贊成維持主權國家，以及盡量不受國際的束縛，我們更不用驚奇了。在這些情勢之下，甚至保持和平的願望亦可以起了族國主義的作用。因為這時國際主義好像就等於擔負人們所不信任的義務，他們寧願孤立，希望能遠離了他們沒法阻止的爭鬪。

國際主義的展望

這種情勢非常的使一些人失望。這些人知道，國家孤立政策能使人民因誇大的經濟族國主義而受到貧困。並且能使人放棄任何積極制止製造戰爭的危險力量的企圖。假如每個強國只爲自己打算，並且列強之間又分裂爲有侵略心理者和保持靜默希望不捲入漩渦者。未來的展望對於小國確是可怖的。牠們的地位不足以獨自抵抗一個有力的侵略者或在整修軍備之下遠避開有力的侵略者。在這些情勢之下。這些小國大多不得不在牠們自己之間訂立公約，希望造成至少可以獨立而且有充分抵抗力的集團。但這類的集團不容易保持團結；因爲小國亦正和大國一樣。有妒忌、敵視、和互相衝突的野心，並且一個侵略性的大國很容易使牠們彼此間不和。小協約國在以前有一時期好像是這類聯合的最強者；但小協約國現在是在危險中。這由於牠內部的羅馬尼亞有發生法西斯革命的可能，和另一方面巴爾幹安全公約引誘羅馬尼亞和猶哥斯拉夫；這種危險將要更加強烈。假如國社主義的政變在奧國成功。並且根據一九三四年正月的德波公約，又因在皮爾蘇士基勢力下波蘭採行了更徹底的法西斯政治制度，於是德波二國和睦起來，以致捷克斯拉夫的一部分受了包圍。

看到國際主義遇着的這些困難，實在容易下一個必然的論斷：現在的國際團結一致，只是關於接受少數管理國際關係的國際法初步原則，訂立對於簽約國主權絕無限制的公約和條約，以及用緊縮後的國聯作工具，增進知識和推進有益的國際社會事務，如管理藥品的運輸和救濟遭難區域的飢荒。這個世界尙未成熟到有超過這些情形的任何方式的國際團結。在這些方面『改造』國聯的計劃現在已有，並且那些持這種見地的改造家的意見，不是要加

強國聯的力量，使牠成爲國際的統制機關，而是要藉放棄國聯原有職務中的較野心的觀念，藉以挽救少數有用的次要活動，使牠們不至於毀滅。唯一確好像要加強國聯的力量，使牠成爲國際統制機關的『改造』國聯的提議，是使國聯依照一個更『真實的』基礎重新組織一下，成爲一個列強聯盟（League of Great Powers），小國要打算加入，必須牠們預備在身分和勢力上接受一個斷然的次等地位。但甚至這個計劃，亦必須假定列強準備合作，才能算是『真實的』。

雖然，假如列強的態度確真正不同，並且牠們之間的不同點確有引起戰爭的威脅，使牠們合作的一切國聯改造，能否發生任何真正的效果？在現在的情勢之下，使國聯變爲列強間常設的會商機關。就等於實際毀棄牠，使牠成爲一個不能主張國際主義和完全在大國的絕對要求之下的機關。保持國聯的原狀，反比這樣改組牠好。因爲借着牠，大國和小國之間已能以比較平等的地位實行正常的會商。國聯的外交已較列強外交部的秘密外交進步了。

國際聯盟的將來

但是。設法保持國聯存在是否很有價值？現在的國聯是否不完全是——種虛飾？並且站在虛飾的地位牠現在是否因被人看穿而失去牠的價值？無疑的廢除國聯是困難的。因爲牠已負起很多的行政和監察的職務。而這些職務用其他方法不容易辦到。例如，假如廢除了國聯。『委任統治地』怎麼辦？這些土地是在凡爾賽和約之下從戰敗的國家拿來的，現在各個戰勝國根據國聯委任書治理牠們。並且委任書的條件確含有有價值的條款。一個國家負責治理牠的委任統治地，須以當地居民的利益爲前題；並且這個國家不得不在公衆眼前過得去。並且在國聯委任統治委員會

之前。報告牠的治理的職責。此外。委任統治地在國聯盟約之下確有『開放門戶』的原則。所以（例如）英國不能把牠的非洲殖民地和牠的委任統治地統一。使英國的貨物和資本在這裏享有優先權。這些原則值得保存。假如能够保存；但如果國聯不能繼續存在。這些原則能否完全保存得住？國聯消滅之後。是否委任統治地就簡捷了相當的合併與握有各委任統治地的列強的殖民帝國？是否這些列強立刻把施行於牠們自己的殖民地的行政原則。引用於委任統治地？

再者，現在在國聯治理或統制下的土地。如丹澤（Danzig）或沙爾（至少在一九二五年以前）。將要怎樣？或者，在國聯解散的時候，那些在國聯保護之下訂立的公約和盟約是仍保持有效抑是廢除？國際勞工局將要怎樣？國際常設法庭怎麼辦？只取消國聯而不以其他國際協定的方式繼續牠的大部分工作，一定是不可能的。但當國聯中的強國集議，要確定每項這類事務的工作，並且討論這種工作將來在何種保護和條件之下進行的時候，將要有怎樣的爭執？這些是至少須保存國聯結構的强有力的理由，假如牠能保存得住。

然而，如果國聯對於世界政治的大問題完全無用，牠很難照舊繼續下去——牠有處理問題的義務，而在現在的情形之下，牠對於這種問題完全沒有處理成功的機會。因為假如許可牠在現在的盟約下盡量有所作爲的繼續下去，在新問題發生並且引起另一個大國（或者就是義大利）隨德日兩國退出之前，還能有多久？但如果再有一個大國退出，國聯就不能繼續爲國際行政的主要的公認機關；因為義大利如退出，大國中就只剩下英法二國爲國聯會員，顯然其他大國不會承認一個僅包含這兩個國家的機關的權威。

實在，國聯還有藉蘇俄加入而增强的可能。但是，因為仍沒有德日二國，這很容易使牠從一個至少要作世界政
府的初步機關，變為若干國家的一個聯盟或公約，牠們團結起來為的是抵抗與牠們敵對的國家集團。或者這種聯盟
的成立是一種好事；但國聯變成這種聯盟，顯然是否認了建立國聯的表面上的原則。

雖然，蘇俄的加入可以使德國。甚至日久之後連日本都返回國聯，為的是避免這種聯盟成立的危險。但是，假
如德日二國都返回國聯，或者事實上將使國聯的目的降為純粹會商，失去任何前進的企圖，甚至失去最初的真正國
際統制的方式。因為，不論法國人（永遠在懼怕侵略中）和俄國人（熱望着能獨自在那裏努力重建牠們的經濟制度）
想怎樣利用國聯，我們很少能希望一個真正包括一切的國聯的行動，能超過那些最缺乏合作性的會員的合作志願。

所以國聯有失去牠的大多數職務的危險，這些職務曾使牠在紙面上成為處理重要國際問題的工具。並且還有一
種危險，就是，牠降低為另一方式，使很多的國家能接受牠，讓牠繼續牠的次要活動。這就是說，牠必須重新組織
一下。允許各強國共同為會員。而這些國家是實際從事彼此對抗的軍備，企圖發動一個可能的戰爭。在這種情形之
下，一切都明白，建立國際主義的整個工作必須重新開始——假如要建立國際主義的話。國聯這條道路確是行不
通了，並且人們或是承認牠的失敗，認為國際主義行不通，或是再另試其他路徑。

但是他們將要試什麼路徑？在承認國家的最高主權和國家的絕對權利之限制以內。沒有其他路徑。只要人們仍
然認為那許多把他們自己分隔的民族國家。是最後的政治組織方式。而且每個民族國家是一個獨立的武力倉庫。每
個民族國家宣布在牠的境域以內牠可以自由作牠所願作的一切。這樣。絕不會有其他路徑。因為只要若干國家可以

自由採行社會組織的方式，並且可以自由在牠們的人民之間獎勵侵略其他國家的心理態度。就不能有真正的國際安全，並且任何一個國家也不能逃避了保持軍備的需要。以備抵抗可能的戰爭。事實上，現在國際法的基本觀念，是每個國家在牠的領域內可以完全自由作牠願作的一切。這個觀念顯然對於一切走向真正國際主義的進步，都是衝突的。

集體安全

以上的理由好像一直引到一個沮喪的結論。就是。只要世界上有些國家對族國主義發狂，其他國家即不能採行任何裁減軍備的步驟，並且這些國家內的和平頭腦的人民，不得不把他們的活動限於勸一個無反應的世界彼此友愛，並且希望歷史自己不重演。槍砲不開火——這就是說。我們必須把裁減軍備和一切國際合作延遲到希臘之朔日（指永不能到來的時日。因希臘曆書無朔日——譯者）或延遲到社會主義的國家遍起於全世界，不論我們以為那一個日期較近。不過，在這種進退兩難中，有些人以為現在的一切情勢是走向一個全世界的新戰爭，並且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引起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文化的整個毀滅。這般人已努力在不通的路途中找出一個可能的出路——這條路徑終於牽涉到以各種方法創設國際武力，來維持和平。

他們開始先指出國聯的缺點，即我們已陳述過的缺點——不論原諒國聯的人怎樣說法，現在事實上牠顯然完全不是威爾遜總統所原擬的國聯。這更增加了牠的缺點。這個國聯永遠未包含俄美兩個最大的獨立國家（按此書為一九三四年出版，俄國已於同年內加入國聯——譯者），並且其次兩個大國已實行退盟。這樣的國聯不能稱為一個世

界的聯合。世界聯合的字義，合理的講，絕不是如此。現在的國聯主要是英帝國和法國組成的一個聯盟，外加上不熱心的會員義大利，以及一堆小國造成一般的會員。國聯的附屬活動，如國際勞工局或關於小問題的若干集會，已擴張得超過這些國家，但這並不能改變國聯的不能成爲一個全世界的政治力量。關於藥品的協定或防止運輸白奴隸的協定，或甚至委任統治制度，不論是如何的有用，都不足以創立或甚至開始創立一個國際的政治權威；並且，假如國聯的比較熱心的提倡者中，有些人能認識這個事實，至少能使關於國際問題的思想比較清楚一些。

提倡『集體安全』者的提案，實在就是說，那些爲了和平預備使本國武力方面的『主權』受真正限制的國家，應當把牠們自己團結起來，成爲一個公開的聯盟。——就是，這個聯盟是公開的，任何國家都可加入。這個公約或聯盟要包含着『一套互不侵略的公約，內中規定下侵略者的定義。仿照蘇俄和牠的鄰國已訂立的那些公約。但這些不侵略公約須超過規定侵略者的定義，進而在條文上規定互助的保障。所以每個簽字國依照條約必須幫助其他任何受攻擊的簽字國家，用聯盟國的整個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幫助牠。』

從這一點起有更進一步的可能。——即進一步同意創立一種公共的武力，受聯盟國家的聯合統制。這個擬議會有許多不同的方式。有的提議在國際統制下成立軍械『儲藏所』。儲存侵略性的軍械，保證只有聯盟共同抵抗侵略者的時候才可以用，有的提議實際共同經營聯盟國的（整個或一部分）武力，藉以硬這種武力成爲國際軍隊，不受各軍個國家之控制，而受牠們全體共同設立的政治機關的控制。此外。這種『國際軍隊』有時被認爲是由國家的單位組成的，有時被認爲是從各民族中混合抽出來的單位組成的公共武力，並且是在各民族混合的軍官們控制之下。

任何這類有深涉性的擬議中的方式，好像在現在極不容易找到許多國家接受並實行也。但這並未絕滅了向這方面進步的可能。很明顯的。國家主權的毀滅。到最後一步一定要牽涉到國家軍備的消滅；並且走向這個路徑的自相矛盾的第一步。必須包括暫時創設一種國際統制下的武力。但是。或者唯一一階段的，才可以達到這種『集體安全』制度。開始是在一個公開的國家合作的集體之間，彼此訂立不侵略公約和聯合保證抵抗攻擊的公約，並且只有訂立了這種公約之後，才可以進一步商討組織任何實際使軍隊國際化的制度的可能和便利。當然必須使這樣的一個聯盟繼續保持着，對於一切願意接受牠的義務的國家公開。並且在牠的條約中須保證，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任何簽字國都不能利用牠為幫助侵略的工具。

顯然的，這種擬議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有困難。除非無論如何，有大國家——例如至少須有英法和蘇俄——準備加入，作牠的中心。並且放棄了那必須放棄的牠們各該國的主權，這種擬議才可以完全實行。這一步不是十分不可能的，因為十九世紀的主權觀念或許因遇着二十世紀解釋主權觀念者所持的駭人的方式而減弱了。假如這一步可以辦到，仍有其他困難，即這種擬議並非立刻裁減任何軍備，假如這個新集團是要真正保衛牠的會員國，去抵抗侵略。真正的裁軍必須用累進的方法達到，如果加入的國家越來越多。

這類的聯盟（有引起實際共同經營軍備的可能）在過去幾年所討論的無數和平計畫中，好像是唯一仍值得研究的計畫。但是，甚至這個計畫——或者實在說，是任何種國際主義的任何計畫——亦必定與國家感情的力量發生尖銳的衝突。除非這種感情能大大的減弱或者使牠轉變了方向。這個問題不能有答案。以任何正面的攻擊使牠減弱，

是不可能的；因為事實上在危機的時期，沒有另一種忠心能抵得住人們心目中的族國情緒。所以，唯一的希望不是對族國主義作正面的攻擊，而是引誘族國的意識運用於另一個不同的路徑。

社會主義與民族

在這裏。我們必須注意到共產主義的『勞工無祖國』的見解。牠說。因為無論在什麼地方勞工都是一個被剝削的階級，並且在資本主義之下各個國家都不是屬於他們。而是屬於那些購買他們的勞力作生利工具的人們。一八四八年的共產宣言宣布了這個理論。牠爲了反抗對於國家的忠心，樹立起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國際的忠心和團結一致。一切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多少都是以國際友愛的觀念爲基礎，並且社會主義者永遠反對國家的軍事侵略性。但除去極端左翼的社會主義運動以外，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理論是國際勞工階級的團結一致，抑是全人類的友愛，永遠不十分清楚。雖然，這兩個理論可以引到很不同的實際結論。假如這個運動的基礎是全世界勞工階級的團結一致。那麼就必須建立一個超國界的世界勞工政府，一切國家的工人都將受牠的領導。甚至是去反對他們的民族國家的要求，或者也許是去反對他們的國家的經濟利益。在另一方面，假如牠所宣布的是不拘階級分別的全人類的友愛，這個政策就成一個純粹和平主義的政策——拒絕從事戰爭，不論這個戰爭是爲了促進或妨礙社會主義運動——或者，如果不是這樣，成爲每個國家的活動的政策。藉裁減軍備，締結不侵略公約，和建立積極的經濟關係，得到和平的合作。所以國際勞工階級團結一致的見解是世界革命的政策，但人類友愛的見解是在現在的國際制度之間促進和平的合作。

實際上，除去共產黨以外，大多數社會主義的政黨都依靠訴之於主要為第二種方式的國際主義情緒，並且是以全人類的友愛而不是以全世界勞工階級的團結一致為他們的政策的基礎。他們確承認一切國家的工人間，有一種特殊的共同利益，並且承認勞工階級與保持和平的特殊關係，但他們大多數絕未曾進一步至於宣布工人無祖國，或完全棄絕任何特殊的忠心。（假如工人對於他們自己的國家沒有忠心，至少對於他們的國家現在所代表的民族團體有忠心。）

我們要記住，在一九一四年，多數英、法、德的社會主義黨全集合在他們自己的民族國家那方面。義大利的情形不完全如此，因為義大利的社會主義者有長時間的奮鬥，要保持義大利不參加戰爭。俄國的情形亦不是如此。在俄國，社會主義的行動不能像議會制下的一種勢力，他感覺不到對帝俄政體有任何忠順。但是，甚至在俄國，這次戰爭分裂了社會民主黨人——甚至分裂了布爾什維克派。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此外，在一切交戰國，在反對戰爭的人中，有許多人的反戰態度不是以社會主義為立足點，而是為了和平主義——例如英國的獨立工黨。布爾什維克黨人——除去普雷卡諾夫（Plekhanov）領導下的一小部分——確是以真正的社會主義為理由，完全拒絕給「帝國主義的戰爭」以任何種幫助。但差不多他們是孤立的。

事實上，在任何國家內，一個在議會制度下工作的議會社會主義政黨，確不能完全否認族國主義的要求。而致自絕於作一個議會制下的勢力。只用宣傳不能從人心中或勞工階級的心中除去族國情緒；並且，當工人們能够被人誘致着相信『民族』是處在外國侵略的威脅中時，舉述工人在資本主義下受剝削的事實，亦不能立刻引起他們的國

際團結一致的情緒，來抵抗他們的國家意識。在一九一四年，德國的、法國的、和英國的勞工階級，都相信有這種受侵略的威脅存在，並且都擁護他們自己的政府。他們的理由是說，這次是國家自衛的戰爭。無疑的，這同樣的情形會再發現，甚至雖然現在反戰者的數目或許較一九一四年大得多。因為只要資本主義的政府當權，並且控制着宣傳工具，牠們不會不知道用這些工具，使人民相信他們是爲自衛而戰。並且在任何新戰爭中，所爭執的問題大半不會如此的明顯。至於一方面明顯而簡單的是侵略者。另一方面獨佔了和平的美德。

在這些情形之下，只能培養忠於國際勞工階級的意識。至少要使這種意識在人心成爲一個有力的勢力。即使在戰爭實際爆發時，牠不能壓倒國家的情緒。要使工人的心情變到不輕易允許『他們的』國家攻打其他國家。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勞工階級當政的國家。要阻止多數工人不保衛『他們的』國家，不論這個國家是如何的資本主義化，亦是不可能的。如果他們相信這個國家是受侵略的犧牲者——至少在運用議會制的國家這是不可能的，雖然在不以議會制度爲基礎的國家或許可能。假如這個國家在牠的境域內已積有一個不滿現狀的危險的無產階級。

以前所述並不是說，多數工人起初集合在國家之下的戰爭，後來不能轉變爲反抗國家的革命。但如要對外戰爭變爲對內革命，必須族國情緒因政府領導戰爭的方法，或者因實際戰敗或戰敗迫在眼前，而完全脫離了政府，並且因此轉向革命方面，變爲階級情緒的聯盟。而不再是階級情緒的敵人。在這種情形之下，革命將爲一個國家的革命，目的在改換一個不同的國家制度，因爲舊制度已不爲人信任。這個革命運動將不能勝利，除非牠能在人心中使牠自己與『世界的勞工』的利益相合之外。同樣須和國家的真正利益符合；並且革命成功後立刻遇到的工作，就是建

立新的民族國家。

這就是說，階級的意識事實上不能奪佔了族國主義的地位，成爲政治行爲的根本動機。我們所需要的是使階級意識表現的形式，與族國情緒的需要一致。社會主義者只宣布他們在任何情形下都不爲他們的國家打仗，是無用的。這樣的一個宣言是一種和平的呼聲，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呼聲。事實上，凡不是絕對和平主義的人，都必須準備作最後的戰爭；而且他們是假定準備爲社會主義而戰爭，譬如說，爲保衛已成立的社會主義的經濟，抵抗對於牠的攻擊。當他們說（例如）他們不『爲皇帝和國家』打仗，那假定的意思是說，他們不以爲爲現下的民族國家打仗，能成爲爲社會主義的奮鬥，並且在非社會主義國家間的任何戰爭中，他們站在社會主義的立足點。不參加戰爭。但是，假如在一個戰爭中，一個非社會主義的國家加入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線，去抵抗幾個極其反對社會主義的國家的聯軍。在這種情形之下將要怎樣？例如，如果英國、法國、和俄國聯合起來攻打德國、義國、和其他法西斯主義的國家。英國的社會主義者是否將認爲在這種爭鬪中。他們不應當參加？他們或許悲傷的惋惜戰爭的必要，並且盡力保持和平直到最後一刻；但當戰爭到來，除非他們是絕對的和平主義者，他們一定是預備參加？

雖然，這當然純粹是一個假設的情勢。舉出這一點來。只是指出除非社會主義者是絕對的和平主義者，他們概括的宣布無論在任何情形下他們都不願意戰爭，是一種不智。因爲他們這種作法，表示他們採取了一種的態度，而這種態度一定要被人誤解並且失去擁護。並且這種態度絕未表明他們爲他們自己盤算清楚。讓社會主義的宣傳盡量注重保持和平的極端重要性。讓牠注重在找出一個超越國界的國際合作的共同政策，並且使一切國家的社會主義運

動必須奉行這個政策。讓牠去對一切人說明社會主義者的建立一個統一世界的意向，並且這個統一的世界是以民族的集團為基礎。這種民族集團雖然保持着牠們的內部的自治，却承認彼此間有一個共同的責任。但是，在這些集團遇到危急的時候，社會主義者是否將使他們的宣傳方式，表明他們敵視一切方式的國家情緒，或表明他們的願望只是要在建立統一的全世界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忽略並且廢棄了一切國界？

有一件事很重要，即蘇俄近年來承認牠境內的許多民族的文化和政治的要求。在這一點上，蘇俄超過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舊日的帝俄是一個統治着許多種人民的帝國；但蘇聯在事實上是一個大部分為民族自治共和國組成的聯邦。借着在蘇聯的容納性的聯邦內承認族國主義，共產黨人才能使極大範圍的族國情緒，來到他們這邊；並且很明顯的，除非他們能集合了這種情緒，來加強階級的團結一致，他們的國家很難經過已往十六年中的一切困難而穩固的存在。我們不是說，蘇聯已完全解決了國內少數民族問題；因為在俄國和在他處一樣，民族的情緒仍然能在經濟恐慌刺激之下，起來反抗已成立的政體。如同在近來的農業集體化的期間，在烏克蘭（Ukraine）和若干其他區域中之好像已發生的現象。不過，俄國對於融合蘇聯以內的許多不同的民族，有驚人的成就。牠設法使牠們成爲一個和諧的聯邦，以承認一切方式的族國主義為基礎。在這些方式中，族國主義可以找到發洩的出路，不致引起種族與種族對抗，或邦與邦對抗。

以全世界而論，社會主義者不得不在現在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結構內進行，他們要能成功，必須把他們的目標變爲在各自的國家內，使社會主義勝利。每個社會主義的政黨都必須制定一個政策，和牠自己國家的情形適合，並且

和國家的感情狀況一致。但是，一個社會主義政黨的天職，是使這種政策與主要為國際主義信條的社會主義的需要適合。所以牠必須設法領導牠自己的國家，與其他任何社會主義當政的國家，在經濟和政治上密切合作。並且牠必須對一切敵視社會主義運動的行爲，作有力的抗議。牠必須繼續不斷的揭發牠自己的民族國家的一切帝國主義的和侵略性的意向，並且藉這種工作，設法使正統的族國情緒和走入邪途的帝國主義分開。牠的工作是以一個國家的政策爲基礎，而這個政策的結構，是在國際方面與其他社會主義的政黨調協。所以牠必須從事於建立國際主義，而同時不否認國家的合法的要求。

在作這些工作之中，最重要的是牠必須使牠所舉起的族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根據一個確切的社會主義的基礎。在國際方面，牠必須不是主要訴之於人類的友愛，（除去認爲這是必須在另一個社會制度下方可實現的理想）而是訴之於一切國家中的社會主義者的友愛。牠必須不以含糊的人道主義爲滿足，而必須積極的扶助社會主義，使牠長成一個世界的力量，並且拒絕使牠的運動關閉在各個民族國家的範圍以內。但和這種在國內事務上取國際態度相關連的，不是否認族國主義，而是訴之於勞工階級，使他們領導着去創立社會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必須指出，人心中有有一種國家精神存在，使人覺得他自己是國家社會中的一員。即使這個社會是以剝削他們爲基礎。他們須指出，唯有在一個已沒有那分裂同國人爲敵對階級的剝削制度的國家，這種精神才能得到滿意的承認。社會主義者必須使人覺得，唯有用社會主義，族國主義的要求才能立刻與世界大同的忠心的要求相遇合並且互相調協。

我們承認，把這些概括的見解變爲積極的政綱，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一個社會主義的運動如果不能把

這些意見制爲政綱。牠就有在勝利之前夕被族國情緒的波浪掃除的絕大危險。因爲假如牠不能把這種情緒集合到牠這方面，社會主義的敵方必定就把族國主義集合到牠們的旗幟之下，來保衛階級的特權。牠們知道如何給這種特權穿上復興國家的外衣。德國的社會主義就是這樣失敗的。德國的社會主義領袖有兩次大錯——或者可以說，他們先犯了罪惡，以後在恢復局勢的企圖中又犯了過錯。他們的罪惡是在一九一四年擁護德意志國家，雖然德國的統治者至少和他們的敵人同樣譴責戰爭的爆發。德國的社會主義的領袖不能幫助牠們的民衆信徒不被國家情緒捲去。不過，他們應當反對戰爭，同樣像英法二國的社會主義者的應當反對戰爭。因爲我們以前的一切陳述完全沒有說，如果他們不能以社會主義的方式得到國家情緒的擁護，他們就可以在後面追隨着國家情緒，雖然他們把這種情緒集合在他們這方面是一件重要的事。在一九一四年犯了這個罪之後，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接着在一九一八年又犯了一次錯過。在一九一八年的德國革命中，德國人的受了挫敗的國家情緒正在尋找出路；但他們在維瑪共和國的怯弱的妥協中找不到出路。當國家情緒可以變成社會主義運動的聯盟的時候，德國的社會主義領袖又不敢訴之於這種情緒，雖然只有一個方法能使這種情緒來幫助社會主義工作，而且這個方法就是勇敢的發動社會主義的革命。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在一九一四年族國主義的氣味太重；但以後在轉向國際主義之中，他們變爲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的盟友，而不會變爲好戰的社會主義的盟友，並且他們自己失去了最有力量的力量。這種力量或許可以站在社會主義的戰綫上替他們作戰。

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者要以此爲警戒。假如他們的國際主義只是和平主義，並且不領導着他們企圖在他們自己

的國中，勇敢的建立社會主義的制度，族國的情緒就要走到反對他們的方面，並且把他們掃除了，雖然他們對於階級團結一致有種種的呼籲。唯一打倒民族國家的主權的方法，是借着牠的工人階級人民的族國情緒和階級情緒從國內克服牠。

第三章 帝國的國家

我們現在的時代，是所謂『帝國主義時代』，或者更明顯一點說，是『經濟帝國主義』時代。這個意思就是：特別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歐洲的先進國家已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隨後日本亦發展到這個階段，並且美國亦有較輕程度的發展。在這個階段，這些國家在經濟方面必須在牠們自己的領土以及在彼此的領土以外，不僅替牠們的剩餘貨物找市場，而且須替牠們的數量日增的資本找投資的出路。這種經濟的壓力引起積極尋找新市場和可能的獨佔市場，尋找未開發的地域讓與牠們來開發，尋找在老國家不能得到充足數量（假如能得到一些）的原料，並且因本國利息低落的趨勢，設法把資本借給較貧的國家，使剩餘資本得到較高的利息。

在這種帝國擴展的程序中，列強在過去半世紀內，把以前所未征服的土著的土地盡都分配了。非洲的獨立實際上已消滅了；並且歐洲列強除去早期在亞洲吞併的土地以外，另外又得到很大的區域。必然的，這種程序引起很大的競爭，並且使列強間永遠不和協。列強尖銳的競爭着，要得到那最適於佔有的土地。一九一四年以前，有一時期歐洲的歷史上夾雜着所謂『事件』——法索達（Fashoda），阿格得（Agadir）等事件——都是起於這種競爭；這類事件是使列強間最易發生戰爭緊張的根源。在一九一九年戰勝國以『委任統治地』的方式，分得德國的殖民地的時候，牠們完全未認為這種事不正當。

現代資本主義引起這些結果，是由於繼續增加的尋找新市場和原料來源的壓迫，以及由於資本主義生產的性質

的改變。十九世紀前一半的資本家不是帝國主義性的，因為他們所要出售的貨物，主要是已成的消費貨物。大量的生產尚未應用於製造生產工具；並且資本家在老國家內尋找投資的出路，完全沒有任何困難。但因為積聚資本的速度增加，往海外投資的需要就增加了，為的是不使國內的資本市場供過於求。生產工具的大量生產，使海外投資成爲一件可能的事。因為生產工具能大量生產，所以不僅可以售給落後國家紡織品和其他消費貨物，並且可以售給牠們鐵路、造船器械、工廠和鑛用的機械，以及其他許多生產工具。在這種交易完成之後，很明顯的，購主不能立刻付款；因為須到利用資本把國家開發了並且增加了國富和國家的收入以後，才可以償還資本。所以先進國家的資本家變爲落後國家的鐵路主人、公用事業和工業工廠的主人，並且也是落後國家的大債主。這種落後的國家把這款項分用於建築鐵路以及推進其他促進國家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事務。

這類的放款必然的引起先進國家的政府『參與』落後區域的統治，目的在保護牠們自己的資本家的投資。一個國家的『本國人民』在海外的投資，使該國家對於所投資的國家的事務發生關係，尤其是假如『負債國』在經濟上落後，並且不被認爲一個充分開化的和獨立的國家。先進國家假借着法律、秩序、和安定政府的名義，日多一日的干涉並控制落後區域的統治者。有時候把他們變爲木偶，有時候把他們驅逐出去，並且吞併了他們的土地。在部落組織而不是在國家組織之下的區域，結果常是完全的吞併；但在有較充分的國家制度的地方，就有許多不同程度的帝國主義式的控制，從實際吞併以至於在一個在名義上獨立的國家取得公認的『勢力範圍』。每個強國漸漸都有了牠的『勢力範圍』，正如牠有已吞併的或『保護』的殖民地；並且在永遠擴張的國外投資所造成的情勢之下，這個

世界日多一日的劃爲這種勢力範圍或積極的控制。美國一直到一九一四年之前，頗能避免經濟帝國主義，因爲牠國內仍有極多投資的出路。但就是美國，亦已開始在夏威夷(Hawaii)、古巴、菲律賓羣島、以及其他少數土地上建立一個帝國。不過，美國的政治輿論對於這種發展頗爲猶豫；並且美國仍保持爲一個不確實行帝國主義的擴張土地政策的一個強國，但牠同樣的爲此決定在美洲大陸上，使美國的勢力取得優勝，並且在對其他列強的關係上，除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的純政治解釋以外，又給了她一個經濟的解釋。

當一個主權國家變爲一個帝國的中心時，新的政治問題就發生了。與原來國家的內部政府問題並立着，發生了在這新土地上採用什麼政府方法的問題，以及這些土地和原來的國家的關係問題。帝國當然可以由很不同的方法興起，並且帝國的屬地的性質可以彼此有很大的不同。從來沒有一個國家能不藉征服而變成帝國；但帝國如何發展，却大部分繫於被征服的土地的性質、人口密度、和文化典型。

現在的帝國

現在的一切帝國，除英帝國之外，俄國及中國不能再適當的認爲是帝國。——都是一個文化高的國家統治着主要爲文化落後的人民所佔據的若干土地。法國人握有非洲北部和中部的 대부분、中國南部與印度之間的一塊廣大的土地、馬達加斯克(Madagascar)、以及許多較小的屬地。荷蘭人握有入口稠密的東印度羣島、爪哇、蘇門答臘、以及其他在亞洲和南美洲的屬地。比國人握有非洲中部的廣大的崗高(Congo)地域，現在公認爲這是治理最善的殖民地之一。義大利人握有來比亞(Libya)、非洲北部的大部分(但主要爲沙漠地帶)、其他在紅海上的非洲屬地、

羅茲(Rhodes)和若若愛琴海的小島、以及達爾馬西亞(Dalmatia)的若干沿海城鎮。西班牙人的大帝國現在只剩下非洲西北部很少的屬地。葡萄牙人在非洲南部保有很大的區域，並且在他處尚有少數小的屬地。丹麥仍握有格林蘭(Greenland)，並且在同一皇帝之下，與現在的獨立的冰洲(Iceland)聯合起來。美國握有夏威夷、菲律賓羣島(暫時的)、亞拉斯加(Alaska)、和其他一些太平洋上的小島。最後，日本握有台灣、高麗、薩克林(Sakhalin)的一部分(即庫頁島——譯者)，並且實際上佔有滿洲和熱河，並且正威脅着蒙古和華北的其他區域。除去愛爾蘭近來部分的脫離了與大不列顛的聯合，冰洲爲獨立國，亞拉斯加實際是與美國分離的一部分地方，以及義大利在歐洲和愛琴海的屬地以外，以前所述的這些土地，每個都是由文化進步的國家來統治歐洲人眼光中認爲文化落後的人民的例子。現在，在理論上，歐洲沒有屬地。帝國的屬地按照定義幾乎是指歐洲大陸以外的屬地，和白種人的國家統治下的棕種人、黑種人、和黃種人(日本除外)的土地。

主要的帝國

不列顛帝國 (人口以百萬為單位)

英格蘭及蘇格蘭·····	46
自治領·····	30
愛爾蘭自由邦·····	3
加拿大·····	10.5
紐芬蘭·····	0.3
澳大利亞·····	6.5
新西蘭·····	1.5
南非聯邦	
白種人·····	1.9
有色人·····	6.4
印度·····	356
英屬印度·····	274
土著國·····	82
其他屬地·····	60
在非洲的·····	42
在美洲的·····	4
在亞洲的·····	11.2
在歐洲的·····	0.3
在海洋洲的·····	0.4
委任統治地·····	9
屬於英格蘭及蘇格蘭的·····	7.5
屬於自治領的·····	1.3
	501
總計	501

不列顛帝國

不列顛帝國與其他一切帝國都不同，因為牠所包含的巨大的地方，除去廣大的普通種類的屬地以外，現在大多

其他帝國	(人口以百萬為單位)			
	本國	殖民地	委任統治地	總計
法蘭西	42	59	6	107
荷蘭	8	62	—	70
日本	66	28	(滿洲為25)	119
合眾國	125	15	—	140
比利時	8	10	4	22
葡萄牙	7	8	—	15
義大利	42	2	—	44
西班牙	24	1	—	25

爲白人所居住，並且是由白人的國家統治着，以不列顛國家的方式，或者至少是以歐洲的國家爲模範。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紐芬蘭都是白人的國家。在這些國家中，那存留的原來的本地人已降到完全無足輕重的地位，並且已不能再成爲一部分可以辨別出來的居民。南非聯邦的地位就不同了。牠是一個白人的國家；但在這裏，是白人統治着多數黑人，他們否認黑人有政治權利。不列顛帝國內的這些白人的國家，其中有一些現在自己又變成帝國，即在大戰後從德國取來的委任統治地。澳大利亞有了新歧尼（New Guinea）委任統治地，新西蘭有了沙摩亞（Samoa），南非聯邦有了非洲西南部。帝國內又有帝國，於是更增加了糾紛。

統治白人的國家，不能和統治被認爲『未開化的』人民的土地用同樣的方法。大不列顛在十八世紀失去了牠的殖民地的大部分，就是因爲牠要使牠的殖民地都臣屬於牠；但牠在十九世紀沒有再犯這種錯誤。牠允許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聯邦，經過代議制度後升到責任自治政府；並且紐芬蘭亦是如此。雖然紐芬蘭因爲腐敗又滑下去，以致牠的公債票持有人勸說大不列顛。在紐芬蘭置一個『破產管理人』。各自治領，包括愛爾蘭自由邦在內，實際上都是獨立的國家，牠們與大不列顛的連繫，只是一個共同的君主，以及在對外關係上有共同行動的一種概括的義務。除愛爾蘭仍在大大不列顛的經濟壓迫之下。大大不列顛和牠的自治領間的連繫，實際上現在是以同意與利益爲基礎，並非以『母國』手中的任何強制權威爲基礎。沒有人懷疑加拿大的或澳大利亞的或南非聯邦的脫離的力量。雖然或許認爲這種力量的作用不在目前。軍備是費錢的；並且現在大大不列顛擔負着最大部分帝國『軍備』的費用。

印度的人口和面積遠過於世界上任何屬地。實際上，對待他不能完全像對待有色人居住的較小的屬地。大不列顛，或者可說是不列顛東印度公司，能在十八世紀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是因為印度是分裂的；但是，如果印度統一在脫離大不列顛的意志之下，再要使牠臣屬於大不列顛就不可能了。所以不列顛的統治者至少必須和一部分印度的意見妥協，並且保持着印度的不統一，藉此好統治牠。

保持印度分裂是比較可能的，因為印度是一個半大陸，不是一個國家，並且包含着許多說不同言語的人民，他們在宗教上和生活觀念上有深刻的分別。此外，大不列顛又不直接管理全印度。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土著國家』，大多是在牠們自己的統治者之下行地方自治。雖然最後一步永遠不能越出不列顛的干涉。土著的統治者感覺在不列顛統治之下，比遇到一個有力的民族運動。他們的王位更穩固，所以他們普通都傾向不列顛；英屬印度的較富的階級亦是如此，並且一些在印度世襲社會階級壓迫之下被逐的人亦是如此。回教徒也有時候幫助英國人抵抗印度教徒（Hindus）；並且大不列顛一向能使本地的印度軍隊在英國人的領袖之下，對不列顛忠心。不列顛允許印度有代議制度，這個代議制度是以狹窄的選舉權為基礎，並且是漸次擴展；並且把許多內政上的事務交與印度的官吏，這些官吏隸屬於所謂『省制』（Dyarchy）下的大臣（Minister）。但英屬印度的基本文官制度，仍然要握着印度的行政；並且最後的政策統治和軍隊中的直接行政，仍保留在英國人手中。一個統一的印度可以強索牠們願意要的任何改革，甚至要完全的獨立，沒有人能阻止牠。但統一的印度現在尚不能實現；並且許多印度的族國主義者不願英國完全撤回，因為他們恐怕那樣印度就要分裂了，或者發生了不幸的內戰。這些印度人要求在不列顛帝國以內有『自

治領地位』——就是。在一個統一的印度憲法之下，有一個完全自治的政府，牠的力量足以把印度保持到一塊。但是，在這種計劃之內，土著國家的地位將要怎樣？

殖民地的政府

我們已知到，不列顛帝國與其他一切帝國不同；牠包括許多居民為歐洲世系的實際獨立國家，並且印度的立足點與其他任何在外國統治下的國家不同。除去這些很大的例外，不列顛的殖民地和屬地與其他國家的帝國屬地同一典型，並且管理的方法亦頗相同，都是在對本國政府負責的殖民地總督管理之下。在較進步的區域——例如西印度——就有一個當地居民的會議。這個會議一部分是根據一個相當擴大的選舉權選出的，一部分是委任的。但在大多數殖民地中，雖然有會議，牠們的人員主要是官吏，並且那由選舉而來的人員，主要或甚至完全代表少數歐洲居民。保護國大多仍是在本地的統治者統治之下。統治國的官吏對於他們的活動的監督權，有程度高下的不同。近年來。帝國的列強漸漸多利用這種至少含有民選人員的會議。來治理牠們的屬地，並且常常說這是走向殖民地自治的一步。不過，確切一點說，這一步是使白種移民有剝削本地土人的更大的自由。

這件事大部分要依賴兩個變動的因素——當地居民的密度，和這個地方對於白人移民的適宜性。在氣候情狀不適宜於帝國的本國公民移來居住的地方，白種居民普通包括有官吏、兵士、商人、和本地工業的白人監督。歐洲列強的大多數殖民地都是如此。這些殖民地大多只有一小部分居民是歐洲的世系。在這些情形之下，經濟的發展必須以本地的人力為基礎；除去在有鑛產可開發的地方，所謂經濟發展以本地人力為基礎，常常就等於說是增進本地的

生產方法。特別是在已密住本地農民的地方。奈基利亞 (Nigeria) 是這類屬地的一個好例子。在另一方面，肯亞 (Kenya) 的人口稀少，並且有一部分地方的氣候適宜於白人居住。於是有一種積極的運動，爲了不列顛的殖民的利益，要使土地脫離了本地人的佔有。在馬來亞 (Malaya)，這種同樣的事發現的更早。在馬來亞有很多的中國移民和其他外國工人在鑛中或田地上工作。稠密的人口使歐洲人的獲得土地有了限度；但歐洲的殖民和鑛主永遠是依賴着本地人力，並且在本地人不願在歐洲式的訓練之下工作的時候，就常常施用強制手段，這種手段的方式幾乎實際使他們變爲奴隸——以強迫的『勞力契約』的方式爲掩飾，這種契約是長期而條件難堪的——以至於用間接的強迫，其方法是壓迫本地的首領。或給他們加上茅屋稅，本地人如不能替白人工作得到工資，就不能納稅。在過去十年中，國際聯盟在委任統治地和未被公認爲完全『獨立自主』的某些國家，如來比利亞 (Liberia) 和亞比西尼亞 (Abyssinia)，把這些情形中的最壞的稍加修正；但剩下的需要作的工作尚極多，因爲在國聯委任統治下的區域以外，現在尚沒有有效的企圖，來處理各帝國的正式屬地的情形，雖然近年來極多的殖民地 and 屬國的行政已有些改進。

帝 的 移 民

大多數帝國主義的國家，都設法鼓勵牠們的人民移居到牠們的帝國。但在氣候上和經濟上都便利的土地，範圍並不大；並且歐洲移民的主要潮流是流向合眾國、加拿大、南美洲、以及居民大部爲歐洲種族的其他國家——當然受這些國家的移民律的限制。有些區域（例如肯亞）已有大規模的印度移民；讀者尚記得因在南非用契約印度工人，發生了很大的『有色工人』的爭執。這次爭執終止了用契約工人，並且使甘地成爲一個民族的領袖。居民大部

爲歐洲人的國家，普通都強烈的拒絕由生活程度太低的國家來的大批工人移民，尤其是亞洲人。合衆國和加拿大嚴厲的限制亞洲的移民；澳大利亞的政治，好幾代都是以保持『白人的澳大利亞』的政策爲中心。雖然事實上澳大利亞大陸的大部分顯然對歐洲的移民很不合適。澳大利亞的工人正確的感覺到。不論起初加在亞洲移民上的條件怎樣，日久以後，亞洲的移民必然會破壞了澳大利亞的高生活程度。因此他們時時懼怕日本擴張；因爲日本的土地已分爲很小塊的租地，並且滿洲對於大批的日本移民是否適宜，仍是很可懷疑的。

帝國主義者的擴張

已往的五十年主要是帝國主義者作大規模擴張的時代。歐洲國家的瓜分非洲，主要是在一八八〇年以後實行的。除來比利亞以外，剩下亞比西尼亞爲唯一獨立的非洲王國（現在已不是——譯者）。來比利亞是在一八二二年到一八四七年之間又經美國的黑人移來居住，在一八四七年正式成立共和國。埃及現在亦列爲獨立國之一；但牠在成爲土耳其帝國的一部分之後，有很長一個時期牠實際爲不列顛的保護國。一九一四年後正式宣佈爲不列顛的保護國。在一九二二年牠在名義上成爲獨立國。但仍多受不列顛的統治。同時蘇丹(Sudan)在名義上爲英屬埃及。實際上就是不列顛帝國的一部分。法國從牠早先在阿爾基瑞亞(Algeria)的殖民地擴張起來，成爲非洲北部的領袖國家。差不多共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非洲人民。大不列顛有四二、〇〇〇、〇〇〇人（南非聯邦除外），散布在非洲大陸上很廣大的一部分。比國有一四、〇〇〇、〇〇〇人。葡萄牙有九、〇〇〇、〇〇〇人。義大利不足二百萬人。西班牙不足一百萬人。列爲最後。帝國主義者在非洲的擴張。是以牠的最簡單的最徹底的方式表現出來的。

亞洲的問題更複雜。在過去半世紀，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有很大的擴展。但能認識這一點的人並不多。在一八八四年到一九〇〇年之間，大不列顛曾吞併了上緬甸（Upper Burma）和牠的三百萬人民，並且又從馬來亞取得五十多萬人。法國在亞洲得到一三、〇〇〇、〇〇〇以上的人口，俄國得到三百萬以上的人民（滿洲除外）。但帝國主義者在亞洲其他地方忽然停止吞併人民；因為中國太大，不能吞下去，並且，除滿洲和法屬印度支那（Indo-China）以外，帝國的列強在海岸附近有『租界』和『租借地』，再加上經濟的侵入，牠們不得不以這些為滿足。日本在一九〇五年對俄戰勝之後，在滿洲得到優越的勢力，並且在一九一〇年吞併了高麗。台灣早在一八九五年日本已從中國奪去。在世界大戰以前，歐洲列強和美國在『銀行團』的貸款協定之下，以共同的步驟對待中國；並且這在一九二〇年又正式復活。在一九一二年中國發生革命，成立中華民國，並且在世界大戰之後，以獨立國的資格加入國際聯盟。但近來日本獲奪了滿洲，表示出國聯無力保護中國的主權；並且中國的華北各省現在有受日本進一步的侵略的危險。不列顛的利益主要在香港和華南以及從上海起的長江流域。法國的利益是在西南部。俄國在華北遇到日本，在蒙古日俄二國互爭勢力。共產黨的勢力在中國亦很大，並且在東南部和中部幾省，中國蘇維埃共和國正與南京政府作戰（現在這幾省已無戰事，亦無所謂蘇維埃共和國——譯者。）

德國在大戰之後丟去了牠的殖民帝國，戰勝國以國聯委任統治的方式，把德國的殖民地瓜分了。差不多凡可以吞併的土地都被列強取走了，現在已沒有多少可以爭奪的土地，除非一個強國能逐出另一個強國。德國要恢復牠的帝國，但沒有以同意得回的機會。義大利的帝國在歐洲列強的帝國中是最小的，並且是生產力最低的，所以義大利

對於牠自己的地位極不滿足；但已沒有牠可以擴張的空地。義大利願意得亞比西尼亞爲保護國，並且甚至想奪取較小的國家的殖民地。法國近來漸多注意牠的較大的殖民地的經濟發展，並且注意以貿易的方法對牠們建立起經濟的關係。但是，除阿爾基瑞亞以外，法國本國的出產和牠的殖民地的出產不能互相補助，成爲彼此交易的基礎，並且殖民地的出產沒有迅速的發展。大不列顛在一九三二的渥大瓦（Ottawa）協定之下，已成立了一個普通的帝國貿易優先權制度。無須根本改變一向的貿易趨勢；因爲不列顛的工業需要一個世界市場。並且不列顛的自治領和殖民地必須把牠們的大部分食料和原料賣到不列顛帝國以外的地方。大不列顛不能吸收牠的帝國出產的麥子、羊毛、茶葉、或橡皮的供給；並且自治領規定牠們自己的工業較大不列顛的工業有優先權。印度通常有四分之一以下的出口貨是到大不列顛。百分之十以上到日本和美國。不列顛帝國的需要和出產是種類最多的，但甚至對於不列顛帝國，帝國經濟自給（Autarkie）亦是一個不能實現的夢想。

帝國主義的擴張引起帝國的敵對。列強爭奪土地、勢力範圍、貿易和工業用的租界。牠們扶助牠們的商人和金融家。這般金融家要想使資本出口到發展落後的國家，尋求較高的利息。其他的帝國忌妒大不列顛。大不列顛的帝國建立最早。並且吞併了最有利益的區域。再一次歐洲大戰或可以引起大批的重分配殖民地。假如大不列顛亦牽涉在內。印度或者要失去。但現在主要的帝國侵略者是日本。這是受了人口壓迫的刺激，和牠的迅速發展的工業需要擴張市場的刺激。日本的目的是要在整個遠東作霸主。誰能說何處是牠的野心的止境？日本的聲勢在亞洲增得很快，同時歐洲列強的聲望在亞洲已降低，特別是在國聯處理滿洲事件失敗之後。當國聯譴責日本的時候，暹羅的代表

幫助日本拒絕贊同。這一點值得重視。澳大利亞的尊重不列顛帝國。主要是以不列顛帝國為抵禦日本的工具。中國徘徊於培養歐洲的輔助、接受俄國的勢力、和對日本妥協的三條路上。日本的勢力和俄國的勢力都侵入了印度。亞洲開始拋棄對西歐文化的尊重，並且開始發生一種他自己的集體的態度。日本或俄國，都好像是預定着要支配亞洲的政策；並且在這二國之間。時時有發生戰爭的危險。假如日本不怕美國，戰爭就要發生了。

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常聽到「白種人的責任」的論調。先進的歐洲和美洲負有開化世界其他地方的使命。現在很少聽見這種論調了；因為帝國主義雖然保持着他的商業上的重要性。却失去了他的浪漫的幻想。民主主義的著者常常希望着，帝國的列強漸漸把歐洲式的自治的幸福，擴展到他的帝國的人民身上。但除在印度或者在阿爾基瑞亞以外，很少有這種徵兆。非洲沒有錢使他的教育和文化發展；因為本地人的負擔和稅的力量小，並且凡可以課征的稅收，主要都已用在其他方面。本地人必須付受治理的代價；沒有餘下的金錢來訓練他們治理他們自己。白種的移民既不要受多數的本地人的統治，白種人的商人和工業家亦不要受本地法律的裁判。非洲自治已無期的延遲下去；在南非聯邦中，自治不受歡迎，甚至不以為他是治世的理想，僅等於美國南部各邦的看待黑人的權利。法國的帝國主義不反對異族通婚；但法國的帝國主義並不喜歡自治。不列顛的帝國主義對這兩件事都反對，雖然他對於第二件的反對不很明顯。

印度是一個例外；印度自治的問題現在是不得已的嚴重討論着。但我們替印度制定的半議會制的憲法愈近於完成，我們之中有許多人對於這個憲法的適合於印度的情勢愈懷疑。也許將來不會變成蘇維埃制度對於印度和中國比

議會制度更好？但是，一個印度的蘇維埃制度必先有一個印度革命，並且，或者也須俄國的力量足以給與有效的幫助。俄國在本國內的工作已很多；並且印度的族國主義遠不足以成爲一個統一的革命勢力。

非洲的叛變好像仍然很遠；並且牠能有什麼結果？除非歐洲的列強互相殘殺，非洲人是不能把牠們逐出的。一個歐洲社會主義制度的意義，或許就是使非洲的教育和自治迅速前進。但社會主義是正在征服着歐洲嗎？這也是尙且談不到的事情。

當國聯制度成立的時候，理想主義者希望委任統治地的治理，可以實際以牠們的居民的利益爲前題，並且希望從此可以有行爲文明的新統治。傳布到帝國列強的屬地上。大不列顛確曾放棄了一個委任統治地——在夷拉克（Iraq）——並且承認夷拉克爲獨立國。但有更多的徵兆，表示着不列顛要想使委任統治下的坦干伊喀（Tanganyika）和肯亞同化，而不是使肯亞和坦干伊喀同化。國聯忙於防止委任統治地的最壞的弊端，牠無方干涉帝國主義者在他處的行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帝國將差不多要照原樣繼續下去，除非印度發生叛變，或日本再擴張。

卷四 政治原則

第一章 社會的基礎

一切的人類社會都是建築在經濟基礎之上。不論牠們的文化性質或牠們在生活技術上的成就如何，牠們完全是依靠牠們的經濟機會為生活工具。人類不能有文化，或創造一種文化，除非他們能供給他們自己以基本的生活工具。

以我們現在的文化的巨大生產力而論，維持生活的絕對物質需要。實在並不是一件很艱難的事。假如我們不作別的事，都去為生活的必需品而工作。並且大家都以此為共同工作的目標。那麼現在世界上那些生產力最發達的地方，就沒有很多的工作可作了。甚至像現在這樣，千百萬人沒有工作，千百萬人的工作所產生的貨物和勞役不是僅維持身體生活所必需的，我們仍可以適當的說。我們的幾大類基本物產是供過於求而不是缺乏。但我們不要忘記，這種供過於求只是相對的。假如使印度和中國以及非洲的全體人民都有飽飯吃，先進國家的堆積成山的剩餘品片刻就沒有了，並且一切地方甚至短少生活必需品。甚至在現在，仍然生活在原始式的貧乏之中的人數。遠多於因先進國家的生產力的增長而享受較高生活程度的人數。

雖然，有些大國家已遠超過僅維持生活的必需品。但甚至在這些國家。仍有許多人缺少康健生活的必需品。但

這種貧乏是分配不適當的結果。不是絕對的缺少。假如先進國家的所有的生產，都以平等的基礎分配，這些生產品遠超過足以維持每個人康健的生活着。雖然有失業和生產富源的未充分利用。此外，假如這些國家的唯一目的是增加必需品的產額，那麼牠們能迅速使生產額遠多於現在。

事實上，從來沒有一個社會，甚至最窮的社會，使牠的生產組織完全是為滿足身體需要的目的。在生產力最低的社會內，亦有些貨物的製造和勞力的消費是在這個目的以外。任何社會的生產力增加之後，牠的整個精力的較小部分是用於供給純粹的身體需要。較大部分是用於滿足其他慾望。文化的進步就是從生活的純粹必需品到所謂生活的奢侈品和裝飾品。這有兩個理由。第一是。人類甚至在得到充足的食物和抵抗天氣的衣服以及應付原始生活程度的他種需要之前，已開始感覺着有其他堅決的慾望。甚於要更多的這類基本貨物的慾望。他們『祭祀』他們的神靈，甚至用他們自己所需要的食物；並且他們願意有些奢侈品和裝飾品。甚至在他們的身體需要未滿足之前。人類不
只靠麵包生活——甚至在他們沒有充分麵包的時候。

不過，尚有第二個原因。從來沒有一個人類的社會，甚至那最貧窮的，認為牠所有的一切人員的需要是平等的。從需要的立足點上看，從來沒有一個社會內是『每個人算一個，沒有人比一個多。』事實上，社會既已從原始的貧乏升到一個生產力較高的地位，牠們對於各人民的需要的估計就發生了差別。並且這種差別久已趨於增大。牠們把牠們自己更深刻的分為富者和貧者，把牠們的人民分為對社會的生產品要求多者和要求少者。這種區分顯然使供給純粹身體需要的工具以外的東西，受到較大的歡迎。牠引起了更不同的消費，以致生產制度必須也區分起來，藉

以供給這種需要。他是第一個原因，使人們寧願要奢侈品和快愉，而不願藉基本貨物的多量供給，提高一般的生活程度。

所以，甚至在很貧窮的國家，如同中國那樣，亦有很多的個人很富有，並且能支持一個高度的複雜的消費程度；當一個窮的文化和一個富的文化接觸的時候，這種趨勢普通都是增加。並且因此開始學習上以牠的較高生活程度為基礎的新需要。在未進步的社會內。這種富有的階級與全體人民相比，普通是很少數；並且在這個階級和民衆之間常常有一條鴻溝。同時很少有任何發達的中間階級。但亦並非永遠如此。中國是一個很窮的國家；但中國除去除去上層很富有的個人以外，尚有一個大的中間階級，他們的生活遠在農民的很低的生存程度之上。在另一方面，俄國的革命前的中等階級是比較不重要的。

在較此更進步的社會中，常常有最不同的生活程度。從社會底層的被擯棄者以至於尖端的百萬富翁。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有各等級的中間階級；因為，正如同統計家所喜歡指出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收入的分配。有依照一個適中曲線的趨勢。自然，這些社會的用於純粹必需品的款項在牠們的總收入中的比例。遠小於生產力低下的社會。

在較此更原始的社會中，文化方面趨向於成爲民衆意識的表現。這種文化的成功，主要是由於人們在基本的身體需要以外的消費，而這些人的收入却不足充分的應付他們的需要。宗教的衝動普通是這種消費的主要誘因。但當社會的總財富增加。並且這個社會內的收入差別的因子增大；用於文化目的的消費漸漸和那比多數人收入多的人密切的結合起來；並且文化本身漸漸成爲資產多的階級的特殊所有物。在歷史的事實上，在若干方面藝術已脫離了

供日常使用的手藝。牠的發展主要是在少數人的手中和獎勵之下，並且牠的報酬較一般民衆的收入高。甚至貧窮的藝術家普通亦比一般的手藝人富；並且他的藝術作品的市場是那些高級的人民。

唯有一個社會內的生產力達到了很高的程度。這種趨勢才可以有部分的逆轉。一般的生活程度既然升高，大部分人民這時能够把他們的收入中相當的一部分，用於身體需要以外的事物。在這種情形發現之後，藝術就又變爲比較『民衆的』。這就是說，藝術開始向那正在變得能購買牠的較廣大的階級走去。不過，牠亦不會返到原始的狀況。成爲全體人民的社會意識的直接表現。因爲文化的供給，只是漸漸的滲下去，到了前此專有牠的人們以下的階級；並且文化的標準大部分仍是由上層階級的需要性質來規定。在一切文化程度高的社會中，文化的標準包含着一個勢利行爲的大因素。

不過。生產力超過一定的限度時。文化的需要仍然要變得更散布的廣。並且及於全體人民的一大部分。現在在較富的國家。小說的散布、廉價圖書的散布、電影和無線電的散布、是這種趨勢的一個明白的例子。但文化的再度民衆化，大大的受了相反的一種運動的阻滯。因爲生產力的增加。身體需要的標準便不和以前一樣了。這不僅是因爲對於生活必需品的從來的觀念。鑒於滿足這些觀念的工具的豐富因而擴大（雖然這也是當然有的事），並且也因爲在進步的社會中生活變得更複雜。所以必須把一大部分開支用於必不可少的需要。城鎮和都市生活方式的發展，是新的最低需要的大創造者；並且在現代的情形之下。極多的費用須用在和消費貨物有分別的運輸事業與其他事務。生活和工作唯一的的方式，變得對於個人和對於整個經濟制度，都是很昂貴的。實際上，大部分生活程度的明顯的

進步，完全消耗於供給本身無文化價值的新需要中，並且不能對於接受者的滿足有真正的幫助。

雖然，文化的和滿足的標準以及消費的標準確是提高了；並且文化和文化滿足的意義確變得散布廣大。但文化仍是一種階級的文化，雖然民衆教育（發達的經濟制度的需要，使民衆教育變爲必要的，生產力的增加，使牠成爲可能的。）確有助於減少富者和貧者之間的文化差別，並且使個人在社會等級中有升降活動的便利。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文化的特點就是——雖然這些國家內仍有世襲的貴族成分存在——個人比較的容易從一階級轉到這個階級以上的或以下的其他階級。這些階級在財富上有很大的不平等。不過這種不平等是分爲無數等級的。階級構造不是剛性的。而是彈性的；但我們不要弄錯，這仍不失爲一個地道的階級構造。

經濟的基礎

我們所熟習的西歐和美國式的社會的經濟基礎，就是現代的科學（廣義的）。這些進步的社會主要爲人類在機械學上、化學上、生物學上、天文學上、以及其他許多科學上的知識的驚人的發展之結果。有時候這種發展來自純理論科學家的工作。他們努力於知識本身的進步，而不是要發現改良的生產方法。有時候這種發展來自實際工作的人，他們否認一切的『科學』知識。有時或是來自以『實用』藝術或科學爲業務的人。不論牠的來源如何，牠使生產力有很大的擴張，換句話說，就是使人在經濟方面指揮自然界的力，有很大的擴張。牠不僅根本改革了人類生產財富的方法。並且根本改革了人類的整個生活方式。除使人類的生產力有無限的增加以外，牠又增多了他們的需要。並強迫他們對於生存採取新的觀念和標準。例如，牠使社會都市化到以前不知道並且不可能的程度。牠延長人

的生命。尤其是把嬰兒的天亡率減到驚人的限度。並且牠亦影響到鄉間居民的生活；因為，除機械學、化學、和生物學對於農業的生產力的供獻以外。運輸和交通的改進，深刻的改變了鄉村生活。並且由電力的散布可以看出在最近的將來，鄉村生活會有更顯著的改變。

現代的社會以及牠的特殊的文化，根本是建築在科學的和技術的基礎之上。這一點無需多講。每個人都明白牠，並且沒有人打算否認牠。但是，當這個結論擴大為整個人類歷史的概論時，或是直接的用在解釋政治的、文化的、以及經濟的制度時。就有許多人猛烈的否認這個學說。這般人承認。沒有現代的科學和現代的工業制度，現代的文化和現代的國家就不是現在這樣；但他們好像是堅持說，援引這些事情的經濟基礎，來尋求這些事情的解釋，是一件絕對不道德的事。他們說，文化是屬於心的：是超越純物質的。並且國家是人類的社會性質的精神上的或者至少是觀念上的表現。不僅是他們的經濟利益的一個反映。

好了，所以工業本身亦是一種屬於心的事——是心作用於物質。所以工業本身是人類的社會性質的表現，如同牠在經濟制度中的表現。這種經濟制度是人類為推進工業而組織的。打算把社會問題的討論，以『心』和『物』的影響的對比為基礎，是完全無效果的；因為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對比。在社會經驗的整個領域之內，心繼續不斷的用於物，物亦繼續不斷的作用於心。今日對人類的心起作用的物質東西，本身就是往日心對於其他物質東西的活動的產物，而這些其他物質東西又是更在前的心的和物質的力量的結果。一架機器完全是一個物質東西，但牠包含着連續的許多發明家和應用家的發現。這些發明家和應用家用新方法改造這個無生命的自然世界，使牠為人類的

目標服務。

所以，我們不承認以經濟情形來解釋政治力量，是一種有損於人心的見解。讓我們把這種觀念永遠從我們的心裏中除去。人類借着運用可以供他們利用的物質和力量，來造成他們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制度和情況。這些物質和力量在任何時代和任何社會都不是純粹的自然界的禮物，而是已往人類的力量作用於自然界所供給的力量而遺傳下來的產物。人類的經濟遺產根本就是一個社會遺產。

所以，歷史的經濟解釋的意義，並不是說人只是粹純機械式的自然程序之盲目的工具，而是說，人類能製造他們的歷史，但唯有把在他們支配下的真正富源建造起來，才能達到這個目的。每個時代所能成功的事是有限度的。一個時代的富源的性質和牠本身的力量和創造力的限度，就是牠能成功的事的限度。牠的力量限度，一部分在於牠承繼的設備所具有的客觀的生長機會，一部分在於牠自己的意志和實際好奇心的特殊的性質，一部分在於牠的共同努力的能力。因為社會行動的本身就是一種驚人的創造力。人類以有組織的和合作的團體行動所能完成的工作，遠多於僅用個人力量的成就。

社會就是一個工作集團

從社會的基礎上看，社會就是一個工作集團。牠的根本目的是保證牠的人員有滿足生活的工具，牠的方法是適當的支配和使用他們共同的工作力量。那最原始的社會明白的顯示出這個主要的經濟性質。在沒有國家這種東西之前，早已有了工作集團，並且牠的人員之間有了精細的職務分類。

雖然，如果在我們的想像中，以為任何社會（或者除去最原始式的）只是工作的集團，只把牠們的社會勞力組織起來，以滿足這個集團的經濟需要為唯一目的，那我們就錯誤了。如果我們認原始社會（直到有國家之前）的情形。是牠的一切人員的社會地位平等，那我們同樣是犯了錯誤。因為這些社會從很早的時代（假如不是從一開始）在男女之間就不僅有職務的分類，而且有身分的差別。這在原始的獵人之間就可最明白的看出。在他們之間，打獵是男子保有的工作，而女子留在家內，作其餘的工作。在我們所能知道的歷史上，這兩種活動之間的榮譽就不同了。狩獵包含着危險和力量。並且有誇耀勇武的機會。所以被人認為是榮譽的和高貴的，而村莊內的工作則被輕視為卑下的。常常是男子殺死了獵物，而婦女出去把他拖回家來；因為獵人不能降低他自己的身份。去作那沒有威武成分的工作。

當這類社會發展有比較安定的生活習慣。在村內和村四周所需要的工作，就發展並增長為農業和原始工業兩種不同的勞動。但甚至如此，這仍然大部分是婦女的工作。婦女（不是男子）是最初的工業工人和最初的農業工人。男女間的階級差別或者是階級差別中之最早者。只有與重武有密切關係的工業技術，如同製造兵器，才被認為是男子值得作的工作；許多關於人類原始的稗史都是以跛子代表鐵匠，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假如他不是一個跛子，他將和其他人一樣，不作一個工業工人，而作一個獵人或戰士了。

所以經濟的活動是在一種社會輕視的雲蔽之下開始的。這種社會的輕視永沒有完全除盡，甚至在最發達的工業社會內。輕視純經濟活動。對於我們仍然是極『自然的』。這意思就是說，這種輕視的態度的起源，在人類歷史中

有驚人的久遠。許多人對於歷史的經濟解釋的偏見，就是源於野蠻人的輕視不含勇武性的活動。甚至最下決心破壞反工業的偏見的俄國人，亦把紅軍和工業工人的『衝鋒隊』列為同等。並且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內，雖然牠們極崇拜發財，如果一個人捨棄了工廠而去到戰壕中，仍然有極多的人認為他是採取了一個更高貴的職業。

雖然，只要社會中的人員除狩獵以外，避免一切形式的生產工作，這個社會就不能在文化上或舒適上有長足的進步。漸漸的，男子必須在田地裏和工廠裏補充婦女的勞力。男子站在高等階級的地位，開始把婦女從那些被認為卑下性最少的工作中排擠出去，留給她們的是更卑下的職業，這些職業最明顯的是具有為男子服務的性質。婦女的地位起始變為『家庭』，而不是村莊了；並且因這個變遷的結果，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降落下去。但在這時。在男子之間亦發生了明顯的階級差別。那些不得不在田地或村莊中作生產工作的人，被認為比那些仍能只作勇武功績的活動的人低劣。較強的人和較狡猾的人自己保留着高貴的職務，並且變為一個上等階級。一個有關階級。他們的日常需要是借別人的勞力來滿足。於是改變階級區分的長久的程序就開始了。

在這裏我們的目的不是要依次追述這個改變以後的許多改變；因為那就要寫成一部人類社會史。與我們有關係的只是要指出，社會階級的生長，實際只是經濟發展的程序的反映。有些階級要求在公共富源的組織中，牠們的需要佔的份多，牠們獨佔勇武機會的權利，並且牠們組成社會中的上級集團。這些階級的產生，是經濟發展的程序中必然的結果。人類利用可供他們支配的生產富源的力量，的性質是變動的。階級的發生就是以這種變動的性質為基礎。

有閒階級

雖然。假如人類實際上是正統派經濟學家所說的『經濟人』(economic Man。爲贏利而經營的人——譯者)，階級的興起就要和他在歷史上的已有的作用不同了。因爲階級區分的進程的出發點，甚至是愛好勇武，不是要得更大的消費。韋伯倫(Thorstein Veblen)所說的『有閒階級』(Leisure class)的出現，就是因爲最強有力的人要其餘的人替他們工作。藉此他們可以使他們的活動限於有榮譽的事業。這種區分各種活動的榮譽的意識，是存在於社會階級區分的進程的根基中。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爲我們所看見的這種作用於原始社會的力量。在現在的世界仍是很活躍的。牠的仍保持活躍，不僅是在人們仍然給與戰士的光榮和給與紅衣獵人、各類運動的優勝者、和各種無生產價值的身體勇武的榮譽中表現出來——在這裏，我們要注意到紳士們的熱切的願意要保留着『業餘制度』，否則他們的勇武就要被人認爲有了商業的價值——而且表現於其他許多方式。文明的社會因爲那種比較原始式的運動的機會已減少，於是把勇武的觀念變爲許多別種活動，其中最顯明的一個就是運動。在近來，又把這種觀念與演員和作家（即使他們是爲了生活而著作）以及上等的職業合在一起——事實上，幾乎與一切都合在一起，只除去普通的勞力工作。最顯著的就是。現在變爲。當一個工業的『領袖』是光榮的事，當一個工業工人則不然（工業領袖四字的本身即有很重要的意義）。『一個充滿了商店老板的國家』要確實的被人看不起；『一個充滿了工業領袖的國家』的名譽就很不同了。英格蘭的維斯利教徒(Wesleyans)和福音教徒(Evangelicals)認爲打倒一切『低視』工商業的觀念，是他們

的使命之一，並且鼓勵新工業僱主『爲上帝的光榮』而謀利。美國人在一個經濟財富無匹的未開發的地方，得以重新創業。曾有一時期他們能够把成功的商人甚至捧到棒球球員之上。直到美國的富人與較老的國家的理想接觸之後，才使得百萬金元的富翁熱望着把他的女兒嫁給一個有爵位的人。美國的無所事事的有錢階級的興起，又使無生產性的聲望因他們的優越感而復活。

我們的目的是在說明，工業文化的發展，必須獻身於高級工業工作這件事。不僅成爲從事工業者得到更多的物質滿足的方法，並且也是聲譽的來源。這可由兩條道路完成；第一是使金錢的佔有本身成爲榮譽的來源，第二是使勇武的觀念與大規模的企業家的工作連繫到一塊。金錢的佔有可以變成榮譽的來源，因爲金錢能使佔有他人的購買現在的高貴階級中的那些象徵榮譽的事物。所以十八世紀英格蘭的發財的商人急切於購買田產，所以在法國以及其他國家有很多人購買貴族特許狀；因爲，在英格蘭，一個人有了田產已竟够了。但在法國，他必須拿出許可他加入貴族界的許可證。在這兩個國家，金錢可以購買威望；從此再到僅有財富（未變爲爲人所熟習的社會優越地位的標記的財富）即可有威望的一步，已不遠了。從此再進一步變成站在工業領袖的地位，就有工業領袖的聲望，無須完全靠着財產。這亦不很難。

這種事情愈發現的多，人們愈將重視發財的高級工業活動的價值，不僅拿牠當作謀利的工具，而且也拿牠當作勇武和威望的來源。勇武和威望的較量主要仍然不是按人的成就如何——一個好雇主很少有什麼聲望，並且不作有害而作有用的事，完全不會有聲譽——而是按一個人所能賺的錢的數量。但是金錢變爲成功的符號，金錢可以購買

一切，所以人們喜歡金錢和喜歡所願要的東西完全一樣。實在，大量的金錢很難用後一種方法來估計牠的價值，除非牠的消用能再加多牠的主人的聲望。

雖然，大量的金錢實在是很容易增進聲譽的工具。這可以由兩條路完成，即購買誇飾的工具和權力的工具。正如同原始式的獵人在人前的誇耀，有錢的人可以在不如他錢多的人面前誇耀。有錢的高級官吏們的許多開支，都是為求得這種意義的滿足。唯一能由這種開支滿足的需要，就是感覺着高貴和被人看着高貴的需要。但在現在的世界，用金錢作為權力的工具，甚至更重要。權力本身的被人重視，大部分是因為牠能帶給人威望。一個富人可以購買窮人的勞務，不僅是為僱他們來生利，而且也是為增加他的權力和榮譽。一個富人已不能再保有一個私人僱用的軍隊，雖然他能保有一個私人的僕役隊；但他能使成羣的窮人按照他的心願去作苦工、傳道、以及宣傳。最幸運的是大新聞紙的主人，他的宣傳費用也就是生利的來源。

婦女的地位

誇飾的費用對於婦女的地位有不幸的影響。因為，雖然在力量小的和狡猾性少的男子被迫去作農業工作和工業工作時，男子的力量足以把婦女推到他們以下去作卑下的工作，但男子去作生產工作，確減少了兩性間的不平等。例如，在中世紀，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近於和男子平等。超過在十九世紀進步的社會中的婦女地位。這種情形對於上等階級的婦女和農家的婦女，比對於許多種工業工人的妻子，尤其適合。除去在家庭工業制度之下；因為在家庭工業中，正如同在田地上，婦女是公認的和男子相同的賺麵包者。中上階級的婦女不是賺麵包者；不過她們有許多

的和繁雜的家事須管理。當她們的丈夫去到田地或店舖或工廠中的時候。烘麵包、作酪餅、以及在家中紡紗織布，已使她們十分忙碌。並且給與她們一種負責的指揮工作。她們沒有時間變成玩物。

工業革命從婦女手中奪去了她們的大部分的工作——在社會的重要性上，遠超過婦女在工廠中得到的工作。家庭工業制度消滅了，並且一國的大部分妻子的收入也隨着消滅了。農民的擠入把大多數婦女。趕出農業以外；因為受僱的新農人主要是男性領薪工人。中上階級的婦女不再紡織了。更漸漸的也不在家中烘麵包和作酪餅了。並且購買工廠制度下的貨物來替代。同時她們的丈夫因這種新財富的充溢而致富。他們須要能表示他們的勇武的標誌。以備人考查。婦女就變成可以表示男性的誇飾的標誌；婦女愈無所事事和愈裝飾的好。她的主人就愈光榮。

維多利亞時代的婦女就是經濟不平的增長的一種產品。甚至是一種象徵。因為中等階級變富了。大家風度的範圍就擴大了。並且日甚一日的變為以完全無用為共同的理想。甚至生產小孩亦被認為有一點粗俗生產力的恥辱；並且雖然中等階級的婦女極少有事情作。中等階級的兒童生產率却開始降低。維多利亞主義（Victorianism）以反動的方式產生了婦女運動。牠反對以婦女為崇拜的玩物。因為她們被人譴責為完全無用的人。這類婦女是中等階級婦女之最有力的。但婦女運動在階級制度的羅網中受到阻礙。革命的俄國掃除了誇飾的消費。一下幾乎跳到兩性完全平等的地位。階級的平等和兩性的平等。是不可分離的連繫在一起。

資本主義的興起

同時在男子之間資本主義的構造正在建築起來。資本主義的企業開始在封建制的社會結構內發展起來，並且牠

的第一個先鋒是商人。我們已知道，在大不列顛，有錢的商人因國外貿易而更富，於是藉購買田地和聯姻升為有田產的貴族階級。這是很容易的。因為在十七世紀政治爭戰之中，議會制度已得到勝利。商人和小地主已證明給皇帝和大地主，如依照他們所能接受的方式來統治他們。要便利得多。直到一六六〇年之後和一六八八年之後，大不列顛仍保持着貴族政治，不過這個貴族政治是以明白承認商人的要求為基礎。封建制度所存留的成分，亦必須學習着使牠自己與環境適合。牠迅速的接受了在議會制度中的炫耀的地位。議會制度允許一切有錢的人都分一份權力。因此，牠藉着繼續不斷的同化上層資財階級，從事於保持貴族政治。

在法國，雖然人們可以藉購買而升為貴族。這種同化作用却未發生。君主專制仍然把持着政治的領域；並且貴族們完全無政治權。他們只更堅固的保持着他們的封建利益。工業的發展是在皇家的獎勵之下；並且在一個國外貿易和殖民帝國不甚活躍的國家，商業的力量不足以強硬政治承認之門開放。在英國，商業的發展帶來了更多的財富，因而生活程度升高。但在法國，封建制的強索使農民陷於窮困，並且軍費開支龐大、宮庭奢侈、以及貴族被豁免大多數的各種租稅，於是將很重的租稅負擔加在中等階級和貧民身上。法國的封建制度沒有改變：牠破裂了。未等到工業中的革命有充分時間產生出牠的社會和政治的效果，法國大革命就來到了。法國革命不是機械時代的產物；牠與蒸汽機或工廠制度無關。牠只是過期的打倒貴族和專制政體，這種政體在英國早已被廢除了。

但是，革命發生的遲早，可以使革命有很大的不同。英國的革命發生於十七世紀，牠發生的這個時間和牠的需要相近，所以結果是妥協，在這個妥協之中老制度尚能保持牠的許多權力。英國革命的結果是大地主和商人合夥。

但法國的十八世紀的革命來的太晚了，不能成功一個這樣的妥協。牠必須應付一個更忿怒而且更進步的中等階級，並且同時特權階級已衰弱腐敗，國家制度已陷於財政衰敗中。法國的革命領袖不能同老制度成立一個合夥，雖然他們之中有些曾嘗試過。他們必須建立一個簇新的制度；並且他們建立的制度不可避免的是以他們得勝利的武力為基礎。法國宣布了民主政治的原則；在這個民主政治中完全沒有特權階級，牠所有的只是完全承認人民的政治權利。在這些權利之中，那脫去了封建制度的強索的財產權，好像是最不言而喻的應當承認。

法國在戰爭的脅迫之下又倒回去成為專制政治；但牠是一種新的『民治的』專制政治，並且法國人永未忘掉他們的民主政治的教訓。在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以及在一八七〇年後，法國人曾一再確定他們的信心。在最後這次，君主派的集會不得不宣布一個議會制的共和國。這時，這種共和國已有了可根據的新榜樣。在一七八九年美利堅共和國尚未成熟。不足以作為榜樣，這時却發達完全；並且大不列顛已把革命的教訓在牠自己的修正主義的方式之下實行出來。

實在，大不列顛是第一個國家，鑒於資本主義的需要。自覺的改造牠的政治制度。美國人建設他們的共和國，不是為了資本主義，而是走着一個完全沒有貴族和君主的國家所唯一可能的路徑。美國的政治上的民治制度的興起，是因沒有任何另外可能的方式，雖然美國人把一個近於剛性的憲法的解釋權交與最高法院，就算對於遏制民治已盡了一切可能的工作。這個制度結果對於擴展美國資本主義的需要，有令人羨慕的適合；但牠當初的設計，却不是為了這個目的，除去在大規模資本主義的憲法上的需要和極初步形式的私人企業的憲法上的需要相同的那些方面。

在另一方面，大不列顛明確的重新改訂了一六八八年的憲法，爲的是使牠與工業資本主義適合。不過這件工作亦經過一次爭鬪。貴族階級以前能很容易的同化少數有錢的商人，這時不能再利用那同樣的方法與遠多過以前的大批的工業資本家成立妥協——這些資本家常常是粗野的自起身家的人。他們正在因新生產方法而致富。這些新進的人必須努力反抗特權階級的阻力，取得社會上的和政治上的承認。和他們對抗的特權階級很聰明，不和他們對抗到底，並且因商界的興起特權階級已勢力薄弱。一八三二年的改革案（Reform Act）給與工業資本家許可狀而並未經過革命。所以對於仍在制服之下階級的激動亦極小。因爲，革命使一切社會的力量都起作用。但改革却不然。

因爲舊統治階級及時讓了步。大不列顛在一八三二年才能够忽然停止了政治上的民治，以及仍保持着工人無選舉權。以後又經過了四次改革案和將近一百年的時間。才進步到普選制度的完成。但是，我們可以合理的問一問，爲什麼以後這些進步能成功？爲什麼城市的工人在一八六七年、鄉村工人在一八八四年、婦女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八年能取得選舉權？爲什麼資本主義在得到政治權力之後不自己保有這種權力？爲什麼要借助於一個顯然能被人用以反對資本家的利益並且必定要增強社會服務的要求和增加富人的租稅的制度？

任何人如認爲議會民主政治是最適宜於資本主義的政治組織，必須準備着回答這些問題。

資本主義與議會

以不列顛的情形而論，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不難找出。一八三二年的改革案並未把一切權力都交與工業資本家；牠僅允許他們和原來的貴族分享權力。並且資本家亦不能成爲一個一致的團體；比較『民治的』小資本家要再增加

力量，去反抗那太走向貴族觀點的趨勢。布萊特（John Bright）所領導的急進的資本家，希望能領導着上層的職工，反對那仍存留着的貴族份子。所以議會贊助改革，這改革引起一八六七年的改革案。實在，這次改革最後得到狄思瑞里（Disraeli）的許可，並且有布萊特的擁護，反抗那更反動的輝格黨人（Whigs）；因為狄思瑞里對於不能不許可的事，寧願許可而不願反對。希望藉此可以使一些新得到選舉權的人擁護他。一八八四年的改革案是由自由黨人提出的，並且也是一八六七年的改革案的勢所必然的補充；因為只要選舉權達到很大一部分工人，比較『民治的』資本家的政黨，自然要設法使選舉權更擴大。最後婦女在一九一八年得到選舉權，在名義上是作為她們在世界大戰中的服務的報酬。但大部分是因為她們是未受過政治教育的選舉人，希望她們成為比男子更守舊的一個勢力。一九二八年的允許所謂『婦女選舉權』，背後亦是這種同樣的動機。

當然，外面的沒有選舉權者的壓力，和已有選舉權者的代表的想要推廣擁護他們的基礎。對於擴大選舉權的成。都有力量；並且理智和利益亦都有關係。如果政府一經以議會代表制為基礎。在這種制度中無選舉權的人就能取得一份選舉權。而無須使社會的構造有任何改變；並且這時反對民治的人很難提出任何詭辯的理由。來反對選舉權的漸次擴大。尤其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特權不是一個有一定法律地位的階級的特權，並且資本階級亦不能像以前的特權階級那樣成爲一個界限明確的集團。因此。在外面的壓迫之下。再加上已有選舉權者之中的較民治的份子的壓迫，選舉權有從來未有的擴大；並且那要設立反抗民主政治的防禦物的企圖。是採取限制選舉權的效力的形式。而不是採取限制允許選權的形式。這種堅持憲法中的非代表性的成分。或堅持那種可以被保持爲貴族性的或金錢政治

的代表制度（甚至在選舉下院議員的選舉權已推得很廣時候）。使被選的代表的權力就受到遏制或剝奪。結果，正如同我們在以前的一章中所見到的。有普選不一定就是民主政治，甚至一個形式上的民主政治；並且雖然普選曾使國家的活動起了變化，使牠對社會服務的範圍擴大。但牠已表示出牠完全和保存資本主義一致。只要資本主義仍然是健全的，並且在經濟的意義上是進步的。

一個準民治性的代表議會制度。對於十九世紀中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是很重要的；因為唯有藉着這種議會制度，資本家才能依照他們的需要改訂國家的政策。例如在大不列顛，那一直存在到一八三二年的地主們的貴族性的議會，永不能被勸服去廢除糧食律（Corn Law），或採行自由貿易的政策。並且牠亦不能被勸服在內政上不干涉工業，當工業的發展好像要威脅到地主的權利的時候。在法國，在打倒革命前舊政體的統制性的桎梏之前，資本主義不能生長。在德意志，封建制度仍保有較大的力量，所以工業家需要下議院（Reichstag）幫助他們。向貴族守舊黨（Junkers）努力作一個溫和的磋商。在俄國，封建制度仍把握着政權，資本主義只能零碎發展，並且遇到極大的障礙。另一方面，在合眾國，資本主義有代議制度作爲很好的武器，在議論紛紛的奴隸問題和『開拓殖民地者』的利益問題解決以後，就沒有再遇到障礙。議會制度雖然開放了要求社會改造的門徑。社會改造在美國受到聯邦憲法和最高法院的權力的有效的阻撓——但牠却證明是最適合於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的需要的一種政治機構。

這尤其是因爲議會制度把人民阻撓在政治之外，不是因爲牠把人民拉入政治以內。選舉權不僅是一個政治權。而且也是政府與公民羣衆之間的一個緩衝物。假如公民不贊成政府的行事，他們永遠可以被人告訴說，他們有憲政

上的補救方法，並且他們屬望於下次大選或屬望於他們的地方代表。而這個代表很容易對他們解釋他個人不能有所作為。雖然。下一次大選將證明實際上是一個無用的工具。不能補救選舉人的大部分苦情。大選是有組織的政黨間的爭戰，所爭的問題是這些政黨同意有差別的；充其量，牠們所爭的也不過是各部分選舉人有興趣的許多問題中的極少數。選舉人只能在政黨之間選擇。並且不能堅持某些特殊方案；並且無法強硬各大政黨意見一致的問題，成爲最要的問題。除去在很少的時機以外，選舉人亦不能在政黨以內十分努力推進他們的特殊見解；因爲政黨的本身就不是民治的，並且政黨的政策是由上面來的，不是從下面來的。

這種情勢的局部的補救。繫於在政黨機構之外。創立自動的宣傳組織，致力於提倡某特殊方案。或某特殊問題。在議會制的國家，許多不同的自動的會社。在牠們的有限的活動範圍內。實在已長足的走向民治的實現，遠超過範圍較狹的政治制度的民治化。在議會制的國家，尤其是在大不列顛。這種自動的組織在十九世紀是從來最有效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壓力的機關。反糧食律協會（Anti-Corn Law League）是這種自動的組織的成功顯著例子；並且這個協會的方法曾被一再的用於各種目的。但現在這些會社的許多力量已失去。因爲牠們的成功在於能使牠們的要求具體的成爲議會中的議案或類似的立法議案，並且由牠們自己去推行這種議案，而不致顛覆了社會構造的其他部分。當牠們的要求變得影響深大，以致牠們不能用這種方法提出牠們的要求時，牠們只能藉創設政黨。尋求政治力量，才能有出路。創設宣傳性的會社，企圖藉着原有的政黨來滿足牠們的要求，已不可能。此外，當意見的區分變得極尖銳化，以致影響到整個的社會構造。甚至次要的改革在人心目中亦被認爲是主要的改革；因此那本身無害的

計劃亦受到阻礙，因為人們認為這種計劃是引向更大的改革。最顯著的例子就是英國議會對於市營企業的態度的改變。只要資本主義的政黨不十分懼怕社會主義，進步的自治市就比較容易取得貿易權；並且有時候是守舊的自治市，如波明安（Birmingham），先領頭。但在現在，市營企業被人懷疑為『社會主義化的』；並且擴大市營企業的提案在議會中被否決。這不是根據這些提案的內容，而是因為這種因由。

結果。政治宣傳漸多集中在政黨機構以內，或是集中在僅為敵對政黨的補助物的會社內；並且這更進一步減弱了普通公民的政治力量。議會變得更僵硬了，並且減少對於外界的要求的反應，除非這些要求來自政黨機構以內，於是議會失掉了聲譽。這時不再是『人或政策』的問題。而是在代表敵對的社會制度的政黨之間作選擇。但是，等到了這一步，是否人們將要同意僅依投票解決問題？或者是，人們將要放棄投票，而堅決的訴之於一種武力？

第二章 秩序與自由

政治思想家傳統的分爲相反的兩派。即『秩序』的使徒和『自由』的使徒。那些擁護『秩序』要求的人們。注重公民個人安全的需要。和國家力量的需要。以國家爲抵禦外侮的工具；並且他們有時候更進一步。宣布把秩序和訓練強加在人民身上。認爲是『人類天性』的不整潔和懈怠所必需的。黑格兒（Hegel）的信徒超過了這一點。主張唯有在國家之內和經過國家。個人才能實現他自己。在國家中他的人格才能得到最高的表現。因此每個人在國家的最高權威強制的秩序之內。應當有他的一定的地位和職務。

擁護『自由』的人們宣布個人權利。與這些學說對抗。他們主張個人走他自己的道路。只要他的行爲沒有太嚴重的干涉到別人的同樣的自由。並且主張個人運用他的公民權利。來參加社會政策的決定。所以政治自由的學說是兩方面的——個人自由和集體自治。但在這兩方面之間有一個潛伏着的敵對性；因爲多數人所持的政策或許和少數人對於個人自由的要求衝突。持自由理論的人們自己就永遠在討論和劃分多數人和少數人的權利。

『秩序』的使徒當然要宣布他們的方法是真正得到自由的唯一方法。他們力說。唯有一個強有力的能訓練地的軍個人民的國家。能站在保護個人權利的地位。財產的安全、契約的神聖、保持社會本身的自由去抵抗外來侵略的威脅——這些常常被列舉爲在一個以厲行秩序爲最重要目的而組織的強有力的國家內。可以得到的利益。擁護『秩序』學說的人們，常常是對於人類的天性或大多數人的天性持悲觀見解。在有尖銳化的社會紛擾的時候，他們最先

受人歡迎。這時社會內的敵對的黨派或國與國間流行着的戰爭，顛覆了人民的原來的習慣，使人強烈的需要一個强有力的權威，足以強制各黨派服從，並且足以使國家變為極可懼怕的，外人一點不敢攻擊牠。

麥堪萬利的『霸術』(Prince)一書，是寫於人們厭惡戰爭和國內爭論的時候，這時的戰爭和國內爭執好像不會得到解決的結果。在要求以强有力的政府為公眾安全的工具的政治理論中，他這冊書是最高的表現。霍布斯在他的『利維坦』(Leviathan)一書中，亦同樣的要求一個能制止內戰的危機和內戰的顛覆性的政府。

自由與容忍

在另一方面，當人們生活在比較安定的政治情況中，並且因此畏懼的心理亦少。這時『自由』就變得受人歡迎了。在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一般構造被認為已穩定並且能抵抗攻擊的時候，人們就轉而要求這個一般的構造之內的主要權利。他們不僅着手使政府成為比較民主式的——即對於和社會關係的一般的性質相符合的民衆壓力，作較多的反應——而且也着手主張某些部分的人民和某些利益一致的人民有許多特權。最重要的是，在這時候人們變得比較能容忍實際上和理論上的差別；因為他們不認為這種差別的發表，會威脅到社會的一般的構造，或者包含着內戰的危險。

容忍是穩定的政治和經濟狀況的產物，是個人自由的兄弟。在英格蘭，十八世紀比十七世紀寬容，因為一六八八年的革命好像已長期的穩定了英國的一般的構造。法國革命和工業組織中的大改革，在十八世紀末又把政治的窄量帶回來。但在一八三二年的改革案和工業資本主義成功的成立以後，容忍又回來了。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

的促進容忍。較洛克（Locke）更進步得多，並且容忍已擴張到在法律上承認工會和共和運動，以及廢除歧視不從國教者和天主教徒的法律。在十九世紀中，『自由』的信條在大多數歐洲大陸國家中前進得不多而且不快，這至少一部分是因爲這些國家對於牠們原來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的繼續安全，沒感覺到像大不列顛那樣的信心。甚至法國，雖然牠贊成『自由、平等、友愛』，經過幾次連續的革命，牠仍是動盪於容忍和壓迫之間。在歐洲，只有大不列顛推進個人自由和政治上的容忍至於許可廣泛的討論自由和不同意的自由，因爲只有大不列顛對於牠的原舊制度的能抵抗嚴重的攻擊，有充分的信心。在這時期，合衆國的推進『自由』甚至超過大不列顛；因爲美國的制度好像更穩固。直到南方解放了黑奴，以及各民族流入北方，才引起不容忍的精神，並且造成『百分之百的美國主義』的心理。

政治上的容忍，和由此而來的情願承認國家以內的個人或團體的『自由』，永遠是在與原來的社會制度的安全相符合的界線以內。永遠有一個界限。到了這個界限，握國家的權威的人們就不能再容忍並且要壓制和壓制那被認爲危害現下的社會基礎的運動。在安全時期發展成的自由主義制度的存在，或許實在能造成一種反對壓制的有力的偏見。並且使得在最後對於舊秩序的基本挑戰興起來的時候，不容易再利用壓制。但是，假如這個挑戰是真實的。容忍就漸漸被收回去了。並且在國難的藉口之下，自由亦將要受到限制。或者，假如國家的機構是極深刻的依賴着容忍，以容忍爲遏制的工具，或者過於受牠所要壓制的武力的影響，那受攻擊的秩序的擁護者就要用憲法以外的保衛方法，並且或者他們自己造成一個革命，藉此去驅除危險。不容忍必定要返回來；因爲沒有一個已成立的社會制度

能容忍牠本身的被撤換。

容忍和秩序

在這時，『秩序』的需要變為集合違法的運動——各種各式的法西斯黨（Fascisti）、國防軍（Dinamos）、內衛軍（Heimwehren）、襲擊隊（Sturm Troops）、國家保皇黨（Camelots du Roi）——的呼聲。並且，在危機期間，那些宣揚自由信仰的人們亦轉而提倡權威，當他們看見他們自己有取得權力的機會。於是容忍的存在僅成為那些自知非強有力的人們的護符；民主主義的革命家或許在將來要重新建立牠，但在目前，他們放棄了牠，因為牠危及革命成功。列寧（Lénine）曾說過，沒有任何事物能像革命那樣有權威性；並且共產黨人只在他們未握政權的時候，才宣布無限制的言論自由。

在這種態度中沒有虛偽；因為如果那受共產黨人攻擊的制度，自誇牠們的民主性的容忍。這時共產黨人充分有資格使牠們履行牠們的言論。但事實上，從來沒有一個政體的容忍是無限度的；並且容忍極端的政治爭論最不能受革命家的認可，因為他們是正在企圖改變社會制度的整個基礎。這種重大的改變必定引起熱望和怨恨，並且使擁護已廢止的秩序的人們陰謀反抗這個新政體。容忍這種陰謀是不可能的。如果最高的工作是建立新秩序的基礎。所以，勝利後的共產主義對於徹底壓迫反共產主義的批評，並不次於勝利後的法西斯主義或反革命派的壓迫社會主義運動。

當然，有人可以爭辯說，在某些情勢之下壓迫是不必需的。假如在制度穩定的時期中，容忍和尊重法律已極堅

固的印入人民心中，以致他們拒絕用暴力，而且甚至那些受改變制度的威脅的人們，不久亦將捨棄他們的特權，不去爲保持牠們而爭鬥。這樣，才可以保持住相當的容忍，甚至在社會制度更替的期間。但是，這種事情永不會發生，除非像在一八三二年的大不列顛，那時爭鬥者的敵對的要求，能够在一個制度中得到妥協，這個制度在大體上使他們都滿意。大不列顛的舊統治階級未曾用武力抵禦議會的改革；因爲他們能和工業家成立滿意的妥協。美國南部各邦的領有奴隸的人，確曾使用武力，因爲奴隸制度是處在危險中。

『秩序』的信條可以阻止容忍，所以牠是適合於急進轉變時代的信條，而『自由』是必須在安定而穩固的社會制度的環境中才能盛旺。在一個安定的制度以內，那一種自由能發育，全在乎這個制度的本身的性質；因爲法律所許可的正式的自由，實際上按照這些自由所在的社會環境而成爲很不同的東西。許多現在最受人高聲喝采的自由，實際上只是那些收入足以許可他們享受自由的人們的自由；並且有些名義上的自由，實際上很富的人們藉之爲工具，用他們的財富去限制別人的自由。契約自由常常被僱主利用。去遏制工會的堅確的『專制』；遷移自由對於能遷移的人是有價值的。但對於很貧窮的人就不值什麼了。言論和著作的自由是有價值的特權。但這些自由實際上對於受過教育的人和未受教育的煽動家或『罵罵者』，容易有很大的不同；並且這些自由也是百萬富翁所領有的報館達到沒有限制的無所顧忌的工具。言論和著作自由可以被用作組織暴徒的工具。去喝退對方的演說者，或去壓制一冊主張『不道德』的趨向的書籍。實際上，大家公認的自由。主要是社會中的握統制權的份子所願意要的和認爲有價值的自由；並且，不適合這個需要的自由，必須進而攻擊那些在政治中『有力量』的人們的反對和可怕的不關心。

自由的種類

實在，公衆的意見如果是熱烈的保護一種自由，牠常常就不能承認他種自由。或者完全不承認他種自由是自由。因為俄國人壓迫反共產主義的批評，並且他們對於『清理』資產階級存留的分子是殘忍的。於是許多人頗不承認共產黨的勝利已在其他許多方面對於思想和言論有驚人的解放。因為共產黨把建立新社會的工作責任，放在無數的『集體組織』的肩上，並且企圖徵募每個可利用的工人，使之成爲一個積極的公民。在建立新生活狀況中作他的一部分工作。在另一方面，社會主義者亦並非充分的認爲，法西斯主義和國社主義永遠不會變爲一個有廣大信徒的成功的運動。如果牠們沒造成相當的新自由，來替代牠們已廢棄的自由。

每一種社會制度都有牠自己的對於自由的觀念，並且牠從事於將這個觀念印入人民心中。當牠仍然在奮鬥着建立牠自己的時候，牠對於壓迫反對者的自由，比擁護牠自己的自由更注意。但假如牠勝利了，並且安定下來享受勝利的結果，牠不久就要精心制定一部自由的法典，適合這個新社會的需要和價值。

雖然，這並不是說，『秩序』和『自由』間的衝突只是時間性的和專屬性的。這二者的理想亦不同。這兩個競爭着的勢力都準備用最大的努力去壓迫對方。一個代表主要以秩序爲基礎的觀念，另一個代表自由的觀念。當這兩個勢力爭霸的時候，都是準備以獨裁的方式行事；但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勝利，對於秩序和自由可以有很大的差別。

除去在這些過渡時期，民主主義者常常是主張自由的黨派，並且反對民主政治者常常是擁護秩序的黨派，不論

他們是在何種旗幟之下。因為，雖然一個民主主義的多數人能壓制少數人，但除去在尖銳而基本的衝突的時候。大半不會有一個願意施行壓制的多數。在一個穩定的社會方式之內，意見的區分不是分爲多數人和少數人，而是分爲少數人與少數人；因爲多數人很少會對於同一事物有興趣。各部分人對於取得自由去推進他們自己的見解的熱心，甚於壓制其他見解；並且在這許多的意見和利益中，信異端者和改革家可以有安全。民主政治只有在恐懼中才會變爲專制的。穩定的民主政治是最能保障個人自由和團體自由的制度。

紀律家的心情

這確是使某種心情——紀律家的心情——不能容忍民主政治的原因。紀律家喜愛整齊勻稱。而民主政治是無限的不整齊勻稱。紀律家拒絕人類的天性，因爲人與人不同，所以他們的反應的方式亦不同。當紀律家說『開步走！』他是要每個人都依一個同樣的動作走開。他熱望着有閱兵場，熱望着工廠依『科學管理』的原則進行，熱望着有極近似培爾(Bell)和蘭卡斯特(Lancaster)的『規勸』制度的學校。這類的心情並非多得足以支配這個世界；但他變爲要使下層階級守秩序的人們的利益之執行者。在一切地方他都是出現於貴族和資產階級那方面。他們用他去訓練他們所怕的頭腦複雜的怪物。因爲，除去在一個民主主義的革命正在爲他的生命而奮鬥的時候，主張『秩序』的黨派亦就是資產階級的黨派。秩序的價值和受人重視，在於牠是阻止轉變的工具；並且，在大家感覺到他們的原來的權威受到威脅的時候，大家才都重視牠，只有那些依賴奴隸階級或人民的服從來維持權力的人們，是繼續不斷的需要牠。在不列顛——只要原來的秩序不受到嚴重的威脅——主張『自由』的黨派能夠同時亦是主張在印度有『秩序』的黨派

。在印度，威脅是繼續不斷的。只要沒有了那幾乎為大家所接受的社會制度，不列顛的自由主義就要解體了，因為牠沒有了能運用的環境。任何自己知道需要保護自己的特權的特權階級，立刻就把它自己列入主張秩序的那方面。

但除此以外，原來就主張「秩序」的人亦必然的傾向特權階級那方面。因為在一個有階層的社會中，比在民治的社會中容易保持「秩序」。社會的特權階級組成一個領袖團體。維持秩序的责任自然落在他們身上。這種特權階級可以造成一個特為訓練領袖的階級，並且使這個階級有牠所必需的力量和權威。在社會地位「人人相等」的民主政治中，亦並非沒有領袖制度；不過牠必須依形形色色的方式。藉領袖的出現來創造牠自己。這種領袖是出自人民中或出自人民組成的機能團體。這種民治性的領袖制不能像一個統治階級那樣容易受指揮或指教；並且這個領袖制亦不會把那種同樣的一致性（Uniformity）和訓練印人民衆心中。紀律家必然的認為民主政治的領袖制完全不能算作領袖制。

在社會緊急和有衝突的時候，民治的領袖制不得不採用在本質上屬於牠的對方的性質。於是有了訓練的獨裁制與起。這種獨裁制是由列寧和甘末爾（Mustapha Kemal）強行設立的。有一時期，牠使牠所運用的政黨有一致性。但這種一致性是強迫的，不是自然適合的。牠不能比穩固的勝利或失敗更經久。所以，在衝突的時期，反對民主政治的人為了攻擊民主政治，必須具有「煽動」性質，並且必須允許那否認他們的主要思想的份子加入他們的團體。這種爭鬪的例子。好像在德國國社黨內高林（Goering）與左派之間正進行着。因為高林根本是紀律家，是傳統的普魯士權威的擁護者。但像高貝爾（Goebbels）這類的人，是接近急進派的煽動家，而不是反對急進派的。假如高林得了勢

，舊普魯士主義就要恢復了；假如左派得勝，也許國社黨的政變甚至轉為一種急進的革命？

由以上的陳述可以得到若干實際的結論。常常有人問『言論自由應當允許到什麼限度？』不過。這樣的一個問題是不能回答的。言論和著作自由，是以民治原則為基礎的安定社會制度中最有價值的權利之一。這種自由對於這種制度是不可少的，並且也是很自然的。對於以不完全的民治為基礎的安定的制度，不完全的言論和著作自由也是適宜的。這種制度所給與的有限的自由，正與現時流行的『民主政治』相稱。在另一方面，對於非民治的制度，甚至在牠已穩固的安定下來的時候，言論自由亦是不適合的，除去以言論自由為對付次要的不滿意的發洩之路徑。如果言論自由超過了這個限度，牠就要受到壓迫，因為怕牠引起民治的意識。

但當最後的爭鬥正在進行的期間，特權政體和民治政體都不會有言論和著作自由。因為在這時候，人們的第一個先入為主的成見是要繼續下去的；並且他們現在不能容忍那有損於他們的機會的自由。在這種時候，這兩種政體都要壓迫對方，假如牠能够；並且牠們的最大分別，就是，大約特權政體的實施壓迫較民治政體殘忍，因為壓迫適宜於擁護特權的人，不適宜於民治主義者。當然，在習於施用壓迫的國家，如同俄、德。較在比較有政治自由的習傳的國家，壓迫的施用更甚而且施用得更自然。這種習傳對於加重或緩和這個打擊，很有關係；但是，如果希望自由和容忍不受損傷的存留在任何國家，而這個國家正有敵對的社會制度在爭霸，那只是一種不能實現的理想。

第三章 平等的問題

在歷史上，平等曾一再的被宣布爲民治社會的必需的基礎。但在大多數常識上，沒有一個人認爲一切人都是平等的。人類在僅有人的資格以外，幾乎在一切方面都有顯然的深刻的差別。人類在氣力上和身體的勇武上、在智能上和創造的資質上、在服務社會的能力和志願上，都有根本的差別。或者最根本的差別是在想像力上。當然，許多人類間現有的不平等本身就是不平等的結果——在幼年養育上、在教育上和教育的機會上、以及在純粹身體需要的食物上的不平等。待遇的不平等生出力量的不平等，使某些人充分的發展了他們的天賦。而使其他的人得不到發展他們的天賦的工具。

雖然，如果強說人與人間的一切不平等都是由於這些原因，那是很荒謬的。甚至即使一切人的機會都平等，不平等仍然存在。這是因爲人仍是生來就有差別的，並且也因爲從生下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不同的機會和環境的影響。一個完全包含平等的人的社會，自然是永不會有的，假如這意思是指在一個社會內，一切男女的作事和服務的能力都相等。

這也就是說，我們不能認爲擁護政治和社會的平等的人們。是要一切人在這些方面平等。或能變得平等。社會的平等是指着些與此根本不同的東西。牠實在是說，人類既然在一切方面都可以不平等——尤其因爲人類現在已是

不平等——人類社會的組織的基礎，應當竭力避免在天然的不平等以外再有人爲的不平等，並且在制定社會政策時

，應當竭力承認每個人都有權要求他的快樂和幸福與其他一切人平等。只有爲了促進最多數人的最大快樂和幸福，社會才有權限制個人的權利和要求。

這個原則曾一再的被許多思想派別不同的民主主義者利用。最重要的是這個原則被宣布爲一切人『在法律前平等』的辯護理由，並且也是採行以『一人一票』爲基礎的政府的辯護理由。但是，沒有一個國家的民主主義者曾得以便事件完全依照他們的方式進行，甚至在這幾方面。僅在一個極其理論的意義上，一切人曾是在法律之前平等；因爲，甚至即使事實上法官和官吏對於處理不同類的人能完全無偏，那聰明的人或財力足以用一個聰明律師的人，必然比愚笨的或貧窮的人估便宜。並且在政治上，雖然在許多國家有實際由普選選出的統治議會，但這些『民衆的』議會永遠未成爲國家的唯一統治機關，並且普選的運用亦未能保證真正平等的政治權利，假如牠是在一個以其他不平等爲基礎的社會結構內。

經濟的不平等

社會不平等的真正根基，主要是經濟上的。只要在人與人之間有極大的財產和收入的差別。以致把他們分爲不同的經濟階級，於是他們在幼年的機會就有很大的不同。有的人能變爲康健的、受過教育的、旅行過的、並且習於認爲世界是爲適合他們的便利而製造的。有的人則不能。這樣，人類就不能在社會上和政治上平等。住在陋巷的兒童就沒有那父母能供給好食物和陽光的兒童康健。在學校中，最窮階級的兒童落在家庭較富足的兒童之後。中等教育仍是保留給主要按經濟理由選擇出的少數人。並且少數人從小就學習發號司令的技術，多數人所學習的課程的用

意，是輸入服從的天職和尊敬『比他們強的人』。在這兩種人之間，普通有很大的差別。

此外，有些人是生活在經濟上舒適而安全的佔優勢的空氣中，有些人的生活工具是繼續不斷的不足而且不穩固。這兩種人之間的社會態度必然有極大的差別。實在，後者之中有些人最後將要起而反抗他們的境遇，並且變為急進的或革命的思想領袖；但是，這類的反抗需要很高資質的個人勇氣，並且極多數社會『下層的豬狗』，自然是缺乏勇氣和能力，不能站起來去克服他們的困難並使他們自己在權力上和實效上和那些沒有這種困難的人們平等。少數有勇氣又有能力的人，多半不會停留在社會下層。他們將來要攀登上來，得到一種安全，或者他們當了革命的領袖，或者在原舊的社會制度中為他們自己謀得一個較好的地位。但那比較沒有勇氣而且不能幹的人們就要留在下層，成為社會的『下等』群眾，受上層團體的敵對的感情申訴的玩弄。

在這些申訴中，金錢很有關係。因為宣傳工具變得更多更費錢，所以金錢的作用較任何時都大。現代的新聞紙的收入是依賴廣告，所以牠不敢攻擊牠的登廣告的人，遠甚於不敢攻擊牠的讀者；因為登廣告的人有較長的記憶又有較多的金錢。組織現代選區中的衆多的選民，是一件費錢的事，所以選舉權的擴大或者甚至增加了富者統制貧者的力量。此外，在一個以經濟不平等為基礎的社會中，差不多一切原舊的社會制度都沾染上富有階級的意見，這個階級差不多成為一切方面的領袖。在社會方面不平等的社會中，不平等的習傳有極大的力量；並且那些向這個習傳挑戰的人們，要遇到有力的障礙。這種障礙甚至是在那些很受這種習傳壓迫的人的心中。因為人類是保守性的動物——不僅在他的願望中保守，並且在被動的接受他所明知的災害中，他亦是保守的。

這些習傳，牢固的阻礙着真正的政治平等。牠們是密切的與經濟的不平等連繫着。因為這種不平等對於選擇富者和貧者的兒童使他們在發育期間受很大的差別待遇，有很大的影響，所以牠成爲延長社會不平等的驚人的力量。有些社會確實允許人們極容易（比在其他社會內）從一個階級移到另一階級，以及從某一種收入標準移到另一種收入標準；並且這種移動普通在新的和發展迅速的社會中困難最少，在老社會中最難，尤其是在以田產爲主要財富的地方。反對封建制度的資本主義，在這方面是降低原舊不平等的工具；但是，牠打倒原舊的不平等只是建立新的差別來替代這些不平等。在新興的資本主義中，從一階級移到另一階級比較容易；但牠僅使階級區分的不易變動性減少，却並未減輕經濟不平等的極端性，並且資本主義老大之後，仍趨向於變爲堅硬性的階級區分。這種硬性的階級區分是起於地位和財產的遺傳。在安定的資本主義國家內，『子繼其父受困頓』已不只僅有三代；在極大範圍以內，是有技術的工人的兒童仍變爲有技術的工人，同時無技術的勞工的兒童仍繼續他們的父母作無技術的勞工。

假如我們要有一個社會地位平等的社會，我們能夠建立牠的唯一希望，是以經濟的平等爲基礎。這並不是說，必需所有的男女或家庭都有絕對平等的收入，或收入只按家庭的大小而有差別。日久之後，這或許是受人歡迎的，人們拿牠作爲解決國家財富分配問題的最容易的方法；但牠並不是民主政治所不可少的基礎。假如在財產和收入上沒有了大差別。不至於把人分爲在生活程度上和社會生活的習慣上深刻相反的分立的經濟階級，就可以滿足了。因爲在生活程度大體相同的人們之間，收入上的小差別不足以使一個人有控制另一個人的大權力。亦不足以干涉到他們在其他方面的充分的社會資格——如同在選舉上、在法律之前、或在他們每日的彼此交往等方面。但是，只要經

濟的不平等超過這限度，真正的友愛或真正的民治制度的機會就沒有了。實在也就是失去了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和幸福為目標的社會的機會。

甚至在比較貧窮的人民之間，亦常常有人反對經濟的平等，甚至反對這種緩和方式的經濟平等。他們的理由是說，這種平等違反按照服務性質規定報酬的原則。有人爭辯說，假如這個原則被廢除或受到限制，就沒有了充分的推動力能使人盡他的最大努力。我們現在並不是要問是否社會將有一天能完全廢棄以金錢為推動力，而找到另外的有力的推動力，足以使這個世界上的工作得以完成。但與這個問題十分不同的是，甚至即使金錢的刺激是必需的，我們亦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這種金錢的刺激必需像在大多數現在的社會中那樣大。因為收入愈平等，引起特別努力的刺激的需要愈小。在一個平等的社會內，一個額外的便士或許就等於現在的一鎊的效力。經濟的不平等激增了努力的代價，尤其是在富庶階級之間。這的確是因為，一個人已有的金錢愈多，再添加給他的金錢對於他的價值就愈小。

平等與社會化

在發達的工業社會內，經濟的平等只能由社會領有生產富源的方式得來。私人領有生產富源就等於不平等，這種所有權是重大的不平的基礎。所以，假如我們要有平等，我們必須社會化。

我們必須這樣去作，不僅是爲了得到經濟的平等，而且也是爲了得到任何意義的真正的社會和政治的平等。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和幸福的追求，與承認生產富源爲少數公民的財產，是十分矛盾的。這種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

和幸福的追求，包含着利用這些富源爲增進全體人民的幸福的工具。政治上的民治不能成爲真正的民治，除非牠能真正控制住生活的共同工具。因爲甚至即使一切人都有了選舉權，除非他們在生活程度上、在教育和文化上，是處於相差不太多的水平綫上。他們不能有平等的機會去正確的使用他們的選舉權。如果仍有貧富的分別，沒有一個純粹以治計劃能阻止富人站在人的地位比窮人勢力大。並且亦沒有任何事物能阻止富人或大多數富人，不使他們團結起來成爲保護他們的獨佔要求的一個階級——不能阻止他們支配職業、學校、戲院、報紙，並且亦不能阻止他們創立一個有社會階層的社會。唯有由社會全體去控制生產富源和收入的分配，才能阻止這些事。在一個以承認不平等的權利爲基礎的社會中，這些事是必然的表現。

當然，在任何社會中，有些人必須領導，其他的人必須服從，有些人必須佔着較負責的位置，其他的人在執行工作的命令之下作那些大部分慣例工作。這完全是實在的。並且，在任何社會中，有些人在教育上、在對於生活性質的想像和欣賞上，高過其他的人。這也完全是實在的。但是，爲什麼這些必然的差別應當把人分爲社會和經濟的階級。却沒有理由。一個聰明的人和一個愚笨的人、一個強壯的人和一個軟弱的人，不能因爲這些種類的平等分爲不同的階級。即使一個鄉間紳士的兒子是一個馱子；他仍然是一個鄉紳的兒子，並且被人認作一個紳士。在一個以經濟平等爲基礎的社會中，仍是有聰明的和愚笨的、聖人和無賴、英雄和『可憐蟲』；但是却没有階級的分別。並且領袖的收入要比被領導的人的收入大，亦是沒理由的，除非至少暫時他的需要大或繼續需要一個較大的金錢上的推動力。

這種作負責任的工作即成爲上層階級人員的思想，是兩種力量的結果——一個是私有財產制度，他使得不平等在整個社會的編織中像一條線一般的運轉，另一個是一種社會觀念的存在，他是從以前的局面留下來的。在以前這種局面中階級的分別是根據血統和遺傳。工業社會消除了舊階級的分別；並且能仿照舊階級的分別創造新階級。這只是因爲工業社會承認私有生產工具的要求。並且因此亦允許財富的尋求。他用財閥政治替代了舊日的貴族政治。但是舊日貴族的殘餘能經過財閥的勝利而存在。因爲貴族在好血統上有相當的基礎。而財閥如果失去他們的財富，便什麼也沒有了。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能夠容易的自然的經過社會化的程序。

雖然。所謂沒有階級的社會，並不是指一個沒有領袖的社會。牠的意思是說。在一個社會中每個公民破天荒第一次變得都有作領袖的資格，假如他有領導的能力。牠的意思是說。在一個社會中盡量給與每個人發展這種能力的機會。其方法是盡量廣泛的散佈受教育（廣義的）的機會。並且使事業廣泛的吸收各種有用的才能。常常有人說，一個人民平等的社會將不允許受人領導。但事實上。大多數人在大多數事件上是很願意受領導的，並且在危險中他們給他們的領袖的權威更多。尤其是假如他們的領袖是他們自由選舉的。並且確信領袖們不會爲了個人的利益而剝削他們。在一個真正的民治社會內。領袖制度將要出現。牠絕不會消滅。但牠大半是比較分散的領袖制，與我們所熟習的不同；一個國家的人民如果養育的好，其中一定有較多的意志堅強和有自己的精神的公民。他們願意領導他人。他們有些是在政治中、有些是在工業中、有些是在職業中、並且有些是在生活的藝術方面。

這就是無階級的社會的意義。有些人反對牠，認爲牠與他們的利益相反，有些人認爲牠只是一種理想，並且違

反『人類的天性』。因爲有些人實際上（假如不是在表面上）否認社會的目標應當是增進最多數人的最大快樂和幸福，並且又有些人是悲觀的誠實的，他們認爲大多數人是需要強迫，不是需要領導。我們只需與持悲觀見解者爭辯；並且我們與他們之間的不同點，實質上是不能以爭論解決的。我們對他們說，人類的歷史曾一再充分的證明，普通人民能反應那超過他們目前的私利的申訴，雖然這些申訴只幫助着引導他們入於迷途。甚至國社黨的得勢亦是藉着運用人們反應領袖制的志願，並且牠的一部分成功是由於在表面上能召集牠的信徒去犧牲以及有一種同志的理想。俄國人爲了他們的巨大試驗的較高的目標，在利用人的貪慾和忿恨上遠少於利用人的競爭和服務的志願。階級的不平等毀壞了願服務的心，用種族的忿恨和族國主義的熱情沾污了牠。只有一個無階級的社會才能使全體人員一齊參加那增高整個人類生活程度的工作。要得到政治的平等，我們必須先在經濟範圍內得到平等。要得到經濟的不平等，我們必須先得到社會化。

第四章 工作與閒暇

在任何社會內，所完成的工作的數量，是喜歡有貨物和喜歡有閒暇兩個欲望的折衷的具體表現。如果社會是分成階級，統治階級在習慣上是要自己獨享閒暇，並且設法使臣屬的階級盡量努力工作，好供給他們享受高生活程度的工具。統治階級所能強求的工作數量，按照氣候、可僱勞工的機會、以及本社會中已有的習慣和傳統而不同。同樣，統治階級本身所要作的工作的數量和種類，在不同的社會中亦有很大的差別。在現代文化中，上層階級的婦女所作的工作，隨着資本主義的進展而顯著的減少，尤其是在工廠制度把許多以前在家庭中的工作轉移到工業中以後。在工業文化中，統治階級的人不再像在以前的文化中那樣有閒暇了；因為經濟上的行政終於被認為是適合於『紳士』的工作，這些紳士們同意把他們對於閒暇的要求給了他們的妻子和女兒。正如同韋伯倫(Thorstein Veblen)所指出的，這種代替的閒暇(指經濟行政的工作——譯者)滿足了優越感的欲望，並且使男子得以在事業中逃避了對於狩獵和戰爭的厭倦，因為這兩件事已不能完全佔去統治階級的整個不事生產的時間了。但在最發達的工業制度的局面中，婦女厭倦了她們的閒暇，於是擠進了職業工作。前此的婦女運動，主要是中等階級婦女發起的，她們沒什麼事可作，並且要替她們的能力找一條出路；牠不是由工業中的女工或工作過度的工人階級的主婦發起的。

閒暇的定義，消極的說是逃避必需的生產勞力，或者，積極的說，是在經濟方面不生產的活動。這個消極的定義當然包括的完全一些；因為完全不作任何事把時間混過去是可能的。甚至可以感覺到渴望這類的閒暇，當作以往

的過度工作的安慰，或當作心力的完全休息。但大多數人所主要願意享受的閒暇，是作一些其他事的自由——一些和他們藉以謀生的職務不同的事。唯有強迫工作的時間不太長或不太疲乏，不至使工人在精神和體力上太勞碌，這種閒暇才可以享受得到。少數人或許在他們的職業中得到滿足，在最低的休息或娛樂的時間以外，不需要有作任何其他事的閒暇。但只少數人是如此。——若干藝術家、少數企業家、從事職業工作者、和行政人員，這些人完全『埋首』於他們的職務中。極多數人自然不是如此，甚至即使他們不是不喜歡他們的工作（許多人是喜歡他們的工作的），他們仍然感覺到他們的工作不夠，並且能有很多時間，可以從事於更適合於自己的事情。

在現在的經濟制度之下（除去在俄國），工作的數量和閒暇的數量是由互相衝突的利益的敵對的牽引力決定。工人，尤其是有工會組織的工人。爲了較短的每日工作時間而奮鬥，他們的方法是藉工業行動和要求保護性質的立法，如工廠法；並且在工廠中又有一種繼續不斷的衝突。即僱主想要增快速度並且增加工人的能率。而工人拒絕過度的受驅使和工作程序上的『科學管理法』。在資本主義侵入落後國家的地方，工人們普通都太軟弱，不能拒絕很長的每日工作時間；但是，資本家必須繼續不停的去克服『黑種人』的『天然的懶惰』，並且去誘致工人，使他們熟習工業制度的訓練，藉以趕上先進國家的工人的整齊和速度。因爲即使是無組織的工人，他們亦有很大的一種天然的力量，拒絕增加速度。這碰巧也是爲什麼奴隸勞工常被發現缺乏效率的原因之一。你能驅使一個奴隸去到工廠或田園；但你不能使他工作努力，除去在監督人眼看着他時候。

在先進的工業國家。工人在限制工作時間上得到很大的成功；並且，雖然他們的一部分所得又繼續不斷的因工

作程序的加緊而失掉。尤其是在經濟衰落工會比較軟弱的時候。但在大體上他們已有真正的充實的獲得。這些獲得在心理上有着重大的影響。擴大閒暇時間的成功，造成一種對於使用閒暇的工具的需要，於是刺激起對於較高生活程度的欲望。人們在生產經濟貨物和經濟的服務上所用的勞力愈少，這種貨物和服務的需要就愈多。近來工業的擴展，在那些主要為滿足閒暇的需要的工業產品方面最顯著。

幸而近來工業生產力的極大的擴展，使得對於較多閒暇的要求，在先進國中，與較高生活程度的要求完全適合。但顯然這兩種要求不能被人無限的追求而不至於互相衝突。唯有在生產力增加迅速足以供給這兩種要求的制度中，牠們才能同時擴展。

假如只有這一個限制，顯然我們在這兩種要求上可以有高度的滿足。但資本主義制度的國際競爭性又給與牠們一個限制。因為，假如一個國家在許可較高工資和較短工作時間上超過了其他國家，牠就不能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因此牠的工廠停閉。工人失去了他們的職業和工資。並且必須限制必需的進口貨。因為牠沒有出口貨來償付牠們。因為有這些限制，這個資本主義的世界在享受擴大的生產力的好處上，顯著的失敗了，牠不能藉生產力的擴大來增加經濟性質的財富和閒暇；並且在資本主義的限制以內，較多閒暇的要求變得與較高生活程度的要求互相矛盾。

雖然，假如我們撇開在國際競爭制度中運用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按那些不與外界往來只努力使較高生產品的要求和閒暇的要求成立合理的平衡的國家去下論斷，立刻很顯明的。我們終須在這二者之間下一個決定。這樣的一個國家，少生產貨物就能享受較多的閒暇。或者，接受較少的閒暇就能多出產貨物。假如這個國家是真正民治的國家

，顯然這個影響及於全體人民的問題。須用民治的方法決定。那些被選舉出來在這一點上代表全體人民的意志的人們。按照要求較多閒暇和要求較高生活程度的相對的力量。在這兩種敵對的要求之間。制定一個最好的調和。

假如這個國家不是不與外界往來的。而是必須以出口貨換進口貨。這個問題仍然不變。我們假定牠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如像俄國。由國家公營國外貿易。那麼牠的問題是決定。在為換取進口貨的出口貨的生產工作上，牠打算作到什麼限度。但牠的地位和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不同。即牠生產出口貨在本錢上不受競爭條件的限制。牠能按這些出口貨所能售得的價錢賣到外國，用這筆收入購買外國貨物。然後按照換取這些入口貨的出口貨所必需的本錢。來規定這些入口貨的價格。這種貿易常常被資本主義的商人和政府指摘為「不公平」。如同在俄國木材運入大不列顛的事件中。班乃特（Barnett）先生的指摘牠——但牠顯然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特有的貿易形式。所謂「不公平」只等於說牠不是以資本主義的原則為基礎。

所以。在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工作與閒暇對立的問題簡單化。只是較多閒暇的要求對較高生活程度的要求。在資本主義的國家，這個問題就不清楚了，因為實在就無所謂生活程度。這是由於收入的分配不受社會的統制。所以牠的問題不是全體人民將多工作或少工作的問題，亦不是全體人民享受較多貨物或較多閒暇的問題。而這個問題的一部分，是社會中一部分人民將被強迫努力工作到什麼程度。藉以供給另一部分人較多的貨物和閒暇，並且要能與其他資本主義的國家競爭，好避免失業。當然，甚至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如果工人努力工作，他們常能得到增多生產所增加的利益的一部分；但這要看國際競爭的情形如何，並且常常是工人所得的利益少於生產力的增加的比例。

。此外，在競爭的資本主義之下，某些工人的生產額增加，常常等於使其他工人失業。

在這些情形之下，工作與閒暇的問題不能用合理的方法解決。在一切先進國家，生產力雖增加，但未得到甚高的生活程度和甚多的閒暇，這是很可笑的。必須一個社會能自由的充分利用牠的生產富源到閒暇的要求的限度為止，唯有在這樣的經濟制度內，這個問題才可以解決。這就是說，必須在社會主義的制度內。

有人反對說，在社會主義的俄國，工人的生活程度比在大多數先進國家低。這並不能駁倒以上的論斷。當然俄國工人的生活程度比在大多數先進國家低；因為俄國在經濟方面仍是一個落後的國家，仍然是在『工業革命』的開始階段。而大不列顛至少在兩世紀以前已開始這種革命；此外，俄國人企圖加緊發展的程序，使一個遠高於以前的生活程度成爲可能的。所以他們審慎的降低他們現在的消費程度。爲的是使資本迅速積聚起來——有些人習於唾棄社會主義。他們的理由是說社會主義的國家永不會同意『儲蓄』。俄國的這種事實，在偶然中回答了他們。俄國現在仍然很窮；不過牠是唯一的國家。有把握不會缺少消費力。不論牠的生產力增加得如何快。

現在在俄國。多量貨物的需要是如此迫切。以致暫時將閒暇的要求擱置在背後。但是，只要那更迫切的貨物的需要滿足以後，立刻閒暇的要求就可以恢復。隨着牠又來了另一個問題——即工作的性質和數量的問題。人們必須作的工作，有許多是極單調的，有許多是極使人厭惡的。因爲人變得教育程度高了，並且變得對於生活的性質更吹毛求疵了，於是這類工作的使人厭惡性更增大。在任何民治的國家內。工作方法的性質問題必然要變得很重要。人們愈來愈堅決主張，機械的使用不僅是爲增加貨物的產額。而且也要使製造貨物的方法的厭惡性減少。很明顯的，

假如在機械的這方面的用途上，和拿機械爲減輕本錢的工具上，用同樣的注意力，就可以大大減輕工人的負擔，即便撇開工作時間的減少不論。

雖然，在若干限度以內，人們必須在有生產力而單調的工作方法。和使人不很厭惡而又生產力少的工作方法之間作一選擇。但是，假如工作時間能够大大的減少並且能有極多的放假日——爲什麼一個社會能無限制的（除去人們工作過度）利用牠所有的生產富源，而不能減少工作時間和增多假期。這是沒有理由的——若干工作的單調性就要變爲極不重要的。因爲有些工人不像其他工人那麼注意工作的單調性；並且有充分用的工人將選擇單調的工作。假如這些工作有較多的閒暇。

前此所提到的閒暇，都是假定牠完全不生產經濟性質的貨物。但是，牠爲什麼應當不生產經濟性質的貨物，却沒有理由。如果一個社會已解決了一般的貧窮問題，並且已使全體人民有了豐富的閒暇，就有遠多過現在的人數，用他們的一部分閒暇時間去作一些事物。他們在作這些事物中能得到積極的快樂。或在作完使用牠們的時候得到積極的快樂。現在，有許多人用他們的閒暇種田園。一部分是因爲他們喜歡種田園，一部分是因爲他們喜歡花、果實、和青菜。許多人繪畫或寫作。製造無線電收音機或修補機器。都是爲了娛樂；並且強迫工作時數的每次縮小。都擴大這些『餘暇』職業的範圍。一個已解決了貧窮問題的民治社會。或許十分依賴着從事於餘暇時間的生產。因爲這種生產範圍的擴大，多半愈來愈侵犯到工廠。以個人的選擇和娛樂的產品代替了大量生產的貨物。凡在個人產品確真正有使人滿意的優點的範圍內，都有這種代替作用。便宜的電力的散布，有助於這種發展，使『業餘作品』容

易成爲像工匠作成的物品，受用者和製者的欣賞。

但是，雖然有永在增加中的生產各種貨物（從農業原料品以至於已成的高度工業貨物）的力量，我們的社會仍繼續強迫牠的多數公民作繼續不斷的令人厭惡的工作。這種工作使得他們沒有使用閒暇的能力。或者社會強迫多數公民受損毀精神的失業。這種失業與閒暇是正相反的。因爲失業使他們無法利用空閒時間。在競爭資本主義所有的情形之下，這個問題是不能解決的。這個問題的解決，須有一個合作的民治社會，盡量利用牠的擴大的生產力所供給的財富和閒暇的機會。

卷五 未來的展望

第一章 政治行爲

研究人類的政治行爲，須從兩方面下手——人門對於政府以及他種社會機構的態度。和他們的參與這些事情。自然，人們在這兩方面的行爲如何，與他們生活於其中的政治制度有很大的關係。議會制國家的公民，除非他是一個很活躍的政客，他以爲他的參與政治，第一就是行使選舉權。選舉一個議會或是選舉好幾個。極少以爲他們參與政治是藉自動的組織和運動爲工具。立刻給政府一種壓力。在另一方面。有政治頭腦的公民多半要最先想到他所參加的自動組織。想到他所隸屬的政黨或其他團體。想到他自己在政治的討論和宣傳中的活動。假如他不僅是一個積極的政客。而且是一個當選的代表或官吏。他最先想到他在其中工作的機關。以及這個機關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

但是，當人們想到政治的時候，他們不僅想到他們的參加（大處或小處）。而且也想到政治機構。以爲牠有別於他們自己以及他們個人的或團體的活動。在議會制的國家。他們心中以爲政府是國家的行政機關，由文官（Civil Service）執行政府的決議，並且在議會之前提出政策。其次他們以爲省市議會和牠們的官吏、法庭和警察。都是這種行政機關。在君主制的國家，或在一個有權力人物統治下的共和國。他們也有一種國家首領的積極的感覺。這個首領或是一個有極大社會榮譽和能招致忠心的形式上的首領。或是一個這類榮譽較少的實際的領袖和政策的指導者。

○
當不甘心的少數民族或社會中的少數人，臣屬於一個他們對之沒有忠心和同類感覺的國家，這種對於政治機構的看法，變爲對於仇敵的權力（壓迫力量的具體表現）的看法，甚至即使這個政治機構亦相當的對人民服務。這種同樣的態度亦可以存在於某些人之間，他們對於國家的敵視不是一個受統治的種族的敵視，而是一個受壓迫的階級的敵視。他們完全否認現行的社會制度對於他們的忠順的道德上的要求。俄國的無產階級對於帝俄政制有過這種感覺。他們未失去作俄國人的意識；但他們不使他們的國家情緒與帝俄的國家相連繫。

族國主義與戰爭

在戰時。大多數人的政治意識都經過一種重要的變化。除去根據政治的或宗教的理由出來反對戰爭的團體以外，人們漸以國家爲一個極與民族符合的社會。不以爲他是他們身外之物。在種種的程度之下，戰爭顛覆了他們的生活的正常方式，並且使他們明白國家團結的意義。站在這個觀點上，不論他們的政府的動機是好是壞，不論國家的憲法是否是民治的，都沒有很大的關係，只要他不十分離開了他們的同情，以致毀棄了他們對他的忠心。大多數人一向在戰時聚集於國家之下。雖然在和平時期他們對於政府是反對的。這可以由一九一四年各社會主義的政黨的行爲明顯的看出，甚至在大多數社會主義者之間。國家的情緒亦證明爲極有力的。國際的階級團結一致不能與他相抗衡；並且各國中對於國家情緒的反對，只因戰爭延長才逐漸復活，厭倦和醒悟才開始侵入原來的國家團結一致的感覺中。

族國主義的情緒在大多數沒有政治頭腦的人民心中是很強烈的；但是。只有在人們感覺民族有危險的時候，這種情緒才與國家機構連結起來。牠可以被用於反對國家以內的份子（尤其是如果可以用國際主義的罪名譴責他們），正如同可以被用於反對外國。義大利與德意志的經驗已明顯的將這種情形表現出來；並且一九二六年不列顛的大罷工，對於一部分英國人亦有這種同樣的但程度極淺的作用。但是。除去國家受威脅的感覺能注入人心中。社會中沒有政治頭腦的一部分人民，在習慣上不以為民族和國家的機構是一件事。他們傾向於認為國家是『牠』，不是『我』，雖然甚至在和平時期他們頗傾向於以為國家的對外政策，是全體人民的政策。因為外國人永遠是『他們』；並且與外國政府相較，本國政府就變成『我們』。

一般人的政治

撇開戰時心理不單獨討論。而先討論平時一般公民的政治態度，比較最容易。關於一個公民我們第一件要注意的事。就是他在政治上用的思想力很少。他或許在報紙上讀到牠們，並且對朋友和熟人們討論牠們；但他並不常把牠們看得很嚴重。不認為牠們是與他有密切關係而且他必須繼續不斷的參加的事情。對於大多數人，政治只是一件很遠的事，他們對於牠所發生的大多數事件和牠的機構無興趣，並且不以為牠是一個繼續不斷的對他們有關係的事，甚至在選舉的時候。雖然現在有稀薄政治興趣的公民較以前的比例大。當然，永遠有少數人是政治頭腦的；但我們現在所說的不是指他們。

這種常態的對政治不關心。在一切階級都是一樣。自然。有些部分人民受他們的環境的領導，對於政治比別人

注意，尤其是如果他們的職業的性質（或者不必有這些職業）使他們常與政府的活動接觸。但是，甚至如此，亦是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表示出對政治有興趣。一個人假如失業很久，他很難不去注意『津貼標準』；但這決不包含着他在其他方面亦是一個敏銳的政客。一個收稅人可以深切的注意關於執照的法律。或者一個營賭業者可以深切的注意關於賭賽的法律。但他們很少有進一步的政治興趣。竊盜們雖然因為他們的職業使他們對國家發生繼續不斷的關係，然而他們却是最不關心政治的人，並且監獄裏的人亦不會變爲熱心的法律改革家。而仍是對於政治持簡略和習俗眼光的人。

有人說，工人階級比其他階級富於政治頭腦，因為這個階級已能獨自成立起以廣大民衆黨員爲基礎的政黨。這是鼓動性的說法。雖然事實上大多數先進國家工人階級中的少數有政治頭腦的人，較其他階級中的多而且活躍。但這並不能表示多數人對於任何繼續的政治興趣有感覺。工人階級有階級團結的感覺。但這種感覺大部分是本能的，不是有充分意識的或理性的；並且因此也不能引起繼續不斷的政治意識。在其他階級中，也需要一種危機，方可把本能的階級團結一致變爲有組織的政治活動。但是，比較富有的階級，因爲人數較少而且教育程度較高，在時機到來的時候容易集合，在受攻擊的時候，他們爲了保護他們既得的利益，他們的階級團結一致甚至比工人階級更顯著。此外，爲攻擊而集合人，比爲保衛而集合人難；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中，通常工人都是攻擊性的黨。

這種大部分公民的缺乏繼續不斷的政治興趣，其原因在於政治制度的運用的根本。這些自認爲民治的政治制度，大部分是建築在人是政治動物的假定之上。假定人們將準備以嚴重的態度看待政治。實際上，議會制度的能運用

，和其他更專制的制度一樣，正因為這個假定是錯誤的。在議會制度的情勢之下，領袖們越過了有政治頭腦的少數人，而訴之於無政治頭腦的多數人。這種力量繼續不斷的拘束了有政治頭腦的少數人的勢力，因為多數人受標語的影響比受理論爭辯的影響大的多。並且精巧的宣傳常常能使他們起紛擾。以人與人相比，少數人的影響比多數人大得多；但在少數人的不同份子之間，產生出政治領袖，他有能力訴之於其餘的人民。少數人急切於努力使一個爭執得到最後的決定，政客們却很喜歡把棘手的問題擱置起來。可是少數人常被政客們打倒，如果多數領袖同意要把一個問題擱置起來，他們常常能辦得到。只要他們能使社會的機構充分有效率的運轉起來，供給人民食料。但是，如果社會機構毀壞。多數人大半要被迫集合在少數人中的各種份子的背後。因為，我們已知道，生活工具的被否認，最能迅速使民衆變為政治的動物。

積極的少數人

在議會制的國家，敵對的少數有政治頭腦的人，永遠是企圖捉住無政治頭腦的大多數人的注意和擁護。至少也要得到他們的消極的附和。每個少數人的集團都要人選舉他們。並且要阻止人投對方的票。他們在宣傳的時候是將有理性的政治辯論與沒理性的申訴並用；並且在這兩種中，牠全企圖訴之於感情和知識。在實際上，較有理性的申訴常常能使這種少數人增多，而不能說服多數人，並且能使宣傳更動聽，但是，沒理性的方法却比有理性的方法能多得選票。或者這種情形在英美二國比在法國更符合，因為法國的政治教育比較散布的廣。然而，這對於德國顯然也符合，雖然牠的一般的教育程度很高；因為德國人在政治方面是富於情感的人民。

所以政治宣傳家的技術只一半是有理性的技術。實在，政治的宣傳有兩個目的和兩個方法，雖然牠們常常不被人分開，當然也不能完全分開。使有政治意識的少數人增多和使不關心的多數人浸染政治，需要不同的技術；但這兩類人對於一個政黨的成功，都是很重要的。因為一個政黨需要宣傳黨義者，也需要散布廣大的擁護者；牠必須以很不同的方法去取得這二者。

如果說任何政治制度都能使多數人民長久變爲有政治頭腦的人。却未必盡然。政治活動的散布廣闊，主要是一種社會的衝突和轉變的現象。只要人們感覺到有一個政體穩定下來，多數人就要對於牠的運用一點也不繼續注意了。當然，有些政治制度要比其他政治制度所產生的有政治頭腦的人數多；並且那些真正信仰民主政治的人們，主張政治制度的設計，應當是能引出最多量的積極的參加和合作。但是，甚至最民治的制度，假如牠已竟安定不來，亦將只能有少數公民繼續注意政治。大多數人將去作別的事；但建立一個民治的世界需要各種的人。正如同建立其他事業需要各種的人一樣。

議會制度雖然有牠的顯然的民治性質。但牠的設計却不是刺激大部分人民繼續有政治興趣。盧梭(Rousseau)說英國人只是每七年自由一次；並且，一個人必須在兩次自由的期間甚至等候五年。我們不能希望他在自由的時光到來的時候，能有充分的準備去利用他的自由。俄國的蘇維埃制度對於努力刺激繼續的政治活動一點上，好像比議會制度已進步的多。因為牠繼續不斷的把必需的政治工作，加在牠的巨大而有組織的政黨的全體黨員身上。並且因為蘇維埃的本身，以及蘇維埃制度中的其他公共機關，都是時時在藉新選舉更換新人員，並且是時時大家在一塊辯論

政事。在這種辯論之中，極多的人有機會參加。其人數遠超過在任何議會制的國家。當然，蘇維埃制度的這種不停止的辯論，一部分是因為事實上他仍然是在一個大的社會轉變的醞釀階段；等到這個制度穩定之後。也許他的活動就傾向於萎縮。但是，俄國人增加了他們的行使一部分政府權威的集體組織。這，一方面也就是審慎的創立下一種最能引起人積極注意政事的機構。說獨裁制下的俄國的社會組織是世界上最民治的，就是這個意思。

俄國的政治

當然，『集體組織』的這種及於一切的活動，不僅是政治機構改變的結果。而且主要是社會制度改變的結果。蘇俄的國家是社會主義的，所以他所要作的工作遠多於其他國家，並且需要極多的機關來執行他的工作。在俄國，政治的範圍遠大於在任何國家。此外，俄國已沒有階級差別。只有農民和城市居民的差別存在（共產黨正設法竭力在短期內廢除這種差別），這消除了集體行動和集體討論的一個大障礙。如果每個人都是社會中共同工作的一份子，並且一切能够這樣組織的事都組織為公衆服務的一部分。這樣就可以有最多的機會，引起散佈廣大的繼續不斷的政治活動。

政治與社會制度

人們對於政治的意見大部分是他們在其中生活的社會制度的產物。設其他情形不變，政府的職務愈狹，愈沒有理由使大多數人民對於政府的職務注意。當然，這不適用於因有特殊理由而注意政治的人們。譬如說，他們受到特殊的壓迫或很重的租稅，因此不論國家的職務是廣闊或狹窄，他們同樣的對政治注意。在這個因素之外，國家職務

的增廣，顯然傾向於刺激公衆注意政治；因爲國家的活動的每次增廣，就是把以前的私人的事變成政事，所以引起前此在政治範圍以外的注意力，現在轉而注意政事。這並不是說，以前所引起的注意現在完全改變爲政治形式的；因爲國家在接辦一個活動之中，有時使牠的運用大部分成爲機械式的，所以人們對於牠的注意已不甚需要，或是不易引起。『社會化』的職務之一，是使那些依慣例去作可以得到效率的必需的事務，變爲機械式的，免得一般人對這些事費心思。如果有一天，供給我們經濟需要的各基本方面，大多已『合理化』，因之我們平常完全不用再爲牠們費思想，並且可以自由的把我們的精力用於生活藝術的其他方面，那才是幸福的歲月。

但是，『合理化』的程序不能不是由漸而進的，雖然生產力的進步繼續不斷的使牠成爲可能的。總之，在國家所擔任的職務或在公家統制下進行的職務內，須有不同政策的餘地，並且給執行這些事務以外的人，留下注意的餘地。因此，公家活動的推廣，常常傾向於增加人民對政事的興趣。

尤其是當重要的事務直接變爲一種政事的時候，這個原則更適用。市政府在房屋問題方面的活動的增大，成爲增加人民注意市政的一個重要因素；國家執行社會事務的興起，同樣的使大部分人民注意國家的政治。

不過另外還有一個因素。人民對於政治興趣的興起，不僅在乎公家統制下的事務的範圍和性質，而且在乎這些事務的執行的方法。現在有一種趨勢，就是當一個新事務被政府担任上的時候，把這種事務的管理託付給一種『非政治的』公司或委員會，爲的是竭力使牠的工作避免政治干涉的『危險』。但是，雖然防止政治干預管理的細節是合人意的，同時，除非一般人有機會發表他們關於經營公共事務的意見，他們的政治興趣不能被引起。要想避免政

治的干預，就等於設法阻止民治性的統制。並且熄滅政治興趣。或許實在是，議會中的質問和不時的辯論的傳統方法，對於使一般人能影響政策。不是一個滿意的方法——要達到使一般人能左右政策的目的，這些方法事實上多半是無效的。但是，假如我們要民主政治，那麼補救的方案不是廢除干涉的權利，而是改變干涉的方式。

真正的民主政治

要使這種改變干涉方式的工作有相當的完成，須使每個社會化的事務都有有效的機構，經過這種機構，有關係的消費者和從事於這種事務的大部分工人。能繼續不斷的影響並且批評管理人的政策。但是，不僅機構有關係，而且更在乎藉公共事務的整個範圍，散布一種合作活動和建設批評的精神。使每個工人或每個工人團體，感覺到他們的工作很有關係，並且感覺到在質的方面改進他們的服務的責任，是在他們自己身上，是他們個人的或團體的責任。觀察俄國經濟情形的人們。最注意建設的批評精神的普遍。這種精神因社會的平等得以普及新情勢下的俄國工業的一切部門。

這種精神的存在，不僅對於工業的福利重要，而且對於整個政治制度的質的方面也重要。因為那些被鼓勵去發展並批評他們自己所從事的一部門公共事務的人們，同時多半也對於其他部門的工作有積極的興趣，並且對於政治亦有積極的興趣，因為政治通常就是這些公共事務的總和。

社會主義把一切重要的社會事務都改為公家經營，所以牠是要在引起社會的集體政治意識上，超過其他任何制度，尤其是假如牠實際上是一個民治的社會主義，審慎的竭力以可能的方式把責任廣為散布，並且竭力多使公民們

參加政府的積極方面的工作。這不僅須有民治的政治制度（這或許是這件事中的最小的一部分），而且須在社會事務和經濟事務的一切部門中，建設起民治的機構和民治精神。同業組合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的力量，最重要即在於堅持這種需要。

因爲民主政治是一種性質，這種性質不是屬於社會組織的某些特殊方面的，而是屬於整個社會組織的。一個民治制度的造成，不能僅借着創立一個民治的議會機構——雖然甚至這件事，也沒有一個議會制的國家會真正完成——而是要使民主政治滲入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顯然這在資本主義之下是不可能的；因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關係，就是否認民治性的平等。並且在國家社會主義的政體之下，也不能作到這一步，因爲這種政體把權威集中在政府和他的行政人員手中。唯有在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中，才能作到這一步。這種無階級的社會，審慎的去盡量廣大的分散責任，所以牠許可範圍最廣的『機能』自治，並且鼓勵自下而上的從各界來的批評。在任何社會中，如果一個人爲了服從他的工作的管理人，不能在管理人有愚笨行爲的時候無所恐懼的指出他們的錯誤，並且不能站在社會平等的地位提出關於他所從事的工作的改進意見，這個社會就不會有真正的自由或民治。

假如我們的目的是要得到民主政治，這樣的社會就是我們所必須建立的。甚至在這些情形之下，我們亦不是要使一切都成爲有政治頭腦的；甚至我們亦無須想要使他們如此。雖然，我們要繼續極度的擴張社會中的政治興趣的範圍和深度。我們將要使更多的人民確實留心政治並且企圖明瞭政治；我們將要保證任何確要參與政治的人，都可以受到鼓勵，去盡他的那部分責任，不會受到政治機構的嚇阻，政治機構亦不會認爲他的干涉是有害的，並且亦

不會盡力限制他的機會。當然，假如我們不要真正的民主政治，我們就不企圖設立這種社會；但是，任何人如果稱他自己爲民主主義者，而又不以這種社會爲目標，那麼他不是一個傻子，就是一個僞君子。

現在我們可以回到這一章的原題。人們的政治興趣的範圍和積極參加政治的範圍，是隨着一套很複雜的因素而變動。設其他情形相同，人民對於政治的興趣。在社會狀況不安定的時候，比在社會狀況比較安定的時候大。設其他情形相同，公家的活動範圍和企業範圍的每次擴大，都可以使人民對政治的興趣增加。設其他情形相同，經濟的平等可以使人民對政治的興趣增大加深。最後，政治興趣是對於刺激的一個有條件的反應。社會制度的設計可以是去盡量增大或縮小這些刺激；並且凡對於刺激政治興趣下最大努力的地方，人民對政治的興趣亦最大。這種刺激不僅是憑藉着一個單純的政治機構，而且是憑藉着社會的一切活動。根據所有的這些理由，所以，社會主義在牠的潛伏性上是最民治的制度。

其餘我們所要討論的，就是在戰時或在戰爭的威脅下，政治意識的特殊問題。我們已知道，戰爭刺激某些政治意識，因爲牠大大的增加了政府對於私人生活的干涉，並且更因爲牠引起人類原始式的抵抗『外國人』的國家統一的感覺。這兩種刺激的作用是不同的。第一個容易變成引起不安和反亂的因素。並且在戰爭延長的時候這個因素更增大。第二個的作用，是幫助政府對付任何不準備以『國家的主張』爲他自己的主張的人。這個因素是極不容忍的和感情的，所以也是無理性的和不接受批評的。牠有一種非常的力量，能使人相信那些對牠有益的謊言；並且牠的推進，平常就是藉着爲牠設計的誇張牠的效力的宣傳。不過，牠需要繼續不斷的一再的刺激，牠才可以不衰弱；並

且在長期戰爭之中，宣傳的資料容易用盡，所以與牠敵對的刺激就得到了機會。長期的戰爭對於國家是危險的，因為無理性的衝動傾向於衰弱，並且理性的批評的力量根據了戰爭的痛苦，隨戰爭的延長而加強。然而恨外國人和護羣的無理性的力量，在大多數國家的人民中都是很強烈的。

戰爭根本就是一件傻事，從事於戰爭或預備戰爭的政府，永遠怕聽見理智的呼聲，並且要盡力抑制牠。批評受到壓制，危險的有理性的人受到驅除。此外，戰爭的情勢使政府不得不在獨裁的權力之下；作迅速的有決定的動作，並且暫停或減弱正常的進行方法。這縮小了有政治頭腦的人的機會，他們容易在被壓迫的沈默之下感到苦悶，並且一得到機會就發揮他們的批評，除非他們被編入前綫軍隊或側綫的宣傳部。並且，把煽動家送到戰場中的方法，亦非永遠是一個安全的辦法。在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人和俄國人都試過這個方法；並且他們的這種辦法都成爲損傷軍隊的『忠心』的一個重要因素。有些政府把煽動者槍斃；這或許是危險最少的路途。假如不滿意的情緒尙未散布廣大。但這也有牠的危險；因爲只有俄皇的政府曾用槍斃民衆的方法；並且沒有得到效力。

戰爭使族國主義者聯合起來，並且給與他們一個增高了的國家統一的意識，但戰爭亦使反對戰爭者堅結起來。在每個國家中，反對戰爭的人知道他們是被人恨的下流的團體，於是被迫彼此結合起來；並且因此他們的合作的權力大大增高。這就是爲什麼戰爭不僅容易造成一種使革命可能的情勢，而且容易使一個團結的革命領袖出現的理由之一。在平常的時候，『左派』可自由的彼此爭論；戰爭却使他們聯合起來反抗國家。

所以，政治意識是一種複雜的東西。但是，除非我們明白了牠的情狀和形式，我們甚至永遠不能明白實際政治

制度的真正運用。因為國家機構的意義，全在於運用牠的那些人的態度或受牠統制的那些人的態度。這就是爲什麼移植的制度在採行牠的國內常常不能運用的原因，雖然採行牠的國家完全依照這種制度在牠本國的方式。一個選民大會能夠給與任何國家一個議會，一次革命也能給與任何國家一個蘇維埃政體。但是否牠們能運用，繫於必須生活於其中的人們的心情和精神是否能運用牠們。

第二章 民主政治的問題

在本書之中，我們曾一再的觀察到，在現代世界上，政治範圍幾乎有使人不相信的迅速的增廣。這一部分是現代生活的增長着的複雜性的結果。文化，特別是工業文化，繼續存在的條件，是許多種無數的組織的綜錯與調和作用；雖然只有少數國家已像共產主義的俄國那樣，把所有這些組織直接置於政治制度範圍之內，同時我們可以確切的斷定，把這些組織的職務完全留給上天的慈善指揮或受私人利益的支配的時期已過去了，假如不是永遠不再來。至少在一個長時期內也不會再來。政治正在日甚一日的變成，並且將要變成，一個更廣大的和更複雜的事情；有思想的人們漸多承認這個事實，這使得像本書這類的書籍可以找到銷路。

這種廣大性和複雜性含有若干特殊的問題，等待民主主義的思想家來解決。這種問題可以大略分爲專門化問題和人類的懶惰問題。在一個真正的民治政體中，假如不是全體公民，至少多數公民不僅是被動的，而且自動的參加社會中的活動，不僅交納租稅和服從法律。不僅隔些時選舉一次和在兩次選舉之間怨恨政府。而且要積極的共同作社會的工作；但是，這種積極的公民性，在一方面需要有能力 and 興趣。在另一方面需要對於許多種不同門類的事務有日多一日的專門知識。在前幾章中我們曾指出，在大多數國家內，多數人對於政治是懶惰的，並且不關心他們的政治組織的運用；或者有人更可進一步說，多數人完全對於任何組織的運用都沒有興趣。所以民主政治就好像有一個顯著的懶惰趨勢。或者充其量人民對於政治的興趣亦是間歇的；結果，實際的權力常常落在好事者或事務官或純

粹煽動家的手中。所有這些結果大都是不良的：好事者容易把任何組織都可變為改進窮人狀況的會社，造成極多的騷動和粗鄙的干涉，事務官容易把持一個冗贅的官廳，這種官廳使他所應付的一切都傷心，並且毀壞了他們的忍耐心。煽動家容易一步一步的變得使人疑心他像一個獨裁者。甚至即便這些極端情形都不會發生，大多數人都厭惡「職業政客」，這些職業政客終身所作的事。是民主政治所應當自己作的事，並且他費去許多時間和許多虛偽的贅言，向這個民主政治中的人員保證，選舉他實際就是他們自己統治自己。並且職業政客亦不限於真正的政治範圍內；每個大大小小的組織都有他們這種人。

實在，在像我們自己的這種社會中（人民在名義上政治地位平等。在財產和教育上有很大的差別）。這些現象更厲害。如果在一個社會中。許多人民太窮或太無知。不會追問好事者、事務官、和煽動家的資格。不能看穿他們的博人喝采的言辭。不反對他們的傲慢，在這種社會內。他們最容易成功。無疑的。如果一般的政治教育程度高，多少總可以制止最粗俗的煽動家的權力。但是。假如財富的不平等和階級的區別仍存在，一切教育制度都於事無大補助。我們不能說一個受過教育的英國人。尤其不能說一個受過教育的美國人，特別能不受別人的訴之於感情的煽動；並且我們近來看見一個教育制度頗受人推崇的國家，全國整個的寄托於一種最誇大的民衆情緒上。

此外，甚至即使階級的分別廢除了，或大大的減弱了，這問題亦不能消滅。人類天性中無理性的成分太大了，我們不能希望不借助於強有力的花言巧語以及道德的和知識的（假如無需體力的）威嚇，能說服人，使他管理他自己的事務並且推動社會。邊沁（Jeremy Bentham）認為每個人的行為都是依照他對於他自己的利益的有理性的計算，

這種簡單的見解顯然最不真實；事實上，研究近年來的政治事件，就可以知道理想的動機，尤其是假如牠藉着顯然可怖的方法向顯然不可能的目標引導，對於人類行動的影響，其力量遠大於個人利益的理性的計量。這個結論或許並且多半是太悲觀了；但是，這個動機問題，亦即如何說服人或如何誘致人以嚴重的眼光看待政治的問題，仍未解決。

這個問題必須解決；並且假如太注意在有理性的方面尋求，是不會得到解答的。幾百代以來，歐洲（以整個而論）就是在宗教的力量之內尋求政治動機的力量，而宗教的力量原本就是無理性的。大多數人都知道中世紀社會制度的根本的宗教性質；大多數人都知道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的發展，很受宗教改革（Reformation）的力量幫助；但是，能認識福音主義基督教（Evangelical Christianity）和維斯利監理會教（Wesleyan Methodism）的推動力量，對於造成工業的英國和工業的美國有如何重大的作用，却比較人少。雖然，在十九世紀之末，這個力量大部分已消失了。宗教在那時正在變成一個過時的東西；那種殘存的宗教感覺正在消散於許多小得無足輕重的祀典之中；並且在二十世紀初期，有許多人斷然預言牠將完全消滅。

宗教並未消滅，雖然牠的力量遠小於有基督教以後的任何時代。牠的力量仍然足以使有組織的教堂成爲從來唯一抵抗國社主義（Nazism）的力量。但是因爲牠已衰敗了，牠的地位被一個同樣沒理性的情緒佔去，這個沒理性的情緒就是誇大的權威族國主義。真正熱心的法西斯主義者或國社主義者，是同樣的不接受辯論，如同熱心的加爾文主義者（Calvinist）；假如斯文伯（Swinburne）在現在寫作，他將嚴厲的譴責族國主義的使徒。正如同他以前的嚴厲

譴責天主教。實在，希特拉尙未用火刑燒死任何人；但這多是因爲幾世紀以來所興起的人道主義的習傳，須經過長久時間才能除盡。不是因爲希特拉對於使他的敵人受痛苦的死刑，有任何真正的反對。法西斯主義像惡魔一般的衝進了宗教留下的空位；牠是否是一個比較使人喜愛的替代，是很有疑問的。

不過，西方的民主主義者必須設法找到一些强有力的動機，足以使人奮發起來，爲共同的幸福而努力。俄國的共產黨是從來唯一的團體，能用一種既非宗教又非族國主義的理想鼓勵一國人民；並且沒有人能否認，俄國人爲達到這個目的，曾大大的利用（或許是不可避免的）無理性的甚至蒙昧知識的申訴。實在，俄國馬克思主義的信條在內容上所包含的知識成分，比墨索里尼的信條所包含的多，而比國社黨的信條高得更多，因此牠應當得到較大的敬仰；但是，牠的凝固成一種教條和一種儀式的危險，亦是不能忽略的。

這好像就是說，相信民主政治的人必須爲他們的運動找一個感情的申訴，這個感情的申訴不是宗教的或權威的，但須是强有力的，足以得到穩固的和繼續不斷的努力，並有經得住一再失望的力量，這二者對於一個平等社會的建立和運用都是必需的。這樣的一個申訴不是用任何方法容易找到的。舊日的社會主義者和早年的功利主義者，同樣未找到這種申訴，這一部分是因爲他們都過於是唯理主義的和唯實主義的；他們假設人類是受以理性方法計算利益的推動，並且假設期望增加物質的舒適，是人類所願意要的主要利益。這實在是錯誤的。無疑的，在大體上，人是喜歡物質的舒適，不喜歡物質的不舒適，並且大多數人都一致認爲，在某種水平線以下的物質的污穢和貧窮，有使人變爲殘忍和墮落的影響，因此爲了文化的進步，提高生活程度是必需的；但是人類不會熱切的爲經濟利益的本

身而犧牲了他們自己。至少，少數人不如此；並且很少數這樣作的人，普通都被其他公民認為有點瘋狂。

但是，是否要求自由和平等的心願能引起一種熱切的信心，足供我們的目的使用？假如牠不能，那麼人類的希望也就實在很小了；在世界史中已有許多的例子，表明牠給人好希望。雖然，牠不要太理性化了，或者變得不能忍耐牠的許多信徒。因為他們需要彩色和運動、歌唱和行軍、甚至需要『動人的材料』。使他們的熱心保持不變。實在，儀式和詞藻是有雙重價值的武器——雖然牠們的價值不多於思想——因之使用牠們亦有若干危險；但是。為什麼讓惡魔（指法西斯主義——譯者）應當獨具一切最好的演說和最美好的遊行隊，以及獨具一切最好的腔調，都同樣沒有真正的理由。那些除盡了民治運動的一切彩色和一切感情的人們。（他們恐怕否則他們會鼓勵人穿黑衫用橡皮短棒）有一種很大的危險。就是他們同時也除盡了民治運動的心靈。只餘下委員會開會的紀錄。『紅旗歌』或許不是一個好聽的歌；但紅旗的本身確比石板色的旗幟更激動人。

雖然，使人的感情力量與感情的時時受理智的制裁合併起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是擁護民治的平等的人們所必須擔任的艱難工作之一；並且這是必須完成的工作。假如不使感情的申訴自消耗或轉而幫助了惡魔的目的。民治的平等在本質上就是指傾聽別人的言論。並且準備修正或變更自己的意見；假如在轉變為民治的平等制度的進程中。證明必需劇烈的剝奪了討論和反對的權利。我們必須不要忘記。這是一種使人不快的和危險的必需。並且應當竭力在可能的最早的機會把牠廢除。不過牠也不會完全被廢除。至少在我們能預料到的任何社會內。牠不會完全被廢除；因為討論政治的目的在引起行動。不在使熱心本身完全變為散沙一般的無窮盡的委員會會議；並且任何社會。

不論如何民治，也必須給純粹防害性的事物立下一個限制。但是，在大體上，它的傾向不是防害領袖，而是準備立即接受牠。以本質論，民主政治在行動上較獨裁制慢；但這不一定就是一件壞事，無論在什麼時候。

第二個問題（即專門化的問題）的性質就不同了。沒有一個人不認為現代文化的複雜性使政府的事務變得極其精細，並且把許多需要專門知識和多量經驗方能解決的問題，帶入政治範圍以內。當然，在某些方面，現代社會必須僱用有特殊訓練和資格的專家，來解決這些問題。這些專家的意見通常都可被他們所勸告的人接受，假如他們提出意見的方式不太生硬和執拗；不過，這只是把問題移動了一步。因為幾乎在一切社會中都曾經驗到專家是一個好僕人，但却是一個壞主人；他適宜於對他所專長的事務作建議，但他常常不能瞭解他所建議的路徑的廣大影響，亦不能估計他的特殊範圍在與其他範圍的關係上，有如何的價值。所以，民主政治或民主政治的代表（不論他們是如何選出的），必須不僅是選擇他們的專家，而且也要選擇專家所建議的路徑。這就是說，他們本身必須有充分的知識和經驗（經驗常常和知識同樣重要），在敵對的要求之間下判斷。這樣的結果，在現代社會中，尤其是在準民治的社會中，是不幸而重視年齡。經驗這種東西只能由歲月得來——這並非是說一切人都可由歲月得經驗，因為有許多人的頭腦好像根本就不能得經驗，並且更多的人好像很早就失去任何有用經驗的能力；並且知識（甚至不是專門知識）不是在短時期內可以得到的。即使我們的教育制度與現代問題的隔離不像現在這樣遠。許多人必定時時感覺到，假如運氣轉變，忽然叫他們來管理國家，他們一定要失敗，因為他們完全不知道若干世界大戰後的國家的位置，或金本位的意義，或其他十分單純但重要的事實，並且他們至少需要十年的教育，才能去大膽擔任這種工作。

皮梯(Pitt)能在二十四歲受人信任當了國務總理，這種時代已成爲過去的了，這不是因爲現在的二十四歲的青年生來就比十八世紀的青年人愚笨，而是因爲皮梯那時所要應付的問題比現在的少得多而且簡單得多。

結果。政府愈來愈落在老年人或正變得年老的人的手中，並且這種趨勢在民治的社會中更厲害，因爲民主政治傾向於（尤其是在政治穩定的時候）使一個人在證明他的才德之前，等待若干年，並且日後對於他的更換很顧惜。英國的兩次工黨內閣的閣員平均年齡都很高，並非完全是一件偶然的事。我們必須反抗這種趨勢；因爲牠容易產生一種猶豫不決的和偏見的政策。並且疏遠了青年人的熱心。我們並不是堅持說，一切老年人都是愚笨的或愚笨的守舊，因爲有顯然相反的例子；並且我們也不是堅持說，青年人永遠是對的，因爲不幸的是青年人常常是錯誤的，並且以較年青的人爲主腦的政府，常常造成最大的和不幸的錯誤。但是，作錯事情總比完全不作事情好；我們不能否認，較年長的人大都趨向於反對創試，因爲習慣是強有力的，又因爲假如創試失敗，他們的損失必多。我們也不否認，如果一個制度使青年人在他們久已成年之後，仍處於不負責的地位或被動的地位。這個制度就是走向停滯和使人醒悟的路徑。

這種情形的補救方法，和真正的問題的大多數補救方法一樣。不是簡單的。我們已暗示出。補救的方法一部分在於使專家和有知識的人與那些他們對之貢獻意見代謀利益的人們之間，有適當的隸屬關係。此外尚有許多事可作，並且在一個平等的社會中可以作到。其方法是改進一般的教育的性質和內容，使教育製造自由人，不製造工廠奴隸，並且應當教授與人民將來的生活較有關係的科目。現在的對於科學、政治、和經濟科目的書籍的廣大需要。反

映出許多人覺悟到，從至少六七年到至多二十年的教育課程。很奇怪的不能教他們現在他們感覺到要知道的知識。

但最後一着，是把社會制度的各不同部分的責任，廣大的散布開。唯有這樣，這個問題才能解決。人類只有在實際統治中，才能學會統治，不論是統治自己或任何人；民主政治的最大希望，在於把責任分散給極多的自治組織，不論這些組織是工業、城鎮、學校、或其他名稱的組織。藉着這種實際的行動，可以把那些最對他們的組織盡力的人訓練出來。在這方面，西方人心目中一向的民主政治，可以從法西斯主義得到一些實際的教訓，並且可以從俄國共產主義得到更多的實際教訓；因為這些制度由於牠們設立的情勢，不能等待牠們的擁護者成熟為可尊敬的有經驗的長者，於是牠們不得不藉着行動來教育地方的和機能團體的首領以及國家的僚屬。凡是去過俄國的人，都能對於俄國青年人（甚至我們應當稱作幼童的青年人）的負一部分建設社會工作的責任，得到一種印像；並且俄國尚有特別的一點，就是已把這種方法同樣的推廣到男女兩性。共產制度相信並且利用婦女的社會和政治的潛勢力，而法西斯主義否認牠們，西方的『民主政治』只利用了牠們的一半。對於這一點，正如同其他問題一樣，細詳的答案自然是因國家而異。但是，如果去為一切願意有工作的人，創立自尊的負責的職業，那麼，民主政治最後一定能解決了牠的問題——假如這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第三章 議會制度與自治

在十九世紀的過程中，人們的心內漸漸把兩件很不同的東西——議會制度與民主政治——幾乎當作一件。這是因為在十九世紀中，民主政治的興起是在比較先進的國家，主要是在已有的議會制度的結構以內，並且落後國家主要是在摹仿先進國的制度。『議會制度』——代議制政府——『民主政治』是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盛行的信條的撮要。但實際上，這三件東西中任何兩件都不能相等。議會不一定是民治的，並且牠也並非永遠是政府的機關。代議制政府無需是議會制的或民治的。牠在於代表制的性質和『着重點』。民主政治無需是議會式的，或者甚至無需以通常意義的代表制度為基礎。在十九世紀，政治的範圍好像變狹了，只餘下議會制度在牠的範圍內。但現在在這三件事的精巧的相等，已不可能了。

議會的起源不是政府的機關，而是批評的機關。皇帝握統治權；國務員(Ministers)在實際上和理論上都是皇帝的國務員。議會的存在是爲了皇帝可以有諮詢他的人民的方法，尤其是關於稅收的事。並且假如可能，他可以藉此得到人民的同意。因爲不能把所有的人民都召集到一塊——甚至不能把意見受人重視的人都召集到一塊——只有最重要的個人被召集到一塊，並且代表制的計畫就是爲藉此諮詢其他的人。代表們來聽到皇帝的提議，回去報告給他們所代表的人們。皇帝不承認議會有立法權，甚至亦不承認議會有權否決他的提議。諮詢是使政府的運用圓滑的一個方法，不是承認人民有參政權。

或者更可以說，來聽皇帝的意向的代表們，亦沒有被承認有這種權利。當皇帝承認他的權力有限制的時候，他是承認了大的封建君主在『議會』（Council）中的權力。不是承認貴族和平民在議會中的權力。英國的皇帝專制的變緩和是因封建貴族，不是因人民的代表。但諮詢的實行很容易長成一種權利，尤其是如果皇帝不能靠自己生活而必須收稅。如果人民幫助或妨礙收稅人員的力量很大。除此以外，或許皇帝更適於假借他的忠實的下院議員，來抵抗大的封建君主們的傲慢要求；但他如果不擴大下議員的『權力』把國家的事務諮詢他們。他不能達到這個目的。

在這兩個方式之下，『人民』選出的代表的權力就增大了，尤其是因為封建君主的勢力隨着中世紀的過去，和國家的精神、國家的組織、及國家的市場的發達而衰弱。稅收上的諮詢權變為允許或拒絕供給的權利；並且在這個權利之上漸次建築起以人民代表為唯一立法機關的要求。皇帝利用下議院幫助他打倒封建君主；但皇帝的這種辦法又給他的專制政體樹立起一個新的反對者。漸漸皇帝的國務員們亦對議會負責，如同對於皇帝一樣；以後。對於議會負責的責任遠過於對皇帝負責的責任。議會漸漸不僅變為立法機關。破壞了皇帝藉『命令』或特別的不對人民負責的議會，如明星議院（Star Chamber），來統治人民的權利。而且變成一個可以否決國務員的任命的機關。終於變成一個全體國務員必須直接由牠產生的機關。這就是意義充分的議會制度。如同英法二國的議會制度。但這種形式的議會制度美國永沒有成立過；並且德國在一九一八年以前亦沒有成立過。

不列顛的議會制度

英國的議會——英國的議會以『議會之母』聞名——雖然得到這些權力，但却永未成爲一個民治性的機關。牠

一向是包含上下兩院，其中之一幾乎完全是世襲的。（除去那些主教和『天授貴族』有議席之外；並且這種主教的議席是世襲的。雖然不是依血統世襲——原註。）雖然，由選舉而來的『下』議院漸漸建立起牠的優越地位，其方法是獨握財政權，亦即獨握允許或拒絕租稅權。但這個下議院的本身，就不是民治的。這意思是說，直到最近以前，牠仍是代表那些社會的重要性很高足以得到代議權（因為不能單獨的諮詢他們）的人們。下議院議員所代表的，不是全體人民，而是州郡的武士和自治市的自由公民——換句話說，就是在封建貴族之下的重要的納稅人。他們的被諮詢權不是一種民治的權利，而是一種以他們『對國家的利害關係』為基礎的財產權。實在，英國的議會在十七和十八世紀中變得甚至連這些份子都大部分不能真確的代表。這一部分是因為代表制的基礎未能適應有資產者的地域分布的變動，一部分是因為在這個時期的開始，牠就因『腐敗的選舉市邑』（即沒有任何選舉人或真正要求要出代表的市邑）的造成而被從容的弄成虛假的了。這種市邑的造成是為擴張皇帝的勢力。但大多數批評家並不譴責一八三二年改革案以前的制度為『腐敗』，因為牠原不是民治的；並且牠永未打算要成為民治的。他們對牠的指責，是說牠未能公平的代表資產階級。

甚至那把『腐敗的選舉市邑』掃除並且將選舉權推廣的一八三二年的改革案，亦完全不是一個民治的方案。牠僅使下議院的代表與因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改變了的資財分配相適應。一八三二年以後的議會根本仍是一個資產階級的議會。

一八六七年的改革案亦不是英國承認民治的要求的第一個改革案。一八六七年的改革案對於增多選舉人，遠過

於一八三三年的改革案。牠給與城市內納地方稅的工人選舉權。但鑛業區和農業區的工人和城鎮內很大一部分不是家長的工人以及全體婦女，仍然都沒有選舉權。在原則上牠仍然是代表重要的納稅人，不是代表人。

雖然，實際上，一八六七年的改革案確可說是民治代表制的開端。因為這新得到選舉權的階級與無選舉權的階級界線不十分明確。在代表資產的舊原則下，無選舉權的階級尚可被吸收到有選舉權的階級之內。要想在一八六七年所達到的地步停止，已不可能。在一八八四年，農業區得到選舉權，並且城市內有選舉權的工人亦加多。但在一九一八年以前男子普選未能實現；並且從一九一八年起婦女亦有選舉權。雖然完全的兩性平等直到一九二八年才建立起來。

我們的要點是在說明，先有議會，並且議會的發展為代議制政府制度，遠在牠具有任何近似民治的性質以前。十九世紀的民治運動把牠自己鑄成議會制的形式，因為議會制度在那裏等着接受牠。民治的議會制度不是一件事，而是兩件事——即民治的選舉權被置放在先牠而有的議會制度中。

合衆國

以上是不列顛議會制度的演進。牠的重要性是因為大不列顛被認為議會制國家的模範。在其他國家，議會制度演進的路程就不同了。例如合衆國的政治制度的發展，就和英國十分不同。合衆國先有殖民『議會』，以狹窄的選舉權為基礎，算是英皇的顧問機關，殖民總督是英皇的代表。以後這些『議會』變得有一些責任政府的意思。等到與英皇脫離之後，美國人發現有為他們的新國家成立聯邦式的政府的必要。制定合衆國憲法的代表是依狹窄的選舉

權選出的——在四、〇〇〇、〇〇〇人口中，僅約一五〇、〇〇〇人有選舉權——從此以後選舉權漸次推廣如同在大不列顛那樣（但各州的選舉權的推廣是不一致的），直至演成實際的成人普選。但合衆國議會制度的演進沒有造成一個對議會——國會——負責的行政機關，而是依『三權分立』的原則造成一個對國會獨立的行政機關：所以議會制度在合衆國永未被認作民治的工具或代議制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在合衆國憲法之下，總統站在代表人民的地位，和國會中全體議員代表人民的力量相等——假如不比他們多；所以合衆國永未成爲一個意義充分的議會制國家。

法蘭西和德意志

法國也是經過了憲法上的許多興衰，始在一八七五年成立了男子普選；這種憲政發展上的缺乏繼續性，深刻的影響到法蘭西國家的性質，毀壞了舊統治階級的勢力和地方統治機關的勢力。這使法國在中央集權上遠甚於英國；並且又使議會民主政治的出現。不是一個大家都接受的長期繼續演進的結果。而是一種革命的力量，留下未解決的反對份子。仍存留在人民中間。在一種意義上，這使法國的議會制度比英國的更民治。英國的議會仍保有從前遺留下來的很多的貴族份子。但牠也防礙了議會制度和民主政治的完全同證。這種同證是英國思想的特點。法國的政治思想中一向有一種潛伏着的拿破崙精神（Bonapartism）——從代表會議以至民選的領袖都有這種潛伏的精神；並且這種精神永遠在阻止法國議會的聲譽。不使牠在一切階級的人的心中增長。

直到世界大戰之前。德國尙是站在另一個立足點。德國下議院（Reichstag）是根據男子普選。但牠決不是意義充分的立法權的根源。牠受着聯邦議會（Bundesrat）的遏制。聯邦議會是受普魯士支配（普魯士仍有封建彩色濃厚的

憲法），並且是以各邦政府爲基礎，而這些邦根本都是非代表制的和非民治的；牠又須應付皇帝委任的國務總理（Chancellor），他決不是牠的僕役或牠推薦的人。在一九一四年德國的議會制度僅僅渡過『顧問』階段。德國得到普選（可說是男子普選）是在議會制度成立很久以後。

代議制政府與民主政治

雖然，英國的政治理論家根據他們對於英國政治情況的見解，堅決認爲議會制度與代議制政府及民主政治是一件事。這在約翰密爾（J. S. Mill）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並且一九一八年以後的歐洲新國家的憲法，都是受英國再加工上法國的強迫的影響。不過，同時有一個很不同的政府形式正在俄國發展着，也是走向民治之路；並且俄國的統治者宣稱不承認議會制國家是唯一的民主政治，或者甚至完全不承認牠們是真正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與蘇維埃

實在，俄國的新領袖的確不要他們的制度是民治的。他們宣布他們的制度是一個獨裁制——一個階級的獨裁制。但他們力說，即使以獨裁制而論（他們認爲牠純粹是過渡階段的特徵），他們的蘇維埃制度所含的民治性，比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制度和普選制度都多。他們這種說法，不完全是因爲他們的選舉權在實際上和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一樣廣大，並且遠大於婦女無選舉權的一切國家，而是由於他們認爲蘇維埃是真實的代表制，其真實性遠過於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任何議會的可能的真實代表性。他們力說，代議制不僅是數選票，重要在取得公民的積極的合作，並且使他們能選擇代表，不以個人的地位在某一地理區域內選舉政黨的推薦人，而是站在積極的人民集團的地位

，從事於社會的公共事務。他們說，蘇維埃是直接由人民產生的，是民衆行動的機關，目的在發表痛苦和直接根據這些痛苦發表一個政策；所以，蘇維埃的代表俄國，其意義絕非帝俄改制下的地方議會（Zemstvos）和其他行政機關所能及。

現在，蘇維埃的要義並不在於牠的選出是由工業選舉區不是由地理上的選舉區；因為牠大部分不是如此。蘇維埃制度並未創設下以工業代表為基礎的總機關，來統制工業。蘇維埃的要義在於牠是一個積極的社會集團的需要和願望的表現。因此牠所能代表這個集團的方式，是在議會制度下不可能的。蘇維埃制度是建築在團體代表制之上，不是建築在個人代表制之上；所以較大的單位是藉間接選舉建立起來的，不是藉直接選舉。有人反對這個制度，說牠使共產黨易於統制，共產黨能『控制』這種選舉，比『控制』議會制度的選票容易得多。這的確是事實，雖然合衆國南部各州以及歐洲近來的選舉經驗，已表示出議會制下的選舉在必要時亦可被『控制』；但他們有一點未能認識，即代議制度應當是表現有組織的團體的意見，不是表現公民個人的意見。其他國家的經驗——例如羅馬尼亞或現在的德國——已表現出，有一種議會制的選舉，完全是為使無窮盡的多數人向在朝黨屈服而設的；並且在東歐，議會制度的運用表明蘇維埃式的選舉比較適宜於落後人民的需要和政治能力。不論牠是否適宜於進步的教育程度高的國家在政治『穩定』時的政府。蘇維埃或類似蘇維埃的制度，或許成爲一個新社會制度的必須的政治組織的方式。並且也許人類可以從蘇維埃的方式，經過我們現在尚不能預料的變化和適應，發展出新的政治組織，越過議會制度，走向真正民主政治的完成。

自治的精義

民主政治（假如牠能變為真正的）需要一種柔性的組織方式，這不是議會制度所能供給的。議會制度成為主權國家的政府的承繼者。牠得到主權國家的集權趨勢，並且得到主權國家的習傳，以為最後的責任和權力應當全集中在一處。不過，民主政治是敵視集權的；因為民治是一種精神，這種精神要自由立刻當場表示出來，不論在任何場合。只要這個場合有表現集體願望的需要，要引導牠，使牠完全走入一個總途徑，就等於毀壞牠的自然發生性，並且使牠成爲不真實的。此外，這種辦法的結果是事務日漸擁擠，並且是嚴重的耗費時間。政客是假設代表一切人的，但他們恐怕弄成只代表他們自己而不代表任何人。公民能使集權失敗，其方法是撤回他們的參與和擁護，並且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藉以竭力躲避國家的干涉。特別是法國人，已把躲避國家的干涉發展爲一種美好的藝術，因此大大減弱了國家的真正權力，雖然國家把握着很大的中央集權。他們聳一聳肩，仍去從事他們的商業，把國家拋到腦後。

如果一國人民會運用這種方法，這種方法也許是很好的。只要沒有搖動社會制度的基礎的事情發生。但這種方法使國家變軟弱，而且沒有提出任何可替換的社會組織的方式，在需要時來接濟牠或替代牠。法蘭西共和國是一種民主政治；但牠大部分是一個社會的民治，而不是政治的民治，並且牠不能抵抗內部的攻擊，如同我們近來所顯然看到的。

假如有一個社會確是要成爲真正民治的，牠必須在牠本身之內創設種種柔性的容易運用的組織。每個組織代表

一組從事於共同事務或有共同利益的公民的集體態度。一個公民能同時屬於許多這樣的團體——能參加他有利益和活動的一切團體，只要爲了他的利益和活動，他感覺到有和他的同人組織起來的需要。這些『集體組織』不一定永遠是對各該事務負責實際管理責任的機關。有的集體組織可以是這樣，或者有許多是這樣。但其他集體組織是作建設的批評的機關，不是正式的管理機關。例如，一個工廠可以由一個經理管理；但工廠內有工廠委員會，其目的不僅是或主要是依工會方式作集體爭議，而且是發表工人對於種種問題的意見，在作共同工作上與管理方面積極的合作，並且表明工廠工人對於工廠生活影響及外界生活的意見。那時將有『鄰里』團體興起，牠不僅是市政府的機關，或選擇市參議員的『細胞』，而且是處理各種由其共同居住於某一區域或村莊或住宅區而發生的共同問題的機關。那時對於各種運動、藝術、科學、和社會事務有興趣的頭腦相同的人，就要組織起團體來。其數目將遠多於現在；並且在一個民主政體中。所有的這些團體不是被認作與『政府』十分遠離的，而是承認牠們爲民治行政工作的重要的助手。俄國的『集體組織』的工作，就是這種形式的社會的嘗試。這種社會以這些『集體組織』爲工具，可以滿足同業組合社會主義者在攻擊議會制國家時所著重的需要；並且有一件事很重要。即義德二國在全圖建立『極權』國家的時候，不待不廣設冒牌的『集體組織』。這兩個國家的『集體組織』不是真正的『集體組織』，因爲他們不是依共同行爲的人們的意志由下而上自由成立的，而是由上而下強加在人民身上的，如同大人有時候強令兒童玩他所不喜歡的遊戲，又如同一個無禮貌的女主人堅持要包辦一個家庭茶會的『娛樂』項目。

組織的自然發生是真正民主政治的標幟。但這種自然發生性的存在，必須重要的組織有結構。如果沒有這種結

構。自然發生就等於紊亂。並且使社會分裂。人們必須對於他們的一般的的生活方式有一個一致的同意，他們才能在自然發生的團體中為他們的共同目標合作，不致在團體與團體之間時時發生爭執。所以在他們能安定下來一同過民主式的生活之前。他們必須決定使社會的重要組織成為怎樣的。財產權的方式、分配收入、積聚資本、以及推進重要事務和工業的一般的方法。必須制定得能供給一種組織的結構，使人民的自然合作在這種結構中有發展的餘地。此外，假如自然發生性的存在不致引起根本的意見分歧。這些重要的組織必須是能滿足大家對於社會公平的意見的，不是滿足每個人的意見的。因為在何社會中亦有些有痛苦的人；但是，一個集體的意見普通已足以保證重要的組織有一個强有力的使人同意的基礎。

我們不相信這種情形能在發達的工業社會內實現，除非是以公有權 (public ownership) 為基礎。至少亦須一切重要的工業和事務歸為公有。因為在這樣的社會內。生產工具的私有必然把人分為競爭的經濟階級，這些經濟階級為分一份公共的供給而爭奪。甚至即使這些階級區分不是社會中的唯一區分，甚至即使這些階級常常是交錯不清的並且有時候暫時被其他區分越過，他們的存在仍必然的構成一種『病痛』，這種『病痛』將阻止社會組織的自然發生，使牠不能有助於共同的目的，並且將使牠成為衝突的工具，破壞社會機構。部分的民主 (democratic enclaves) 可以存在於依這種基礎組織的社會內。如同議會制國家久已有的。但任何充分意義的民主政治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能存在；因為民主政治根本是一種精神，這種精神產生於經濟的和社會的平等，不僅是產生於選舉權的平等。除非在一個已廢除階級的社會中，不能有真正的整個的民主社會；除非把主要生產工具的私有權廢除。不能廢除階級。

實在，對於落後的社會，民治問題常常成爲分布私有權的問題，不是限制私有權的問題。在法國革命時就是如此；並且在農業國中，向民主政治的發展的最先一步。永遠是使農民實際領有土地。這種事情最適合流行的社會公平的意義；並且任何組織皆不能以民治的方式設立，除非運用牠的人們認爲牠是公平的組織。但在工業社會中，將土地分給農業工人並未把問題解決。因爲這並未解決了工業問題。並且因爲實際上『被解放了的』農民必定落到資本家的商人和金融家的控制之下。因爲這些人控制着市場和必需的信用的來源。在這種國家，甚至即使土地大部分握在農民個人手中，出品的售賣和信用的供給亦必須受集體的 control，假如農民要想享受些真正的自由。俄國人的竭力迅速使農業『社會化』是否是對的，仍是一個可爭論的問題。但我們不要忘記，俄國的土地大部分不是劃歸國家的農業組織，而是交給農民的『集體組織』。這種組織是以農民自己集體管理的意義爲基礎。俄國的『社會化』的農業，不是國家的農業，而是合作性質的農業：替代農民個人的不是國家，而是盛行的農民集團。

分配主義者以爲補救社會苦痛的辦法，是分配私有財產，不是使私有財產社會化。這種意見對於工業國中的主要事務的經營都不適用，對於分給每個公民一份『社會利得』（即經濟制度的總生產額中的一份）。這種意見或許是對的（在若干形式之下，牠無疑的是對的）；但這必須在社會公有權的基礎之上才能辦到。在工業社會中，需要分配的不是有生產力的財產，而是收入。這就是說，除生產工具之外，私有財產不應當廢除。在一個民治的社會主義的社會中，生產工具已歸公有，私有財產的分布將要比現在普遍的多。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極大部分人民僅有極少的個人用的私人財產。民治社會的目的，是一方面普遍的分配個人用的私有財產，一方面在工業所有權上限

制個人私有權。

在那些議會制度已變成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慣的國家，我們心目中的民治社會或許可以保留着些議會制度的痕跡。但牠們（指著者心目中的民治社會，以下同此——譯者）的議會一定和現在的議會很少有相似處。牠們的大部分工作——或許差不多全部分——將轉到其他集體組織手中。這些集體組織負起各種社會和經濟的組織的特殊工作。牠們將是極不集權的，是柔性的，繼續不斷的有新組織興起，來應付新的需要。並且舊組織時時可凋謝，如果牠們的需要已不存在。最重要的是，牠們不怕牠們的公民中的自然發生的運動，並且準備把社會的職務託付給各種自身興起的團體，只要能立即勝任這種工作。牠們的政府的構造將是很不整齊的，並且極不容易在一冊憲法教科書中寫出一個大綱來；因為構造整齊和自然發生性是不相合的。牠們的目的是盡量多使牠們的公民在社會需要幫助的一切地方，作積極的幫助；並且牠們極不注意形式，而極注意民治組織的精神。

這種自由社會的歲月尚未到來；並且人類須經過一個困難的工作，才可完成這種種社會。因為必須等到人類建立起一個確可滿足大家的公平意識的社會組織的結構，這種社會才可實現；建立這些組織的奮鬥工作，大部分仍然留在我們面前。但是，假如這種社會是我們所要的社會——這就是說，假如我們真正信仰民主政治——我們必須準備去作這種奮鬥，並且用我們的一切力量，去和那些冒牌的主張民治者奮鬥。這些人設立下組合國家（Corporative State）的有訓練的專制，來抵抗民主政治的自然發生性。因為民主政治不驅使人：牠幫助人尋找他們自己的領袖；我們之中的民治主義者，須擔任起建立社會結構的工作，在這種結構中，一般人民的衝動和欲望可以得到充分的發

揮。

第三章 議會制度與自治

——(完)——

參考書目

關於大戰後的歷史和政治情況的書籍。

參
考
書
目

- C. Delisle Burns: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8-1928. 1928
R.L. Buell: Europe, a History of Ten Years. 1929
R.L. Buell (ed): New Governments in Europe. 1931
I. Bowman: The New World. Revised edition. 1930
A.J. Toynbee (ed):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S.D. Schmalhausen(ed): Recovery through Revolution. 1933
R.D. Charques and A.H. Ewen: Profits and Politics in the
Post-war World. 1934
League of Nations: Ten Year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1930
A Headlam-Morley: The New Democratic Constitutions of Europe.
1929
The Statesman's Year Book.
The Europa Service.
Current History (New York, monthly)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quarterly)

關於政治理論的書籍

(A)初步的小書——歷史的

- C. Delisle Burns: Political Ideals. 1915
Phyllis Doyl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1933
G.D.H. Cole: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1929
G.D.H. Cole: Modern Theories and Forms of Political
Organisation (reprinted from An Outline of Modern
Knowledge) 1932
H.J.Laski: Political Thought from Locke to Bentham. 1920
E. Barker: Political Thought from Herbert Spencer to the Present
Day. 1915

(B)初步的小書——理論的

- H J. Laski: Introduction to Politics. 1931
C.E.M. Joad: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1924
G.D.H. Cole: Social Theory. 1920

(C)較大的書——一般的

- Graham Wallas: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1908
Graham Wallas: The Great Society. 1914
R. H. Tawney: The Acquisitive Society. 1920
R. H. Tawney: Equality. 1931
H. N. Brailsford: Property or Peace. 1934
R.M. Maciver: Community. 1917

- Krabbe: The Modern Idea of the Státe. 1922
 T. Hobhouse: The Metaphys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1918
 G. Wells: 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 1933
 S. Woolf: After the Deluge Vol. I 1931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1915

(D) 社會學方面的

- A. Lichtenberge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Theory. 1924
 Oppenheimer: The State. 1914
 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1899
 W. Bagehot: Physics and Politics. Various editions
 H.S. Maine: Ancient Law Various editions

(E) 歷史的

- A.E. Zimmern: The Greek Commonwealth. 1911
 B. Jarrett: Soci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s. 1926
 E. Halevy: The Growth of Philosophic Radicalism. 1928
 D.G. Ritchie: National Rights. 1903
 W.A. Dunning: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3 vols. 1905
 G.P. Gooch: English Democratic Idea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2nd edition 1927

(F) 社會主義的

- H.W. Laidler: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1927
 G.D.H. Cole: What Marx Really Meant 1934
 M. Beer: 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Karl Marx. 1921
 S. Hook: 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 1933
 K. Marx and F.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Various editions
 N. Leni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Various editions
 H. J. Laski: Communism. 1927
 J. Strachey: The Coming Struggle for Power. 1932
 E. Burns: Capitalism, Communism, and the Transition. 1933

(G) 法西斯主義的

- J. S. Barnes: The Universal Aspects of Fascism. 1927
 J. Strachey: The Menace of Fascism. 1933

關於國際關係的

- Norman Angell: The Unseen Assassins. 1932
 R.L. Buel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29
 League of Nations: Ten Years of International Co operation. 1930
 F. Morley: The Society of Nations. 1932
 L.S. Woolf (ed.): The Intelligent Man's Way to Prevent War. 1933
 P.B. Potter: A Manual Digest of Common Internatinal Law. 1932